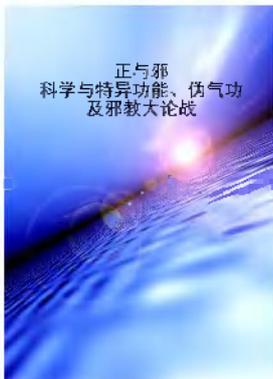


正与邪
科学与特异功能、伪气功
及邪教大论战



反·邪·教·书·系

正 与 邪

——科学与特异功能、伪气功及邪教大论战

申振钰 曾昭贵 徐升国 著

群众出版社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与邪：科学与特异功能、伪气功及邪教大论战/申振钰，曾昭贵，徐升国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6

(反邪教书系)

ISBN 7-5014-2508-6

I. 正… II. ①申…②曾…③徐… III. 邪教 - 批判 IV. D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8598 号

反邪教书系

**正与邪——科学与特异功能、
伪气功及邪教大论战**

申振钰 曾昭贵 徐升国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88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508-6/B·17 定价：24.0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中国文联坚决拥护党和国家关于
处理和解决“法轮功”组织的决定



首都艺术家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召开的座谈会上，
深入揭批“法轮功”。



执法机关收缴的部分有关“法轮功”的非法出版物，正是这些非法出版物毒害了众多“法轮功”信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柯云路的部分著作。他专心为各路“大师”作传，推波助澜，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了很大混乱。



“大作家”柯云路(右)和沈昌



柯云路与陈林峰



柯云路与他人交谈

准呈报过报的决议。8月5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与中国自然科学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所筹建工作的决定。

至于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会已被撤销，今后如有有人以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所为名从事违法活动，违反国家法律，应依法予以追究。

感谢贵会公安部门的关心和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对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 第2086号提案的答复

公字[1982]443号

你们提出的关于请政府认真查处“伪科学派”一口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据了解，所谓的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会实际全属由北京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所、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等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所成立后，随即气功科学研究所的自命自封组织。据中国科协分会工作组提出报告，中国科协分会工作组曾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予以受理立案，后因北京中科院提出不予立案的证明材料，才不予立案。9月21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副所长办公会，明确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协批准，在未经过审批的情况下，7月11日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以上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成立，属违法行

地址 电话 5121124

办证处印



庄逢甘、王大珩、朱光亚、邹承鲁等院士出席《伪科学曝光》首发式。



这是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的场面，“大师”又在欺骗学员现场制作所谓“信息锅”，令人啼笑皆非。



反伪科学的两面旗帜：于光远(右一)和何祚庥



何祚庥、龚育之、任继愈、司马南、刘吉等反伪科学斗士在一起。

出版说明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许多邪教组织,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也出现了邪教组织,其中有的是土生土长,有的是从国外渗透进来的。它们秘密结社,宣扬歪理邪说,大搞教主崇拜,实行精神控制,疯狂聚敛钱财,阻碍人类文明进步,已成公害。邪教不除,民无宁日,家无宁日,国无宁日,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1999年4·25事件以后,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在全社会特别是党员中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教育,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对邪教的免疫力和识别力。为此,我们及时组织编写了这套反邪教丛书,它集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以帮助人们认清邪教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本质。

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对我们编纂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给予批评指正。

群众出版社
2001年5月

前 言

我们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在新的世纪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期待着科学更加发展、社会更加进步和谐。但是,我们在展望光明的前景时,千万不要忽略了在世界上还有一股使社会退回愚昧的暗流,那就是邪教。如果说过去我们对邪教还不大注意,现在不同了。大家对于近些年来在世界各国发生的一件件、一桩桩邪教事件都感到触目惊心,尤其是“法轮功”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癌瘤。

在过去的 20 世纪中,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股逆流,那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时代运动”(也称为“新世纪运动”)。这股逆流宣称科学时代已经过去,传统宗教已经过时,代之而起的将是全新的宗教和思维能力统治世界。与此同时,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又展开了一场秘密的“心灵战”(即幻想把“特异功能”用于未来战争),这就促使一批江湖骗子、巫婆神汉粉墨登场,也促使“新宗教”运动风起云涌。在世界各国兴起的“新宗教”数以千计,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

教主膜拜团体(CULT),而其中又有一些成为危害社会的极端组织(EVIL CULT),也就是今天的邪教。

中国同样也未能置身事外。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已经卷入世界上“新时代运动”的逆流中去了。“中国的新时代”宣称:中国的新时代运动发端于1979年3月11日,因为,在这一天《四川日报》刊登了四川大足县发现了儿童唐雨能够用“耳朵识字”的消息。随后又涌现一批具有各种“特异功能”的人和事,但是,这些“特异功能”很快就被科学鉴定所揭穿,也就是说“中国的新时代”运动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骗局的基础上。

在这第一阶段,许多社会知名学者和中科院院士对这类作伪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于光远先生还撰写了长文分析和批驳了这一系列的伪劣表演。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人又打出了“人体科学”的旗号,说什么:“人体科学的幽灵在徘徊”,象征着将要出现第二次文艺复兴。而什么是“人体科学”呢?这在1987年6月15日召开的会上的一个重要发言中说的很清楚:“所谓搞人体科学”,乃是“用了一个别名”;“搞人体科学的是搞人体特异功能的。因为,这个特异功能,人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就把它换了一个词,不叫特异功能,叫人体科学”。很清楚,他们就是幻想一次大革命,用“特异功能”来改造社会。

随之而来的是“神怪气功”的兴起,他们与“特异功

能”互相配合,就像西方“新宗教”排斥传统宗教一样,把传统气功斥为低层次的而加以排斥。于是,80年代中叶,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光怪陆离的打着气功旗号的邪教和准邪教组织。分析其根源,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会道门”组织的沉渣泛起,他们常常打出佛家或道家的旗号,例如自称是玉皇大帝的女儿张香玉的“大自然中心功”;自称是金麒麟转世的“麒麟文化”;自称是佛家第56代传人、“东北的红太阳”张小平的“万法归一功”;自称是由唐玄奘到济公一脉相承的功法,修炼20年后到世间传道的“×功”;还有与解放初就取缔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同善社”一脉相承的“××功”……;另外,还有由台湾渗透进来的邪教组织,如“观音法门”、“宋七力天人合一学会”……。至于邪教“法轮功”的兴起就无需多说了。

回顾20年来,我们经历了从“特异功能”——“神怪气功”——邪教的历程。“人体科学家”们并没有迎来“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春天,也未能主宰“新世纪”,反而成为当代邪教的“舆论”和“科学”根据,从而陷入世界上同声讨的反科学、反社会、反进步的逆流。

人们往往是当局者迷,事后才能清醒。回顾这20年来的斗争史,我们才清楚这原来不简单地是科学的真伪之争,也不是“特异功能”的有无之争,而是一场关系到整个社会是前进还是倒退到愚昧落后和邪恶势力复辟之争。

以史为鉴,使人聪明。这本《正与邪——科学与特

异功能、伪气功及邪教大论战》正是以史为线，阐述 20 多年来，科学界与在中国大地上风靡的人体特异功能、伪气功和邪教的论战与较量，以此诏示公众，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科学研究的东西，但要达到科学真理的境界，确也没有什么科学以外的捷径。

郭正谊
2001 年 6 月 10

目 录

第一部 “特异功能”辨

第一章 中国灵学小传	(3)
第一节 灵学传入中国	(3)
第二节 20世纪初中国的灵学活动	(4)
第三节 “赛先生”斥灵学	(7)
第二章 “耳朵认字”起风波	(12)
第一节 特大新闻——唐雨“耳朵能认字”	(12)
第二节 “耳朵认字”是怎样出笼的	(14)
第三节 科学界测试——“耳朵认字”是假的	(19)
第四节 本应停止下来的荒谬宣传	(23)
第五节 “独具慧眼”的李学联	(27)
第三章 “特异功能”风靡全国	(32)
第一节 《自然杂志》的带头	(32)
第二节 追逐猎奇的新闻媒体	(35)
第三节 大科学家首创人体科学	(40)
第四节 舆论准备与组织准备	(42)
第五节 人体科学研究会(筹)成立	(47)

第四章 有识之士驳斥“特异功能”	(53)
第一节 邓伟志挑战《自然杂志》.....	(53)
第二节 建立组织.....	(56)
第三节 卓有成效的工作.....	(59)
第四节 “兰大”的功劳.....	(63)
第五节 力排众议,力挽狂澜.....	(69)
第五节 于光远不再沉默.....	(75)
第五章 “三不方针”出台内幕	(86)
第一节 激烈争论.....	(87)
第二节 胡耀邦的第二次批示.....	(99)
第三节 “三不方针”出台.....	(108)
第四节 胡耀邦肯定“三不方针”.....	(109)
第五节 暂时的偃旗息鼓.....	(111)
第六章 “特异功能”向“气功外气”演化	(119)
第一节 “气功外气”就是练出来的“特异功能”	(119)
第二节 “气功”——开发人体潜能的钥匙?	(121)
第七章 国外“特异功能”面面观	(124)
第一节 招魂术的表演——灵学的起源.....	(124)
第二节 灵学研究会建立.....	(125)
第三节 灵学中心的转移.....	(127)
第四节 灵学发展的全盛时代.....	(129)
第五节 美苏灵学讹诈.....	(131)

第六节	美国“星门计划”及其终结	(136)
-----	--------------------	-------

第二部 气功真伪之争

第八章	气功与“科学革命”	(143)
第一节	大江南北气功潮	(143)
第二节	大科学家再倡“人体科学”	(149)
第三节	人体科学小组及其活动	(160)
第九章	严新“大师”兴衰记	(168)
第一节	一鸣惊人	(168)
第二节	清华外气实验辨真伪	(173)
第三节	众志成城破严新	(180)
第十章	气功“超人”走麦城	(183)
第一节	兰迪中国行	(183)
第二节	何祚麻力克张宝胜	(192)
第三节	“玉帝女儿”张香玉趣闻录	(203)
第四节	庄逢甘戮穿陈林峰	(211)
第十一章	中功“宗师”张宏堡	(215)
第一节	横空出世	(215)
第二节	中功实业	(221)
第三节	走向祸乱	(226)
第十二章	司马南“捉鬼”	(231)
第一节	司马南登场	(231)
第二节	挑战柯云路	(233)
第三节	决战终南山	(235)

第十三章	1995年向伪科学宣战	(246)
-------------	--------------------------	-------

第三部 “法轮功”大起底

第十四章	“大师”真面目	(257)
第一节	李洪志出山	(257)
第二节	“法轮功”成势	(265)
第三节	早期学徒揭老底	(273)
第十五章	向邪教转变	(284)
第一节	建立严密组织	(284)
第二节	宣扬歪理邪说	(287)
第三节	各界人士揭露“法轮功”本质	(293)
第十六章	中南海事件	(299)
第一节	媒体与“法轮功”大斗法	(299)
第二节	何祚庥又捅马蜂窝	(309)
第三节	围攻中南海	(313)
第四节	取缔“法轮功”	(323)
第十七章	沦为反华走卒	(331)
第一节	负隅顽抗	(331)
第二节	建立第二梯队	(336)
第三节	天安门自焚事件	(338)
第四节	充当反华走卒	(343)
第五节	揭批与挽救	(348)
第六节	战斗仍在继续	(350)
结语	不是尾声	(352)

附录 气功、特异功能争论大事记(1978—1999)	
.....	(354)
参考文献	(389)
后记	(391)

第一部

“特异功能”辨

第一章 中国灵学小传

第一节 灵学传入中国

20世纪初，正是欧美招魂术运动盛行的年代，尤其是1882年英国灵学研究会的建立，使灵学研究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在这种背景下，美洲和欧洲大陆的各种灵学项目相继介绍到中国来。当时中国灵学研究的中心主要是在上海和北京。1917年前后，在上海成立了“灵学研究社”、“中国灵学会”、“神州学会”、“预知研究会”等组织。不久，又创办了“心灵科学书局”和“心灵科学书店”，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灵学书籍。如《灵学丛志》、《心灵学讲义》、《神通入门》、《灵力发显术》、《灵力拒病论》、《灵魂体总论》、《灵力实验法》、《新灵子术》、《心灵现象》、《灵明法》、《太灵道》、《心灵光》、《扶乩原理》等。

上海的灵学活动，就是在灵学会主宰下进行的。一些热衷于灵学运动的知识份子如俞复、陆弗遑等人。在灵学会的名义下，设盛德坛，进行扶乩之类的招魂活动，还办了灵学会的会刊——《灵学丛志》。仅从查到的资料统计，从发刊起，共出了二卷本20多期。在当时出版、发行的灵学著作中，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933年由上海“心灵科学书局”编辑、出版、发行的《心灵学讲义》。该书共分9章：第1章，心灵现象之内容及其研究之态度；第2章，自动现象与心灵

现象；第3章，实验的精神感应现象；第4章，自然的精神感应现象；第5章，交灵现象；第6章，透视千里眼与未来之预知；第7章，心灵物理现象；第8章，骚扰幽灵之现象；第9章，心灵现象之解决。这本全面、系统介绍西方灵学研究内容、方法、争论、灵媒事例以及理论阐述的灵学著作，成为中国灵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灵学会会员的必读之物，是读者了解灵学的向导，也是中国招魂会——盛德坛上的宣传教材。

灵学研究的另一个中心就是北京。几乎和上海同时，北京也成立了“悟善总社”，并创办了一个会刊——《灵学要志》。该杂志从1920年创刊到1926年共出版3卷本36期。悟善社还编纂和发行了一些其它灵学书籍。如《未来预知术》、《天下第三奇书——灵魂世界》、《千里命稿》、《百灵舌》、《人电术》、《桌子浮动现象》等。这些书籍也都以宣传当时在美洲和欧洲大陆广为流行的“预知”、“天眼通”、“传心术”和“意念致动”等的特异功能研究为主。“悟善总社”的会刊《灵学要志》与上海“中国灵学会”的会刊《灵学丛志》是姊妹篇，都以推动灵学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为宗旨。刊登在杂志上的内容，除了一些学者、文人介绍国外灵学研究的历史、理论、案例、评论之外，还有他们自己撰写的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灵学论著。但大量的还是中国灵媒表演的实例。

第二节 20世纪初中国的灵学活动

20世纪初，中国的灵学活动，虽然没有像美洲和欧洲大陆那样风靡，历史那么长久，但中国灵学研究者对于这些舶来品的热情，也是情有独钟的。他们除了仿照着西方灵学家们

成立组织，建立队伍，出版杂志等方式布道传播外，还创造了新的招魂会形式——扶乩。扶乩是中国古老迷信操作，也是西方招魂会上灵魂自动书写的翻版。即扶乩者（灵媒或求卜者）在一个设有书写用具的沙盘上，灵媒在圣贤仙佛灵魂的支配下书写出求卜者所求来的乩文。上海的灵学会就专设一盛德坛进行此类招魂活动并把这类招魂会的乩文刊登在《灵学丛志》上。从上海灵学会的一份特别广告，很清楚的说明，《灵学丛志》就是一份发表招魂会项目的杂志。这个特别广告称：本会编辑主任俞仲还君，于3月29日至无锡，遗忘东洋车中皮包一个，内有盛德坛乩录二册，系去年10月初一起到11月30日止。当即在无锡登报寻找并托人四处探访，至今未见寻得。于是今年4月初一、4月14日二次在坛上叩问，蒙常胜子、张公武判云：“玄珠一去几时回，再度春风送得来……，举手足下丰姿秀，拭目面前云雾开，虚惊无疑何用急……。”无奈，此乩文不灵，又于4月27日，此日被称为是碧眼鬼神临坛作法之日，于是又叩问，拟请鬼神指引乩录中第十则至十五则中补宣六则，以求在本期《灵学丛志》中蝉联续下。蒙鬼仙判云：“失者终当还璧，可勿补。”时过许久，遗失乩录仍不见归还。灵学会不得不在《灵学丛志》上再发广告：“倘阅本丛书诸君，能以辗转托人访得者，请径寄上海灵学会中，当有相当之酬报也。”北京的《灵学要志》除刊登乩文、占卜、算命、看手相，灵学照相、千里命稿之类的把戏外。还号称修身行善，扬道德之阶梯。在《灵学要志》第1卷6期、11期、12期由张悟澈所写的序言中声称：“国家社会，交承其敝，人心已有思乱之象，天心寄无悔祸之机，于是诸仙神佛乃飞鸾降化，以冀挽救人心于万一。”

“悟善总社”还在《灵学要志》上发广告，宣传灵学照像。

广告称：在“悟善总社”三层楼上将特设净室自备像机，有仙佛垂示，为来者摄制法像。并进一步宣扬说，本年4月21日正午，有张紫阳真人降临现像，此乃迄今一千数百年犹得新睹，真人须眉，显系本社至诚所感。最后，还进一步蛊惑说，这是今日灵学昌明之象征，上天警世深意，此等神像均刊于杂志第2卷第7期，真人者希早日订购此刊。灵学杂志就是用这种货色吸引信众。还有和现代“大师”手法一样的，灵学会组织向信众教授“十八般特异功能”高招。他们在发行的一本“灵力实验法”的书中，把古老江湖表演的把戏通通拿来当一种“特异功能”传播。其中所列如下项目：木棒分合术、纸刀断棒术、吞火术、人体刺针术、麻绳手断术、人体高飞术、觉醒时错觉术、刀刃不伤术、灵媒善兰术、即感人体自由术、铁棒屈曲术、人体架桥术、任意轻重术、动物止动术、刚强不死术、热汤入手术、手取热铁术、掌上火焰术、木棒术、窥破人心术、灵力灭灯术、金刚不坏身术、魔摆术、物体灵动术、圆桌灵动术、灵智灵觉术、灵动照像术、万里透见术、现神现佛术。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还专门为这些巫术、骗术正名说：“本书以纸幅所限。未将各术之原理说明。仅罗列各术实修之方法。读者苟先修养精神。而后由浅入深，依次实验，必有灵力发动之一日，灵力既发动，则一切奇象，为必然之结果。或更有千万倍奇异于本书中发现。是则俟学者之自考耳。

其有依本书修炼，未获实效。遂以本书为无用。不知本书止与人以规矩。不与人以巧。况实验不灵者。其咎在于学者自身修养之功未到欤。是为序。”

由此可见，今日之“特异功能”之闻、之见、之行也必不能超越古之巫师骗术耳！

第三节 “赛先生”斥灵学

20世纪初的中国灵学，是一个发育还不成熟的畸形儿。中国灵学会的建立，正值中国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向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旧制度、旧罗网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带有极浓封建迷信色彩的灵学一出笼就受到了抨击。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撰文批评灵学，并发表在“五四”运动的喉舌《新青年》杂志上。

革命先驱陈独秀带头批灵学。他在一篇《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说：“如果相信世间万物有神灵主宰，那西洋科学，便根本破坏，一无足取。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些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这一段话则指出，中国之图兴，学习西洋之民主科学，断然要求与这些妖言邪说决裂。

鲁迅批鬼话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搀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

“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稣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

了。因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摘自《随感录三十三》，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

陈独秀质疑有鬼论

“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定数观念最为有力。今之士大夫，于科学方兴时代，犹复援用欧美人之灵魂说，曲征杂引，以为鬼之存在，确无疑义，于是著书立说，鬼话联篇，不独已能见鬼，而且摄鬼影以示人。即好学尊疑之士，亦以远西性觉（Intuition）哲学方盛，物质感觉以外，岂必无真理可寻。遂于不能以科学能释之鬼神问题，未敢轻断其有无。今予亦采纳尊疑主义，于主张无鬼之先，对于有鬼之说多所怀疑，颇期主张有鬼论者赐以解答”。——摘自《有鬼论质疑》，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

陈大齐辟灵学

“近日上海有人设坛扶乩，取乩书所得，汇刊成册，名曰《灵学丛志》。并设灵学会以从事灵学之普及。吾所及见者，乃该丛志第1卷第1期，其内容之荒诞离奇，真足令人捧腹绝倒，据该志所载，所设立乩坛曰‘盛德坛’，由孟柯主坛，庄周、墨翟二人之为之辅，下置‘四秉十六司’，此种说话已属滑稽之极，而某日‘圣贤仙佛’临坛时，各有题诗，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柯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讲音韵，能知世界语之发音，此真荒谬。离奇之尤者也。答吴稚晖先生音韵三篇，该会中人自谓感人之力最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者，据吾友钱玄同先生言，亦复陈义肤浅，假使果有陆德明等鬼，断不致作如此肤浅之文，此种荒谬之点，钱玄同先生别有详论……，鸣

呼，处 20 世纪科学昌明之世界，而犹欲以初民社会极不合理之思想愚人，亦徒见其心劳而日拙耳。”

“要而言之，若扶者故作乩书，用以惑人，是有意作伪也，若纯出于扶者之变态心理，扶者不自知为己所书，而信为真有‘圣贤仙佛’是无意作伪也，作伪均也，不过有意与无意之别耳。有意作伪，是奸民也，无意作伪，是愚民也。假‘灵学会’诸君而有意作伪，吾无执法之权，惟有期其良心上之反省，不与之辩可耳。若其不然，果出于无意之作伪，则吾辈略有科学智识者，不可不聊尽提撕警觉之责。国有奸民，宁有愚民。今姑以君子待人，姑以扶乩为非有意作伪，本此意旨，以科学之理解释扶乩，以明扶乩之为变态心理现象，而非真有‘圣贤仙佛’之降临，‘灵学会’诸君或能因此稍加反省，不再鼓吹邪说，以蛊惑青年，不再摧残科学，以种亡国之根，则吾之希望为不虚矣。”

“俞文曰：‘夫科学之见重于当世，亦以事事徵诸实象，定其公律，可成为有系统之学而已。以今日所得扶乩之徵验，则空中之确有物焉，不可诬矣。’此段议论，说明‘灵学’之所以成立，即吾所谓说来仿佛有理，然细按之，一无是处者是也。科学者之研究事物，宜具致密之观察，精细之分析，不可为幻象所蒙蔽，吾文上文已屡屡说及，已足破俞君之论矣，今复略述于此，以明其误。今之科学，以经验为基础，以事实为根据，通诸事实，求其公理，以成系统之学问，此诚不易之定论也。然所谓经验，所谓事实，亦有真妄之别，非谓耳目之见闻如是，即此经验便可以造成学问，必慎思明辨，察其无妄，然后可引以为学问之基础。梦中所见所闻，因梦者之经验，而方梦之际，亦梦者所引以为真事实，及醒后与外界对照，始知其为幻境。精神病者之见神见鬼，是精神病者之经验，亦精神

病者所引为真事实，而傍人观之，莫不笑其诞妄。今假有人以梦时及精神病者经验为基础，用以创进新学，吾知世人必哂笑其侧，且目之为精神病者矣。扶乩现象明属变态现象，及珍重视之，欲藉以新创‘灵学’其何以异于引梦时及精神病者之经验为基础以新造科学者之所为耶。”——摘自陈大齐《辟‘灵学’》，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

钱玄同斥《灵学丛志》

“近来看见《上海时报》上登有广告，说有《灵学丛志》出版，此志为上海一个乩坛叫作什么‘盛德坛’的机关报。其中所列的题目，都是些关于妖精魔鬼的东西。最别致的，有吴稚晖先生去问音韵之学，竟有陆德明、江永、李登三人降坛，大谈其音韵。我看了这广告，觉得实在奇怪得很，因此花了三角大洋，买他一本来看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买了来，大略翻了一遍，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不料世界已至20世纪时代，中国号称共和者亦已七年，还居然出现此种怪事。”

“真倒楣！真晦气！我们的《新青年》杂志，并非W·C的矮墙，供给人家贴‘出卖伤风’‘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啼郎……’这一类把戏的；然而今天竟不能不自贬身价，在‘随感录’中介绍这种怪物的著作。真倒楣！真晦气！”

“惟吴稚晖先生，实为极端提倡科学，排斥邪说之人；这回因为被朋友所拉，动了一点好奇之心，遂致那个什么‘盛德坛’上发现了这三篇讲音韵的怪文章。在不知其中情形者，对于吴先生此番举动，约有两派议论：一派是头脑清楚的人，说：‘怎么吴稚晖也信起扶乩来了！他从前作《新世纪上下古今谈》的思想见识到那里去了呢？’一派是昏头昏脑的人，说：

‘你看！吴稚晖都相信扶乩了；可见鬼神之事，是的确有的，是应该相信的。’前一派的议论，不过损吴先生个人的价值。后一派议论，为害于青年前途者甚大；本志以诱导青年为唯一之天职，不可不有所矫正。”

“青年啊！如其你还想在 20 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 20 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筋，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摘自钱玄同《随感录八》，载《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1918 年。

这些批评都切中灵学要害，使中国灵学一出世就面临着怀疑论者的挑战。只是在 20 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争夺的战乱年代，上层社会还无暇顾及这些旁门左道。而灵学家们也不过是一些好事的少数知识分子之所为。至于信仰者，也远远不能与欧美信仰大军比拟。故中国灵学的传播，到了本世纪 30 年代也就渐渐地消退下去了。

第二章 “耳朵认字”起风波

第一节 特大新闻——唐雨“耳朵能认字”

20世纪30年代在欧美大陆又兴起了“超心理学”，但由于中国的战争环境，这个在欧美大陆新兴起的灵学研究的第三阶段——超心理学，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影响。解放后30年来，也没有什么人在这门“学问”作过介绍，因此也就没有人关注它。然而，到了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传入，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也随之在中国大地找到传播市场。人体特异功能就是一例。率先掀起这场争论的是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记者张乃明，通讯员高琪、丁先发发表的一个惊世骇人的消息——《大足县发现了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这则消息是这样报道的。

本报讯 大足县最近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的儿童。经反复考查，确有其事。

儿童唐雨，现年12岁，小学五年级学生，家住大足县团结公社建立大队。去年旧历十月的一天，唐雨和小朋友陈小明一起走在路上，他的耳朵无意中触到陈小明的上衣口袋，大脑便呈现出一包香烟的牌名“飞雁”二字。唐雨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对陈说：“你装的香烟是飞雁牌，对不对？”陈小明对唐雨

猜到他的香烟是飞雁牌感到奇怪，但当时是在玩耍，未引起注意。事隔两个多月，一天，本大队石工韩仁甫等人玩“猜字”，唐雨在旁边看热闹，就对他们说：“我们来猜字。随便你在什么地方写，写好裹起来我来猜。”韩仁甫便背着写了一个“房”字，揉成小团，交给唐雨。他拿来放在耳边，很快就辨认出来了，使对方大为吃惊。这样，唐雨能用耳朵辨认字的消息就传开了。

为了证实此事，公社干部又写了“猪”、“牛”、“马”、“羊”、“狗”等字，揉成一团，唐雨接过去，贴在耳边，静听一会，随口就读出来了。县科委、文教局又派人核实，并有意在一张纸条上，将“尖端科学”的端字写为“瑞”字，给唐雨放在耳里辨认。唐雨照样一一认出，并指出其中“端”字写错了。在考查中，还发现唐雨能鉴别字的颜色是红色、蓝色或是黑色，是用毛笔写的还是用钢笔写的。消息传到江津地区机关，地委领导同志经过考核，上报到省委。记者闻讯，前往现场，进一步对此事进行了考查，先后用几种笔和不同的颜色写了“中国”、“四川省”、“安定团结”等字条，有的叠成若干层，有的揉成小团，交给唐雨用耳朵辨认。每张字条，唐雨只用了几分钟就辨认出来了。连用什么颜色什么笔写的都能辨别。后来，又写了几个英语字母交给唐雨辨认，唐雨因未学过英语，念不出来，但却照着字母的样子描画出来了。在场的人见了，无不惊叹，记者随即了解到：唐雨身体健康，学习成绩好，特别喜爱数学。据唐雨自己介绍：他的手像有电一样，拿到写有字的纸团，脑子里便开始有字迹的反映；当字团放进耳门，脑海就像银幕一样把字的笔划逐一显现出来；如果心情愉快，没有噪音等干扰，脑里显出来的字就十分清楚。对这一奇特现象，人们议论纷纷：唐雨耳朵的奇异功能是罕见的，人类

生理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

最近，省委负责同志到了当地，接见了唐雨及其亲属，了解了实况。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

第二节 “耳朵认字”是怎样出笼的

唐雨“耳朵认字”不过是流行于乡间顽皮儿童的小戏法，然而在媒体、科研主管部门和领导的行政推动下，一夜间就爆发为震惊中外的特大新闻。1979年11月《红领巾》杂志社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1980年10月张乃明又重新写了“以耳认字”报道的过程——题目是：《报春花盛开的季节》。这两篇文章，非常有力地说明了一个被称为“科学”的问题是如何出笼的。

《红领巾》杂志的调查报告是这样叙述的。

唐雨能用耳识字、辨色，首先是从少年儿童中间传开的。去年（指1978年——作者注）旧历十月初四日，唐雨的大哥结婚时，本队一个小朋友陈小朋买了香烟回来的路上，碰上唐雨，要唐雨猜他买的什么烟。当唐雨的耳朵触及他的白衬衣口袋时。纸烟盒的图象便映入了他的大脑；立即猜对了，是“飞雁牌”。从此，唐雨便在小朋友中经常做用耳猜字打赌的玩耍。当时同学们写出了一些“五年级”、“建立”、“唐雨我儿”等字条，揉成纸团。叫唐雨用耳猜时，都猜对了。四队（当时农村最基层的生产组织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组——作者注）社员王文国得知此事，有一天对唐雨说：“没那么怪，你用耳朵估得到字。我愿赌二角钱。”当场写了“王文国”、“四队”等字条揉成团交给唐雨，果然都被唐雨用耳朵认出来了。唐雨所

在的建立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作者注）小学教师发现了此事，认为这是搞迷信，宣传唯心主义，不准唐雨再用耳朵猜字。

老师禁止了唐雨在学校中用耳猜字。可是在寒假期间，许多小朋友以及社员仍然要找唐雨，试试他的耳朵。结果试一次，灵一次，人人感到奇怪。

不久，此事便传到了唐雨的家中，今年（1979年）2月26日，唐雨的父亲唐克明向唐雨问起此事，起初唐雨还不敢承认，他父亲便诱导他说：“听说你用耳朵猜字得了钱哩，你如果认得到，我也给你钱。”于是背着唐雨写了“太平天国”等字条，都被唐雨的耳朵认出来了，唐克明不能理解这种奇异现象，同他的另外几个儿子——用耳朵亲自测试，都不得行，便要唐雨说出个道理来。唐雨说：当写着字的纸团触到耳朵时，字迹便先在后脑部分一笔一笔地显了出来。然后就在前脑部分呈现出完整的字型。

今年2月15日，建立大队小学开学，学校领导仍然在批评这是宣传唯心主义，要求制止。公社文书李华清碰到唐雨的父亲也在打招呼说：“要把你那娃儿管好。”可是此事越来越传得神乎其神。连学校老师也感到疑惑不解了。2月16日一早，胡发利老师便把唐雨带到办公室。经过解除顾虑，胡老师顺手从作业本上扯了一块纸，背着唐雨用红墨水写了“毛主席”三个字。折了六折。让唐雨用耳辨认。唐雨说是一个红沱沱，在场的几个老师打开一看，果然是因为红墨水未干，折叠时，便浸成一沱红色。当即重新写了“毛主席”三字晾干折叠。让他辨认，没半分钟就认出来了。当场几个老师都惊奇地说：“硬是啊！”有的老师怀疑有假，中午再去测试，再试再灵。

2月17日，各大队小学老师到团结公社完小开会，谈起

此事。其他老师都不信。当场胡泽举老师愿赌五元，杨凌才老师愿赌20盘炒菜。当晚，全体老师到了唐家。加上围观的社员不下20余人。周兴国老师故意在事前就写好不成语句的四个字“牛打马角”。交给唐雨用耳辨认后。唐雨说：“不是一句话，是牛打马角”。打开一看，一下轰动了所有在场的观众。接着周兴国老师又把盖有他的一颗私章的纸团交唐雨用耳辨认后，唐雨断断续续说：“你这不是写的”、“红色的”、“是一个私章”。大家问他哪个的。唐说：“认不到，上头有三点（兴字）。后面有一个国字。”这一来，大家都说：算了，算了，用不着再考了。

团结公社得知此事后，专门组织了公社党委委员白道德、文书李华清、医生何洋泽等5人到唐家院子去考察。当场认对了“猪牛马羊狗”、“周大顺”、“刘承明”等六七个纸团，李华清仍觉怀疑，下午他又写了一个“语”字。交唐雨用耳测试。唐雨说“是二又六分之四多一点”。叫他写出来一看，恰恰是一个手写的随笔体“语”字。公社党委也不得不信了。

2月18日，团结公社正式向县文教局、县科委、《四川日报》、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领导机关写了报告。

县上接到报告后，由县科委何大华、县文教局隆祥海专门进行考察。何大华同志原在公安局工作。隆祥海同志过去也办过案子。他们办事都很精细。2月19日，他们首先查访了唐雨的祖宗三代、亲戚朋友以及当地群众有没有耍魔术的（确实没有）。然后把唐雨叫到一个僻静的屋子，专门考了几个儿童不常见的名词“遗传工程”、“法拉弟”、“集成电路”、“仿生学”。他们特别严密地防止唐雨有任何魔术动作。结果，除第一个认成“贲付工程”外，其余都认对了。2月22日，他们又做了两个字数很多的纸团。一个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团结一

致，同心同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31个字4个标点符号）。一个是：“为四化学文化，学科学，永攀科学高峰。”（15个字，3个标点符号）。他各认了九分钟，全认对了。

经过这样多次的反复考查以后，2月23日，县科委向江津地区科委用长途电话作了汇报。第二天地区科委彭树林、地区文教局何林来到大足县进行考察。这时唐雨正在发烧，效果差些，仍然考起了。3月2日，地委书记白兰芳、聂荣贵亲自考察，认为属实后，随即由地委宣传部、地区科委向省宣传部、省科委写了正式报告。

3月6日，省委×××同志听了汇报后，指示：“请省科委认定一下，如确有研究价值，要给以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当天，省委××同志到江津地委亲自对唐雨作了测试，发现唐雨不仅能用耳朵识字辨色，甚至手指等部分，也有这种功能。

3月9日，省科委把唐雨接到了成都，住在锦江宾馆256房间。3月10日，省科委主任韩正夫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唐雨。考了“雨”、“力学”等字的纸团。唐雨用手一摸就认出来了。

从这个调查报告可以看出来，一个农村小孩摆弄的猜字打赌的玩耍，竟然被各级领导一下子就吹起来了。由当时的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到县到地区到省里，层层都有领导亲自观看、批示和关怀，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怎能不引起媒体的关注。于是《四川日报》的领导就派张乃明关注此事。张乃明在他的《报春花盛开的季节》的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

正是报春花开放季节，1979年。

报社总编辑李半黎十分高兴地交给我一项任务：去大足县农村采访儿童唐雨“耳朵认字”的新闻。

人的耳朵能辨认字，这简直是古往今来的“奇闻”！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里，不能不产生“问号”。

晚上，副总编辑许川又认真交待了任务，叫我先看一些材料。我面前摆满了群众来信和各级领导的调查报告。字里行间洋溢着人们热切关怀科学新事物的激情。我的心被感动了。第二天一早，我登上了自成都去重庆的列车。

到了大足县，我作了细致调查；接着又到江津地区机关，进一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数以百计的干部、群众、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向我具体描述了考核唐雨的情景，给我看了许多测试的实物。一张张诚挚的脸膛，使我进一步想起党的一贯教导：相信实践，相信群众。

当晚，小唐雨被接到了地区招待所。百闻不如一见。我留心观察了他：小唐雨个子不高，五官端正，不多说话，言语中总带有几分羞涩。完全和其他农村生长的儿童一样，给人的印象十分纯朴。

“好。实践最有权威。就让我亲自测试一下吧。”

早晨，空气清新，四周恬静。我把小唐雨叫到我的宿舍里。

“叔叔考你一下行吗？”

“行”。小唐雨挺高兴，很自然。

我把事先悄悄写好，反复折叠为六层的字条拿出一张递过去。唐雨用两个指头揀着，使劲压紧，放进右耳碗内。我坐在唐雨的对面，紧盯着他的眼睛，他的眼凝视眼前的空地，若有所思。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也过去了。我的心渐渐紧缩，怀疑开始在脑里产生。然而，就在我的思绪被牵动的瞬间，小唐雨那晶亮的眼珠一闪，对我微微一笑：

“叔叔，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你的字条是四个字，蓝颜色，钢笔写的‘安、定、团、结’。”他边说，边用两个指头从耳碗里取出测试字条，小心翼翼地交给我。我当众打开核对，准确无误。接着我又对他严密地测试了许多次，次次都对头。小唐雨还给我详细讲述了字迹是怎样在他脑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人们说他简直像部活的电视机。唐雨笑了，笑得如同一朵绽开的报春花。

这次采访，使我感到更有幸的，是省委书记××同志也来到江津地区，在他亲自考察唐雨“耳朵识字”的时刻，我按下了照像机的快门，拍下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镜头。

《红领巾》杂志的披露和张乃明的自述，把“耳朵认字”的事件描绘地有声有色。至此，掀起了一场为期近四年的人体特异功能热。张乃明的报道被称之为“揭开了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研究的帷幕”，“是我国的科学新发现”，“是我国报刊界的首创”。《四川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后，“两三天内，唐雨的住处，从早到晚，纷纷要求测试和围观的人群水泄不通。”“国内关心科学新发现的同志为之振奋，国际友人发来电报和信件，感到极大的兴奋；香港报刊还派记者进行采访”。一时间好不热闹。

第三节 科学界测试——“耳朵认字”是假的

自《四川日报》3月11日报道四川一少年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的消息后，引起了各方关注。各省地方报纸纷纷转载这一消息，《美国之音》作了广播，香港《大公报》、《明报》也在头版显著地位作了报道。当时的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信访

处不断收到来自各地的询问信或推荐信。自唐雨的报道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有北京、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北、辽宁等省市又相继推荐了17名所谓用耳、鼻、手、脚、胃“认字”的青少年。其中大多是由地、县科委或单位党委正式来函报告的。

就在热闹非凡之时，四川省为了进一步证明唐雨“耳朵认字”的真实性，省科委决定，由四川医学院科研处出面组织专家对唐雨“以耳认字”真实性进行科学测试。与此同时，为了查明真相，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组织了科研人员对当时由《北京科技报》推出的特异人姜燕进行测试。测试的结果，证明唐雨和姜燕的所谓“以耳认字”是假的。为此《人民日报》于1979年6月2日发表了《四川一小学生用“耳朵认字”是假的》，发表了《四川医学院的调查报告》，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也以《信访简报》的方式，公示了《北京一儿童“耳朵认字”也是假的测试报告》。为使读者了解这一真相，现将两个测试报告公诸如下：

四川医学院的调查报告

1979年3月13日至20日，我们对大足县小学五年级学生唐雨“用耳认字”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的目的是：明确唐雨为什么能“用耳认字”，他的耳朵或身体其它部位是否具有超常的生理功能。

首先，我们对唐雨的基本情况作了一些了解。他出身于一个农村家庭，现在12周岁。从5、6岁起，经常扯谎，并以为乐。现已学会抽烟。第一次“用耳认字”就是为了骗取别的孩子的香烟开始的。

我们曾4次与他一道玩扑克，几乎每一盘都发现他采用多

拿牌、窃取大牌、藏匿小牌等手法，弄虚作假。

在8天的时间里，我们对唐雨做了25次试验，他有时用耳朵“认字”，有时用手指、头顶、小腿、足底“认字”。我们发现，除有六次偷看未成、拒绝辨认外，其他19次都偷看了纸条。他偷看的手法多种多样，经常变换，大致可归纳为：

1. 先观察周围形势，见有机可乘才答应“用耳认字”，如监视很严、难以作弊时，就拒绝“认字”。

2. 常采用拖延或推诿的方式，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寻找可乘之机，有时拖上半小时至一小时才开始“认字”。

3. 用手摸字时，像变魔术似的做些动作，故弄玄虚，设法用手指搓开纸团，利用自然光透照或偷看。

4. 用耳听字时，先分散观众注意，然后将纸团拿在隐蔽处偷看。

5. 如别人当面写字给他辨认，他则站在远处凝视别人笔动，或在别人背后通过腋下空隙窥视。

6. 如在夜间，则关掉灯，待眼睛对黑暗适应后，利用窗外微弱的光线辨认。

7. 用被子蒙着头认字，则躲在被子里，借缝隙透进的光偷看。

8. 所谓到成都之后的新发展——“过电”，即将纸团放在别人的耳朵旁，唐雨用耳贴在该人的背上可以听出纸团里的字。手法是，唐雨手中先有一个假纸团，然后以假换真，把假纸团放在别人耳旁，自己以耳贴此人背后，偷看真纸团里的字。

总的说来，唐雨弄虚作假的手法是比较快的，基本上采取了魔术师的那一套，但并非十分难于识破，只要认真观察，就可以看得出来。

唐雨采取以上种种骗人手法，是否说明他智力超常呢？3月15日晚，我们对他进行了一次智力测验，共出7题，除有一题很简单且有人从旁帮助做得较好外，其余6题成绩很差，说明唐雨智力在同龄孩子中并不高。

根据以上调查观察，证明唐雨的耳朵并不能“认字”。耳朵只能接受声波传递的信息，不能接受文字传递的信息。这类科学知识有必要在群众中加以普及。

四川医学院调查组：吴家骥（科研处副处长）、刘协和（讲师，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刘安负（讲师，眼科主治医师）、陈开俊（科研处工作人员）。

1979年4月3日

中国科学院的调查报告

姜燕，女，8岁，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小学二年级学生，父母都是石景山钢铁厂工人，1979年4月4日，由区教育局和学校老师陪同，到科学院信访处上访，说她能“耳朵认字”。

4月6日，我们把姜燕接到心理所进行了一次实验，因忽略了实验场的布置，让姜燕坐有一横一竖的两张桌子接合处，致使主持人观察姜燕的動作有困难，未能肯定她是否偷看。

为弄清真相，4月19日上午，我们再次对姜燕进行了实验。首先我们坐在室内中间，面前不放桌子，四周都有人进行观察，距离1—2.5米。在这种不利于作弊的场合下，让她辨认了10个透多层的带字纸条。她每次都花很长时间，做了许多假动作，寻机偷看了5次，另5次因偷看不成未“认”出。然后，我们又让姜燕坐在靠窗的一张小茶几前，面朝窗，背向其他人，故意给她一个作弊的机会。在这种场合，她很快就完

成了偷看的动作，所以全部“认”出。

姜燕的作弊手法是，先用一手接过选好的纸条，送到耳边片刻后，将两手同时放在耳边捏纸条，故作听认的样子。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耳边那只手时，纸条已倒到另一只手中，并放在腿弯下或桌下两腿中间，极迅速地打开偷看。然后将纸条复原送回耳边那只手上，继续装作听的样子，宣布“认”出纸条上的内容。在整个作弊过程中，姜燕的目光不断四处寻视，动作极迅速，如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

为了获得具体的作弊的物证，我们对实验的纸条作了一些特殊的安排：(1) 纸条中有3张夹有细玻璃纸丝，若纸条被打开过，则细丝会掉出来。结果一张写着“迷”字的纸条，被姜燕“认”对了，但夹在里面的玻璃丝掉在地上，当场由主试人拾起。另两张纸条她说“不出字”，未打开即退回主试人员。(2) 有一个纸条里包有痱子粉，纸上写着“0.5”，姜燕“认对”了，但当即主试人员发现姜燕左腿下部的裤子上有一片白色痱子粉的痕迹。说明她在该处打开了纸条。(3) 所有用胶水粘上的纸条，姜燕都“认”不出来。

此外，我们也曾作过这样的试验，让她闭上眼睛，以及别人拿纸条放在她耳边时，均不能辨认出纸条的内容。

根据以上的实验结果，我们认为，姜燕所谓“用耳认字”完全是假的。

第四节 本应停止下来的荒谬宣传

在经四川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科学调查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信访简报》第92期（1979年4月23日）以《揭穿“耳朵认字”的骗术》为题，向中共中央宣传部

上报。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于1979年4月24日在这个简报上写了一段寓意深刻的批语。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类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多么警惕啊！该要多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胡耀邦同志批示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以《宣传动态》的方式，提出“未经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宣传”的方针，其中指出，“这种宣传，徒然增加了人们迷信传说和助长各种离奇的谣言呓语的流传，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类乎这样的事，过去也曾发生过，事后证明都不足为信。”针对报刊争相转载和报道这类奇事，《宣传动态》上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爱好猎奇，那怕是荒诞不经的事也信以为真，而且通过他们的口、手，使之互为流传。这种作风很不好。让我们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杜绝这类的无稽宣传。”

这样的批示和宣传方针该有多好啊！如果能按着这样的方针办，也不会酿出之后的伪气功和今天的“法轮功”。

为了遏止这种荒谬宣传，《人民日报》于1979年5月5日和5月18日连续发表祖甲和叶圣陶批评“耳朵认字”的宣传报道。祖甲文章的题目是《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叶圣陶文章题目是《关于“耳朵听字”的新闻报道》。祖甲在文章中引据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瞎和尚用鼻判断文章优劣的讽刺故事，来批评所谓“神耳”、“神眼”、“神手”、“神

脚”、“神腹”认字一类的特异功能同瞎和尚的“神鼻”一样的荒诞无稽。神甲在文章中，还进一步指出：“‘用耳识字’之类的魔术，也是大人吹出来的。单纯、幼稚的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没说真话，至多出于一点好胜心而已，够不上什么行骗。对于这些天真伶俐的儿童，我们有责任好生引导，使之走上正路，成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有用人材。”

“奇怪的是个别科技部门的同志和个别领导同志，不请教科学、不请教科学家，看完魔术似的表演，居然带头鼓掌，大赞“神耳”，甚至煞有介事地下命令保证这些儿童的营养。这些同志如此缺乏科学常识，不禁令人担心，如不改变这种情况，怎能带领群众为四化奋斗呢？”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更是对在儿童中推行“耳朵认字”的实验，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在文章中写道：“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有的学校竟叫小学生一个个作实验，要从中找出能用耳朵听字的。请想想，这样的试验对小学生是什么样的教育！”

“最近有人从四川来，跟我说起大足那件事，至今有关的单位明知错了，还散布消息说，那个儿童害了一场大病，耳朵不灵了。这不是为他们自己和上级掩饰吗？这不是还坚持耳朵听字确有其事吗？”

“昨天遇见周建人同志，他也关注这件事。他说，在搞四化的今天却有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的脸。建老说得非常对，听说香港的报纸和“美国之音”都作了报道了，一定会引起外国有识之士的讪笑。”

“我恳切祈求有关的同志和单位，以及虽与此事无关而于同类工作的同志和单位，能从这件事取得教训，确信这样胡搞是不行的，至少要学一点科学知识，学一点唯物主义，才能切切实实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对四化有所贡献。”

在这种政治氛围和舆论的批评下，《四川日报》和四川省委宣传部都作了检讨。《四川日报》的检讨是：

本报3月11日刊登了“耳朵认字”的新闻后，一些报刊电台转载或广播了这个新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和省委宣传部及时批评了这个报道的错误，使我们深受教育。我们认真检查了这一报道的教训。一、由于我们本身科学知识不多，在刊登“耳朵认字”这个报道之前，又未经科研部门严格的科学鉴定，这种不慎重的报道只能增加人们的各种离奇传说，对发展科学事业是没有好处的。二、在我们报纸上出现这种错误报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报纸编辑部的领导思想上还残存资产阶级“猎奇”的新闻观点。对待“耳朵认字”这种事情，更多地着眼于它的新闻性，而没有很好考虑它的科学性、严肃性，更没有考虑它的客观效果。我们诚恳接受领导和群众的批评，并认真从中吸取教训，改进今后工作。

《四川日报》编辑部

1979年5月28日

四川省委宣传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检讨是：

中宣部：

关于《四川日报》3月11日刊登“耳朵认字”一则消息的问题，《四川日报》编辑部先后写了两次检查报告，他们决定在报上公开检讨，以挽回不良影响。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对此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川报发表耳朵能认字的消息是我同意的，这是草率的表现。应该由我负责任，报社和下面单位的同

志是没有责任的。”经省委研究，同意川报编辑部提出的处理意见，同时，采取适当方式将杨超同志的表示转告县以上单位。

现将《四川日报》两次检查报告和处理意见送上。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1979年6月5日

至此，这场荒谬的闹剧本来可以收场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平静水面下孕育着一股激流，欲喷发而出。

第五节 “独具慧眼”的李学联

在《四川日报》和四川省委宣传部的检讨之后，似乎“耳朵认字”的公开宣传，暂时平息了。但是，热衷于“耳朵认字”的人们，并未因此偃旗息鼓。“耳朵认字”的表演，仍然在一些地区进行着。除此之外，《人民日报》陆续收到对这一阶段“耳朵认字”以及祖甲和叶圣陶文章的反映，《人民日报》科教部和群众工作部采用“群众来信摘编”的形式反映了这些内容及其中一些不赞成祖甲和叶圣陶文章的读者表现的极大的愤懑情绪，还有个别读者出言不逊谩骂《人民日报》。

就在这时，一位“独具慧眼”的香港人士李学联于1979年6月18日在香港《明报》上发表了《以耳认字，未必荒谬》，给大陆特异功能研究者的一封信，很快被大陆的一些新闻媒体转载。在这封信里，把在西方和美国已经传播了有百余年历史的灵学——近代心灵学——现代超心理学研究介绍到中国来。所谓的超感官知觉就是国外已经嚼过许久的馍。即ESP（传心术、天眼通、预知）和PK（意念致动）的老货，甚至把

美国和苏联所进行的“灵学讹诈”的宣传，也拿来当成“奇货”，恫吓中国人。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李学联贩卖的货色，这里把他的奇文全部刊载如下：

今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刊登了一篇四川省大足县小学生唐雨以耳认字的报道，许多报刊纷纷转载，香港左派报纸也都刊登了，并有详细的专访。5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祖甲的文章，认为以耳认字是荒谬无稽的，并指出说“奇怪的是个别科技部门的同志和个别领导同志，不请教科学，不请教科学家，看完魔术似的表演，居然带头鼓掌……这些同志如此缺乏科学常识，不禁令人担心，如不改变这种情况，怎能带领群众为四化奋斗呢？”

“以耳认字”的真假，本身是一件小事，然而在中国官方处理的态度上，反映出某些领导人的科学知识恐怕还不够现代化，态度似乎也不大科学化。正如祖甲说：“如不改变这种情况，怎能带领群众为四化奋斗呢？”我们猜想，写文章的祖甲，某些部门的党委领导人，对ESP（Ex-trasensory perception 超感官知觉）这门学问或许所知甚少。

超感官知觉就是不通过眼耳等感官，而得到视觉、听觉等，还包括预见能力等等，内容颇为丰富。这门学问美国的科学家也组织团体研究，到目前，美国许多大学中有专门研究这门学问的机构，其中杜克（Duke）大学是最出名的，此外独立的机构和实验室，闻名学术界的至少有七八个。在东欧，最有成就的是苏联与捷克。苏联称之为“生物传讯学”（Bioinformation）。苏联与美国还合组机构，研究以超感官知觉与外太空通讯的可能性。这方面的科学书籍、论文、杂志数量很多。中共的科学研究与外界脱离接触太久，同时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比之

其它物理学、化学等等，更多落后于西方及苏联，以致认为“以耳认字”是绝对不可能之事。

“超感官知觉”的学问还在幼稚阶段，那是事实，但我们翻开英美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几乎每一本书中都会谈到这个方面的。一般科学家的态度是：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存在的科学知识还不能提供众所公认的解释，这是一门大有前途的学问。至于个别科学家的著作，研究“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者不计其数，极少有根本否定的，最保守的说法也是：各种科学实验还不足以绝对肯定，理由难以解释。

以耳认字的现象，在超感官知觉的各种报告中，只是最简单的现象，在科学家眼中只感到颇有兴味，却不足为奇，西方国家科学实验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将有这种能力的人关在秘室之中，以按电钮的方式，辨认几间房之外的纸牌或字母。然后用电脑计算正误的或然率。多数实验都证明，存在这种现象的比率极大。

希望中共官方在对科学问题作出任何结论之前，态度更科学一点，对于还不明白的事物，不妨持怀疑态度，不要过于武断。

1979年6月18日

香港享升街九十号地下李学联寄

这篇文章大大振奋了“耳朵认字”热衷者的情绪，引起“耳朵认字”宣传者极大的重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看到党报的批评，有的正在检讨；有的还在观望；也有的坚持抵制。正在这不知所措之时，看到了海外的支持，他们顿时腰杆都硬起来了。原来处于动摇状态的现在“坚定了”；原来处于观望的和有些没有积极进行这种宣传的人，似乎预见它的发展前

景，也都投身到这个行列中去了。“唐雨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耳朵认字”的发源地——唐雨的家乡又重新掀起测定唐雨“耳朵认字”功能的热潮。

1979年9月3日、4日江津地区科委副主任高万秀和大足县宣传部、科委、文教局的同志一起在团结公社对唐雨进行重新测试，效果不好。

1979年9月5日大足县团结公社党委书记李均荣、副书记曾泽、宣传委员谭天成、公安员黎功德等又亲自测试。由大足县宣传部、科委、文教局、公安局、进修学校、县医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又对唐雨进行测试并由何大华、丁先发、申政伦、钱邦伦、朱永弟、胡正书签署考察报告。

1979年10月5日至13日由江津地区宣传部、科委、地区人民医院组成的“唐雨耳朵辨色认字考察小组”共进行了11次测试。江津地区科委于10月16日（江地科【79】87号）以《唐雨耳朵辨色识字的近期情况报告》上呈行署并报省科委。

1979年10月24日至26日成都《红领巾》杂志社又组织了7次测试，《红领巾》杂志的赵明、郑家声、何五全、贺启富，《四川日报》的张乃明，江津行署科委的黄侃如，大足县科委的王大用、何大华联名写出《关于儿童唐雨耳朵认字辨色的考察报告》（10月27日）还在《红领巾》杂志社编的《情况摘编》第5期上，发表了“红领巾杂志社调查组”11月1日写的《关于唐雨用耳朵认字前后情况的调查报告》。

1979年11月12日唐雨的哥哥唐可飞写信给中国科学院，称他的弟弟唐雨“耳朵认字”受到批评，是“不白之冤”，并希望科学院的人再来考一考唐雨。唐雨也写信给《红领巾》杂志的叔叔阿姨们，“我的耳朵认字是真实的”，并由《红领巾》

杂志 1979 年第 11 期发表了这封唐雨的来信。

唐雨的“耳朵认字”案翻掉之后，大大激发了“耳朵认字”宣传者的情绪。《人民日报》继续收到批评他们的文章，一时平息下来的“特异功能”宣传又大张旗鼓地进行开来了。

第三章 “特异功能” 风靡全国

第一节 《自然杂志》的带头

《自然杂志》是1978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一本科学杂志，当时是一本档次很高、影响很大的综合性科学期刊。李学联在他的《以耳认字，未必荒谬》的文章里，把在西方流行一百多年的灵学项目再次介绍到中国来之后：“以耳认字”的小戏法，就正式冠上了“人体特异功能”的美名。此后，“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就越发不可收拾了。引导这场争论的舆论带头人，不能不归功于上海的《自然杂志》。“唐雨事件”后，不仅没有制止住“耳朵认字”的宣传，而且宣传的呼声越来越高，传播的也越来越广，“耳朵认字”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特异人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这种现象的发生，都与《自然杂志》的率先垂范作用分不开。1979年7月，上海《自然杂志》派人到北京测试当时在北京颇为出名的特异人王强、王斌两姐妹，之后并于1979年9月份，在该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由记者采写的《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观测报告。之后，就连篇累牍地发表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和所谓的论文及测试报告。并循着西方灵学祖师爷的调门，也把这些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人体特异功能”表演上升到用科学的语言、词汇和概念理论去描述它。也是《自然杂志》把“耳朵认字”的功能上升为“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高度，肯定了“非视觉器官图象识

别”确实存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从此，《自然杂志》成了发表这类宣扬超自然现象、伪科学现象的阵地和大本营。当时国内知名的特异功能研究者，如北京大学的陈守良、王楚、贺慕严，首都师大的林书煌，云南大学的罗新、郑天民，空军某医学研究所罗冬苏，航空医学工程研究所梅磊，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李宝实，《自然杂志》总编贺崇寅，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以及著名科学家，还有其它一些高等院校、新闻单位和中国科学院高能所、物理所、生物物理所等单位都在该杂志上发表宣扬“人体特异功能”观测报告、理论文章。仅从1979年至1982年期间，就发表了53篇。据统计，当时全国就有138家新闻单位参予“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报道，68所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内容，也早已大大超出了“耳朵认字”的范围。从《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报告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名目。^①

① 《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与人体电磁感受机制探讨》——罗冬苏；《人体能感知地磁》——潘锦章；《探索生命科学的奥秘》——贺崇寅；《特殊感应机能的普遍性问题》——陈守良；《非视觉器官识别色谱的实验》——王胜利；《图象显示过程》——王楚；《人体特殊感应机能与方向判别》——张祖启等；《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钱××；《磁与人体科学》——林书煌；《人体特异功能者脑血流图的初步观察》——张柱芳；《人体放大实物功能的初步实验结果》——陈夷等；《人体特殊感应机能对多层重迭样品的辨认过程》——罗林儿等；《色盲儿童运用人体特殊感应机能辨色的初步观察》——贺慕严等；《人体特异功能力学效应的初步测试》——云南大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人体非目视图象识别功能依赖于经络传感》——林先哲等；《特异功能与经络现象》——刘冠军等；《对特异功能者经络传感特征的初步研究》——赵荣福、张淑珍；《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钱××；《推动人体科学研究》——聂春荣；《人体特异功能在一种光敏探头上的异常现象》——郑天民等；《生物探测器研究人体辐射物理的实验》——赵永昇等；《脑信息遥感的考证与初探》——陈涛秋；《人体特异功能与物质相互作用初探》——柴建宇等；《特异功能者对非可见光感应能力初步测定》——方小任张崇起等；《人体非眼视觉光对比度传递特性的研究》——杨俭华、刘易成等；《人体非眼视觉对四种不同波长的光的反应灵敏度》——张允艺等；《人体特殊感应机能辨认纸团纸卷时的图象显示过程》——邵绍源等。

这类没有经过科学共同体检验的实验报告或者是实验对象主诉的观察报告，截止到1982年“人体特异功能”争论暂时停止时，就发表了100多篇。这些所谓的科学报告，对于尔后伪气功和伪科学的产生与传播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然杂志》还有一个“功劳”，就是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1980年2月4日至10日在上海，有14名特异儿童参加的所谓“科学讨论会”，就是由上海《自然杂志》出面网罗“人才”，进一步推进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一个动员号角。这个会，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特异功能”儿童和青年几乎都到场了，所有有点知名度的“特异功能”研究者也都到会了，当时虽然只有八个省的代表，但已包括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大区，也可谓带有全国性了。这个会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把在1979年4、5月份发生的，几乎让“耳朵认字”消声匿迹的那场“事件”所发生的影响消除，即进一步肯定“特异人”不仅可以用耳朵、腋下认字，而且连头、手、额、腹、膝盖、脚掌、脚趾、背部、臀部都能认字，甚至把纸团吞进胃里、剪碎也能“认”。参加会的北京师范大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林书煌说特异人不仅能认密封在牛皮纸袋、火漆或蜡封口的塑料盒、用火烧死管口的玻璃试管、双面镜子、暖水瓶、锡纸、铁盒里的试样，而且把试样放进壁厚40毫米，贮藏同位素10公斤、20公斤的铅罐中，特异人只要用手摸一下铅罐外壁，字就认出来了。在会后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大肆宣扬这些东西。二是为推进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建立人体特异功能组织作舆论准备。在会上所谓的科学报告中，把“耳朵认字”上升为“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人体特殊感应机能”、“脑信息遥感”、“第六感官”、“第七感官”等等，而且把“耳朵认字”吹捧为“可能使

人体生命科学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可能对医学科学产生影响”、“可能会促使物理学向生物学和生理学领域的渗透”、“可能包括重大的实用价值。”

在一篇“上海会”的报道中，展望了“特异功能”研究的美好前景。

人体非视觉器官识别图象功能是人体生命现象中一个新的发现。这个课题的研究，将会大大拓展对人的生命活动现象的认识。它还可能大大改变医学科学的面貌，并有助于用现代科学来阐明中医的经络、气血、脏象等学说，促进中医的现代化。

国外对于人体的“超能力”、“超感官知觉”等特异功能的研究，70年代以来陆续有所报道。但是由于这一课题所特有的高难度，迄今未看到有重大突破。我国目前已经和正在发现不少具有这种特异功能的少年儿童以至成年人，不仅为开展这项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引起了更多的科学研究单位的兴趣和重视。正像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81岁的五官科专家李宝实教授在亲自验证之后说的那样，“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亟需进行多学科的深入研究。一旦有所突破，现代生理学、物理学中许多内容都将重写。”

“上海会”后，为了更广泛地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由《自然杂志》编辑部创办了《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并于1980年10月15日出了创刊号。

第二节 追逐猎奇的新闻媒体

追逐“猎奇”的新闻报道思想，曾一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可就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刚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这个事还未来得及说个对错呢，一些“新鲜事儿”，

“另人眩晕事”却像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尽管人们能“欣赏”到这些事儿及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许多非理性事件的气息感到厌恶，但它们仍然能大量地、堂尔皇之地登场，似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社会良心、社会理性经不住“新鲜事儿”的诱惑。掀起这股宣传热潮的是一报一刊的两个带头羊。一是《四川日报》的“独具慧眼”，一是《自然杂志》的学术领头。《四川日报》在报道了唐雨事件之后，全国新闻媒体立即蜂拥而上，仅跟《四川日报》之后，到1980年2月上海会议之前，全国新闻媒体就有几十家接踵而来。报道的内容，也早已大大超出了“耳朵认字”的范围。^①

这些报道为“上海会”作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因此尽管

① 《探索人类特异功能的奥秘》——《黑龙江日报》；《未揭开的奥秘》——《黑龙江日报》；《从人体特异功能谈到认识论》——《辽宁日报》；《“疑惑”认字》——《吉林日报》；《生命科学的新课题》——《河南日报》；《杨小明耳腋辨图识字记》——《河南日报》；《就耳朵认字读“扶异探宝”》——《解放军报》；《神秘的第六感官》——《北京日报》；《听人介绍半信半疑看了表演口服心服》——《长江日报》；《15岁小学生谢朝晖用肉眼透视人体内脏》——《湖北日报》；《耳朵认字测试目击记》——《甘肃日报》；《我区少年郭华能用耳朵识图认字》——《宁夏日报》；《访耳朵认字的姐妹俩》——《福建日报》；《人体特异功能第七感官》——《福建日报》；《膝弯认字的陈碧》——《湖南日报》；《十三岁女孩王云舌头认字》——《湖南日报》；《多伦县发现三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女孩》——《内蒙古日报》；《我省渭南地区发现有特异功能的女孩王海燕》——《陕西日报》；《目可穿地耳能遥测》——《南方日报》；《武昌11岁小学生透视人体内脏十拿九稳》——《香港快报》；《手指认字与人体特异功能》——《天津日报》；《奇特的新屋》——《河北日报》；《探索人体特异功能之谜》——《四川日报》；《轰动库尔德的新闻》——《新疆日报》；《不见不相信 一见就叫绝》——《解放日报》；《省、市领导同志和专家教授观看测试情况》——《云南日报》；《郑三迎耳鼻认字辨色奇特功能得到证实》——《浙江日报》；《全身认字“神神”测试论》——《中国新闻》；《他们的眼睛比X光还强，他们的意志能指挥手表》——《春城晚报》；《我亲自看到不用眼睛认字识图》——《羊城晚报》；《看透你的五脏六腑》——《羊城晚报》；《可折枝催花的特异功能》——《北京晚报》；《忠于科学勇闯禁区》——《北京科技报》；《我的特异功能》——《科学周报》。

“上海会”漏气的表演，但并未影响新闻媒体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热衷。《解放日报》率先报道了“上海会”。还在会议期间，《解放日报》就抢先在2月6日发了新闻，为以后的新闻报道定了调。本来大会原定4日的正式测试是事先向代表作了预告的。但4日原先预定好的测试人的被测试项目统统不成功，而且有人偷看，当场被发现。为了使这次精心安排的“科学讨论会”产生轰动效应，主办单位又精心安排了多次非正式表演，然后就大加宣扬。在这些报道中，不成功的表演只字不提，对于那些“成功”表演的各种可以偷看的动作和情况，也不加描述，就一味地用最具有诱惑力的词汇包装、报道。《解放日报》在2月6日不仅发了消息，同时还作了《“奇异功能”——耳朵、腋下认字辨色目击记》的报道，中国新闻社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向海外发了通稿——《十二位儿童和青年当众以耳朵、腋下认字辨色》。《中国新闻》3月11、12日连续两天报道张风的文章《耳朵认字，轰动上海》。文章中用尽美誉之词，一开头就引人入胜。“春节前后，上海街头巷尾，公园茶室，到处有人谈论耳朵认字。谈的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因系亲眼目睹，决非道听途说……”

“上海会”的最大成果，就是肯定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当时不仅中央级的报纸是这个口径，地方的报纸也是这个口径，一个“上海会”，就这样轻率地下了这个结论。这些报道，把那些不成功的，偷看成功的表演，也都用一个“眼见为实”的最鄙俗的经验论和“表演就是科学实验”的非科学的思路串起来，然后大加赞赏和宣扬，为神秘现象和伪科学的传播推波助澜。《长江日报》在会后的报道中，回避那些作假、作伪的表演，从一个“上海会”中，总结出10个方面，作为实验研究的成果宣传。这10个方面是这样描述的：

1. 关于身体上能认字的部位，一般在耳朵、腋下、手指等处。但并不一定局限在这些部位，有的人身上其他部位，如头顶、膝弯、背脊、脚底、臀部等处也有这种功能。

2. 人体这种功能不但能辨认平展的图象，而且能辨认折迭甚至揉皱的图象。

3. 被辨认的图象置入纸袋、塑料盒、铁皮盒、铅皮盒等容器内，一般都可辨认。

4. 在辨认第一个图象时速度较慢，以后就较快，似乎这种功能存在着一个需要“激活”的过程。

5. 辨认的速度与辨认的正确率存在着平行关系。往往辨认速度快时，正确率也高，而当辨认困难时，出错率也高。

6. 一般儿童都声称，颜色与图象都是显示于前额脑际而被识别的，有如电视屏幕一样。

7. 这种特异功能与眼睛的视觉相比要微弱和迟钝得多，但也可通过训练逐步提高。

8. 当前具有这种特异功能的儿童还很少，成人就更少。但北京大学的同志们已在其职工子女中“诱发”出2、30名儿童都能用手指、耳朵和腋下来认字，似乎这种功能也存在一定的普遍性。

9. 有的儿童更有“传感”和“遥感”的功能。

10. 此种功能好坏与身体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密切相关。

实际上，“上海会”绝非像新闻媒体所宣传的那样。观察者中，不少人持怀疑态度，甚至当场指出偷看的事实。但在“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一边倒的喧嚣声中，这种意见不被重视，

也没人给发表。《人民日报》在《情况反映》第200期上，披露了上海会的真相：

2月4日至10日的“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是由《自然杂志》举办的，请了14名青少年作了表演。因为有前一阶段的争论，尤其是1月7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的否定文章，这次讨论会更加引人注目了。上海《解放日报》最早作了报道。《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也相继作了报道。中国新闻社向海外发稿。这些报道，一致说这次会议如何成功，表演如何精彩，认为是“我国探索生命科学的又一新开端”，“它无疑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开创性研究领域，将会给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等许多领域提出全新的课题。”

然而，所有这些公开报道都没有提到会议第一天的事实。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邓伟志同志反映，会议筹备组原决定2月4日下午请儿童表演，以后转入讨论，“不再进行公开测试表演”。可是，就在这开场第一天，会议组织者选了五名被认为最有把握的儿童（王强、王斌、黄红武、谢朝晖、姜燕）进行了表演（后来何小琴、唐雨也在台下用耳朵“认字”）。结果，他们一个字也没有认出来，而且有的偷看，当场被发现。《文汇报》张煦棠同志说，我们派了3个同志，盯住3个儿童，看其动作，结果一个也未认出来。本报群工部正好有2个同志在场，目睹了这个令人扫兴的场面。这一段未公开报道的真相，使一些持否定意见的同志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第三节 大科学家首创人体科学

“上海会”后的1980年6月，某著名科学家亲赴上海访问《自然杂志》，和《自然杂志》的负责人及编辑部进行了座谈，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并在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他说，人体特异功能是开发“人体潜能”的钥匙，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他鼓励大家，要下功夫认真地研究。对于“耳朵认字”一出笼所表现出来针锋相对的争论，大科学家非常明确、非常坚定地站到了人体特异功能一边。他鼓动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以后的多次谈话中，大科学家明确地肯定了“特异功能”的存在，甚至以“党性保证特异功能是存在的”。他说有些儿童具有耳朵识字这种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因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就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我国发现了具有特异功能的青少年，为人体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不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的使命。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也必将深化人对自身的认识，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

大科学家出来支持“人体特异功能”，其意义决非仅仅是一个表态，而是推进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理论研究的奠基者、领路人。之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就在“人体科学”的名义下，大张旗鼓地进入了科学的殿堂。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也就有了坚强的后盾。“人体科学”的概念提出以后，这位大科学家多次谈话和写文章阐明“人体科学”的内容。他认为，人体是一个巨系统，这个巨系统有许多相对稳定的态，特异功能也

是其中之一，把特异功能状态和大脑的功能联系起来研究，找到不同意念影响下，特异功能者释放出来的微量的生物大分子，从而找到特异功能态的物质基础，这就是人体科学研究的目标。从1980年到1982年期间就“人体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论著^①。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82年底，大科学家发表这类阐述和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谈话文章和论文50余篇。大科学家在这些论著中，对以开发“人体特异功能”为目标的人体科学研究评价很高，认为，它可能在中国产生“科学革命”，是“东方的文艺复兴”。他的这些文章和论述，很快被编辑成大部头著作，在80年代中后期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如《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创建人体科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为了进一步推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大科学家建议，成立人体科学研究会，并对建立这个研究会提出了一些情有独钟的想法。在一篇《谈人体科学研究范围问题》的文章中，谈到为什么要有一个人体科学学会时有这么一段话：“为什么你不是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的一部分，或者你不是什么生理学会的一部分，要讲清楚。另外，我也想了一下，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

^① 《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自然杂志》1981年第1期）；《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自然杂志》1981年第7期）；《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人体特异功能通讯》1982年12月30日）；《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讲话摘要》（《人体特异功能通讯》1982年12月30日）；《钱××谈人体潜力新领域研究》（《羊城晚报》1980年7月16日）；《人类要对人体本身进行深入研究——记钱××同志关于建立人体科学体系的一次谈话》（《北京科技报》1980年7月18日）；《著名科学家钱××对记者发表谈话》（《工人日报》1980年7月18日）；《钱××发表论文指出人体科学将在中国开花结果》（《解放日报》1981年5月4日）；《钱××谈人体特异功能》（《中国新闻》1981年5月14日）；《钱××向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提交论文指出：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光明日报》1981年5月21日）。

所谓人体科学的那时候用了一个别名，什么叫搞人体科学的？搞人体科学的是搞人体特异功能的。因为特异功能，人家反对的很多，有的人更打棍子扣帽子，所以我把它换了一个名，不叫特异功能，叫人体科学，委婉一点。”在《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文章中，说得就更明白一些：“人体特异功能太不寻常了，恐怕能接受的人是少数，更大范围的是气功，它能治病，人家容易接受。虽然人体特异功能一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气功可以。”“当然，更广泛的还有中医。我们所以研究一下，搞一个协会性质的组织，可以把气功与中医联合起来……，有一个群众组织，它可以打前锋，侦察并发现新的人体特异功能。”更明确的说法是：“人体特异功能，国际上早就开始了广泛的研究，我们起步晚，试验设备也较落后，但是，我们又有巨大的优势。一个，我们有许多具有显著特异功能的气功师，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第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气功和特异功能的天才论述，这也是我们独有的。”

第四节 舆论准备与组织准备

在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的推动下和大科学家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促进下，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的浪潮。1980年3月份以后，全国各省市都在组织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研讨会、报告会，筹备成立组织，而且得到政府各级领导的支持。根据《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报道，将全国各省当时的情况披露如下：

四 川

1980年3月2日重庆市科协召开人体特异功能座谈会，中

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亲临讲话。

在1980年8月17日重庆市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重庆市科协王竹、王勇代表科协党组到会祝贺。

1980年11月16日重庆市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举行学术交流会，省委书记××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着重指出研究人体特异功能、气功、中医现代化、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等课题的重大意义。

1980年12月26日四川省内江市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

1981年1月11日至12日在成都召开了四川省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会议。正式成立四川省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组。

四川省科协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分别举行人体特异功能报告会，请《自然杂志》的贺崇寅同志作报告，省委书记××到会并讲话。

1981年1月12日在成都召开四川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筹备会议，省委书记××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但他对会议的开会法作了指示，并把×××教授1980年12月29日给他的信送会议宣读和参考。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允中到会讲话表示支持和祝贺。重庆市科协副主席王竹等同志在会上介绍了研究情况。

云 南

1980年8月1日由云南电视台要求，省卫生厅和云南中医学院组织了人体特异功能汇报测试，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副省长马文东，副省长邵凤，省科教部副部长张更生，省卫生厅厅长曾育生等负责干部出席观看。高治国同志还讲话，指出：人体特异功能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应受重视。

1980年8月25日云南省副省长、省科委主任马文东在省科协主持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测试会上指示：人体特异功能是一门科学，需要成立学会，开展研究。

1980年9月20日在正式宣布的云南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同志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勉励科学工作者研究。

1980年9月20日正式宣布云南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的理事长为省卫生厅厅长曾育生，副理事长为省科协副主席苏音。

云南文山州人体科学研究会经州科协批准正式成立。

黑龙江

1980年8月11日哈尔滨市科协在科学宫举行报告会。由《自然杂志》张风介绍国内外特异功能研究情况。

1980年8月18日哈尔滨市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筹委会，省科协副主席李亚非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他和省科委副主任张恒轩都被聘为顾问。

1980年8月20日黑龙江省科协第2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观看了人体特异功能表演，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文达亲自测试，对“思维传感”、“穿透看书”、“透视塑料提包”等特异功能，深表叹服。

1980年10月1日黑龙江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书记×××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观看人体特异功能测试。几位同志还讲了话，对人体特异功能表示大力支持。

安 徽

1980年9月10、11日安徽省科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和安徽科技报社在合肥市联合召开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研究座谈会，省科委主任、科协主席均出席了会议，省科协副主席杨寿南主持会议，副省长杨纪珂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会上决定筹备成立安徽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

1980年11月26日在合肥成立了安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筹备组。

北 京

1980年6月3日北京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

1980年10月6日由北京教育学院主持一次报告会，参加者为北京市内各中学物理教师数百人，由北京中医学院何庆年介绍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概况。

1981年3月10日北京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召开座谈会，北京大学等16个单位3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

上 海

1980年7月21日上海市成立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贺崇寅为研究会负责人。

吉 林

1980年7月29日至8月6日在长春举行了人体特异功能科学测试会，吉林省副省长、省科委主任李树臣出席开幕式，省府副秘书长龙文宇同志主持了会议，4位省委书记和3位副省长亲自观看测试。

湖 南

湖南省委书记××同志和常德地委书记郭连贵同志曾亲自

测试湖南省石门县具有特异功能的男小孩宋季。

河 南

1980年7月25日郑州市金水区科委成立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

1981年1月3日在河南省委会议室举行人体特异功能观测会，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委书记胡××、张××，省政协主席赵××及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葆光等党政领导亲临观看于兆雷的透视人体表演，并对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表示支持。

浙 江

1980年9月20日在科协领导下浙江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筹备组）成立。

1980年9月20日浙江省科协在杭州市科学会堂举行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研究报告会，省科协秘书长袁援主持了报告会。

天 津

1980年12月由天津市科协牵头成立了天津市人体特异功能专门组织，拟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甘 肃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同志前往测试具有特异功能的小孩魏若阳（甘肃农业大学魏廷同志的儿子）。

宁 夏

1980年11月8日宁夏生理学会组织一次题为“介绍一项意义深远的科学新课题——人体特异功能”学术报告会。

河 北

1980年暑期石家庄教育局、团委、体委举办的“青少年科技活动月”举行了一次“奇妙的人体特异功能”专题报告会，六千多人听讲。

科 协

1981年3月9日中国科协主要负责同志邀请《自然杂志》贺崇寅同志汇报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到会的有裴××、刘××、钱××、王××副主席及聂春荣、林勃民书记等。会上一致同意支持4月在四川举行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

军 队

1981年2月18日上午国防科委副主任李××同志接见了具有特异功能的河北沧县的少年于瑞华并测试了她的特异功能。

1981年2月18日下午肖××、韩××等部队领导同志在住地接见了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于瑞华、王强、王斌等，并观看了他们的人体特异功能测试表演。于瑞华还为几位领导同志做健康透视检查。

第五节 人体科学研究会（筹）成立

在作了上述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之后，1981年5月11日至18日，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106个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收到论文147篇。四川省委书记××同志主持开幕式，会议期间还作了

《人体科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报告。重庆市委书记崔连胜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同志作了《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报告，四川省科委副主任叶兆麟同志代表筹备组作了这次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著名科学家×××和贝××、王××、王××、赵××，卫生部中医局局长、中华全国医学学会秘书长吕炳奎等同志向大会送交了论文、书面发言和贺信、贺电。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在《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报告中说：“近两三年来，从少年儿童中发现了人的透视、遥感、磁感、信息感等特异功能。这些发现之所以有重大价值，由于它已不再是迷信，而是客观存在的。”

他还说：“我们不能认为，凡是违反现在科学常识的现象就不是真事，也不能认为凡是违反经典理论的事物就予以承认。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不也是违反当时的科学常识吗？不也是违反牛顿的经典理论吗！？”

“今天不是哥白尼时代，只要有志的科学工作者多做些扎扎实实、严肃认真的科学实验，就会在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被社会所公认的重大成果。”聂春荣鼓励广大科学工作者，在人体特异功能的机理方面进行大胆的猜想和验证工作。

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380多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和新闻工作者参加了会议。还是《中国新闻》在会议的第三天5月13日，首先将这一消息向国内外作了报道。这次会议与“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截然不同，在肯定了“人体特异功能”存在的前提下，做了所谓大量的理论研究。这次会议有两个宗旨：一是展示“辉煌”的研究成果；二是建立组织，进一步推动“人体科学”的研

究。一篇《全国第二届人体科学讨论会》的报道文章说：“人体特异功能的新科学一经诞生，立即引起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密切注意和浓厚兴趣，受到了一批著名科学家……的热情支持。现在开展这项研究的，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有原子能、物理学、高能物理、无线电、电子学、光学、声学、生物物理、生理、心理、航天、神经、大脑、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经络、气功、自然辩证法、哲学、科技情报等 20 几个学科，真是珠联璧合，人才荟萃。”在另一篇报道中，以“层出不穷的新功能”和“应用科学的新领域”的小标题，把“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成果，作了“全新”的概括。

早在去年 2 月召开的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人们在确认“耳朵识字”真实性的同时，就发现北京的王强、王斌有思维传感功能。当时，科学工作者们就考虑到：人体一定具有更多的特异功能，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新领域。

果然不出所料，一年多来的大量实验表明，特异功能者确有特殊的反映世界的本领。比如，有的青少年能透视，可以像 X 光机一样描述人体内部的脏器及其病变；有的能放大，可以像显微镜一样把人体血样放大数百倍；有的能存贮信息，把写有 50 位数字的纸卷塞入耳朵，就可读出，取出纸卷，即使几天后仍可把数字‘取出’来；在双盲条件下，有的能辨别磁极，有的能辨别方向；有的还能追溯过去了的某种信息……。

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特异功能者通过意念的集中作用，还能发出特异能量，并作用于外界物体。北京师院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在会上播放的录像，使与会同志领略了特异能量的做功过程，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我国虽属初创阶段，但它已在应用科学领域展示了诱人的前景。

武汉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等单位，应用透视人体的功能来辅助医疗诊断，在骨折、肿瘤等的诊断上取得了一定效果。在盲童中进行诱发试验，无论在先天的或后天的失明者中，都能诱发出一部分盲人出现特异视觉功能。一旦成熟地掌握了这类机理，就能出现盲人不育的动人景象。这是多么富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啊！

科研人员的实验还表明，特异功能者透视土层、勘测埋物的功能，在地质、城建、文物、考古、公安等领域，也是颇有意义的。

值得一提的是，人体特异功能在仿生学上的应用，在我国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顾涵森同志，坚持特异信息的特质性观点，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和娴熟的实验技巧，在国内首次捕捉到人体红外辐射信息的物理量。后来，她又与气功师等合作，按所测得的红外辐射、电脉冲、磁信号等进行机器模拟，研制成生命信息治疗仪，它就是‘电子气功师’，或者叫‘机器气功师’。这样，‘气功师’就可终日与病人相伴了。

大科学家在提供给大会的论文《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中提出，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不仅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而且与现代科学发展的源泉也是吻合的，可以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框架中，来进行探讨。在这篇论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气功、中医、人体特异功能一体的理论。他写道：“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蕴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它

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5月13日至17日，会议进入“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成果交流阶段。令人遗憾的是，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论证“鬼魂存在”、“古墓怪影”、“意念论”这类文章，也拿到会上作为学术论文进行交流。一篇被大科学家倍加赞扬的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位教师合写的《意念论》的论文，还被提到大会上作学术报告。《意念论》说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摘录几段供欣赏。

一个人体，除了存在有形人（生理人）外，还存在无形人（意念人）。一个世界，除了存在有形世界外，还存在着无形世界。人类的生活，除了存在有形生活外，还存在无形生活。有形与无形是对立的统一。

所有已发现的这一切人体意念功能，都充分证实除了有形人生活的有形世界外，的确还存在着一个无形人生活的无形世界。

我们深信，随着具有意念功能的人越来越多，由无形人培养无形人功能的时代必将到来，那时，整个人类生活必将发生根本变化。

文章中还进一步阐述，待无形世界开发出来时，可以两个星球之间打“意念电话”；劳动者和工具之间可以远距离的进行劳动；可以两个星球之间相互送货……。不需再多列举了。这些臆语，告诉我们的无形世界和无形人就是鬼魂世界和鬼魂。这样的论文曾被某位著名科学家吹捧为“应向全世界宣告的中国人的成就”。这种“有形无形奥妙无穷”的设想，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无非是古老唯灵论骗术的重演。这次会上，除了这类奇文之外，就是宣读那些未经科学证实的虚假的

实验报告。但这些报告却被吹嘘成是“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工作的重大进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谱写了我国人体科学的新篇章”

5月17—18日，大会就建立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商讨、酝酿。筹备委员会由29个省、市、自治区各出一名，北京、上海、四川再增加一名，《自然杂志》编辑部一名，共三十三名人员组成。18日上午，举行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由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同志主持。在这次会议上考虑到工作开展情况与兼顾地区原则，协商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七名人员组成：北京、吉林、云南、四川、湖北、上海各一名。同时表决选举产生了临时召集人，为上海的贺崇寅同志。

常务委员会和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常务委员：龙文字、叶兆麒、吴熙载、林书煌、苏音（女）、贺崇寅，另保留一名。

委员：北京：林书煌、彭庆生。天津：葛葆安。河北：王冠友。山西：王嵩民（女）。吉林：龙文字。黑龙江：张恒轩。上海：贺崇寅、吴汶海。安徽：何文。福建：贾秉钧。山东：秦士德。河南：郭风高。湖北：吴熙载。湖南：谭湘。广东：刘汝琛。广西：韦瑞峰。四川：叶兆麒、金淑然。贵州：孙云寿。云南：苏音（女）。西藏：杨汝楷（女）。陕西：王兴中。青海：古洪。宁夏：钱祖凡。《自然杂志》：朱润龙。

此外，内蒙古、辽宁、江苏、浙江、江西、甘肃、新疆等省、自治区，暂时还没有产生代表，名额则予以保留。

第四章 有识之士驳斥“特异功能”

第一节 邓伟志挑战《自然杂志》

双伟志当时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当编辑。改革开放后，在文化战线上一件重大事件就是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邓伟志因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所以常在北京。于是他有更多机会去观察当时在北京冒出来的著名“特异人”王强、王斌姐妹的表演。令我佩服的是，尽管我在1979年7月份以后，受当时所在单位领导的委托，也去看这些表演，正是在看“特异人”表演中发现了种种舞弊行为，使我走上了反对特异功能的道路。但是我却没有勇气也不知道到那里去发表这些“见识”。邓伟志不然，他却把先后5次（其中还有两次是同《自然杂志》的编辑一同观看）看王氏姐妹表演所见到的“洋相”，以《“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的文章，于1980年1月7日发表在《文汇报》上。这一作法在当时是一个捅马蜂窝的行为，是跟“潮流”对着干的行为，是直接指向领头羊《自然杂志》的行为。执意要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带头羊的《自然杂志》，就是在《自然杂志》编辑及邓伟志发现“特异人”作假、偷看的行为，一再建议杂志不宜发表宣传这类“特异功能”文章的情况下，仍率先在该杂志的1979年2卷第9期上发表了《“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观察报告》的长文。在报刊对“耳朵认字”暂时的沉默声中，第

一个冲破了这个沉寂，成为带领舆论界再一次掀起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热潮的佼佼者。接着《自然杂志》以从来没有的“热情”和“见识”，在该杂志的1979年第10期、11期、12期连续发表了9篇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观察报告。邓伟志就是在这种氛围中，第一个在公开的报纸上挑战特异人，和《自然杂志》对垒。在当时舆论一致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无疑是把一滴清水滴到了马蜂窝上，于是“流氓无赖”、“梦呓”、“放屁”、“混话”、“蠢猪”、“赚稿费”等谩骂不胫而走。但邓伟志并不气馁，1980年2月“上海会”后，他于同年3月5日又写信给国家科委“吁请科委鉴定耳朵认字”，并附上自己在1980年2月写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对有关耳朵认字宣传的两点意见》，其矛头是直指“上海会”和《自然杂志》的。邓的“意见”和“吁文”是针对报界追逐“猎奇”的不实报道和新闻炒作推出所谓科学事实的恶劣影响而写的。邓在“意见”中指出，“上海会”后，“很多报纸讲，耳朵认字已不是真实与否的问题，而是承认事实前提下，如何研究的问题。然而，‘事实’尚且争论不休，所谓的理论研究，岂不更是空中楼阁，水上浮萍么！”邓在“吁文”中，呼吁主管科学的国家权威部门出面组织科学测试，这是一个非常科学、非常正确的建议。这个建议的意见不仅对于科学本身，对于精神文明和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意义也是极大的。邓在“吁文”中写道：“我认为，由国家科委召集有关方面共同鉴定，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耳朵认字从去年三月传出，至今整整一年，已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上海有一中学的试题中也有耳朵认字。海外也跟着我们转，一会说有，一会儿说没有。据我了解，国内很多研究、教育、报刊等单位中都有不同意见，有的大报的总编与副总编都有不同看法。有些同志之间，就像当年斗所谓走资派

那样，分成两派，伤了和气。”

“还有，随着科学奖金等的实行，我估计类似耳朵认字之类的事还会发生，似有设立科学法庭、制定科学法的必要。现在的不同观点，都能从国外找到旁证，都能从科学史上找到依据，都能从认识论上发挥一通，甚至都能从我们的老祖宗马列那里找到指导思想。不论是《人民日报》还是《羊城晚报》上头的文章都能顺理成章。所以单靠舞文弄墨不行，必要时绳之以法。发明、发现的真伪，不能无休止的争论。”

这样一个中肯的意见，本来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然而，这个建议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坐不住的上海《自然杂志》和它的主编贺崇寅急忙出来辩解、澄清、威胁、恫吓。在以《自然杂志》编辑署名的《关于邓伟志同志的‘对有关耳朵认字宣传的两点意见’的答复》中，不仅全面否认邓在“意见”中指出的“特异功能”表演中的作假、作伪行为，而且对邓大加指责说：“对于一个有8省3市60多个单位80余位代表参加的会议，没有起码的调查研究，凭主观臆断和道听途说就作危言耸听的反映和全盘的否定，信口开河地欺骗领导实在是骇人听闻的。我们为对参加‘上海会议’的代表和全国几十家报纸负责起见，不能不有所申言，以明事实之真相，以正各方之视听。”贺崇寅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中，对《人民日报》以《情况反映》的方式披露“上海会”真相大为不满，大加指责：

贵报科教部在《争论》一文中，关于‘上海会议’，置全国各大报记者（包括贵报记者林纲同志在内）亲历其境的报道于不顾，竟把一个连一个会议也未参加过的邓伟志同志的反映未作丝毫调查核实，即奉为重要事实根据，这种做法实在是欠

慎重的。贵报过去对耳朵认字一事也是丝毫未作调查即在报上公开轻易否定，但因为是公开报道，群众中了解事实情况者还可如实向贵报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而现在科教部竟在撰写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内部情况时依然如此作风，以贵报的身份和地位，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其后果则是向中央领导提供了不符合事实的情况。

写到这里，还有一位勇敢的斗士，我们不能不提到他的名字，他就是《文汇报》记者洪东流。《文汇报》在反对“耳朵认字”微弱的宣传中，也是凤毛麟角。洪东流是“上海会”的参加者，也是“特异人”表演的目击者。在“上海会”后，几十家报纸在宣传“耳朵能认字”的欢呼雀跃声中，也独有洪东流敢于把当时的事实真相写成了6千多字的报道：《上海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观察记》。它对于揭露“人体特异功能”作伪、作假的事实，对于了解“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真相，对于推进怀疑观点的传播都功不可没。

第二节 建立组织

建立“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是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先生提出来的。“耳朵认字”的事情一发生，一向对科学问题有敏锐嗅觉的大学问家于光远就很关注。1979年下半年，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的于光远就指示当时任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钟林同志，要了解“耳朵认字”的事情，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阵地，应该关心、了解“耳朵认字”这类奇事。研究会把这件事交给了我。在钟林同志的领导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编辑部参与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具体调查和接待工作。我和编辑部的同志看过多次“特异功能人”表演，看过空军四所罗冬苏组织的王强、王斌表演，看过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组织的测试，看过北京大学陈守良组织诱发出“特异功能”儿童的表演，看过北京师院（现首都师大）林书煌在王强、王斌家里组织的测试。在我亲历的这些“特异功能”的表演中，没有一例是成功的。我的体会是，只要你认真地盯住“特异人”，他就一次也不会成功。在陈守良组织的诱发特异儿童的那场表演中，也被新闻媒体炒的沸沸扬扬，把在场的科学家的微笑、鼓掌都视为是支持者。在那场表演中，参加的孩子是被陈守良称之为在北大教职工中已经诱发的有特异功能的儿童 30 多个；测试是在北京大学一间大会议室，参予的人有 100 多人。会场的气氛十分活跃，也十分混乱，“特异儿童”在那里嘻笑、耍闹，参观看热闹的人谈笑风声，测试开始后，由现场的观众交给特异人试样。被测试的儿童在会场内外不断走动、出入、抖尽各种“机灵”的动作。会场上不断报出成功的测试结果和掌声与笑声。然而，我却死死地盯住分给我的特异儿童（一个大约 7、8 岁的女孩），20、30 分钟过去了，女孩始终没有认出试样里面的字，我又盯住另外一个男孩，同样不能辨认。之后，还参予一些所谓的测试实验（实际上仍无异于表演那一套，只不过是人少点，试样的设计严格点），也没有作成功。这一切奠定了我成为对“人体特异功能”坚定的反对者和怀疑者的基础。这些调查和观察的结果，都由我写成简报上报给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1981 年 10 月 9 日、10 日两天，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召开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座谈会。在会上，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发起建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

这个组由于光远牵头，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罗伟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钟林三位同志负责。其任务就是调查研究、组织测试、出版刊物。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11月30日）以《尊重事实，弄清真相》发了一条消息，其内容如下：

座谈会上大家回顾了两年多来耳朵认字宣传的曲折过程。1979年3月，当报上发表了四川一儿童耳朵认字的消息后，《人民日报》对这种反科学的宣传连续进行了批评，四川医学院等单位也对儿童的欺骗行为进行了揭露，有关部门作了检讨，事情本来已经平息。可是，1979年下半年有杂志为其翻案后，人体特异功能愈演愈烈，遥视、透视、思维通讯、意念取物都出来了。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有人大谈见鬼、闹鬼。现在已发展到“异能”儿童看病、破案、找水，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由于两年来出动了各种宣传机器宣扬耳朵认字，因此，必须花很大力气来调查研究才能分清是非，破除迷信。

会上，组织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联络组已开始同有关方面建立联系，并陆续收到来信、来文。联络组还派人到一些地方和单位进行调查，搜集资料。联络组负责编印《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

这个联络组的办公机构设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当时由国家科委批了5万元（这是反对特异功能的工作所得到的惟一的一笔经费）作为开展这项工作的活动经费。研究会就委派我来负责联络组的具体工作。自1981年10月10日成立到

1982年，中宣部第二次发出《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问题的通知》后停止工作。

第三节 卓有成效的工作

“联络组”的工作，虽然只有短暂的14个月。但这14个月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却是重大的。对于反对和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传播与宣传起到了抵制、削弱和申张正义的作用，是中国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历史的见证和印迹。这14个月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编辑出版了《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共10期，40多万字，编辑出版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参考资料》10期，100多万字，发给全国各省、市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这些资料，不仅针锋相对地发表了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揭伪、揭假、揭迷、揭秘的揭露文章和理论文章以及群众的来信、来访和纪实文章，还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灵学——心灵学——超心理学的历史、现状与研究。这些内容为怀疑论学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也为批评和反对“特异功能”的宣传、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这些资料至今都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第二，组织召开了“‘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会”，该会于1982年3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

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浙江、安徽、河北、甘肃、黑龙江、福建、山东等十个省、市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六十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到会讲了话。心理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徐联仓、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洪潮生、

北京医学院生化教研室教授王志钧、首都医院眼科主任胡铮、首都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邹鲁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李佩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感官生理专家江振裕、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上海科技出版社副社长姚永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叶至善、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章道义等出席了会议。

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罗伟、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钟林共同主持了会议。

与会代表对最近二三年来宣扬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讨论。同志们列举了各地揭露的大量的“人体特异功能”的弄虚作假的情况。同志们在讨论中说，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并不是像国内某些人所说的是科学上的“新生事物”，是“我国独有的奇迹”，“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金”等等。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外国一直有人鼓吹这类东西。时起时伏，但随着骗局不断被揭穿和现代科学的昌明，它们的市场越来越小。在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面前是毫无地位的。但是，近二三年来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反科学的宣传规模之大是极不正常的，代表们分析了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的历史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各种因素。大家认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反科学宣传，不能认为是不屑一顾的小事，不能听之任之，由其“自生自灭”。应该看到这不仅在毁坏我国科学的声誉，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严重污染。为了捍卫科学，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爱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与这种反科学的宣传作斗争。

第三，组织了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测试。由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上海心理研究所、四川医学院、兰州大学生物物理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国家科委声相中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单位组织了两个测试组，对当时报道的“特异功能”表演，成绩最佳的黑龙江省、河北省、湖北省、安徽省、云南省著名“特异功能”人进行测试。其中一个测试组由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虞积生负责，对黑龙江、河北、安徽的特异人进行测试；另一个测试组由我负责，对云南、湖北的特异人进行测试。测试采用中科院心理所的测试方案。该方案的具体设计摘录如下：

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者的“耳朵认字”、“透视”、及“意念移物”进行验证测试方案。

(一) 问题的提出

“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是从“耳朵认字”开始的。它究竟是不是科学事实？（即其真实性的问题）目前对此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鉴于对“耳朵认字”这类现象的真实性的歧见，有必要进行严格的、客观的验证测试以辨真伪。验证测试包括对“耳朵认字”、“透视”、“意念移物”三部分。

(二) 验证测试应遵循的原则

严格性——采取严格的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实验方法而不是以表演方式进行测试；

客观性——必须保证测试的客观性，避免主观随意性。

合作性——测试者与被试者双方必须合作，使测试工作顺利进行。

被试者不得提出有损严格性、客观性的要求。被试者采取合作态度，无论测试结果如何，将能得到一定的奖励。

(三) 对“耳朵认字”的测试

(1) 排除视觉因素：主张“特异功能”的人认为，“通过在完全排除了用眼睛看到或其它暗示可能的条件下（如双盲密封纸袋，以及暗室中观测等方法）得到了完全肯定的结果”（贺崇寅）因此，对“耳朵认字”的测试首先应在排除视觉的条件下进行。排除视觉的方法，或在暗室中进行测试，或者采取戴眼镜或遮眼罩的方法，使被试者的视觉不参与辨认活动。测试前征询被试者的意见，由被试者选择排除视觉的条件下测试；

(2) 双盲法：测试人员与被试者对试样内容均无所知。

(3) 试样包括：

无意义图形 100 个；外语字母 100 个；汉字 100 个；以随机数字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抽选；

(4) 试样密封——贺崇寅指出，“被密封在纸袋、塑料盒、铁皮盒、铝皮盒等容器内的图象一样都可被辨认。”本测试的上述试样装在密封的塑料盒、铝盒、纸袋及玻璃瓶内。试样制作由专人负责，并有编号；

(四) 对“透视”的测试

(1) 试样方块——特制“魔方”，它的五个面均为白色，前平面上的九个子面的颜色为红、绿、兰、黄、黑、橙六种颜色。测试前由专人随机确定这九个面的颜色。共有试样一百个，每一试样制成后用黑纸包好并编号；

(2) 采用双盲匹配法——给被试者一个六面均为白色的“匹配方块”，让他根据自己“透视”的结果在这个匹配方块前平面上的九个子面上贴上红、绿、兰、黄、黑、橙的颜色方片，使之与试样方块的前平面上的颜色一一对应。

(五) 对“意念移物”的测试

林书煌等在《人体特异功能移物的若干实验》一文中说：“某些具特异功能的少年儿童能在肢体不接触的条件下，使一些小物体从一个地方转运到另一个地方。”对“意念移物”的测试首先在特异功能者的四肢不能接触被移物体的条件下进行。“不接触”的办法是：被试者穿上测试专用服装，使其四肢不能接触试样。

试样包括：手表、有孔的135胶卷暗盒中装有M3的金属螺母、装有金属别针的火柴盒。

两个测试组于1982年6、7月间分赴测试地点。其测试结果是可以想像的。已经进行测试的，其结果都是否定的。安徽、湖北、云南都设置种种阻力拒绝测试。中科院心理所的报告，给出肯定的结论：黑龙江的牟凤芹没有“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河北的于瑞华没有“透视”功能。这两个测试组的工作，虽然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但这个工作，却给“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拒绝怀疑者参加的任何测试工作。在赴云南测试组给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的报告中，披露拒绝测试的理由是：

1. 认为我们的测试组是由一方意见组成，是来获取批评材料的，虽经多次说明、解释，仍然拒绝测试。
2. 继续宣传“诚则灵”的理论，认为“人体特异功能”已是科学事实，无须再做什么科学的验证测试。苏音同志（当时云南省科协副主席）并声言“相信的人，不要测试，或者测试不出来，他照样也相信。”
3. 提出家长、孩子不同意，拒绝测试，因此不能测试。

第四节 “兰大”的功劳

在北京大学陈守良等人通过对40名少年儿童的实验后，

提出“特殊感应机能的普遍性问题”，接着重庆医学院、太原铁路中心医院、山西中医研究所、安徽师范大学、蚌埠医学院、南通市人民医院等单位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也先后通过各自的实验证实了北京大学陈守良等人的观点。而且在1981年5月于重庆召开的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一致肯定了这个“重大发现”，这个观点也可谓北京大学陈守良等人首创，这个被称之为“人体潜能”的特异功能如果被开发出来，将会带来一个多么美好的前景。请看一位大作家笔下的描述：“如果人的潜能被开发出来，人人具有思维传感能力，人人都有特异致动（搬运）能力，那么，人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思想秘密可言了，相互都能感知对方的心理。而且现有的财产关系、法律，都失去了神圣的意义。”接着他进一步阐述“把特异功能训练用于教育和培养人才，将为21世纪培养出大量具有高度智慧和知识的人才，到那时，中国将立于世界智慧之林的颠峰，这是何等美好的前景！”这种完全虚无飘渺的憧憬，究竟有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兰州大学生物物理系单嘉量 and 无线电与电子计算机系韩波等人组成的实验组作了极有价值的工作。

早在1980年4月到8月，这个实验组在甘肃省兰州大学附属小学对728名少年儿童进行了实验，并曾得出了具有特异功能人数占总人数的1.4%的估计。但实验组的同志，并没有停留在这个结论上，也没有急于把这个结果发表，而是认真地反复地检验这些实验设计、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他们发现了许多实验中的漏洞，主要表现在实验方法的不统一；多种试样（开放、半开放与封闭）的采用，以及不少人作弊现象的出现等，都使他们对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他们认为，对于所谓“普遍性”的肯定与否定均须在排除

一切外界的人为的干扰因素的条件下，进行大量而严谨的科学实验，并在实验结果的处理与评价上，保证是严格与客观的，只有这样的结果才是有价值的。

于是，他们于1981年10月到12月在甘肃省兰州市的五所小学，在实验方法标准化的基础上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完成了对2832名少年儿童的32480个样本量的测验。现将其结果公布如下。

实验设想

进行人体非视觉器官辨认图形的实验，必须保证实验特别是试样本身能杜绝受试者通过非实验途径进行辨认，尤其要消除受试者依靠自身视觉以及在外界提供辨认信息的条件下的辨认效果纳入结果的可能性。任何依赖于监督与旁证的做法都会使实验减少其可靠性，对大量少年儿童进行实验，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突出，为此作如下考虑：

(一) 统一采用“一次破坏性全盲试样”。我们把油印着的图形(1.5×1.5厘米)纸样用胶水或缝纫机线全封在牛皮纸袋中，并夹入了一层牛皮纸以防强光下视觉助认。这里图象采用了基本无意义的简单图形代替了以往惯用的汉字试样，从而简化了组成结构，增强了特征及实验结果的确定性。

(二) 进行这样大量的实验。受试者随机猜中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企图通过实验本身完全排除猜中可能性是不可能的。所以采用了100种简单图形作为辨认图象。在实验过程中，给受试者始终展示这100种图形，让受试者能根据自己辨认结果与100种图形相对照，以图形编号表示辨认结果。这样，既消除了结果中似是而非的主观因素如“火”字认成“大”字算部分正确的人为判断标准，又给出了确定的猜中概率，从而使所

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排除猜中概率的干扰，结合受试者辨认结果的总体与个体两个方面的假设检验，给出具体的、有数据指标的客观指标，对受试者是否具有非眼辨认图象的人体特异功能给出客观的判断。

(三) 实验严格的保证每个受试者每次实验均为独立实验以维持猜中概率的恒定。即受试者的上一次实验不为下一次实验提出辨认信息。

(四) 实验整个过程采用了说明、诱发及物质奖励的激发方法，力求使受试者能集中精力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实验。除此之外，在功能诱发上，考虑到尽可能增加实验次数。

实验概况

实验是以学校自然班级为实验集体，由一实验人员在班主任配合下进行，实验开始给每一个学生随机发给一试样，受试者将试样放在测试部位进行辨认，到规定时间后在试袋上写上自己名字及辨认图形的号码，然后统一交上，由实验人员开封、校对、存档。需要说明的是：

(一) 测试部位基本是腋下、耳朵、手心等，但不限死。

(二) 每一试样，测试时间为 20 分钟。

(三) 受试者年龄基本在 9 岁至 13 岁之间，其中个别大于 13 岁者纳入 13 岁，小于 9 岁纳入 9 岁。

实验过程，我们安排四个阶段：

1. 普遍测试阶段。每一受试者共进行间隔一天以上的两次实验，每次辨认五个试样，这样 2832 名受试者进行了 28320 个样本数的实验。

2. 第一次复查阶段。从 2832 名受试者中把在 10 个试样中辨认正确一次以上者抽出再进行一次 10 个样本数的测试。

3. 第二次复查阶段。从参加第一次复查的受试者中把前后两次进行了20个试样辨认中正确两次以上者抽出，再进行一次10样本数的测试。

4. 重点复查阶段。为了使结果更客观、可靠，我们对在前后测试了30个样本数的受试者中抽出辨认正确三次以上的14名受试者进行30个样本以上的测试。

以上四个阶段的总测试样本量达到324840次。

实验数据及其数学处理，因篇幅所限及涉及比较复杂的数学公式，在此略去。

结 论

1. 在我们所试验的2832名少年儿童中无一人具有非视觉器官辨认图象的特异功能者，因而非视觉器官辨认图象的机能“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的论点是没有严格的试验根据的。

2. 实验方法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着并决定着实验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3. 从大量反复的测试以及我们的引导诱发工作来看。特异功能是不能通过诱发与学习从无到有或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的。

4. 本普查结论不能作为否定“耳朵认字”客观性的充分必要依据，必须对那些作为该现象立论依据的著名功能者测试之后才能做出最终判断。

讨 论

本文是以“耳朵认字”为代表所获得的某些经验，但其中的原则也可以应用于其它的有关现象中去，如透视、遮视、意念做功等。

测试的目的不能基于一个一个的揭露具体骗术的细节，这种工作是永远也做不完的。要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加以理论化和标准化，如果这种方法为人们所广泛接受，那么真伪必将为一切严肃的研究者所判明。

大规模普查工作不能对“耳朵认字”的客观性给出否定的证明，如果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即使样本数再多也难以捕捉到。对散在社会上的各种功能者的骗术的逐个测试判明，也不能对“耳朵认字”的客观性提供充分的否定证据。只有将那些作为这种现象成为现实的那些著名功能者进行严格的测试后，才能对“耳朵认字”现象的客观性得出结论，因为这些关键人物是使“耳朵认字”现象成为“客观存在”的立论基础。

科学终究是科学，一旦某种现象真伪判断的理论与实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时候，科学才能够确立，骗术也就没有它的立足之地了。正如永动机的设想直到今天也许还没有绝迹，但它终究不可能再引起喧然大波了。

兰州大学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用严格的科学实验方法否定了“特殊感应机能”的普遍性问题，它比用表演的方式，实验对象的主诉的方法所发表的实验报告有价值、有意义的多，而且为科研工作和科研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科学道德和科学风尚。兰州大学本来自于1980年，“耳朵认字”的风靡宣传中，对728名儿童作过“普查”性的实验，并曾得出了具有特异功能人数占总人数的1.4%的结论。但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发现实验方法中的问题，然后进行不断的修正。并于1981年10月至12月，又对更大的实验群体作实验。对于实验结果，兰大的科研人员也不作夸大的评价，并提出兰大的实验，只是否定了“特殊感应机能”的普遍性，并不是否定“耳朵认字”的判

决性实验，并提出对“著名特异人”进行严格测试，因为他们是“耳朵认字”现象成为“客观存在”的立论基础。这种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的品格。美国著名科学教育家戴维斯曾精辟地分析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所应具备的品格：

1. 在新的证据出现时，乐于改变自己的观点；
2. 毫无偏见地探索完整的真理；
3. 具有根据事实作出判断的习惯。

第五节 力排众议，力挽狂澜

在“人体特异功能”的争论中，宣传舆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耳朵认字”一出笼，全国上百家省、地、市级报纸，大部分的科技报和一些工矿、铁路、部队的小报都以“科学珍闻”、“科学新发现”作了报道。但随着这类“奇事”表演的多了，“露馅”、“露马脚”的事也就越来越多，报社不断收到揭露弄虚作假的“特异功能”表演的观测报告。而对报端的一些“拔高”的不实宣传，更引起一些有识之士极大的反感。这种声音在当时虽然是处于弱勢，但它却代表了一种真理的呼唤，而一些报刊更是顶着当时那种宣传“特异功能”强大的舆论压力，坚持独立思考、敢于反潮流，甚至顶着辱骂和恐吓，发表了反对“特异功能”弄虚作假和违反科学宣传的文章。以《人民日报》旗帜最为鲜明，其次《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上海青年报》、《上海科技报》、《广州日报》、《河北日报》以及《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大观园》、《哲学研究》、《百科知识》、《科普创作》、《科学画报》、《自然辩证法通讯》、《新闻战线》、《云南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吉林）》等报

刊都发表了批评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上海解放日报的《新论》、国家科委编的《内部讨论》、中国出版协会编的《出版工作》，以及中国心理学会编的《心理学探索》，安徽日报社的《文摘周刊》都相继发表批评耳朵认字的言论。连香港《争鸣》杂志也发表了一些批评“耳朵认字”的文章。《文汇报》于1980年1月7日第一个发表了邓伟志同志写的《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此后，《文汇报》在《向科学进军》副刊及《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和《长知识》专栏里“力排众议”，“挽狂澜既倒”发表了不少宣传唯物主义，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

《中国青年报》在1981年8月15日至1982年3月13日，在《科普小议》和《长知识》专栏里连续发表批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文章，其中邓伟志《在玻璃瓶子面前》一文，是他的又一次“目击记”，那是在“重庆会”召开以后的1981年8月26日在上海科学会堂，让特异人在全封的玻璃瓶面前怯步面逃的事实；袁一志介绍国外这类研究被冷落和“特异人”漏气事实的《“人体特异功能”纵横谈》；薛延揭露“重庆会”宣传“鬼魂”、“魔杯”等“奇事”的《特异功能和特异技巧》；明道披露“特异功能”宣传中“借古喻今”、“侈谈神怪”的《汉武帝和特异功能》等文章，都有力地击中了“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中的伪劣和虚狂。于是也遭到了“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的强烈反对：谩骂、诅咒，甚至污辱，但同时也让批评“耳朵认字”宣传的人大言“痛快”，甚至雀跃三尺。为了让读者真实地了解这段历史，在此将《中国青年报》汇集的《读者反映》双方观点的精彩段落摘录如下：

赞成“特异功能”的声音：

吉林省桦甸县印刷厂署名：有特异功能者王敦志、王敦伟、王敦春、王敦洪、王小东。家长王世奎、武光兰、田素珍、王福佑。

您报在8月29日刊登了《特异功能与特殊技巧》，作者是薛延，最近又在12月5日刊登了《汉武帝与特异功能》，作者明道，批判特异功能。

薛延和明道这两位秀才不知是干什么的，这两个东西一不懂科学，二不尊重事实，实际和“四人帮”一样存有严重的极左思潮。难道你参加过几次测试会？你们两个听着：全国现在出现了几千名特异功能者，各省市领导和科研机构都到现场测试。并用仪器进行了检查，难道全国这帮科学家和特异功能者都在骗人？就拿我省来看，在长春测试数次，都有著名科学家和各大学参加，每个儿童测试上百次，难道都在骗人？难怪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和著名科学家×××在全国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会议上讲，今后还会出现一些人在讥笑。我们不必理睬他。这种人在五六十多年前也有过。我国著名科学家×××、赵××、王××、王××、贝××正在研究这些功能，难道他们都在搞迷信？他们发明原子弹、核武器等，难道不知道什么是迷信，偏偏研究几个毛孩子？他们的知识不如你薛延、明道。您们两个不懂科学，还不睁开你们的瞎眼看一看。就拿我县来讲，有几名特异功能的孩子，一放假就到省、市、县医院去给患者看病。有很多大夫也找他们给透视。难道一个大夫让几个毛孩子给骗了？这些小孩经常出现在我县医院的病房中，受到大夫和患者的高度赞扬。经他们的手给患者摸好了几十人，手到病除，有病的60%全摸好了。不信您可来我们这里做试验。不然的话你们瞪着眼睛说瞎话，不尊重事实。乱在报上写假文章等于放屁一样。你二人这些假话和你们俩在春节和

新年期间上西天去吧！祝你二位骗子见鬼去吧！我们家有六口人，其中五人有特功，受到省、市、县的多次测试，并治好了几十名患者（不用吃药）。你们敢来的话，在事实面前做实验你们看一下，透视达到99%准确。让你二位骗子在春节期间见鬼去吧。

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张亚伦：我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大会”上谈过我关于魔杯的实验。我知道有人会神经过敏，曾特地声明：所谓“魔杯”的“魔”字是打引号的，关键是有特异功能的人。薛廷同志抓住一个字，硬要把它同迷信联系起来，完全是徒劳的。“人体特异功能”在我国是一门崭新的科学，有巨大的发展前途。像他这样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小议”，公开阻挠科学研究，如果不予以驳斥，必然会贻误青年，产生极坏的影响。

河北邱县文化馆徐孟山：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谁也不能保证他的论断就绝对正确，认识也是在揭示科学中不断更新的嘛！……我觉得，所谓鬼的出现，即使与事实有出入，也不该阻止人们发表见解。“鬼”侵入科普报刊无罪！

山西阳泉科普创作学会俞志安，在《冲破“鬼魂”研究禁区》一文中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次的科学禁区的冲刺，都会有人跳出来非议阻拦……当“耳朵认字”的报导见报以后，不是有人咄咄逼人地批之为“骗局”吗？现在，对“鬼魂”现象的研究刚一露头，便又有人横加指责，说什么“现代鬼魂”出来游荡了，煞有介事地要有关报刊保持“头脑清醒”。

反对“特异功能”的声音：

山东枣庄市机械厂胡乐华：

看了邓伟志同志《在玻璃瓶子面前》一文，不禁为之叫好，我终于看到了一篇关于人体特异功能测试的真实报道。

柳州高中白宇：

邓伟志同志的文章《在玻璃瓶子面前》，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表演揭露得好。应该说，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有些人是别有企图的，比如说利用“特异功能”的宣传，达到他宣扬封建迷信的目的，这种人是最可恶的，非揭穿他们的障眼法不可！

1981年4月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的“仙姑”治病，轰动一时，真是无独有偶，这个“仙姑”治病的地方，也打出“特异功能研究办公室”的招牌，使封建迷信的敛财之道，巧妙地 and “科学”结合起来了。这个县的拉烈公社五仁大队弄仇生产队的一些干部和社员，为了弄钱，竟然异想天开，把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潘美菊装扮成得了道法的“仙姑”，能治百病，引得外县的男女纷纷不远几百里专程而来求治。先是“仙姑”找药草打发病人；后来求治的人来多了，就由“仙姑”摸病人带去的饼干糖果之类的食物当药；后来求治的人更多了，干脆就由“仙姑”摸摸病人的头顶或是肩背，就说是有效了。许多人求治心切，既不去辨其真伪，更不注意是否科学，大暑热天气在山道上排队坐等，风餐露宿，不病也熬出病来，有些人竟无辜地死在山上，岂不悲惨！其实，就连“仙姑”的母亲关秀月患慢性鼻炎鼻出血的毛病，都还是到拉烈公社医院治好的，“仙姑”又真有什么法力？可恨的是那批财迷心窍的骗子，不管群众的死活，还要打出“特异功能”的“科学”招牌来杀人，难道还不令人醒悟警惕！？

铁道部山海关桥梁厂康三昌：

《人体特异功能纵横谈》使我更加坚定了否认特异功能存

在的观点。我是一个魔术爱好者，虽说三十出头，但对魔术的研究已十年有余，在听到耳朵认字的报道以前，我就经常在舞台上或台下工作之余，为大家表演魔术，其中耳朵听字是最受欢迎的，当时也有很多人提出为我写报道，我公开讲，这是魔术。就听字来讲，我会的表演方法就有三四种以上，这种听字虽说是最简单的魔术，但也是最高级的“活”，它包括内在灵感和心理学。我对科普报刊一个时期所报道“特异功能”的文章是可以谅解的。但人们不能谅解的是那些伪科学的骗子们，把唯物的艺术说成是“特异功能”，用以欺骗国家和人民。魔术是不能公开的艺术，但应声明一下，不是“特功”是魔术，也就不会造成人们对所谓“特功”认识上的混乱，对魔术艺术来讲如果是门外汉，一百个人（包括科学家）也不一定如一个门内汉的眼睛，我建议：有关机构如再测试“特异功能”，最好能让我参加，我愿做出贡献。

明道写给《中国青年报》的信：

居然有人利用“侈谈神怪，什九虚造”的小说《封神演义》，来证明“特异功能”不仅古代有，而且普遍和高深，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明代的许仲琳本来是因为无钱嫁女，才闭门数月敷演出这部神魔小说的，岂料想四百年后竟被奉为现代灵学的太史公。如果许仲琳确有灵魂并能被召来显形的话，真不知他老先生又将作何感想。这种到古代小说中去“考古”有什么必要呢？那就是企图证明“特异功能”古代就有，但今天“特异功能”却不普遍而且衰退了，不言而喻这就论证了科学昌明是一种“罪恶”。这并不是什么创新的理论。日本人在《不可思议》一书中说过：“具有超级能力的孩子，随着长大成人，这种超级能力逐渐消失。这是由于知道了人体的构造，并且有了一般常识”的结果。两者从人类发展和个人成长的两方

面得出的是相同的结论。看来，科学与“特异功能”二者是不可得兼的，难怪他们要对现代科学发出“挑战”了。要开发“特异功能”，人类就应该倒退到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这就是这场科学“革命”的最终目的。

这些批评和抵制，如春风化雨，为这种阴霾的氛围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第六节 于光远不再沉默

“耳朵认字”一出笼，长期从事科学领导工作的于光远，就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股不健康的潮流。1980年10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召开的辩证唯物主义学术讨论会的演讲中就指出，一些哲学工作者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表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但是，这时于光远还没有系统地反击“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直到后来，他越来越觉得有点太不像话，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才正式出击反对和批评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正像他在《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的前言中所说的：“原先我以为这样的事闹腾一阵子之后就会自生自灭，没有想到竟然越演越烈。‘人体特异功能’的受骗者越来越多。在我国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彻底唯物主义原理得到伸张；另一方面如此荒诞的反科学的迷信的宣传，却喧闹一时，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视，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学校等等为这种反科学的迷信的宣传提供宣传工具、提供便利。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为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的国家的国家，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竟如此肆无忌惮地得到宣传，作为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于是1981年8月我不得不发出‘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的呼吁。这也是许多同志的想法，他们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非常愤慨，积极投入这场破除这种伪科学宣传的战斗。”

从1981年的下半年到1982年上半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于光远同志发表了十几万字的论文和揭露文章，列目如下：

1. 《对两年多“耳朵认字”的哲学评论》——《江西社会科学》；

2. 《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科学大观园》；

3. 《科协应该严肃研究一下“耳朵认字”问题》——《给中国科协负责同志的一封信》；

4. 《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知识就是力量》；

5. 《对待人工智能和人体特异功能用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在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大会讲话》；

6. 《科普书刊中的鬼魂宣传》——《给中国科协负责同志的两封信》；

7. 《希望中国科学院有更多的同志参加揭露“耳朵认字”的工作》——《给冯德培、过兴先、潘叔同志的信》；

8. 《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

9. 《重读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哲学研究》；

10. 《Psi 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中国社会科学》；

11. 《唯灵论、心灵研究、超心理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百科知识》；
12. 《中国科协有没有承认“中国所谓人体科学研究会”》——《给中国科协负责人的信》；
13. 《一个会议的纪要和我们的按语》——《人体特异功能问题研究资料》；
14. 《消除哲学教学中的不良影响》——《教学与研究》；
15. 《请读读一篇奇文〈意念论〉的摘录》——《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
16. 《1981年我国哲学战线上的一件重要事情》——《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
17. 《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历史手稿》——《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
18. 《要恩格斯，还是要灵学？》——《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
19. 《对“耳朵认字”的系统批评》——《文摘报》；
20. 《于光远同志对“耳朵认字”等宣传提出意见》——《文汇报》；
21. 《于光远认为“耳朵认字”根本不是事实，必须纠正荒谬宣传》——《文摘报》；

其中以《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为最系统。全文共分七个部分：（一）两年多来“耳朵认字”宣传的经过；（二）这种宣传不是新现象，也不是我们一国的现象；（三）如此宣传的“人体特异功能”根本不是事实，这只不过是利用魔术手法的弄虚作假；（四）对“耳朵认字”宣传的揭露和批评的文章，都未能获得发表的机会；（五）为了在更多人面前揭穿这种弄虚作假，不妨再作一番测试，但必须是真正科学的实

验；(六)要从哲学上根本解决问题——反对经验论；(七)是停止这一宣传的时候了——但这一宣传有其根源一下子是不会绝迹的。这一篇长文，从理论和实践上剖析了在中国土地上宣扬的“特异功能”研究，不过是西方“超心理学”研究在中国的重演。这篇文章在国内引起极大的震动，它受到了反对“特异功能”人的赞赏，也受到了宣传“特异功能”人的攻击。于光远的文章如利剑、如匕首、直刺“人体特异功能”的要害。于光远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从1979年夏天到现在的两年中间，对这种事实上不存在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愈演愈烈，除“耳朵认字”外发展到：

(1) 人体的各个部位，包括腋下、腿弯、胸、臀部、脚底等等，甚至把纸团吞到胃里都能辨色、辨画、辨字。这种“功能”，人们称之为全肤辨字或全身辨字。

(2) 能够透过不透明的物体，如透过金属、塑料、墙壁、土地“看”到里面或背后的物件，能够看到人体内的器官及其异常。这种“功能”被称之为“透视”。

(3) 能够在很遥远的地方，例如在一千公里以外的地方看到一个人的模样，且不需要借助于任何物质的工具，这种“功能”被称之为“遥视”。

(4) 不需要经过任何物质的信息工具，即不需说话，不需要作什么手势或其他动作与表情，不需要通信，不需要电话、电报等等，一个人脑子里面想的东西——一个念头，一种想象或得到的印象，一个盘算等，另一个人在别的地方，如在别的房间甚至在城市中另一个地区或另一个城市就可以知道。这种“功能”被称之为“思维通讯”或“心灵传递”。

(5) 有某种“特异功能”的人，可以用不着手，用不着运用自己的任何体力，用不着借助于任何工具和任何体外的动

力，只需要运用自己的意念，就可以使物体发生位置移动，而且可以使物件发生这个人要它发生的那种移动，如可以只凭某个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的意念拨动钟表的指针或者把植物的茎折断，可以把锁打开，可以把金属的餐刀餐叉等“看弯”、“看断”，又可以用“看”的办法把它接起来，恢复原来那个样子，凭意念可以把塑料盒子里的火柴断成两截等等。这种“功能”被称之为“意念致动”。

(6) 具有某种“特异功能”的人可以使物件穿过坚固的墙壁，“飞”到他所指定的地方。例如可以使几十米、几百米以外长在植物上的叶子或花朵，穿墙过户，自己飞到预先上了盖的杯子里来；可以使扣在这间房里碗里的钮扣飞到隔壁屋子里去；人在这间屋子里，甚至可以把放在隔壁房间的苹果咬去一口等等。这种“功能”可以称之为“驱使物件穿墙越户”。

(7) 具有某种“特异功能”的人，可以见到死去了的人的“鬼魂”。比如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在参观故宫珍妃井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群古装人物把一个女子扔到井里去的景象。据宣传还有人见到鬼，这个鬼还对他开口说：“你起来，这是我的床”。有两个医生见到一个垂危不能起床的病人到诊室来和他们告别，并且一下子不见了。医生走到病房，原来这个病人刚刚断气。这种“功能”可以称之为“白天见鬼”。进一步说还有原先不懂医学的人，因为有死去了的名医附在他身上，因而会开方治病等等。

针对上述“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中的“奇谈怪论”，于光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科学的判据方面，进行了系统地、深入地批判。他指出，进行这些荒诞的宣传，就意味着三个结果：1. 否认经过人类历史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2. 背弃科学唯物主义的原理；3. 为早已不再公开宣扬的封建迷

信开路。所以，于光远把这场斗争看成是一场科学和伪科学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正义的人们应该站在科学真理这边，运用科学的武器——科学的论据、科学的理论来对待这场争论。他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恩格斯所说的江湖骗术能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毒害青少年，制造思想混乱。”

为了维护科学真理，维护科学唯物主义原理，抵制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于光远同志作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他运用科学史、灵学史的丰富材料，引用了大量“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宣传的所谓“特异功能事实”进行揭露和批判，有理、有据、有力，给“人体特异功能”的虚伪宣传以有力的打击，是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先锋者、带头人。二、他从科学和哲学的理论高度揭示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理论框架的虚妄和危害，指出“人体特异功能”居然都进入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教科书中，这种把灵学唯心主义的东西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体现了哲学界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伪科学的攻击下败下阵来。他要求，我们的教科书，必须在灵学唯心主义和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捍卫了科学的纯洁和科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现了于光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敏锐的嗅觉。三、从科学方法上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是一种反科学的宣传，这种宣传所以能成为“气候”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落后思想愚味的表现，也同人们科学方法、思想方法的缺陷有关。他指出，在“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中，不仅把“诚则灵”的灵学的信条，塞到科学中来；把“眼见为实”、“只要实验成功一次，偷看百次何妨”的经验论信条，拿来作科学的“判据”来抵御科学的检验；还粗暴地歪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他们否认历史上大量的实践检验和实践检验的真理。认为

“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可以全部推翻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哲学认识；第二，只接受信仰者的检验，不接受怀疑论者的检验。在《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的前言中，他写道：

应该指出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直到今天在欧美、日本等地仍有活动，名称不同，内容都差不多。而且这类反科学的宣传不只是文化落后思想愚昧的表现，它也同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缺陷有关。有一些人接受这样一种认识方法：“耳听是虚、眼见是实。”他们不去想一想，“眼见”的只是现象，而现象中有些可能是假象，它不直接表现本质，假象背后的本质需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去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出来。对于行骗和受骗，有专门的学问去进行研究，那就是“欺骗心理学”。对揭露骗术也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行骗者是不敢接受严格的科学测验的，所以在“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的文章中就白纸黑字地写有“在有强烈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人在场，或是有其他气功师在场，就会影响这些儿童的功能”，作为失败后的退路，而他们热心的是表演。同时也有不少入，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科学知识，可是他们竟然不去想一想：如果“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是事实，那么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基本知识究竟还能不能成立？他们是否准备把这些东西统统抛弃？他们究竟准备把自己的认识和实践建立在怎样的科学基础之上？

这些批评句句击中要害，体现了于光远作为一个大学回家卓越的见解。

1982年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报告会，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主席团执行主席的李昌同志主持并讲了话，国

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于光远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于光远在报告中指出，近两年来，我国对“耳朵认字”一类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作了大规模的宣传，已经走得非常远了。比如，《自然杂志》去年9月发表一篇报告，说“特异人”可以用意念转运物体。在转运过程中，有一个从有到无（即消失），再从无到有（即再现）的过程，什么手表和果绳都可以先钻进脑子，进入通常人不能察觉的“异态”世界，然后再从脑子里钻出来，回到常态。还有人竟然宣传有什么“有形人”和“无形人”，“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说开发“无形世界”将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等等。这些是很不科学的。

于光远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自然杂志》1982年第1期一篇文章中就说它属于超心理学范畴。超心理学又叫心灵学，就是伪科学。因为它并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标准。比如，任何科学的试验都是可以重复的。连国外一本既不相信也不反对“特异功能”的心理学史都说，超心理学的实验没有一次能重复的。“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者们搬出“诚则灵”来作根据，说只有相信的人才能试验成功，不相信的人有一种反意念，就试验不出来。这怎么能使人信服它的科学呢？

他在报告的最后举例说，现在这种宣传，在国家建设、人民生活中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为此，我们要求停止这种不科学的宣传。

《人民日报》对这个报告会作了报道，并加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的内容如下：

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1979年5月，本报对所谓“耳朵认字”的宣传进行了批评。广大读者赞成这一批评，也

有一些人不赞成。

在这个时期，有些热心于“人体特异功能”的人对本报进行了若干批评和指责，我们对这些批评一字未答。这是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科学单位和科学工作者坚持说“耳朵认字”是科学，是很深奥的科学，是‘人体生命现象上一个重大发现’；更多的科学单位和科学工作者则坚持认为是伪科学，是把魔术式的表演硬说成科学，有的甚至是故意弄虚作假。究竟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呢？我们认为，对于这类争论进行权威性的评论，应该由科学领导机构来作，而不是由《人民日报》来作；而且一张政治性的报纸也很难提供篇幅来刊登有关这方面争论的文章。所以我们期待着有权成的科学机构来解决这个争论。

现在好了，国家科委于去年10月组织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已经编印了四期《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同志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连续发表批评文章，一些科学杂志和报纸相继发表文章揭露“人体特异功能”的虚假性。昨天，中国科学院又召开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报告会。

今天，本报在刊登这次报告会新闻的同时，刊登两年来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情况的综合报道。请读者分析和判断，究竟“人体特异功能”是科学还是伪科学？

《宣传简况》的综合报道内容如下：

近一个时期来，国内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观察报告，对两年多来‘耳朵认字’宣传提出批评。

自从1979年3月，有的报纸介绍四川大足县一名儿童能

“耳朵认字”的事情之后，北京、广东、安徽、河北等省也陆续报道“发现”几个这样的儿童。但是，这些宣传很快地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四川医学院等单位的实验所否定。同年5月，本报及其它一些报刊对这种报道进行了批评。

上海《自然杂志》1979年第9期发表文章为“耳朵认字”辩护。1980年2月，《自然杂志》在上海组织召开了“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以后，一些报刊、电视、电影对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作了大规模的宣传。其中，《自然杂志》在两年多时间中，为“耳朵认字”开辟专栏，每期至少发表一篇有关文章。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办起了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组、研究会。1981年5月，在重庆召开了“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在此期间，批评“耳朵认字”的文章很少发表。

近两年来，“耳朵认字”宣传的内容大大发展了：

①认字的部位已从耳朵发展到人体从头到脚的各个部位，甚至把纸团吞进胃里也能“认”出来。有的“特异人”不仅能“认”纸团、“认”一封信，而且能“认”剪碎了的纸片上的字。

②不需要任何物质的信息传递工具，一个人脑子里想到的事，另一个人在别的地方也能知道，称做“遥感”、“心灵传递”、“思维传递”。

③透视：能穿过密封的牛皮纸袋、塑料暗盒、密封的铝罐、铁盒、墙壁、土层、人体，看到盒内、罐内、墙里、地下的东西，甚至可以认出孕妇体内胎儿的性别。

④意念致动：能拨动钟表的指针，折断植物的茎，看断火柴重新接上，嫁接植物，等等。意念还可以使物体穿墙过户，如使百米以外的植物叶子或花朵“飞”进盖着的杯子里，叫这

个房间里碗下的钮扣，“飞”到隔壁屋子里，“特异人”在这间屋里可以把放在隔壁房间的苹果“咬”一口，等等。有的文章还宣传说：“特异人”的意念活动能使物体从有变无，处于“异态”，这时普通人的感觉器官和通常的探测手段暂时不能察觉它的存在。但是，物体（如钟表、果蝇）并没有停止机械运动、生命过程。过几十分钟，“特异人”又能使物体从“异态”恢复到常态。

⑤“特异人”能见到已死者的鬼魂。

⑥理论上把“耳朵认字”的概念变成了“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功能”，进一步称为“人体特殊感应机能”或“人体特异功能”，后来又代之以“人体科学”。宣传者们声称，“耳朵认字”由于人体有所谓“第七感受器”、“七元世界、八元世界”、意念波。有的甚至说这一切是无形人的作用，“一个无形人生活的无形世界被开发出来，这将是人类文明史以来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广大读者和科技工作者对这些宣传十分不满，有的投书本报揭露真相，有的要求本报予以澄清。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在去年8月以后多次发表谈话，呼吁停止“耳朵认字”等不科学的宣传。他的题为《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的长篇文章，正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连载。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茅以升、潘菽在对本报记者谈话的时候，指出一些报刊上关于他们相信并支持“耳朵认字”的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五章 “三不方针” 出台内幕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章，作为从科学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这场在中国涉及范围之广、探讨问题之深、影响之大、时间之久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这其中有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还有政治家。而政治家的代表人物就是胡耀邦。胡耀邦从“人体特异功能”问题的一出笼，就被卷入其中，可以说，他与“人体特异功能”息息相关，“人体特异功能”与他也息息相关。每当“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争论的关键时刻，都有胡耀邦批示的作用在发生影响。从1979年“耳朵认字”争论起到1982年暂时停止的这场“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终萦绕着胡耀邦同志的影子。他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批示（1979年4月24日、1979年11月8日）到以中共中央主席的批示（1982年4月10日、1982年5月13日）跨越了整整三个年头。从胡耀邦同志的几次批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胡耀邦同志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是不赞成搞什么“耳朵认字”这类“人体特异功能”的把它称之为“丑戏”，称之为“荒谬绝伦的笑话”；他以前瞻的思考和坚决的态度强调，“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他以更敏锐的政治家的眼光指出，“我们该要多么警惕啊！该要多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些教诲，在“特异功能”到伪气功，直到

法轮功邪教产生的历史脉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是可以关系到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只可惜，胡耀邦同志，没有把这种远见卓识坚持到底，他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退却了，他承认了“三不方针”。这一点，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尽管有的科学史家将包括“人体特异功能”在内的灵学作为伪科学的案例写在科学史里。但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可能也许是无可非议的，这有什么办法呢？

第一节 激烈争论

在上述特异功能的论战中，不仅形成了宗旨不同、观点不同的两个组织（“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和“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两个刊物（《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到1982年12月30日停刊共出刊30期，小报停刊后，仍由《自然杂志》社出版《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共出刊10期，1982年10月又编辑出刊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研究参考资料》，也出刊了10期）、两面旗帜（一面是大科学家，一面是大学问家）。而且也卷进不同见解的著名科学家。

著名科学家支持“特异功能”的报道：

《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创刊号（1980年10月15日）不署名报道了《赵××教授谈人体特异功能》，从报道中可以看到赵教授表明自己相信“特异功能”是确实存在的，并指出解决争议的办法是进行科学研究。下面摘录其中几段：

关于人体特异功能这件事，大概第一次听到的人总是反对的，总是不赞同的。等到他们实际参加了测试以后，大概绝大

部分的人是会同意它的存在的。这种从不同意到同意，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科学态度。

除了‘耳朵识字’以外，特异功能还包括其它的一些现象，例如知觉遥感、精神致动、气功治病等等。这些现象的真实性还有着严重的争议，而解决争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付诸实践与科学研究。

现代科学还不能完全解释特异功能。使用客观的科学仪器的记录来研究特异功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在还刚刚进入到这个阶段。过去人们对特异功能的探索，只是凭感觉与口述，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别人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单凭主观感觉不可靠，有客观记录就可靠多了。从主观到客观是很重要的，要不然是不容易推进的。

《人体特异功能通讯》第2期（1980年10月31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孟戈非谈人体特异功能。他说：“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未知的领域、生物界、生物个体以至在人体中存在着特殊功能，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能轻易否认。”

《人体特异功能通讯》第4期（1980年11月30日）《贝××教授谈人体特异功能》，报道了7月中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你信不信》摄制组采访贝时璋教授的讲话。贝教授认为，“把人体特异功能的事迹搬上银幕，扩大宣传，让没有机会实践的人也都能看到这件事，这很好”。他当天亲眼观看了董文豹父子的思维传感表演，并表示“对这一现象的可靠性的认识就更加坚定了”。关于是否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发表了如下见解：

但是，承认了它的可靠性还不够，还应该深入开展研究。我认为，人体特异功能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决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或一两次实践能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很好的认识和研究。需要而且也值得投入力量的。

我们是生物物理所，顾名思义，是运用物理的手段对生物进行研究，因此，人体特异功能这一研究与我们密切相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科研任务。我们生物物理所应该抽出人力来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目前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在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我们一位副所长对此也很重视。

×××同志最近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讲话，我完全支持×××同志这一观点。人类对于未知领域就是应该勇敢地去探索嘛！

《人体特异功能通讯》第7期（1981年2月20日）《×××教授谈人体特异功能》，报道了×××教授听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小组的工作汇报后所作的发言：

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很重要，先把特异功能的范围搞清楚，‘现象学’至少是可以做的，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准备要搞的课题。现在承认的人越来越多了，将来一定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不要追求表演，现在重要的是把研究工作搞得扎扎实实，否则一遇风浪，这几年的成果就可能付之东流。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兴起一阵子，垮掉了，新奇一阵了，垮掉了，这是因为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要继续艰苦奋斗。现在看，特异功能已经可以应用，不过，研究和应用，我倾向重点是搞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应用不做重点，当然应用也不可

忽视掉，要给予推动，但真正下力量的应当是研究工作。开始时会很困难，但我相信这项研究是有科学意义的，终究会突破的。现在的应用和将来在机理搞清楚以后的应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我希望这项工作较快地步入正轨，引入到科学研究中。大联合起来，发挥集体力量踏踏实实地前进！我完全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破点，这项研究工作在将来是不得了了，要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人体特异功能通讯》第8期（1981年3月20日）以《李宝实教授谈人体特异功能》为题报道了著名五官科医学专家李宝实在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李教授认为：具有特异功能的人是“天才”。他谈了两点：一是用普查的方法去发掘天才；二是运用天才的措施。

他建议“由中央建立一个普查机构，每个省市也都建立一个分支机构，这个机构应当有行政领导部门和科学协作部门，如科学院、科协、教育、卫生等部门，还有其它临时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参加这一普查工作。”他建议，“继普查之后，根据不同的特点加以运用，有些尚需加以教育，更好的发挥天才人的作用，在边运用他的天才中边探索其特异功能的奥秘。”在他谈运用天才时举例说，可以把透视功能用于医疗、工业和海关检查及盲人的训练。

《人体特异功能通讯》第9期（1981年4月20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院长刘允中《谈人体特异功能》。下面是他发言的一部分：

这个事情发展很快，在那样一番波折下，能有一些同志坚

持搞下去，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得到×××、贝××、王××、赵××等著名科学家的大力支持，很简单，相当不错。历史上多少人为研究一门科学献出生命。向真理迈进一步是相当不容易的。要任得劳、任得怨。有的人任劳不任怨，希望大家对别人的支持表示欢迎，对别人的赞扬不要飘然，对别人的批评不要讨厌。科学成就是一滴血一滴汗凝成的。

著名科学家反对“特异功能”的报道：

《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下简称小报）刊登了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茅以升、潘叔、马大猷、洪朝生等抵制、批评“耳朵认字”这类宣传的报道。

小报第一期（1981年11月30日）刊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1981年8月19日给《人民日报》科教部的一封辟谣信：

人民日报科教部：

今晨接你8月18日信，不胜惊诧之意，我从未见过《福建青年》杂志，在它今年第7期上所载我“于今年3月在北京观看了昆明的四名小孩移动物件穿墙过户的特异功能的表演”更是莫名其妙。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一位林同志是我老友林诗伯之子，今年6月曾约我去他的学院，观看了一次所谓特异功能的“录像”，很模糊，也无穿墙过户的镜头，同时观看的也无周培源、钱伟长同志，可见《福建青年》这段报导，完全是捏造的，可否请你报去函查问一下，以免以讹传讹。

此致

敬礼

茅以升

小报第2期（1981年2月10日）刊登了吴凯报道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物理学会会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1981年9月15日在上海的一次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谈话。

9月15日，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同志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了对人体特异功能等问题的看法。

周培源说，在普及科技知识方面，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有虚假。科学的态度应是慎重的。我看过一次特异功能表演，有的地方就把我看表演的事加以宣传，说我信。人民日报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要解释一下。那次是云南来的四个孩子表演。其中一个口中念念有词，杯子中有了一朵花。这朵花不是北京的，而且修得很整齐。一朵花怎么可能到水杯中来呢？同我一起看的还有裴老（裴丽生同志）、述周（刘述周同志），他们也同我一样，都不相信。还有什么意念作功，我也怀疑。有人说那些东西可治癌，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意念是主观的，规律是客观的。如果说我想要什么东西，就会到我口袋里来，公安人员还怎么做工作？有人提出要成立全国性的特异功能学会。这个问题，我看要慎重。科协不能接收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人会。科协要对维护科学的尊严负责。

小报第4期转载了刊登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内部讨论》1981年第100期上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981年10月23日给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封信，该信澄清一些刊物关于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潘菽同志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看法的歪曲报道，转达了潘菽不相信“耳朵认字”的宣传意见。

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

前一个时期，我国有几种刊物对潘菽同志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看法作了不符合事实的报道，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为了澄清事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去年11月在重庆召开心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期间，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问潘菽同志对人体特异功能有什么看法。潘菽同志当时明确表示，他本人是不相信的，至少现在还持怀疑态度，因为没有科学根据，也不一定是真实。但如果有人愿意去研究清楚，他也不反对。但《人体特异功能通讯》（80年第5期）却在第一版报道说：“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指出，心理学要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并且还报道说，“……潘菽指出，……要建立中国式的心理学，特异功能的情况必须考虑。”我们认为，这种报道是不符合潘菽同志谈话的原意的，予以澄清。

二、今年5月间，在重庆举行了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会议组织者在会前曾给潘菽同志发来邀请信，潘菽同志不准备参加会，就在印好的回信单上填明他不能参加会议并将原单寄回。但《四川心理学动态》今年第2期却报道说，潘菽同志（据报道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科学家）对这次大会去信表示祝贺。其他有关刊物也作了类似的报道。这类报道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三、潘菽同志从不相信诸如耳朵会辨色认字，用意念可以折断树枝、移动物体、拨动表针之类的宣传，也从未支持过这种研究。不久前在心理学刊物编辑工作会议和科普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说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潘菽同志说，心理研究所通过周密的实验揭露了徐州的董小四和北京的姜燕的所谓特异功能纯属弄虚作假。空军四所李良明等同志也以他们自己的多次实验、测试令人信服地指出，北京几个有名儿童的

所谓特异功能都不过是一种偷看的“低级魔术”。可见，这类所谓的特异功能并不是什么科学事实，也没有科学依据。他认为，在科学刊物上登载这类报道是不妥当的。对于在心理学正式刊物上或科普工作者宣传这些东西，潘菽同志更表示不赞成。他认为，对于科学问题应持严肃的科学态度，报刊上的宣传报道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小报第5期报道了该报记者魏贞写的就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访问中国科学院数学学部副主任马大猷的一段文字。

最近就人体特异功能研究问题，调查联络组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物理学家、声学所副所长马大猷教授。马教授认为：“耳朵认字这类东西，一百多年前，就有人搞了，外国的恩格斯，中国的鲁迅都批评过。我看科学界和科学家都不要介入这个事情。一些领导科学方向的同志起作用，甚至大力宣传，也有些半信半疑的，因而助长了这股风。我想现在应该更关心一些对我国四化建设有直接影响的事业，把大家的精力引导到这上面来，是更为重要的。”

小报第6期，刊登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洪潮生关于召开“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会”1982年2月23日给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的信。

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

收到关于召开“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会议的通知。多谢你们的邀请，但我不参加这个会议。

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是科学与迷信的区分问题，用不着什么调查研究。

如果人体特异功能指的是气功效能这一类问题，那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现在吵嚷的是耳朵认字，人眼透视内脏，意念移物等荒诞迷信的东西。这种东西若还要组织测试，我认为是太可笑了。测试也不会有结果，迷信的人会有一万个借口来否定把戏的揭穿，信科学的人也不会因为戏法一时未被揭穿就昏了头。

我奉劝相信这种把戏的人：①把这种特异功能的儿童或成人放在有用的岗位上为四化服务，如医院、海关、机场与车站检查口、公安局侦缉科等地方。过几年比较一下，特异功能者与普遍功能者各为四化作出的实际贡献，便可有说服力了。②属于科学界的人凡宣扬这事的，如果自称还是研究科学或科学教学的，则请他们不必老是说“确属事实，务请相信”，而是做点符合他们本职的工作；即埋头研究，找出对这种把戏的科学说明，像对电、磁、电磁波、X射线……等的发现与研究一样。时间需要多长都不要紧，那是可以耐心等待的。但若只不断地演戏法而就算是科学新发现，那就不要再自称为科学工作者。

有的名人也宣传这类迷信，他要这样做别人也没办法。但我们只尊重他过去在科学上的成绩。

严重的是：本该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科学的一些中央宣传机器、报刊竟也对于迷信毫无抵抗力。于光远同志已在大声疾呼。我希望中央能严肃看待这种情况……

此致

敬礼

洪朝生

1982年2月23日

小报第6期刊登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所长潘菽1982年3月14日给于光远同志的信。

光远同志：

“人体特异功能”的大肆宣传已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搞得到处都是乌烟瘴气。你出来加以批判抵制，我完全拥护。

“人体特异功能”所以能有市场是因为它“真真假假”，真假混淆，以假乱真，以真蒙假，使得许多人头脑混乱。所谓真假混淆就是它把气功也拉在一起。有些气功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生物反馈”来说明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不让它把气功拉在一起。要说明气功问题是气功问题，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是另外的问题。

估计不少人相信“人体特异功能”是因为相信耳朵认字事实，但不相信“意念致动”这种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攻破耳朵认字这个“堡垒”，要求他们在我们的条件和监察之下来进行表演，或者我们自己进行实验的检验并可邀请一些中立人士来观看。

大作《Psi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已拜读，很好，很有说服力。稍许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应该就可以迷途知返了。但一定还有执迷不悟的人。但我们主要是要帮助那些绝大多数能迷途知返的人以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你说可以把Psi译为“心灵学”，我觉得不很合适，还是用旧译名“灵学”较好，或者仍用翻译恩格斯的那篇文章用的译名“神灵学”更合适些。不多说了，并此候好。

潘菽

1982年3月14日

1982年3月25日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报》以《闹剧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为题目，报道了生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香桐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批评。

中国有句古话，叫“耳食”，是说耳朵可以吃饭，意思是说偏听、轻信、不动脑筋。现在又有人说耳朵可以认字，真是骇人听闻。他们明知这是违背科学真理的，为了掩饰，就美其名曰：“人体特异功能”。生理学家从未发现过耳朵有接受视觉形象的功能。感觉生理学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周围环境中的各种事物必须通过与其相应的特殊感受器，才能进入意识领域，产生感觉。例如，光线的感受器是眼睛内视网膜上的各种感光细胞，没有这种光感受器是不可能看到形象的。

从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目的等几个方面看，很像国外一些人所提倡的“超感觉论”、“旁门心理学”和“灵学”。不要听他们说的那样神乎其神，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那些东西，在国外是吃不开的。科学家们认为那不是科学，是灵学。

1964年广州有一个少女声称可以透视，能看到密封信的内容。科学家测定了她的光谱敏感曲线，希望找到她的视觉器官的特异之处，可是找不到任何不同常人的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是“有目共睹”呢？后来偶尔发现，她身上带有快速启封信件的道具，西洋镜才被揭穿。1965年在上海一带又冒出过几位钉螺姑娘，诡称能看到水下、地下的钉螺，也能看到人体内肺结核或肿瘤的位置。一开始，生物学者明知上当，可是不知道是如何上当的。后来他们的把戏在福建被揭穿了。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人体特异功能”是否也属这一类，值得我们好好地想一想。

为什么这类事情一再被否定，又一再重复发生呢？不仅在中国，在外国也是如此。人类总有一种愿望，希望看到人类视力看不到的形象，听到听不到的声音。这种愿望是好事，不过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愿望。经过长期刻苦的努力，人们发明了显微镜、望远镜、X光、雷达、红外技术、人造卫星探矿等等。这些发明都能把人类的器官延长。然而灵学家们则乞灵于“超感觉能力”，乞灵于“人体特异功能”，这当然是最省力的，可这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在国外贪图省力、乞求于灵学的，大有人在。灵学研究的声势越大，他们离开科学就越远。在中国，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信仰唯物主义的人居然也搞起灵学来，那是很可叹的。闹剧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

1982年3月25日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第一副校长李昌同志于1982年2月联名写信给科大的一些领导同志，批评科技大学有些人搞人体特异功能的活动。这封信搜集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108期上。全文如下：

过去，我们在合肥和北京都曾多次指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完全是违反科学的，我们科技大学不要有人去搞。然而，现在不仅有人在搞，听说校有关部门还拨款支持，并作为科技大学的代表到处写文章、做演讲。为端正学风，维护校誉，我们现在郑重地向你们表示，希望科大的教师职工和同学不要以科大的名义搞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活动。希望你们几位捍卫科大的优良学风，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导全校开展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工作。

在这之前，中国科技大学教师蔡庆生、孙其梅等同志写了《意念论》、《人体存在“意念器官”》两篇论文，提出“有形人”和“无形人”、“无形世界”等假说，并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代表参加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李昌同志就这两篇论文写了下面一段话：“严老：科技大学的蔡庆生等人搞人体特异功能，竟提出‘无形人存在假说’和‘无形世界开发假说’。还代表科技大学参加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建议你给学校负责同志打个招呼，不要再这样胡来了，否则，损害校誉，真令人不堪。”严济慈同志完全同意李昌的意见，于是，两人便联名正式向科大发了这封信。

从科学家所阐明的完全对立的观点和激烈的争论，可以看出，关于“人体特异功能”所涉及的问题的分歧，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异功能”已经存在和根本不是事实，这是争论的第一个分歧；“特异功能”是人体科学还是灵学，这是争论的第二个分歧；在认识论上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坚持经验论，这是争议的第三个分歧；在方法上是坚持科学检验的判据，还是坚持“眼见为实”，这是争论的第四个分歧；“特异功能”是科学的新现象，还是灵学的老现象，这是争论的第五个分歧；“特异功能”是科学的新发现，还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这是争论的第六个分歧。

围绕着这些分歧，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第二节 胡耀邦的第二次批示

《人民日报》批评“特异功能”的再一次亮相和反对“特异功能”宣传的著名科学家的表态和批评，以及于光远、严济慈、李昌对中国科学院一些科研人员搞“特异功能”的批评，

激起了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一些“官员”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写信给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同志和胡耀邦主席，并对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于光远、李昌、潘菽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进行了挖苦指责，以表达强烈的不满。为此，当时已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作了第二次批示。

下面把这些信的全文发表如下：

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同志给胡耀邦同志的信

耀邦同志：

您好！

近半年来，于光远同志对人体特异功能采取了粗暴的全盘否定，横加指责的态度，这是错误的。

今天不管特异功能这一事实存在与不存在，而学术界早已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定的，一种是否定的。既然有两种看法，（前一种是做了大量的无数次的检测，肯定下来的，后一种是没有严格精细的测验，主观轻率的做结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的领导者于光远、李昌同志，来取这样粗暴态度，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这样缺乏民主的领导思想和作风，会束缚住科学上的探索。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激发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整个科学的发展的，我的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仅供参考。

致以

崇高的敬礼！

祝健康长寿！

卫生部吕炳奎 3月25日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致王任重同志的信

王任重同志：

关于耳朵认字这件事，我认为于光远同志不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只用理智分析的方法，就断定耳朵认字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事，太武断了。同时，我也认为人民日报的报道，把耳朵认字是否客观存在的结论说在调查实验之前，也未免太早了。

今年3月9日上午，我去看了耳朵认字的表演，现将这次公开测试的记录寄给你。第一个测试的就是耳朵认字，那个用红笔写了一个“红”字试样的那位老同志就是于××同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不是魔术表演。

我们国家有上千人的科学研究人员投入的特异功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它的应用很广，理工农医都联系到了，特别是对国防将产生很大影响。此事正是由于与过去的科学理论有矛盾，才更能说明这种客观事实值得研究。现在于光远同志的观点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对于当前的研究工作是有阻力的。

希望中宣部主持公道，对耳朵认字，组织科学的鉴定。希望你出面说话，使这场争论能健康发展。

此致

敬礼

聂××3月24日

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给李昌的信

李昌同志：

最近拜读您 81 年 10 月 31 日在自然辩证法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有一点想法想说一下（关于人体特异功能）。

您经历的几件事情都是假的，不太相信，可以理解，科学院有几个所参加了研究（如物理所、高能所……）不妨打听一下，如有机会，也可以看看真的。

说违反科学常识，确是真的，不仅违反科学常识，就是古典物理理论，也解释不通。连现代物理理论，能否解释得通，还要费点力气，用常识来肯定或否定一事物，有点危险性（不是全不行）。

您的讲话是即席讲话，还是经过深思熟虑，还是正反两方面都观察了一遍，就不太清楚。不过，据我看，应当全面一些，真的假的都看一看，然后再下结论，比较恰当，因为地位不同，影响不同。

科学家中赞成者有之，如贝××、王××、赵××等，因为他们看，确有其事，不是假的。

不赞成者亦有之，如周培源等，原因就不详了。也可能看的是不成功的，或者是虚伪的，有的如严济慈（根本不看材料，给他材料就撤掉）。冯德培（如骂支持人体特异功能者还怕脏了他的嘴），这是于光远同志告诉我的，这恐怕不算科学的态度。

我认为应当严格的科学检验才能确定。如确定是真的，就应当认真研究，有重大的科学和哲学意义，科学院门类齐全，有研究的便利条件。有些打着唯物辩证法的旗号；貌似科学，而实际思想混乱者确实可怒（如《国内动态》清样 155 期，《自然辩证法通讯》6 期）。

尚希吾兄（身负科学重任）保持当年“先锋”锐气，宝刀不老也。

敬礼！

张××1982年2月6日

张××给于光远同志的信

光远同志：

去年开人大时，曾就耳朵认字问题进一言，未蒙采纳。我之所以敢于如此者，因我曾亲自试过，确有其事，许多人亦因看过，而由不信到相信。

后未读了一些材料，确感思想上有些混乱，连起码的哲学基本原理都违背了，例如，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55期（1982、1、22）摘登的邓伟志的文章，“按照唯物主义的逻辑，不看耳朵认字表演也可以推断他们是玩魔术。按照唯物主义的逻辑，即使看到他们表演成功了，也可以推断自己是受骗上当。”明察者如吾兄，这叫什么唯物主义的逻辑呢？

最近看了童大林同志在上海1月8日的讲话，觉得他真不该那么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都承认，那么是真的伪，一试便如，何必空费唇舌，当然要是真正的科学的严格试验。

中宣部洪禹同志对此事感兴趣，拟请部委会议决定表演一次，我部作些准备，力争本星期日能够实现（因表演的小孩子已开学，不愿耽误她们的功课），完全按照《自然辩证法通讯》81年6期余信的文章所说：“双盲法”试验，吾兄亦可前往一观。

耳闻吾兄说：“为耳朵认字类真，应组织一定的力量未研究，这就太好不过了。这不仅在科学上有意义，特别是人体科学，而且对哲学亦有重大意义（以物质存在的形式等等），可

能对四化亦有些贡献。从急功近利来说，亦不是坏事。

待候明教。

敬礼！

张××82年2月15日

张××给潘菽同志的信

尊敬的学部委员潘菽同志：

读了3月25日《科学报》摘录发表的您3月14日给于光远同志的信（批判人体特异功能）。您欣赏他的大作，有个人的自由，不便干涉。

我们倒欣赏您的这句话“我们首先要攻破耳朵认字这个堡垒。”如果您首先攻一下这个堡垒，再给他写信就好了。因为于光远最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不肯亲口尝一下梨子的味道，就连篇累牍地大写其批判文章。他竟视而不见中国真有耳朵认字的真人真事，更不用说天下了。最近，他如获至宝，录了所谓耳朵认字弄虚作假的像，到处放映。不知他是否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和方法办的，或者如您信中解决的方法。

您如果试了一下，能否照样写篇文章登在《科学报》或其他范围更广的报刊杂志上呢？这也是科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吧！

给您介绍一位解强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光远同志曾叫他帮助收集批判耳朵认字的材料。他经过调查研究，知道耳朵认字是真的，偏偏他的第二个孩子就会，于是反过来劝告于光远同志。于就是不听，这是什么心理状态呢？他还不知道北京市光明楼小学，3月21（星期日）日对四、五年级两个班90余个孩子进行了测试统计，能耳朵

认字的五年级占 70%，四年级占 50%，心理学家对这件事应会感兴趣的。打搅了，对不起。

敬礼！

张××1982年4月5日

最为激烈的是张震寰同志写给《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的信。在此之前张震寰同志曾写信给胡耀邦同志，指责国家科委对“特异功能”口诛笔伐，要求科委公开作自我批评。《人民日报》于1982年2月25日发表了“编者按”之后，张震寰同志十分恼火，当即给《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批评《人民日报》2月25日的“编者按”，提出你们已经写了“赵王鼓瑟”，我们要求也登“秦王击缶”。信的全文刊录如下：

绩伟同志并人民日报党组：

我们素不谋面，但《人民日报》是天天见面的。

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后世就什么也说不上了。

读了2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深为你们惋惜。怎么，曾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民日报》，意干起这样糊涂事！

就拿编者按第一句话来说，“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不相信，有你们的自由，根据是什么？

再拿这大报道的最末一句话来说，“部署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和方法重复测试等问题”，正在“部署”，还没实践，怎么就在台上长篇大论起来了呢？

我认为，凡是弄虚作假的宣传迷信的，必须批评、教育、纠正，严重的要禁止、取缔；如果是客观事实，而又在作严肃

的科学研究的，应给以正确的引导，加以鼓励、帮助、扶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只有这个）务求作出科学的解释，这恐怕要费很大的力气。

李昌同志不相信，说他看到的“耳朵认字”都是假的，那么再找真的看看不好么，这不是辩证法么？于光远同志根本不屑一顾，这是唯物论么？什么叫实践第一的观点？你们有哲学家王若水同志，请他说一说吧。连起码的哲学常识都违背了，《人民日报》作了殉葬品。

你们登起文章很大胆，但做起事来又胆小，有点不相信自己。谁是科学领导机构，国家科委应当是，但不知他们怎么领导的？就拿耳朵认字来说，你们错了。谁是有权威的科学机构？科学院算一个，李昌同志和报上登的几位著名科学家也不是正确的，最权威的是客观事实，白纸写上黑字是抹不掉的。

说起来很简单，有点判断能力的人都能做到，不要迷信科学领导机构和有权威的科学机构，本来应相信他们的，但耳朵认字不行。找几个耳朵能认字的孩子来，排除一切作弊和玩魔术的可能，你们当场亲自试，是真是伪，一看便知，不必费笔墨、唇舌，当然，科学实验希望成功，但也允许失败，不行再来，不会费多少时间，愿效劳。

王揖同志，你们应该很熟，可问问他，我第一次认得他。如果试验成了，我们就要求平等待遇，在《人民日报》上照样登载，你们已经写了“赵王鼓瑟”，我们要求必登“秦王击缶”，这，我们已屈“尊”了。

敬礼！

张××1982年3月5日

这封信转到胡耀邦手里。胡耀邦同志就“人体特异功能”

问题于1982年4月10日作了第二次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

4月10日

胡耀邦同志在这个批文里，提到的1979年作过三次批语（当时我们只查到两次）。这两次批语的内容：

耀邦同志对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1979年4月23日第92期信访简报《揭穿“耳朵认字”的骗术》的批语：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类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多么警惕啊！该要多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胡耀邦4月24日

1979年11月8日，耀邦同志在《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上的批示：

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

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

第三节 “三不方针”出台

截止到1982年4月10日，胡耀邦同志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1979年两次批示的核心思想是：一、耳朵认字之类是小戏法，是“荒谬绝伦的笑话”；二、把住对这类“丑闻”宣传的口子，因为它对四化没有一点好处、用处；而且还会造成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

1982年4月10日的批示，与1979年的批示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即一、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二、在报刊上不介绍、不宣传。然而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考虑到“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的强烈态度，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刚刚改革开放需要稳定的大环境。中宣部在下发文件时，没有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全文下发，而是发了一个折衷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了中宣发文【1982】14号文件。全文如下：

关于不要在报刊上宣传或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行了“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现通知你们，请各地区、各部门注意掌握。

中央宣传部

1982年4月20日

中国科协于1982年4月28日以(82)科协发字119号文件转发了中宣部14号文件。

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的“三不方针”就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

第四节 胡耀邦肯定“三不方针”

中宣部文件下达后，并没有使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的人收敛或反思大规模“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相反，对于把住“不介绍、不宣传，也不批评”的“三不”方针，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就在“人体科学研究会（筹）”接到中国科协于4月28日转发的中宣部14号文件之后。某大科学家于1982年5月5日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郁文同志写了《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一封中肯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郁文同志：

我首先表示衷心拥护中央任命您为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您在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二十余年，深得广大科技人员的信任。我尤其记得您在1978年12月纪念郭永怀同志为国牺牲十周年会上讲的一句话：当您在“牛棚”里听到永怀同志遇难后，您说，“又一个好同志死了。”我希望您在您现在这个重要岗位上，还常常想着我们这些人。

因此，我向您讲一件事：

中国科协4月28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

令，将即发排的5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

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此致

敬礼！

这一封“寓意很深”的信，对胡耀邦是有影响的。胡耀邦同志看了大科学家致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同志的信后，于1982年5月13日，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又作了一次批示。批文转中宣部、复印发给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大科学家。此批文刊登在《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24、25期合刊上。全文如下：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条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去阅读和继续探讨。”

胡耀邦

5月13日

胡耀邦同志在这个批文里，肯定了“三不方针”。

这个“三不”方针的出台，虽然对于抵制当时“人体特异功能”的荒谬宣传和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限制了批评的声音，使“人体特异功能”在不断变换手法，在不断演绎出的新“名目”下（例如，“气功外气”、“看相算命”等），仍然能堂而皇之地介绍、宣传与传播，而批评者、怀疑论者的手脚，都紧紧地被捆绑住。这就是造成以“气功外气”为核心的另一种形式的“人体特异功能”荒谬宣传得以大面积传播的基础。

第五节 暂时的偃旗息鼓

1982年5月13日，胡耀邦关于“人体特异功能”问题第四次批示，不仅遭到了宣传一方的抵制，这是因为他们还觉得宣传不够，他们的研究会还没有得到批准，他们所遭到的批评还不能完全被扼杀；另一方面这个“批示”也遭到了批评一方的质疑和反对。批评一方认为，自以“耳朵认字”为先异的“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一出笼，质疑者、批评者的声音，就是处于被抵制、被扼杀、被冷迂的境地。胡耀邦同志1979年4月24日第一次批示后，批评、揭露的文章，才有一些机会得以发表，但也属凤毛麟角。随着这股宣传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怀疑论者的声音，就越来越被淹没下去。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和《两年来“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简况》，都以“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的基调，再一次的出场亮相。这本来对批评和制止“人体特异功能”的荒谬宣传是极为有利的形势，然而“三

不政策”的出台，使这股刚刚兴起的“反逆流”之风被压了下去。为此，反对一方的带头人于光远写信给胡耀邦，当时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写信给胡耀邦、胡乔木和主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书记。他们在信中都表达了这种忧虑的心情。信的全文刊登如下：

吴明瑜同志给胡耀邦主席的信

耀邦主席：

读到你4月10日在张震寰同志信上的批示，如同79年4月你在科委信访简报上的批示一样，高兴的雀跃三尺。

这两年，所谓特异功能的反科学宣传，涉及电视、电影、报纸、刊物，影响极坏。随信附上长沙揭发的一件骗案的简要情况。（《湖南日报》已于5月7日公开发表详细的消息）其他地区也不断揭露这类性质的或造成国家财产浪费损失的事例。

至于参与表演的儿童，更是从小就受到身心摧残，四川医学院在今年春节邀请成都17名“特异功能”儿童测试，现场作了全过程录像，未偷看成或未敢偷看的，全部测试失败。凡是所谓测试成功的，没有一个不是偷看的。这份录像资料极为宝贵，因为全长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保存作为档案了，现把主要情景节录下来，约50分钟。特送上，如有便可以看看。每个有党性的、关心下一代的人，都必定会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去年尾，鉴于特异功能的荒谬宣传有增无已，实在有损国誉，有损科学声誉，有损马克思主义的声誉，科委政研室、科学院政研室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组织了调查研究组，编印了几期揭露的资料。现在从各地反映的材料来看，所谓具有特异功能者，几乎没有不被揭穿过的。而这还是没有采取严

密的科学测试手段下，就揭穿的，前不久，北京有的单位远程从黑龙江请来“特异功能”者牟凤琴（20多岁的妇女），大肆宣扬。4月底，科学院心理所的同志去哈市，采取科学方法测试，证明所谓“特异功能”也是虚假的。

我们还在做揭露的事。因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由于我们国家科学文化比较落后，再加有些身居高位的领导者支持，随意动用国家科技经费支持这种“研究”，因此要听任自生自灭是不可能的。

你的指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但是前几天又接到中宣部的正式文件，提出“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这使人深感忧虑。两年来，为此大规模的宣传，中宣部没有采取这种态度去制止，现在刚发表了几篇批评文章，就要刹车。这样做对科学、对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战线上的地位会有什么好处？

还有于光远同志在《知识就是力量》上发表的连载文章，尚未刊完，是否就此腰斩？这在国内外又将引起什么反映？是否表示中央认为于光远同志批评错了，或者中央支持“特异功能”？（我们知道实情，但我看猜测和传闻不会少，也是可以预料的）。

因此，我建议中宣部这份通知可否重新考虑，作点修正。比如说，可以提出发表批评文章也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

盼望得到你的指示。

敬礼！

吴明瑜

1982年5月18日

吴明瑜同志给胡乔木同志的信

乔木同志：

这两年，所谓特异功能的宣传造成极坏影响。实在有损科学之声誉，有损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今年春节，四川医学院做了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邀请成都市著名的“特异功能”儿童10多名进行表演，作了全过程录相，有几个小时。这是一份宝贵的科学资料。为使领导同志有时间看看，我们请科技电影厂帮助剪辑了主要的镜头，约55分钟。特送上请便中看看。

我们许多看过的同志都不禁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再也不能让下一代幼小心灵，遭受如此摧残了。同时附上长沙揭露了一个骗局的资料（已于5月7日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详细的消息）。从中可以看到，听任特异功能宣传的发展，造成了什么后果。

但是，有一件事，实在令人费解。中宣部4月20日发的文件，除了指出“特异功能”不是科研方向，不要在报刊上宣传介绍之外，同时又提出“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那么过去那么多的宣传造成的影响，就会自生自灭了？为什么那样宣传的时候，不去管一下，甚至有人还提倡，现在刚有几篇揭露和批评的文章，就马上刹车。

希望能够在你的支持下，修改这种不妥当的规定。

如有不妥，望予指出。

敬礼！

吴明瑜

1982年5月14日

于光远同志给胡耀邦同志的信

耀邦同志：

看到钱××同志的信之后，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我也想向你反映一点意见：

（一）三年来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的同志，作了无数次表演，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和消息，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钱××同志说有假的、有骗人的。既然是骗人的，为了受骗者不再受骗，就应该进行揭露。但是热心宣传此种功能的同志，至今没有自己揭穿过哪怕只是一件作假骗人的事。我想应该进行这种揭露工作。钱××同志也应该赞成这样做。

（二）钱××同志说：“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但是他们没有说哪些人的哪些功能是“真”的。依我所知，凡是经过严格测试的，所宣传的“功能”全是不存在的。科委发起成立一个“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作了调查和测试。进一步证明全是弄虚作假或根本表现不出有此种功能，有确凿的证据。例如四川医学院有长达三百几十分钟的录像带，证明今年春节在该院表演的10多名成都“特异儿童”的“功能”无例外的都是假的。国防科委507所是钱××同志领导下的单位，他提交“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也是请507所的一位副所长代为宣读的。507所3位科技人员参加写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移物的若干实验》，发表在去年9月出版的《自然杂志》上。报告说实验证明手表、铝片、果蝇等可以进出小孩的脑子，可以处于常人与仪器观察不到的异态。希望钱××同志告诉大家，这种功能是不是“真”的。如他认为是“真”的，希望他能协助科委用真正的科学态度重复这个试验。我认为“人体特异功能”是事实还是弄虚作假，不能由某

一位有名望的科学家的党性来保证，而只能用科学的方法，即用论证与辩论，用严格的科学试验来解决。

(三)“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直接违反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科技大学5位教师写的《意念论》，就是一突出的例子。文章说，在“有形人”外存在“无形人”，在“有形世界”外存在“无形世界”；“无形世界”开发出来，将是“人类文明史以来最伟大的变化”；那时几百、几千公里甚至两个星球间可以“打意念电话”、“送货取物”，人们之间赤诚相见无密可保，货币变成不必要的东西；……（钱××同志读了此文后写信给作者说“我祝贺您们所取得的新成果！”）。这种宣传造成的思想混乱，只能用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来解决。

(四)我拥护你的“人体特异功能”不能成为科研方向的指示。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同志说，全国有68所大学、38个研究所的数百名科技人员从事此项研究。为此而耗费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见。在国防科委507所，此项研究更居突出的地位。这种情况的确不允许继续下去。极少数坚持此道的人要搞，可不必禁止。但他们既然在科学的名义下活动，就必须遵守科学道德和科学工作的准则；对向他们提出的疑问作出严肃的答复，欢迎别人重复自己的试验。

(五)“人体特异功能”这类宣传有其根源，一下子是不会绝迹的。但这场闹剧（借用我国著名脑生理学家张香桐的语言）总要有个收场。尽管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同志要人们“不要迷信”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我还是建议国家既然设立这样的科学领导机构和学术权威机构，就应该责成它们负责作出科学的结论。我认为只要对如何才算取得了结论这点有明确的标准，正确的结论很快就可以作出。

以上所写如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于光远

1982年5月28日

这些信件，并没有改变胡耀邦第四次批示的内容。根据胡耀邦的批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82年6月15日，又下发了第二个《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问题的通知》，以中宣发文【1982】24号文件形式下发，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总政宣传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

按照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中宣部最近议论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问题，现提出几条意见，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一、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在科学上还没能充分证实之前，今后在报刊上不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

二、对过去曾经发表过支持或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的科学工作者，不要进行批评指责。

三、今后，不要再搞许多人去做人体特异功能实验，也不要再搞以宣传为目的的表演。少数人坚持其观点，可以在有关单位负责管理下，继续进行研究；也可以允许他们搞些反映研究情况的材料，发给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参阅和探讨。

四、要把科研人员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试验，和弄虚作假、投机诈骗的人区别开来。个别弄虚作假，招摇撞骗，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可适当给以批评和处分。

中共中央宣传部

1982年6月15日

中国科协于1982年6月26日全文转发了中宣部的通知。至此，以“耳朵认字”引起的“人体特异功能”的争论，经历了4年的唇枪舌战，此时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气功外气”形式的“人体特异功能”在更大、更广、更深的层次上传播着。

第六章 “特异功能”向“气功外气”演化

第一节 “气功外气”就是练出来的“特异功能”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神怪气功即所谓“外气”热，是继70年代末掀起的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浪潮。虽然人体科学研究者打着研究气功与中医的幌子，实际上只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老酒，仍然继续在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的神奇和怪异。人体科学研究者认为，气功师发“外气”，就是练出来的特异功能，练气功功夫深的人，高级气功师，能透视人体，透视地下构筑，“发气”拒敌灭火、改变生物习性、遥视千里之外，意念移物、焊接、折断、接枝等等。这些项目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的ESP（超器官知觉的英文Extrasensory Perception的缩写）和PK（心灵运动的英文Psykenises的缩写）毫无二致。为此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将特异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发特异功能，这主要是青少年；另一类就是气功师，是通过气功练就的特异功能，气功师不仅可以使自己发“外气”，进入一种气功功能态也就是特异功能态，而且可以诱发别人进入气功功能状态。于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气功外气宣传热，就以涌现大量气功师及以气功作为特异功能的载体为特征。一个气功师教功，就可以诱导出成百上千的进入气功功能态（特异功能态）的人，许多练功的人，出现幻觉、幻听、幻视，都被视为处于“高功态”、“特异功能态”，这种人

不仅具有前述的功能，而且还可以为人治病，可以遨游灵间世界，成为能与灵间对话的现代灵媒。在论证气功“外气”物质基础及与特异功能关系时，有这样的论述：“气功进入高级阶段，‘气’就不限于人体内部了，能从由意识指定的部位或穴位发功，发出一股‘外气’，这‘外气’是物质的，它还载有信息。这到了气功的高级阶段就非常发达，可以运用自如。不同气功师发出的‘气’，其量（即强度）和质（即性质）也会有所不同。这‘外气’可以用科学仪器去测量，随测量仪器性能之不同，而有不同效应，有的是紫外线，有的是微波，有的是一定能量的电子。因此我认为，测到的是‘气’的派生物，不是‘气’这个载体的本身。这个‘外气’还能作用于物体，物体可以是无生命的，也可以是活的，如另一个人。物体接受‘气’之后，也可以发回信息，这信息也有物质的载体。高级气功师在自己身体的部位或穴位能接受回授的信息，信息又传到大脑，大脑加以处理，最后形成感受。有人体特异功能的青少年在运用功能时也是这个过程。最后的感受大都在脑的视觉部位，有形象的感受。‘耳朵认字’，皮肤认字认图，透视，以及遥‘视’都可能是这个过程。高级气功师也同样能‘看’到另一位气功师发出的‘气’，即在脑中感受‘气’的形象和性质（颜色）。至于遥感，那也是相似的过程，只不过信息载体可能不同。”这一段话给予我们一个清楚的概念，即自发的人体特异功能（特异功能态）与气功师激发的特异功能（气功功能态）的物质基础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练出来的。这就是说，那种起强身健体作用的气功，根本就不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之列，因此也就不在人体科学研究的范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明确地提出：“至于气功对锻炼身体，起保健和增强体力的作用，就不包括在人体特异功能里了。”

由此可见，人体科学研究的气功，只是“外气”气功，即能激发特异功能的这一部分气功即一般大众所称的神怪气功。所以气功、中医和特异功能的统一，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统一，而是寻求特异功能机制的统一。

第二节 “气功”——开发人体潜能的钥匙？

气功——这个架在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之间的桥梁，自80年代以来，以它独特的风采，风靡了中国大地。为了澄清中国文化瑰宝——气功的名誉，本节所说的气功是指人体科学宣传者所说的“外气”气功或称之为伪气功（虚假气功）、神怪气功（带迷信色彩的骗人把戏）。这些被人体科学研究者和宣传者捧到人体科学宝座上的假气功、神怪气功，都以具有特异功能或者能完成特异功能者所能完成的一切项目为特征。

在实现了特异功能向气功的转化之后，人体科学研究者，便气功上大做文章。他们把气功升华为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统一体的核心，认为气功是人体科学的一块“敲门砖”。气功既可以练出特异功能，又与中医理论相通，是中医中药理论的源泉。抓住气功，就抓住了人体科学研究的实践和理论。开发人体潜能，就是气功的实践应用。他们认为，人体有很多好的功能——人体潜能（人体科学研究者称之为第四医学的研究任务），还没有开发出来，就像是一把关闭的锁，气功就是打开这智慧潜能的钥匙，并以此推测，古代的高级气功师都具有特异功能，古代的医药名家很可能就是有成就的气功师。顺着这样的思路，气功研究者们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的神怪气功，似乎气功可以上通神仙，下通人体，他们说，神仙是什么？神仙就是高级气功师；人体是什么？人体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

统，它可以有许多相对稳定的态，如醒觉功能态、睡眠功能态、危机功能态、警觉功能态、催眠功能态等等，还有特殊功能态，这就是气功功能态、特异功能态。而无论是神仙，还是人体的特异功能态，都可以通过气功练就出来，气功可以提高人的智慧，可以调动人的先天潜能。人体科学研究者认为，人体潜力的开发，将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带来巨大的改革，中国将可以培养出 22 岁的博士和 18 岁的硕士，并且提出，中国要立国，就要在智力开发上领先，这就联系到人体科学和特异功能、气功。并且认为，特异功能人与气功师的事情，一般人并不是不可以做，可以通过练气功诱发。所以，从前人们都说什么“神仙”，也不过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如果把人体科学的成果运用到培养人的方面，就能从人体特异功能中找出规律，把人的潜力发掘出来，那就又高出一层，不仅是人皆可成圣贤，而是人人皆为“神仙”了。有的气功工作者声称，通过对中小学生教授气功，可以提高课程的成绩，可以挖掘开发人的智力，甚至可以培育出“特异功能的超人”，并为此提出建立“气功科学技术”的设想。认为气功科学技术是最高的科学技术，对气功科学技术研究的突破就会带来一次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一位为大气功师严新作传的作家，把气功和特异功能简直吹上了天。他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思维科学、艺术、宇宙学等多角度，论述了气功、特异功能给人类带来的美好前途。他写道：“气功、人体特异功能引起的及所蕴含的社会学问题太丰富了。如果人的潜能都被开发出来，人人具有思维传感能力，人人都有特异致动（搬动）能力，那么，人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思想秘密可言了，相互都能感知对方的心理。而且，现有的财产关系、法律，都失去了神圣的意义。因为人们都可以超越空间把东西搬

运来搬运去，将是一个怎样的‘混乱’——相对旧秩序，又将引出怎样的新道德、新秩序、新法规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存的一切，本质上都是抵制人体特异功能的；反之，人体特异功能本质上也将是破坏现存的一切的。”作者进一步论述了，用练气功开发气功态、特异功能态和特殊思维态的意义，“有了这些功能态，可以要什么就有什么，可以用思想来把握宇宙，如果思维想到了银河系，就可到达银河系，对银河系有了影响。”他甚至把中国神话故事的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穿墙过户、明察过去与未来；透视人体、未卜先知、遥测预知，搬运折断的所谓“视听八达之外”、“视见垣一方人”、“尽见五脏症结”、“视听不用耳目”及解锁法、缩身法等等一套东西，都看成是真实的。他说：“现在不能只是一般地承认过去那些神话有依据，而是需要整个重新认识那些神话。现在，我们人体科学研究者认为，把气功和特异功能训练用于教育和培养人才，将为 21 世纪培养出大量具有高度智慧和知识的人才，到那时，中国将立于世界智慧之林的颠峰，这是何等美好的前景！”。

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1823—1913），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他与达尔文同时建立物种进化学说，1858年他与达尔文一起在林耐学会宣读他们的进化理论，因此使他成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科学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竟然也陷到神灵世界中，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迷恋于灵学运动。他有两个兴趣：第一个兴趣，就是古老传心术运动的始祖——催眠术；第二个兴趣是“神灵照相”。

威廉·克鲁克斯（1832—1919）爵士，英国著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他发明了光电管，发现了化学元素铯，是皇家学会会员。他在心灵活动方面比华莱士走得更远。他热衷于降神会，把很大精力花在和灵媒的密切合作上。他用20多年的时间研究各种能从死者那里收到信息的灵媒，同两个著名灵媒合作，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灵魂不死的闹剧。

尽管华莱士与克鲁克斯的闹剧一再被人揭穿，但他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这样的一些大科学家所热衷的“招魂术”运动，推动了英国的心灵运动。

1882年7月17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由一小群学者建立了“灵学研究会”（又被称之为“剑桥小组”）。此后又扩大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以贵族、政治家组成的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曾经作过英国首相的格拉德斯通。另一个小组则由科学家组成：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皇家科学院物理学教授威廉·巴雷特爵士等。

在英国“灵学研究会”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相继成立了灵学研究组织。法国、瑞士、荷兰、意大利、德国先后成立了心理玄学学会、灵学基金会以及心灵研究会等组织。并仿效英国的作法，由科学家或社会名流挑头。如法国索邦大学的生理学教授，191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夏尔·里歇就是灵学的倡导

真开始在晚上就听到一些怪声、后来这些怪声不断出现。而且发现这怪声总是在凯特和玛格莉特在场时出现，于是两姐妹商量，达成用一种“暗号”与怪声对话。1848年3月31日晚，两姐妹利用她们商定好的“暗号”与他们称之为“死不离魂先生”的鬼魂对话。先是凯特在黑暗中边捻指头边叫道：“死不
离魂先生，跟我做呀”，接着她拍掌数次，然后就听到相同数字的拍掌声。然后玛格莉特，也用同样的方式说：“别听她的，跟我做”，于是玛格莉特命令说：“数一、二、三、四”，然后拍掌四次，立即听到了四声急拍作答。此后福克斯太太和他的另一个女儿莉亚·福克斯也加入了与“死不离魂先生”的对话。这一与幽灵对话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福克斯姐妹迅即成了名人。福克斯太太也就把他的女儿的招魂术表演，当成了一棵“摇钱树”。从1848年3月31日晚开始，招魂术的表演迅速传播开去，在纽约市、纽约州、中西部若干城镇，招魂术大行其道，招魂术士、信徒迅猛增长。据《日本心灵学事典1979年版》的统计，1855年美国招魂术信徒就有200万人之多，灵媒上万人。这种与鬼魂交谈的风气，不仅在美国风起云涌，而且迅速穿越大西洋传到欧洲大陆，在英国尤其盛行。

第二节 灵学研究会建立

在美洲和欧洲大陆风行的“招魂术”运动是导致英国灵学研究会建立的直接动因。

“招魂术”运动虽然起源于美洲大陆，但第一个“灵学”组织却没有在美国成立，而是在英国。这就不能不提到英国的大科学家华莱士和克鲁克斯了。这两位科学家在写灵学发展史时，是绝对不能少的人物。

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1823—1913），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他与达尔文同时建立物种进化学说，1858年他与达尔文一起在林耐学会宣读他们的进化理论，因此使他成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科学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竟然也陷到神灵世界中，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迷恋于灵学运动。他有两个兴趣：第一个兴趣，就是古老传心术运动的始祖——催眠术；第二个兴趣是“神灵照相”。

威廉·克鲁克斯（1832—1919）爵士，英国著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他发明了光电管，发现了化学元素铯，是皇家学会会员。他在心灵活动方面比华莱士走得更远。他热衷于降神会，把很大精力花在和灵媒的密切合作上。他用20多年的时间研究各种能从死者那里收到信息的灵媒，同两个著名灵媒合作，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灵魂不死的闹剧。

尽管华莱士与克鲁克斯的闹剧一再被人揭穿，但他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这样的一些大科学家所热衷的“招魂术”运动，推动了英国的心灵运动。

1882年7月17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由一小群学者建立了“灵学研究会”（又被称之为“剑桥小组”）。此后又扩大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以贵族、政治家组成的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曾经作过英国首相的格拉德斯通。另一个小组则由科学家组成：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皇家科学院物理学教授威廉·巴雷特爵士等。

在英国“灵学研究会”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相继成立了灵学研究组织。法国、瑞士、荷兰、意大利、德国先后成立了心理玄学学会、灵学基金会以及心灵研究会等组织。并仿效英国的作法，由科学家或社会名流挑头。如法国索邦大学的生理学教授，191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夏尔·里歇就是灵学的倡导

者之一，甚至居里家的人也成为心灵感应试验的传播者。

在美国，“灵学研究会”成立于1885年。美国虽然是唯灵论的故乡，但是作为标志着“唯灵论运动”进入到探索性“科学”研究的灵学组织的建立，却迟于欧洲大陆，这大概是因为“唯灵论运动”在美国没有受到科学界的重视，更没有引起科学精英的青睐之故。倒是一些社会活动家和著名灵媒如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以及波士顿著名灵媒利奥诺尔·派珀夫人等推动了“唯灵论运动”的发展。

第三节 灵学中心的转移

随着风靡于19世纪招魂术运动的衰败，1882年建立“灵学研究会”，一个新的唯灵论运动的兴起，使灵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挂上了“科学招牌”。而这个历史阶段的最兴盛时期是在美国。

美国的灵学研究会在迟于英国灵学研究会3年的1885年成立，并由于业绩不佳，遇财政困难，于1887年并入英国灵学研究会。此时的唯灵论运动的中心一直在英国。直到20世纪初，这个中心转移到美国。从这时开始，唯灵论的运动的中心始终保持在美国，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本世纪初，由于美国大众没有泯灭的对招魂术的浓厚兴趣，致使一些热衷招魂术的富翁支持招魂术研究，他们出钱给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让他们搞灵学研究；有名望有影响的人观看招魂术表演，而且唯灵论者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设计表演上。而由于这种“表演实验”经常遭到失败和不可重复性，使许多学者仍然不敢贸然涉猎灵学这片荒僻的土地。而在这中间，只有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被称为社会心理

学之父的威廉·麦独孤（曾作过美国灵学会主席）教授，断言证明“灵魂”存在是个巨大的研究课题，为如此难以捉摸的现象保留了一席之地。

麦独孤教授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研究灵学，并极力提倡将灵学研究引入大学，作为心理学的课程。1926年麦独孤教授在克拉克大学作了题为《灵学研究作为大学研究》的演讲，鼓吹在大学中进行灵学的研究。得到当地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北部的--所新建大学杜克大学（后来发展成以医学院颇具名气的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威廉·普雷斯顿·费尤博士的赞许，因此杜克大学就成了从事灵学研究的中心。1927年，麦独孤教授来到了杜克大学创办心理学系。同年，他在哈佛结识的年轻的生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莱因和他的妻子路易莎一起来到杜克大学麦独孤的心理学实验室。在麦独孤教授的鼓励下，开始了超心理学的研究。

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最早是1889年由德国学者马克思·德索伊尔提出的。超心理学一般被用来描述某些超乎寻常现象的代名词，并与“灵感者”或“通灵者”这样的特殊人物紧密相连，似乎是“灵气遍在论”的总称。到了莱因的时代（1927—1965），莱因正式启用了这个名字，至此，超心理学这个词汇，便成了一个意义明确的，代表着超心理学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的一个“划时代”的概念了。从此结束了以昏迷灵媒（催眠术）和清醒灵媒（号称可以听到或见到鬼魂形象）主持降神会形成的“观察测试阶段”，进入了“系统实验研究”的时代。而莱因因为首先使用了超心理学这样一个词汇，并把它意义推向一个更宽广的领域以及他在近四十年超心理学研究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成为美国超心理学界的领袖人物。他研究的超心理学包括两类现象：超器官知觉和心灵运动，编写

为由于莱因的全新的超心理实验研究方法，使他的工作成为超心理学历史上重大的里程碑；他提供了一个代表大学级别的超心理学的牌价；其次，他获得了在研究中用数学、统计学的方法取代自我证明的权威方法。从而，使超心理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一个繁荣昌盛风云际会的时代。

第四节 灵学发展的全盛时代

灵学发展的全盛时代，应该说是莱因在杜克大学执教的三十多年，特别是1935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超心理学实验室，一直到1965年莱因退休这三十年。

莱因一生的研究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7年至1934年创办超心理学实验室的准备阶段。这一时期的超心理学研究都是在心理学系心理学实验室进行的。由于莱因“出色”的工作，使超心理学在心理学系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从莱因时代一开始，超心理学这个课题就表现了巨大的诱惑力，打进大学的心理系是最令人感到“鼓舞”的，在“实验”的名义下，一门新兴的“实验科学”正在兴起。莱因将超心理学引进实验室，就是以猜纸牌和其它靶子的方法开始他的研究的。他以测度天眼通、传心术及其它超心理学项目为己任，花了六年的时间，对一大批受试者进行测试，并用数学方法统计超过机遇的得分。1934年，莱因发表了他六年多来所做实验的专题著作《超感官知觉》。在这部著作里，莱因断言了超感官知觉的存在。

第二阶段——1935年至1950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超心理学实验室，并开展了日益耸人听闻的研究。随着公众兴趣的越来越大，学生们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一时间，超心理学成了

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成了作家、漫画家，甚至是百老汇的宠物。

第三阶段——1950年至1965年莱因的实验室从兴盛逐渐走向衰落，最后退出了大学的舞台。

由于莱因的工作与心理学的矛盾越来越大。莱因1950年辞去了心理学教授的职位，专心经营他的超心理学实验室。这一时期莱因工作，仍然是在喋喋不休地进行着测试实验，超心理学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是不能让非超心理学家去重复他们的试验。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超心理学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验证方法，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物理学家对超心理学的测试方法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把自己的测试方法引入超心理学，认为人脑同电子计算机一样进行工作，还认为可以把物理学以及有关学科中的概念，直接用于对人脑的研究。此时超心理学的兴趣更直接归于研究人员的新的应用性和专门性心理学分支学科的建立。1957年在杜克大学成立了超心理学会，在杜克大学影响下，一些大学开始讲授超心理学课程，并导致了超心理学教科书的出现。同年，在杜克大学设立了“麦独孤奖金”，授予对超心理学作出杰出贡献的校外研究人员。到1967年共发放10次。美国和英国各获两次，两国共获一次；捷克、印度、荷兰、南非和瑞典各获一次。由于“麦独孤奖金”的发放，新的超心理学研究中心在美国其它地方和苏联、日本、印度、瑞典、捷克等国家先后建立起来。这些研究组织最引人注目的是超心理学家日益与其它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小组，使用许多其它研究领域中的技巧、知识进行研究。然而这一现实并没有挽救超心理学尴尬难堪的处境，直观的玄虚和骗局的频频发生，更加重了科学家的怀疑和不满。并加大了与心理学之间的距离，心理学家对超心理学的研究采取了超然和冷漠的态度。

在麦独孤奖金的 14 名获奖者中间，心理学家只占 2 名，事实上，在美国 30 年代超心理学的社会影响比现在还要大，在大学心理系比现在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看起来这个时期的超心理学研究喧嚣一时，但是已经预示着它的衰落。1965 年随着莱茵的退休，杜克大学也就断绝了与超心理学的一切联系。而杜克大学这所第一个向超心理学敞开大门的高等学府，也就悄悄地把超心理学摒弃在大学校园的围墙之外了。

超心理学这一段的兴衰历史，给予了我们一些什么启发呢？从以上对历史材料的分析看，似乎存在着这样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观点：其中之一的看法，认为超自然现象的概念根本没有持久的可靠性，它只不过表明我们的无知。另一种看法认为，超自然现象是精确的，它标示着科学世界图景的边界。超出了这个界限，就是解放了精神的自由王国，而这个自由王国是可以不依赖大脑的，它提供了对人类精神本质的证明，因此，它必须永远向严格的科学分析挑战。这两种对立的哲学，究竟哪一种将会取胜？你是否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我们能从这走过来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剔除人类的错误和偏好，也许能帮助我们更迅速地甄别受试者。因为任何方法学上的严密和精深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中具体发现的代替物，更不能代替理论上的解释。尽管已经提出了这样那样的学说和模型，但是它们并不比思辩更让人感到明快，远远缺乏经验的支持。如果我们仍然愿意献身于对 PSI 现象本质的追逐——这个曾经吸引我们人类好奇心的最为错综复杂的探寻领域，那么，很可能还要和我们的先驱一样，在黑暗中摸索。如果是这样的，上帝啊！我们就不能为任何结果担保了。

第五节 美苏灵学讹诈

从研究灵学史的角度审视美国和苏联，会给出两幅完全不

同的图景。美国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而苏联是“非常隐秘”、“小心谨慎”。美国灵学研究虽然也经历了衰败和波折，但从莱茵时代，灵学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之后，美国一直处于灵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在美国有国际级的超心理学协会组织，有国际级的研究所关注这项工作，有知名科学家，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介入这项研究，也有面向世界的超心理学杂志。所以美国的灵学研究，对全世界这个领域都发生着影响。而对苏联的灵学研究，外界猜测颇多。一种说法是，苏联官方不承认灵学领域的研究，并且在这个领域受到心理学界和科学界的冷遇，因此没有它应有的地位。另一种说法正相反，认为苏联在灵学研究方面有许多惊人之举，国家安全部已将各种特异功能付诸实践甚至在军事上得到了应用，所以对此领域讳莫如深不愿透露。这些猜测也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苏联在灵学研究领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19世纪席卷美洲和欧洲大陆的唯一论运动对俄国也不是没有影响的。早在19世纪末，英国著名灵媒霍姆就到过俄国，为宫廷贵族表演，受到俄皇的青睐。之后，在俄国也不断出现表演奇异现象的特异人。不过这些特异人，都没有霍姆那么高明，由于不断地被揭露，就逐渐消声匿迹了。直到十月革命后，在苏联才出现了灵学方面的系统研究。1922年，在苏联科学院大脑科学研究所成立了一个“精神暗示委员会”。1924年在苏联成立了一个属于国际心灵研究会苏联委员会的组织，负责人就是大脑科学研究所所长别赫捷列夫教授。1926年又成立了催眠术和心理物理学实验委员会，主席仍然是别赫捷列夫教授。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旨，就是进行传心术研究，而且开创了对动物进行传心术研究的先河。这一时期对传心术的研究，被苏联的学者认为是具有国际水平的。别赫捷列夫等人对动物所做的传心术研究报告，还被译成英译

本在国外发表。1927年别赫捷列夫逝世以后，由他的学生列宁格勒大学生理系主任瓦西里也夫教授接替他的工作。瓦西里也夫在灵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不仅是在传心术方面继续发表惊人的结果，声称他的传心术实验，有14%达到准确无误的程度；34%部分正确；52%判为失败。就是这样的结果，瓦西里也夫仍然认为，在这个领域，苏联是领先的。在倡导和实施与美国的灵学竞赛方面，瓦里西也夫是一位佼佼者。为了确立苏联在传心术和天眼通方面研究的优先发明权，1963年，瓦西里也夫又成立了一个研究传心术的特殊实验室；1967年在苏联超心理学学会下，又成立了“超心理学和生物信息分会”，潜心进行超心理学的研究工作。瓦西里也夫的另一个贡献则是发现了一个不朽的具有心灵功能的特异人——库拉基娜。她的高超的“意念致动”功能表演，被苏联灵学家们称之为是第二个走在别国之前的领域。可见苏联的灵学研究也绝不是无声无息。据国外报道的猜测，苏联正在官方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条理地进行着具有军事目的的灵学研究。这就是美苏两国进行“灵学讹诈”的基础。

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断地推行争霸世界的核讹诈政策。这种军备竞赛的喧嚣，大大刺激了灵学领域军事应用的呼号。1960年瓦西里也夫看到法国一家科普杂志《科学与生活》发表了美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传心术和天眼通的实验。这个报道声称这个实验是一个陆地上的实验室和一个在航海中潜入海底的潜水艇“鸚鵡螺”号上的受试者之间进行的。法国对这一号称是真实的“心灵感应”事件连篇累牍地报道，震动了苏联的灵学家们。瓦西里也夫更是乘机向苏联官方要求，加强和加紧对传心术和天眼通的研究，于是一个个传心术的实验室建立起来。事实上“鸚鵡螺”号的传心术实验已被揭

露，实属一场骗局。到了70年代，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灵学家塔格和普索夫极力鼓吹特异功能的军事用途，称“遥视”、“心灵感应”这类心灵项目也是军备竞赛的一部分，并以苏联在心灵研究方面投入数千万美元的诡称，从1972年开始，争取到美国五角大楼每年50万美元的灵学研究经费的支持。这期间，美国不断发表“遥视”和“心灵感应”方面的实验报告，以此来诱惑苏联等国在心灵战中投入大量的经费和人力。1975年《纽约时报》就报道了阿波罗14登月宇宙飞船上的宇航飞行员埃德加·米切尔所进行的传心术实验。米切尔本人就是一个灵学和神秘主义的笃信者。他欣然地接受了莱因研究小组灵学家提出的，在外层空间进行一次非官方的传心术实验的要求。米切尔按照莱因的实验方法，事先选出5种齐纳符号组成的25个随机选择的数字，并事先给地面上确定的4位受试者一个发送时间表，以表明什么时期他会发送这些信号。米切尔在外层空间向地球上以4个不同时刻发送了4组数字。地面上的4个受试者，有两个受试者在6个时刻写下了接收到的数字；另外两个受试者，因为阿波罗14发射推迟了40分钟，而搞乱了米切尔事先留下的时间表，在米切尔还没发信号时，就接受了两组数字。莱因研究小组对前两个受试者收到的6次信息一览表进行了分析对比，发现54对是相符的，而根据概率的预测，应是40对。于是超心理学家把这个结果大加宣场，并欢呼这是思维传感特异功能的一次胜利。而对另外两个与发送者不协调时刻接受的信号一览表则视而不见。当人们对米切尔实际的发送时间和计划发送时间作了300次最接近的猜测后，发现根据概率的预测应有60个对应，而实际上只出现了35个对应。对于这一些，米切尔拒而不谈。况且在试样少得可怜，而材料的收集和选择又是在如此古怪的条件下，这种成功是根本不能

说明什么问题的。然而，米切尔却向宣传机构大肆夸口说，此次特异功能实验极为成功。人们也就把它视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最佳的神话。

比这样失实报道更有诱惑力的，诸如开发“预知”功能，可以探知敌方行动计划；开发“特异干扰”功能，可以扰乱敌方指挥自动化系统；用“思维传感”功能迷惑敌方指挥员；用“意念”功能伤害敌方首脑等恫吓性的宣传，不时地在双方的报端出现。在美国报刊上还出现苏联在研制能用意念力引发美国核爆炸的“超空间核榴弹炮”及使人致死的“光垒调制器”等的灵学讹诈宣传。

这些宣传的宗旨，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军事上争霸世界的政治需要。他们不仅在核武器方面的发展争先恐后，而且在“灵学”项目的开发和军事应用目的方面，彼此窥测、揣摩对方的“发展水平”，不时地放出一些虚妄的报道，诸如用“意念”发射“超空间榴弹炮”，发射致人死命的“光垒调制器”等。其实这些东西是毫无根据的臆想。一百多年的灵学发展历史，至今，灵学家们哀叹，没有一例“特异功能”被科学共同体证实，所谓的“灵学的军事应用”，不过是一种灵学讹诈而已；二是灵学家们，为了获取经费的支持，像一切搞“特异功能”的人一样，把灵学的幻想当成现实，大肆渲染，大肆夸张，以求得政府和社会团体大额度的支持，达到聚敛财产的目的。美国灵学家（实际上是两位物理学家，却把一生很大的精力用于灵学研究上）塔格和普索夫，对美国五角大楼每年 50 万美的灵学研究经费，并不放在眼里，而要去寻求更大投资的军事应用项目。美国投资 2000 万美元的“星门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灵学军事应用项目。

第六节 美国“星门计划”及其终结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加大了宣传“美苏灵学研究差距”。极力鼓吹美国在“心灵竞赛”中输给了苏联，说苏联可能研制成功26种心灵电子武器。甚至连美国总统卡特都在担心苏联人在通灵武器方面的威胁，并责令国防部对这方面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并没有证据说明苏联正在进行心灵电子战的大规模研究。这种自己吓唬自己的战略，一是体现了美国军事称霸的野心，在军备竞赛上不能输给另一个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美国灵学家卷人“灵学讹诈”中的真实目的——利用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来获取更多的经费去从事这个叫你一时无法作出否定结论的艰涩难解的领域——以便从中获取更多的好处。斯坦福研究所的塔格就是这样一位灵学家，他在斯坦福研究所做了12年的心灵研究，特别以支持当代超人尤里·盖勒，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骇世惊人的实验报告而享誉全球。但到了1984年，他不再满足国防部连续12年，每年50万美元的拨款支持心灵研究的现状。于是离开了斯坦福研究所，自己成立了一家公司，独立地寻求同苏联的军事应用方面的合作研究，且放出一个个惊人的结果。例如，塔格声称成功地完成了从莫斯科到旧金山相距16000公里的“遥视实验”。塔格还把他宣传心灵研究军事应用方面的“高见”及“遥视实验”的军事应用前景，写成了《心灵竞赛——了解和利用通灵功能》的书广泛发行。一时间《心灵战》、《心灵大战》、《心灵竞赛》方面的书风靡一时。美国政府和美国情报机构及军事机构，就是在这种灵学氛围中卷进了灵学研究。

早在60年代，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出资支持“超感官

知觉实验分析”的灵学研究，其中还包括对苏联超心理学领域工作的分析和评估。而恰是这时，苏联也被外界猜测正在进行灵学军事应用研究。所以，更准确地说，美苏的灵学竞赛就从这时开始，并逐渐演化升级，直至发展成“灵学讹诈”。为了对付美国宣称的苏联在灵学研究领域领先美国数十年，美国情报机构、军事机构频频出资支持灵学研究和雇佣通灵人进行搜集情报、侦破等军事目的项目。最知名的要算是从1970年启动的代号为“星球大门”绝密的一项灵学军事应用计划。该计划声称有三个目的：（一）跟踪国外灵学研究及搜集这方面进展的情报；（二）寻求灵学的军事应用；搜集军事情报、侦破、缉毒等；（三）对ESP（超器官知觉）现象进行实验研究，以证实“传心术”、“预知”、“透视”、“遥视”这类特异功能的存在。这个项目从1970年启动到1995年终止。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0—1977），是由中央情报局支持，在斯坦福研究所实施。目的旨在证实ESP项目在情报搜集工作中的价值。到1976年，因没有得到情报工作的应用价值，中央情报局决定放弃这个项目。第二阶段（1978—1995），由国防情报局接管了这个项目，并给该项目取名为“星球大门”的代号。在该局主持期间，1978年至1990年该项目仍在斯坦福研究所实施，1990年至1995年在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实施。第三阶段（1995），又回到中央情报局，并由中央情报局委托美国研究所进行最后的评审。这个计划实施之所以这么长久，也是受灵学讹诈的诱骗，在“星门”计划实施期间虽然也作过几次（1980、1984、1988年）局部评审，并无惊人的结果，但是国防情报局仍然不放弃“星球”计划。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灵学讹诈的呼声越来越高。此期间苏联的灵学军事开发和灵学情报特技的宣传愈演愈烈。许多科幻式的灵学推理小说纷纷登场。

捕风捉影地大肆渲染苏联和美国开发灵学在军事和情报方面的用途。连白宫发言人怀特这样的人也加入这场灵学讹诈中。他在《心灵战：事实还是虚构？》的小说里写道：“东西方冷战即将出现又一个恐怖战线，涉及精神研究技术和电子武器的绝密开发，其应用目的意味着对人体和人心的大规模的征服和奴役。在这条战线中，到处可闻神秘玄妙的阴谋密谈，随处可见对付心灵的怪异机器，吓得人灵魂出窍，吓得鬼哭狼嚎。遥感监视、超感间谍、精神破坏、超高空投弹开炮、远距离引发核弹，通过光栅调制器让千里之外的芸芸众生患病丧命——这些科幻小说中才有的概念设想，一旦真的研制出来，必将对人类社会构成空前的超级威胁。但是，这些东西毕竟是宣传，不是事实；是讹诈，不是成果。所以并不能帮“星门”计划的忙。“星门”计划虽然实施了25年之久，耗资2000万美元，终因劳而无功，最后终止了这项研究。应该说“灵学讹诈”到此也告一段落。

美苏“灵学讹诈”的结束和“星门”计划的终结，充分说明了灵学研究的虚伪和虚弱。美国“灵学讹诈”的炮制者之一的麦克雷1992年在《间谍》杂志上，自我披露说，所谓的美苏“通灵差距”，不过是他与一位朋友就“人们是否什么都相信”的一种赌注而已。这个赌注果真灵验。在麦克雷的《心灵大战：政府研究通灵武器军事潜力的真实故事》的著作中，宣扬的“第一地面部队”、“通灵特种部队”、“超空间榴弹炮”等的“灵学讹诈”，真是吓坏了美国政府和军方。于是政府和军方动用了各种力量，除了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还包括国防部、国家安全部、防务高级研究项目部、陆军、海军、空军都卷入到灵学开发军事应用的领域中来。他们经常雇用所谓“通灵谍报员”进行有军事背景的“侦破”。“星门”计划的终

结，有力地揭露了这些“灵学讹诈”的骗局。1995年底，当中央情报局决定撤消“星门”计划的消息公诸报端时立刻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率先发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报道，指出这一指望从通灵间谍身上得到有价值军事情报的企望，无疑于尤里·盖勒弯勺子的伎俩，“星门”计划实际是看弯勺子人之间的一场心灵战。“星门”计划是美苏军事竞赛冷战的产物。所谓“通灵谍报员”“遥视”的军事应用也是一派胡言。

“星门”计划是终止了，“灵学讹诈”也结束了。但是这种打着科技竞争的你骗我、我骗你、自己骗自己的伪科学骗局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了呢？从灵学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靠社会影响，舆论驱动，蛊惑人心的伪科学案例还会不断出现。这是因为人类的认识史上，总是伴着那些貌似神奇而又难以理解的现象。而面对这些现象，人们总是有两种态度：一是笃信者，把科学现象拉入到神学的领地，使科学成为宗教神学的婢女；另一种，则是按照科学本来的面目去探索、研究，最后揭示出科学的真谛。不管人们持什么态度，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倒愿意引用一位科学史家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科学地研究的东西，但要达到科学真理的境界，却也没有什么科学道路以外的捷径。

第二部

气功真伪之争

第八章 气功与“科学革命”

第一节 大江南北气功潮

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气功活动热潮。这种气功活动最先在四川、河北、辽宁、广东等省兴起，至 80 年代中期，汇集北京，蔓延全国。短短几年，气功迷达到 6000 余万，气功报刊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健身院、气功表演会，遍九州大地。

在这场气功热潮中，鹤翔桩飞遍神州，“大雁功”声浪八荒，“自发五禽戏”轰动南北，“内劲一指禅”传响宇内，“空劲气功”倾倒南国，“六字诀”吟遍中原，“马家功”如骏马奔腾，“藏密功”出土走红，“严新气功”一鸣惊天下；少林、武当、峨眉三大派出开门授徒，儒、释、道三教功并列耀彩，……实在说不清全国各地气功热达到了怎样的一种疯狂程度，反正到处都热，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在北京、广州、西安那样的大城市，气功迷占据了城市花园和林荫宝地。一个气功大师光临，不亚于来了某国的总统，往往倾巢而动。严新、张香玉等人在各地作气功报告，听众达到每场万余人。

正像任何一门科学建立都需要博大精深的理论一样，气功也是靠一股庞大的理论力量推上顶峰的。1979 年，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顾涵森等人，运用现代科学仪器，测出气功师运气发功放出的外气，具有物质性，含有四种信息：1、受低频涨落

调制的电磁波；2、静电富集；3、低频磁信息；4、微粒流。徐州医学院在同年对这一项目进行了研究，除了肯定顾涵森等人的测定外，指出气功外气含有“次声”。这是掀起气功狂热的一个突破口！

在短短几年内，气功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发现，足令其他学科相形失色：气功可使小麦增产，可使旱天落雨，还可杀死细菌，又可在 2000 公里的远距离改变水分子的结构。气功史学的研究报告说，秦始皇是个气功师，能看见人体外气，扁鹊也是个气功师，有透视人体的功能；刘邦是个天生气功人，身体能发五色光；曹操是个气功迷，周围有大批气功师；张良也是气功师，能辟谷行气，飞檐走壁。近代史上毛泽东练过气功，蒋介石练过气功，张学良也练气功，并且是个气功理论家，写过论文。一句话，凡是有成就的人，都与气功有关联。并且，又有雪花般的报道文章漫天撒来，在朝鲜、新加坡、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泰国、日本，都在开始学习气功，研究气功。中国气功已走向世界，传遍人类。中国的四大发明之外应增加一项：气功。

科学家们还通过理论研究，将气功上升为 21 世纪科学革命的突破口。他们认为，气功是东方文化，科学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是从微观世界人手向宏观世界前进，而西方文化是从宏观世界人手向微观世界前进，它们还没有碰头，中间还有相当的距离。以气功和特异功能为代表的人体科学是当代最高的科学，是高技术中的高技术，是高技术的平方。西方科学已山穷水尽，唯有东方的气功术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最后问题。

还有的人将气功理论上升到治国理论高度，认为气功还是治国之术。关于气功治国的理论，不但散见于各气功家的讲稿、论文中，而且有多种大部头的著作问世。坚持气功治国的

气功家们认为，如果举国上下，从村庄到城市沉浸在气功态中，到处宁静安详，花自开落，便可息事宁人，达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举国进入气功态，则举国安泰；全世界进入气功态，则就是共产主义之兆。气功师严新在北京一次带功报告会上指出：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气功就是中国的特色，气功加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气功理论家认为：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气功发展史，中国文化就是气功文化，不懂气功，就是不懂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提出气功是最高科学和气功治国主张的人，不仅是气功家，还有一些是中国科学界、文化界、甚至政界名人、要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呼吁，中国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一切有责任心的人们，一切愿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的人们，都应投入到气功事业中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振臂高呼：迎接人类又一次最伟大、最辉煌、最壮美的科学革命浪潮的到来吧！气功是中华瑰宝，是全部中华文化中最珍贵的文化！振臂高呼的人士深感国人不理解他们的挚情，甚感愤惋。又说外国人，如苏美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偷窃我中华瑰宝，并运用于航天、军事及尖端物理科学，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坐等了。再这样不去，我们就要挨打，中华民族就要沦亡。

随着这样的呼声，人们心动神摇，气功的队伍如滚雪球壮大。要学功的人多，气功师也相应的增多。似乎一夜之间，“正宗传人”、“嫡传名师”、“秘传”、“掌门人”、“高级气功师”、“著名气功师”，都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他们不仅功法上乘，功力绝伦，而且都德高千古，一齐把历代秘传的功法献给众生。那些气功学习班广告，飘满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街小巷。与此同时，修炼气功器具随之而生，继电子气功师问世之后，又有中美合资中华气功机、大陆台湾合作气功人静仪问

世。商店里有气功帽、气功鞋、气功服、气功表、气功枕、神功元气袋，书店里有气功书法集、气功人物挂历及各式气功人物神迹故事。中国似乎真要变成气功国了。

气功呈星火燎原之势，是需要一大批人士奔走呐喊的，不少党报、科技文化类报刊出现了介绍气功人物的新闻文章，中央电视台连续三年的春节联欢会上，也安排了气功节目。这些对气功神奇功能的史无前例的夸大宣传，足以使一般人听了如醍醐灌顶，顿入雾中，但毫不怀疑气功有无比强大、无所不能的功用，小则祛病延年、增长智慧，大则呼风唤雨，阻挡原子弹。

在这一热潮推动下，一些气功组织纷纷成立，一些图书杂志也不惜余力地为气功热呐喊助威。这些组织的推动和书刊的宣传，是气功热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一阵又一阵的高潮的又一重要动力。据《中国气功大论战》一书统计，这些气功组织和书刊大体有如下一些：

1981年，中华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1982年，《气功与科学》在广州创刊。

1982年5月，《北京文学》第7号发表柯岩的长篇报告文学《癌症≠死亡》，报道了郭林气功抗癌的奇迹，震响全国，北京出现大规模气功热第一次热潮。

1983年，《中华气功》在北京创刊。

1983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上海创刊。

1984年，《中国气功》（原名《北戴河气功》）在河北创刊。

1984年，中华气功进修学院在北京建立，吕炳奎担任院长。据三年后一次学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3年来该院聘请气功界80余位著名人士为兼职教授，编写出1800余万字的

气功系列教材，培训学员 5000 余名。

1985 年，《气功与体育》在西安创刊。

1983 年，马济人编著的《中国气功学》出版，到 1988 年已再版 5 次，总册数达 30 余万册。

1986 年 4 月 30 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北京香山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大科学家作发言《团结一致，迎接新的科学革命》，张××在大会上讲话，他后来一直担任研究会的理事长。此前，1984 年陕西省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此后，按照国家科协的文件指示，全国各省纷纷建立相应的气功科学研究会。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下，还成立了一系列的专业委员会、直属分会、研究组等组织。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推动各种气功学术交流会、推动和宣传各种气功外气实验、宣传气功师的神迹和压制批评意见等方面功不可没。

1986 年 5 月 26-31 日，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人体科学代表大会同时在北京召开。著名科学家作《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的发言。

1987 年 5 月 3 日，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中国人体科学学会。

1988 年 5 月 26 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科技会堂宣布成立，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领导下的科研实体，张××兼任中心主任。

1990 年 5 月，《中国人体科学》杂志创刊。

在整个 80 年代，有下列气功学术著作值得提及：

1988 年，林中鹏主编的《中华气功学》出版。这部书为气功学院函授教材，80 万字。

《中国气功辞典》，80 余万字，吕光荣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年出版。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学》，30 余万字，上海市气功研

究所林雅谷、马济人等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中国气功养生学》，40 余万字，李远国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气功学》，林厚省主编，30 万余字，青岛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中国气功心理学》，26 万字，王极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有多少种功法被印成册出版和在各地口述传授，已很难统计。人民体育出版社编辑的《气功精选》再版前言云：“本书自 1981 年问世后，算这次已重印 6 次，累计印数已达 65 万 9 千册。……1985 年又出版了《气功精选续篇》，并已重印 6 次，印数近 30 万册”。

1985 年以后，各种记述气功奇人的报告文学开始问世。这也是气功热走向迷信和荒谬的先兆。在各种气功神迹著作中，仅有关严新一人的神迹宣传专著和杂志，据严新气功研究会统计就有 100 多种。以下是宣传严新气功的名作：

《瑰宝之光——严新与气功》，钱成、周新编，25 万字，工人出版社出版。

《中国超人》，郭同旭著，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年出版，30 万字。

《中国超人》，李培才著，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出版。该书有张宝胜等超人的神迹掺杂其中。

《奇人神功》，秦晖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严新气功现象》，李伦编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26 万字。

《当代科学新天地——严新气功介绍》，新华出版社 1988

年出版，30万字。

《严新气功导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严新功法故事》，辽宁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严新与严新气功画册》，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年出版。

《严新气功》，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严新传奇》，花城出版社1990年出版。

《气功和练功要领》，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

以《严新报告》为名的小册子，多是根据严新在各地的讲话录音整理出版，版本繁多，没必要罗列赘述了。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中国史上还没有一个像严新那样的人，能被世人格外注目。

关于其他气功大师神迹异行的传记著作，需要提及的有：《大自然的魂魄》，李培才著，写张香玉的神功异能；《大气功师出山》，纪一著，写张宏堡的神迹及出山前后经过。两书是中国气功热潮中荒谬绝伦之作，也是促使气功热转为气功冷的承前绝后之作，此二书以后，绝少气功人物专著问世，气功人物传记少有人问津了。

第二节 大科学家再倡“人体科学”

20世纪80年代气功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次热由科学界、舆论界、民间共同制造出来的。其中大科学家的支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力量。在这些支持和鼓吹气功科学的大科学家中，我国一位人所众知的科学巨人又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气功活动和特异功能研究的广泛开展，与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人们相信他，信赖他，是因为他是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科学家，为我国“两弹一星”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建立了卓著功勋，受到党和人民的崇敬和爱戴。此外，他还是中国科协主席，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巨人，被誉为“科学泰斗”。正是这位科学泰斗，“以他非凡的智慧，超前意识和战略家的眼光和魄力，在80年代创立了中国人体科学，并热情支持和参与了研究。”

在第一部特异功能大论战中，我们已经讲到如何支持特异功能研究的。在由特异功能向气功发展的过程中，他再一次起到了中坚作用。

在1983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杂志在上海创刊之际，这位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肯定了特异功能的真实性，并指出“人体科学是最高科学，是高技术中的高技术，是高技术的平方”。在同时的《中华气功》创刊时，他又在该刊第1期著文，提出“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统一，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那是翻天覆地的事，科学要整个改变面貌，整个世界也会大大地向前发展。”

1984年2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气功学术讨论会上，他又作了著名的《—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指出：“搞这个事业很不容易，但我们相信，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就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如果搞得好的话，这场革命可能在21世纪就会到来”。

又说，“《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是不是人体科学的幽灵正在我们当中徘徊？从我们做的事情看，我有这个感受。既然如此，这就会有斗争。我们的同志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能单纯把它看作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运动。……这实际上

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斗。”

在1986年2月23日的一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气功科学座谈会上发言，提出“当前气功科学研究的一项任务是建立唯象气功学”，“什么叫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986年4月30日，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这位大科学家作了《团结一致，迎接新的科学革命》的发言。他说：“我相信，气功和我国传统医学（包括中医、蒙医、藏医，还有其它的民族医学等）以及人体特异功能的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一旦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就一定会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也就是真正的科学。……这件事做好了，必然导致爆发一次科学革命……大家也可以认为这是东方的科学革命。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得到深化和发展。……这个问题不简单，因为这涉及到人体本身，所以是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大脑和意识的辩证统一的问题，这是最难最难的一个问题。……现在外国都说要搞高技术，而我认为最高的技术应该说就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要研究的气功科学技术。”

他的这些观点，极大地推动了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的这些思想，与后来的伪气功骗子借气功之名行诈骗之实有根本的区别。他们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看到一些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而这些现象与我国的传统气功理论、中医理论之间又存在一些逻辑联系，因此，试图从科学研究的手段对其进行解释，并设法提出自己的解释，这种思路本身并没有什么错。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实践和不断的失败进程中才得以推进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他的这些研究，在事实上却造

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蔓延神州大地的气功热潮，正是在这股热潮中，良莠夹杂地滋生了一批气功骗子。而这些研究却至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到底是一场科学革命，还是一场科学迷梦？如果是后者，这其中的原因又何在？具有如此精深的科学素养的大物理学家，是不可能对一些显而易见的科学谬见轻易相信的。有人曾用“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来解释，然而问题决不仅仅如此简单。这对今后的科学研究又有何启示？

为了展示大科学家的思路，我们这里保留一篇这位大科学家在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使大家可以从其中看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追求人体科学的初衷，也可以从中分析为什么他们会陷入其中。这篇文章后来署大科学家和 507 所所长陈信两人名字公开发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该文全面阐述了人体科学研究和气功研究的系统思想，是一篇“代表作”。文章原长 10500 多字，限于篇幅，做了一些压缩，但保留了原文的主要思想。

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 体系中的一个大门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 1987 年 5 月 3 日批准成立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这离 1979 年 3 月发现四川唐雨“耳朵认字”已八年多了，对我们这些关心并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是充满了战斗和经历了曲折的八年，我们之有今天，的确来之不易！所以我们庆贺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的正式成立！我们都是科技工作者，而科技工作者是老老实实的实干家，在高兴之余，总不免要想一想：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是干什么的？对此，我们

想在这篇文章里谈点我们自己最近的一些体会，供大家研究时参考。

(一) 什么是人体科学

好几年前，我们从吕炳奎同志那里学习到一个观点，他说：“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三者是连在一起的。”这对我是很大的启示：人体科学至少要考虑这三个方面。

一个是中医。1983年我们有一篇文章讲到中医的理论要用现代的语言来阐述，使它更容易被人理解。后来把这些内容称作唯象的中医学。另一个方面的工作是气功，我们也曾讲过，对气功要逐步使它科学化，也要建立唯象的气功学。第三，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最引人注目、最能吸引我们的，是人体特异功能。

我们应该明确：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不单纯搞人体特异功能，我们这个学会是研究人体科学的，人体科学包括人体特异功能，但不仅仅是人体特异功能。过去我们常把这两个词通用。有时叫人体特异功能，有时叫它又怕惹出什么事来，就把它变一变叫人体科学，这是当时历史条件造成的。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这样做了。我们应该明确的讲：我们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是搞人体科学的，也包括气功的科学，也包括中医理论，还包括有其它方面的科学技术。

这样，就必须说清楚：人体科学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的思想中，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除了人体科学之外，还有八个大的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和文艺理论。我们的人体科学和这八个大的部门是平起平坐的。人体科学是现代技术九个大部门中间的一个，和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平起平坐。这是不是把人体科学抬的过高了？不是，人体科学确实是了不起的，因为人体科学就是研究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他的特征是人体的功能状态，包括一些特殊的人体功能状态。人体科学就是研究人和人在客观环境中所处功能态的学问，包括中医（也包括中华各民族的医学，如藏医和蒙医等；即在《宪法》第二十一条中所讲的“传统医学”），也包括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及其它可吸取的许多东西，把这一切统统汇总起来称之为人体科学。

把人体科学突出出来，不放在生命科学之内，可能会有同志问：你说人体是开放的巨系统，这也不是人体所特有的，有许多生物不也是很复杂的巨系统吗？人与生物有什么区别？回答是：区别在于人不仅是开放的巨系统，而且人是有意识的。人有意识，其他生物不存在意识，这一点是直到今天的科学研究所证实了的。意识又能作用于人体本身，是“意识反馈”。这也就是人体科学区别于一般生物科学的特征。因此人体科学的研究要把握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大脑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这是人体科学的又一核心思想。

人的功能状态都是亚稳态，是可以调节的。那么调节的手段是什么？

第一个手段与外界的物质交换。第二个手段是信息交换。气功师发外气治病，我们想也就是电磁波的作用，不过是很复杂的电磁波。还有第三种手段，就是人脑所产生的意识，意识是人体最高层次的运动，它可以返回来作用较低的层次。这个看法，是四年以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斯派瑞（R. W. Sperry）提出的：人的最高层次意识的活动，可以影响下一一些层次的活动。因此，意识也是调节人体功能态的一个手段，这非常重要！

(二) 研究人体科学的指导思想

人这个巨系统在宇宙这个超巨系统中存在交往，这里边又有三个小层次，一个是宇观的（人在宇宙中关系叫宇观的人天观），在西方有人称此为“人择原理 Anthropic Principle”。第二个层次，中国古代关于人的哲学，是宏观的人天观，这是中医的哲学思想。第三个层次，到了微观的层次，也有人和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从微观的层次——量子力学的层次——人是怎样认识周围客观世界的？量子力学中还没有解决人究竟怎样认识、怎样测量、观察周围的微观世界。要研究人的感觉器官和外界的刺激之间的关系，从量子力学的层次深入去研究。

(三) 人体科学的三个层次

我们把一切科学技术部门分成三个层次。首先是基础学科层次。有这些学科，象生理学、心理学等等，及研究人的意识、思维活动，联系到最高层次，用斯派瑞提出的一个词，叫精神学（Mentalics），实际都是研究人大脑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都是人体科学院基础理论学科。在此我要加一个，就是从人的整体、从人体功能态和功能态的调节去研究人，这就是人体学。人体学的重点是研究人体巨系统、人体功能态及其调节变化的学问。

在基础科学下面一个层次就是技术科学。就是实际应用或者说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在我们人体科学里头就是医学理论，西医的理论也是一个内容。在技术科学里面还有一门也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即人跟机器怎样一起协同工作，在外国叫人—机功效学（Ergonomics）。讲人跟机器怎么样有效的配合。

再下个层次就是实用科学。在人体科学的实用科学当然就是医学了。现在的医学，治病叫第一医学。防病叫第二医学。美国人在搞所谓未来预测医学。就是说对你今后五年的情况来预测一下，你可能要害什么病。还有第三医学，就是康复医学。这三个医学都可以利用所有人体科学研究的成果，气功、特异功能都可以用上。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还要搞第四医学（即开发人潜在的能力），就是把人的功能再加以发展。气功的应用有这样的记录，通过练功可以使学生的智力提高。佛教练气功说“定能生慧”。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开发人潜在的能力（提高智力也好，适应环境也好）。这叫第四医学。在实用科学里还有很主要的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与第四医学关系很密切。

（四）人体科学研究到底怎么做

我们要开阔眼光，不仅是对中医理论、气功、人体特异功能，要用人体科学的眼光去看，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可以研究的东西还很多，我们要把握住核心思想：人体巨系统、功能态，用什么手段，包括人的意识，去调节功能态以及在各种不同的能态中所产生各种效应。下面简单谈谈我们现在的认识。

1. 气功是研究人体科学的“敲门砖”。人体科学的概念，很多突破点是由气功引起的。气功是人体科学的一块“敲门砖”。气功是人体科学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认识到这一点，对推动我们的工作是很有利的。

2. 建立唯象理论。唯象的中医学是完全可以搞的。再就是唯象的气功学，1986年2月23日已讲过，就不再重复了。最后剩下一个问题是：人体特异功能是不是也有一个唯象的学问？对人体特异功能，也可以建立一个唯象的理论。问题是怎

样建立？有一个线索是不是应该加以考虑？人体特异功能的表现实际上可能是人与物之间出现的电磁场。在改变某个物的状态时，物也可以发电磁波、电磁场，人也可以接受它，接受环境中电磁波、电磁场的作用。

人体特异功能中关于信息和信息处理的功能（特异感知），是不是由于人发出电磁波作用到物，物再反过来将信息输入给人，最后在大脑中处理这个信息，得出结论。没有特异功能的人，这些信息可能都没能处理，扔掉了；而有特异功能的人，则会处理。例如有一位×××，能预感地震；这是可以理解的，地震过程中会发出很多电磁波信息，动物能感知这些信息，如有的鼠和蛇都跑出洞来，×××也可以处理这些信息，这是属于特异感知类型的。

还有特异致动，是使周围的物质出现变化。云南姚宏均提出：从前所谓的“闹鬼”，可以和特异致动联系起来。这是认识上的一个突破。它是指有特异功能的人一进屋，这间屋子里的东西就乱动。这可能是特异功能人自己意识不能控制的特异致动，就是过去所谓的“闹鬼”。所以实在不是什么“闹鬼”，是“闹人”，是特异功能人在“闹”。

3. 特异思维。1984年8月，在全国思维科学讨论会上提到了“特异思维”这个词。所谓灵感，也是特异思维。我们要研究特异思维（作为人的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包括灵感思维，特异感知和特异致动中的思维。另外，特异功能人和气功师，都可能具有他或她的特异思维。至于特异思维的过程，那是不能用常规语言表达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4. 宇宙环境对人体的影响。人体开放于宇宙的一个方面就是环境的影响，如昼夜的变化，四季的演变等，这是一门人体的时间节律学。我国古代称之为“子午流注”，近代在国外

这方面发展很迅速，它对人体科学是很重要的。此外，近年来又有科学家注意到地磁场的影响，实验观察证明，地磁场的变化对人体有明显的作⽤。

5. 国外的民族医药学。人类生活在大地上总要和疾病作斗争。所以医药是一切民族要发展的，传统医学也决不限于中华民族，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这也是发展研究人体科学的素材。最近有根据说非洲的医药界也开始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收集并传授非洲自己的传统医学了。

6. 营养学。营养问题，也必须从人体科学的角度来加以研究。从前营养学涉及的面很窄，而营养实践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却非常丰富，运⽤人体科学的系统方法来研究它，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发展人体科学，这是把营养学引入人体科学。

7. 中药的范围可以扩大。二百年前，中药里边并没有西洋参。后来华侨在美国发现了它，这才引入到中药里边来。中药的体系也可以扩大，许多东西还可以引入中草药里边去。中草药的范围扩大了，不也开拓了人体科学的视野了吗？

8. 引⽤中西医结合及西医的成果。人体科学从医学的角度还可以再扩大，不单把中药引入到研究中来，也可以把西药引进来。对于西药的作用和疗效不是从西医的角度去解释，⽽是用中医的理论概念解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L. 鲍林(L. Pauling)就提出了所谓正分子医学(Ortho-Molecular Medicine)，是说人之所以生病是由于他体内化学分子的构成失调。这不是人体功能状态的概念吗？

9. 充分利⽤现代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新成果。把现代生物学、生理学的新成就，⽤系统科学人体科学的观点和理论去分析升华，了解人体各种功能态的微观活动结构，做到还原观和整体观的辩证统⼀，把人体科学的研究引向深⼊，知其“当

然”，又能知其“所以然”。

以上我们把特异思维、国外民族医药学、营养学、新的中草药以及西医西药引入人体科学，这就更加开阔了研究人体科学的途径。不光讲是中医的唯象学，人体特异功能的唯象学，而且通过中药的开拓，把中药与西药结成一个体系。至于其它如体育科学，还有第一医学、第二医学、第三医学，以及我又提出了第四医学（开发人的潜力的医学），都可以联系起来，这就是建立人体科学这个大厦的途径。而在这当中，气功科学起着很关键的作用。研究人体科学，几个方面要互相配合，而核心思想是人体巨系统和意识的反馈作用。

今后可以做的工作是非常广的，所以我们人体科学学会是大有前途的。这样搞下去，我认为那一定会导致一场新的科学革命，这场新的科学革命必然会引起一场可以改变世界的技术革命。

可以说，这是一篇人体科学研究的纲领性文献，是前一阶段从耳朵识字以来研究成果的大成总结，是对下一阶段气功特异功能研究的理论指南。如果说气功热在这之前还只是小打小闹地进行，那么在这次讲话之后，气功热潮便如火上加油，呼啸腾空，没有人再能阻挡的了！气功师胆壮了，气功迷更多了，气功团体如雨后郊野的烂漫山花，千红万紫，多不胜数，目不暇接。也有人大惊失色，以为听错了，希望这些话不是出自这位科学家之口。然而最后都印证了，这是事实。并且，他不止十数次地发表支持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的讲话。他赞美气功科学将导致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的到来，认为气功是“高技术中的高技术，是高技术的平方”。后来，他还将这些研究成果汇总成书，并正式出版。这些书有：《创建人体科学》，四川

教育出版社出版；《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8 年出版；《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等。

第三节 人体科学小组及其活动

在人体科学发展史上，还有一个关键不能不提，这就是人体科学小组及其活动。人体科学小组也是在这位科学家的倡导下成立的。

有一位当年人体科学小组的成员申漳在 1998 年出版了一本图书《天感——特异功能与气功探秘》，因此，人们便将他称为“天感派老人”。在书中，申漳专门辟出一章讲述了他参与的人体科学小组的一些活动情况。他作为参与者的讲述应该是较为准确的，本节以下内容便摘引自该书。

先说人体科学小组的两个顾问。这两个顾问一是上文所述的大科学家，二是张××。“在于光远这样权威人物的严厉批判下，如果没有上文所述大科学家等人敢于对抗这种批判，敢于扛起支持的大旗，恐怕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在中国早已夭折了。

“大科学家曾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等职，是世界著名科学家。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历尽千辛万苦从美国回到中国。60 年代他负责主持研制导弹的工作。70 年代和 80 年代他先后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地位最高、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了。人们习惯地尊称他为×老。

“×老不仅是力学专家，而且兴趣极广，知识面也非常宽。

早在40年代，他就涉猎过心灵学方面的书籍。当我国发现耳杂认字等特异功能现象后，他十分关注此项研究的进展情况。从1980年起，他曾在《自然杂志》等刊物发表一系列文章，扶持对特异这个未知领域的研究。他从学科发展角度，提出人体科学的概念。

“×老本人从来不看特异功能表演，也不和任何气功师来往。他相信和支持特异功能研究，不是因为他看表演上了什么功能人的当，或者是受了骗。他除了阅读《自然杂志》、《特异功能研究》等期刊发表的实验报告外，还要求国防科工委直属的航天医学研究所（507所）对张宝胜等人的特异功能现象进行严格的测试和检验。宋孔智等人关于张宝胜抖药片的实验研究，就是在×老的密切关注和支持下进行的。×老相信特异功能，主要来自相信科研人员的实验。他还曾派自己的秘书对张宝胜及有关实验作过严格考察。有这样一个故事。考核人员听说张宝胜有梦中取物的现象后，曾整夜不睡坐在张宝胜床头进行监视，夜里发现张宝胜伸手在空中一抓，就抓到一只苹果，考核人员立刻从张手中拿过这个苹果，张又在空中一抓，又抓出一个苹果，再拿掉，接连几次。

“在支持特异功能研究的队伍中还有一个著名人物是张××。他早期是北京大学学生，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是我国原子弹和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工作的具体组织者。他廉洁奉公，敢于负责，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在国防科工委系统内威信和功劳都少有人能比。70年代和80年代先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后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惯称为张主任。

“由于年龄的原因，80年代中期张××就退休了，他离体后，靠以前的威望影响，担任了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由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演变而来）理事长和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

理事长。人体科学学会是以科研人员为主。气功研究会有相当一批热心气功的离退休老干部和一些气功师。这两个组织都是民间组织，都没有经费来源。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坚守了人体科学阵地，团结了一批科研人员和功能人，支持了一些项目研究。由于得不到政府财力支持，他认为不能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要靠自己解决特异功能和气功研究的经费，他支持气功师看病收费和带功报告等行动，推动了气功商品化的进程。

“在有于光远等反对者批评的形势下，张××将相当大精力用于争取社会的承认。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掀起气功热。凡是特异功能人和气功师，只要能找到他，他都会尽力支持。他支持过严新等许多著名气功师；也曾受过张香玉等气功界败类的蒙骗。气功界的人士说，他的心肠太好，太轻信人了。由于张××等人努力，在中国确实掀起了气功热。气功热和气功商品化过程中，由于民间组织不具有管理职能，不可避免出现许多不良现象，出现假冒伪劣，出现迷信或诈骗行为。这并不是张××的本意，但也不能说与他没有一点关系。在人体科学小组成立后，×老与张××都担任了小组顾问。”

再说人体科学小组的核心人物×××。

“×××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4年毕业生，毕业后考上理论核物理研究生，未学完就调到团中央，在全国学联任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给王震副总理当过秘书。后来在国防科工委任参谋、副科长、副局长、副主任，1985年时任政委。他所以相信和支持特异功能研究，并不是因为仅仅看了一两次张宝胜的表演。他是十分慎重的，对传说从不轻信，总要设法亲自体验一下。他与张××不同。张××离休了，不当官了，作为民间学术组织负责人，无论怎样支持特异功能和气功，实际上都不需得到什么人的批准。×××是现任的高级

干部，一切言行都必须符合党的组织原则，重要问题需向上级请示汇报。特异功能研究具有争议的事情，他想支持，如何支持，需要得到有关上级的批准。气功的社会影响很大，对社会气功活动和宣传若不加管理则乱，如何管理，既需要有人授权，又需要有一定的名义和组织才能实施管理。他联合了中宣部和公安部两位负责人，共同向上层领导写了信，阐述特异功能在科学上的意义，以及在国防和安全方面潜在的可能应用价值，毛遂自荐由他们三人组成小组来负责特异功能研究及其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工作。此信得到了有关负责人的批示和同意，从此有了三人小组。

“三人小组认为，特异功能在国防和安全上可能有其特别的作用，因而确定以张宝胜为代表的特异功能研究要保密。在一定时期内，尤其是对张宝胜，这个规定是有效的。张宝胜在507所，要服从×××的领导。

“1987年时，三人小组扩充为四人小组，增加了国家科委郭副主任，他兼国务院科技办副主任，习惯称为郭主任。郭主任做事很稳重，可是对新生事物又很敏感。那时，经常有人到科技办来汇报改革或科研工作的新进展。可能是在1985年前后，科技办一位同志曾介绍他在清华时的同学顾涵森向郭主任汇报过气功外气的物质性测试研究工作，海军总医院的冯理达教授也汇报过气功研究情况。当时这些汇报没引起他的重视。武汉空军一位同志曾与北京特异功能女青年小俞合作，在武汉作过特异透视诊断癌症实验研究，并将此工作向郭主任汇报，还将小俞领到他家中。小俞对郭主任的夫人范某进行了特异透视体验，指出范某胃有严重问题。范某当时说自己没有胃病，也没感到胃部有任何不适。但是过了一个星期，范某的胃大出血，十分危险幸亏抢救及时。1987年初，507所部分科研人员

给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写信，阐述特异功能研究的重要性，建议将此项研究列入国家高科技发展长远计划，即 863 计划。郭主任指示我（申漳——本书编者注）进行这项调研工作。我将调研情况向郭主任汇报，还写了份颇有倾向性的材料登在内部刊物上。

“当时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和科技办的同志共同制定 863 计划。郭主任对特异功能研究有兴趣的信息传到了三人小组那里。三人小组希望能扩充为四人，增加科委负责人，为此向有关方面写了报告，得到上层批准，科委主任宋健指定郭主任代表科委参加四人小组。

“四人小组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组建了四人小组办公室，作为领导的参谋和工作班子。办公室成员由四个部委领导指定各自部委的工作人员兼职。办公室主任是当时国防科工委科技副秘书长兼，成员有钱老秘书。郭主任指定我（申漳）代表科委参加办公室，当时科委和科技办实质上是一家。办公室日常工作主要由×老秘书和我（申漳）处理。

“二是根据×老的推荐组建了专家组。组长是 507 所所长陈信教授，成员有：北大生物系教授陈守良、清华生物系主任赵南明、首都师大物理系教授林书煌、507 所张宝胜课题组负责人王修璧教授、高能物理所教授陆祖荫等人。

“三是筹到科研费并制定科研计划。我（申漳）写了一个申请科研费的报告，希望在正式列入国家计划之前，能拨少量经费先作探索性研究，有关领导批示后，得到为数不多的科研费。四人小组指示，研究的重点放在现象验证方面，要得到严格的实验报告，作为争取列入国家正式计划的根据。

有了钱后，专家组对科研方针和选题计划进行了认真讨

论。根据专家组意见，1987年底，以四人小组办公室名义，批准了十几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人体科学研究课题计划，并拨了相应经费。每人课题的经费很少，一般不超过3万元，资助强度低于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四是1988年3月，拟定和下发了关于气功宣传的通知。

“五是1988年5月，组织了科研汇报和张宝胜表演，即何祚麻等人所说的张宝胜走麦城一事。”

四人小组后来又变成六人小组。

“1989年，×××从国防科工委调到国家体委任主任；1990年初，郭主任调离国家科委。这期间×××忙于举办亚运会工作，四人小组停止了活动。1990年夏，原四人小组成员又给上层领导写信，鉴于成员工作变动，建议调整和加强人体科学领导小组，制定必要政策，加强科研和管理工作。这封信得到上级的批复，于是在1990年12月成立六人小组，明确组长为×××，成员有卫生部陈部长，国家科委李副主任，以及中宣部等部门负责人共6人组成。

“根据有关领导指示，六人小组任务是指导和协调特异功能、气功活动方面的管理与科研工作；六人小组不是实体机构，只负责组织、协调、联络，各项具体工作靠有关职能部门，采取不定期开会的方式活动，共同研究，分头去办。人体科学的方针仍为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组织一些人搞研究；打击借气功、特异功能之名进行诈骗和迷信活动。

“1991年2月，六人小组开了第一次会议。我（申涛）整理了会议纪要，经领导小组成员审阅修改并报上层批准。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四个加强：加强领导，会同有关部门对特异功能、气功方面的学会、协会、研究院等组织，进行整顿、调整和充实领导机构；加强管理，制定和完善宣传、保密、外事、

医疗各项规定，主要依靠各部委做好职权范围内的管理工作；加强办事机构，由六人小组所在部委指派兼职或专职人员组成联合办公室，根据六人小组指示，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工作，及时了解 and 反映情况；加强科研，科研是小组中心工作，要拟定近期和中长期科研规划，切实解决人体科学研究的一些特殊问题。会议纪要为六人小组工作的方针和依据。六人小组的成员后来又有发展变化，改称人体科学工作组。”

人体科学小组还有过一次较重要的事件是核心人物×××上书。

“×××是国家体委主任。在各项体育工作中，武术与气功有关系，因而他决定将人体科学工作组办公室设在体委武术研究院，将人体科学工作作为武术院工作的一部分，由武术院院长兼任人体科学办公室主任。

“由于复杂的社会背景，没有完全理顺的管理体制，特异功能和气功社会活动的种种特殊性，以及其他原因，人体科学工作四个加强的方针，尤其是加强管理和加强科研工作，贯彻执行得不尽如人意，社会上气功界的假冒伪劣行为没有遭到有力的揭露和打击，香花和毒草并存。1995年5月份起，一些人、有些媒体，采用大批判的方式，给人体科学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天惑》一书原文如此，为了保持原貌，不作修改，特此说明——本书编者注）

“在此情况下，×××并没有退缩。他在上层领导询问有关情况下，上书申诉自己的观点。有关领导认真听取和研究了×××的意见，于10月份制止了不恰当的大批判，于年底重新肯定了人体科学工作。

“1996年初，在人体科学工作组会议上，×××重申了他上书的主要观点，1996年11月出版的《中国人体科学》杂志6卷4期全文发表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可以说，由于×××的上书，由于上层领导的谨慎，人体科学工作又一次转危为安。但是，人体科学发展所必须解决的许多问题，比如在国家科研计划中的“户口”问题等，仍没有解决。人体科学面临的仍是一条漫长、曲折、坎坷不平的道路。”

这就是人体科学小组内部成员所述的小组成立演变经过和其所作的一些工作。实际上，这个小组作为中央高层的一个气功人体科学领导小组，其存在本身对气功热就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按于光远的说法，我们所有的其他学科，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没有过什么中央领导小组，唯独人体科学有领导小组，这本身就不正常。

第九章 严新“大师”兴衰记

在中国气功热潮中，不能不提到严新。他是热潮的中心人物，处于热潮的漩涡。教授气功者被称为“大师”，并逐渐被神化也起始于严新。如果评选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新闻人物，严新肯定是其中之一。这位号称在著名学府取得了全世界首创“高科技”成果的严新，曾经被誉为“现代济公”、“活济公”、“中国超人”。在一些练功人的心目中，严新更是具有一种朦胧的神秘色彩。

曾几何时，严新气功风靡大江南北，由他首创的“带功报告”掀起阵阵的气功热浪，成千上万的人据说在他导引的“气场”之中创造了生命力的奇迹。于是，几十元一张的“严新带功报告”门票被炒到几百元。一些人甚至以靠倒卖严新报告门票而发财。有人曾半开玩笑地说，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外，在公开场合，群众对任何名人的狂热崇拜程度，没有超过严新的。

第一节 一鸣惊人

严新是四川省江油县人。他从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大学生奇迹般地成为轰动国内外的“现代济公”的过程，其实是很简单的。

严新 1977 年从成都中医学院毕业时，恰逢文革期间被禁锢的气功得以复出，社会上公开出现又一次群众性学练气功高

潮，严新自然也进入了这个潮流中。1978年后，上海顾涵森用自己改装的仪器测试气功，在《自然》杂志连篇发表文章，声称她测出气功师能发出有物质基础的外气，从而引发全国范围内声称能放外气给人治病的气功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波澜壮阔”局面，严新也首当其冲成为“春笋”之一。据说他还是80年代一个大红入海灯法师的入门弟子。

然而，那时的严新还没有什么名气。后来，严新调转到重庆中医研究所从事临床工作时，用发放“外气”的方法治好了几个病人，1984年，四川的一个工人日报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报导，使严新在小范围内有了一些知名度。由于这份工人日报的作用，1985年以来，《体育爱好者》杂志、《气功与科学》杂志也先后报导了严新，引发全国各地更多的人向严新求医。其中，北京有关人员提出请严新给“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疗晚期癌症。

开始，严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护人员通过先进而周密的治疗使病情缓解的结果说成是自己外气治疗的功劳。进而，当患者病情恶化时，严新则归罪于医学专家对他的蔑视，并通过报导宣扬“想来邓稼先之病当有治愈希望……可是天下之事难以一一预料，更难以全部称心如愿。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邓稼先病情出现反复，抢救无效，终于7月29日下午1时50分与世长辞。”

就是这个过程，但是后来在一些人的笔下，就完全不同了。在一本由新华社记者明真著的《当代科学新天地》书中写到这个情节：“6月27日晚11时，严新到了邓稼先的病房。严新仅仅站了三分钟，没用任何药物，没有直接接触病人，病人的剧痛霎时止住。10分钟后，病人要求站起来。两天后，这位科学家能下床走路。这位科学家经严新力挽垂危，赢得了延

长一个多月生命的时间。”

严新在给邓稼先的治疗上没能为自己捞着分，但是他这次北京之行却得到了意外的三个收获，从而为他成名一举奠定了基础。

一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接纳了他，并安排严新作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访日友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访问日本。

二是清华大学陆祖荫、李升平将严新请到清华大学分别在生物系、化学系等地搞所谓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实验，从而使严新有了到处与清华大学相并提的资本。

三是在科技界知识界颇有影响的《光明日报》，分别于1986年11月18日和1987年1月24日发出两篇宣传严新用其神功异能治病和与清华大学人员合作用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报导。这两篇报导，前一篇是严新的事迹第一次在全国最权威的报纸上披露，这是严新的热的一个起点。后一篇报导则更是一下子轰动了国内外，并引起更多记者纷纷采访严新，将严新越炒越热，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光明日报》1986年11月18日的报导标题是：《怀揣着求医者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北上——中医师严新千里迢迢找病人，他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沿途为不少人治好病》。1987年1月24日头版发表《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观察发现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治病的原因这项发现表明我们气功研究由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文章原文如下：

气功师发放外气可以治病，也可促进植物的生长，为什么？这个谜底，我国科技工作者正在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手段

去揭开。北京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采用双盲试验，观察高级气功医师严新发功后的“信息水”的变化，发现外气能使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一些物质的分子结构发生变化，初步揭示气功的机理，即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治病的原因所在。这项研究工作，使我国气功研究由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

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在**高能物理和生物物理教授陆祖荫的指导下，从1981年开始研究气功外气的作用。1984年以前主要是应用微波实验装置及热象仪等对气功表象进行测试工作。1985年他们开始用有机物液晶进行试验，发现气功师发放外气可使液晶的两个折射点一个变暗，一个变亮。这一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因为人体的细胞壁都是类似液晶的高分子物质，说明外气可以对细胞层次起作用。外气能否对生物分子起作用呢？大胆的设想，使他们迈出了探索的新的一步。

重庆市中医研究所医师、高级气功师严新治病的神奇疗效，使气功科研协作组产生极大的兴趣，决定请他发功进行试验。从1986年12月至今年1月中旬，先后在不同地点、不同距离，进行了七次试验，均获得预期效果。他们将装有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自来水、生理盐水、葡萄糖水、麦迪霉素等的密封瓶子，放在一个密闭的黑屋子里，当严新分别在近距离及远距离遥控发功时，观察到自来水的激光拉曼图的水的特征峰之间，出现一个巨大的未知峰，变成了另外一种结构的水。生理盐水、麦迪霉素等也发生了类似的显著变化。

这个协作组的一位负责人、催化研究室讲师李升平，在向记者解释他们观察到的以上现象时说：我们对具有生理效应的物质进行的初步试验，说明气功发放的外气对构成细胞的物质发生了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实验研究，不仅有利于在分子水平上阐明气对生物的效应，而且对子现代

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基础研究都将具有很大意义。

以上报道如果内容真实，那将是科学发展史上非同小可的重大突破！对此一爆炸性新闻，各大报纷纷加以转发。1987年1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了与上同样内容的报道；1月26日，英文版《中国日报》报道：清华大学对气功外气的研究已由细胞水平进入了分子水平。这样，严新外气实验在海外也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接着，在199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李升平同严新再一次作气功科学实验，这次严新远距实验室发放外气，使生物实验室里的化学样品发生变化，实验再次大获成功。这一轰动性的实验还惊动中央，2月，一位领导接见代表。在接见中，他说：“气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这不是什么既不反对也不要宣传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宣传，以便促进这项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此后，严新人气急剧上升，成为气功界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到处都有人请他作带功报告，作实验。他一时忙得不可开交。3月31日，严新在辽宁电子研究所作带功报告，听众数千人；4月1日，严新在辽宁省委礼堂作带功报告，听众数千人，礼堂外也挤满人；4月15日，严新在辽宁省体育馆作带功报告，听众达万人，许多听众是政界、军界要人。……5月15日，据严新向外界透露，辽宁方面邀请他做气功扑灭大兴安岭火灾的实验；7月，严新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作带功报告。后来，严新还在中科院高能所、北大、清华做了“数百次”气功外气实验，仅在清华，据称就做了“两百多次”。一直到1995年，严新还在继续从美国发外气与清华大学合作做实验。

1987年9月4日，《光明日报》再次报道严新气功实验，

报道标题为《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首次发现气功外气能影响核酸分子结构，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报道全文共 1500 多字，文章说，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发挥大学学科多、学术水平较高的优势，从分子水平上研究气功外气作用的影响，从 1986 年 12 月到 1997 年 3 月，利用业余时间对严新医师的气功外气效应进行数十次实验，他们的工作表明，气功有着极为丰富和深奥的内涵，中国科技工作者有必要花大力气进行深入研究，以还其人体科学的本来面目。

9 月，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把与严新气功外气的 6 篇实验结果论文提交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那位著名科学家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批示：

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第二节 清华外气实验辨真伪

1988 年严新神采奕奕地第一次来到了香港。他作了长篇的带功报告，回答了一大串记者的各种提问，也作了几项表演。这一切，使小香港热闹倍增。接着，严新所作的一系列实验报告，也在香港《明报》全文连载，这些报告包括：

1. 《外气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原载《中华气功》1987 年第 3 期，作者为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
2. 《气功外气对某些物质的结构和性质影响的观测》（原载《生物物理学报》1987 年 3 月第 3 卷第 1 期，作者为陆祖荫、赵南明、李升平、郑昌学、严新）。

3. 《气功外气对激光偏振面的影响》（原载《东方气功》1987年第2期，作者为陆祖荫、晏思贤、李升平、严新）。

4. 《气功外气能影响核酸分子结构——证明人体可不接触物质面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原载《光明日报》1987年9月4日，作者为光明日报社一记者）。

5. 《气功作用下的人体耐电能力》（原载《瑰宝之光》，工人出版社，作者为李国金、周家智）。

6. 《激光拉曼仪对“气水”结构的测试》（原载《气功》1987年第6期，作者为李升平、陆祖荫、严新）。

这些报告的发表，很快引起正反两方面的反响。一方认为是新兴科学，值得探索和研究，造福人类；一方则认为是伪科学、谎言，是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应视为妖孽痛加批判。事隔不久，1988年秋，严新又一次来港，打算一步宣传气功科学的价值。然而严新预料不及，这一次香港科技界的名流人士都调动起来了，组成了阵容庞大的气功和特异功能考察团。国际化学界知名人士香港中国大学化学博士甘巨廷首当其冲站出来讨伐他。甘博士认为中国出了个严新真是无法解释的悲哀。他写出了评价《严新报告》的文章，发表在《大公报》上。他狠狠痛批了严新，指出严新对科学还很无知；他的“外气”，只是一种“傻气”。甘巨廷是一位知名的化学博士，他认为这六篇论文无从证明真伪，甚至无可判断他们是否作过试验。即便这些试验都真实无误，也只能证明严新是“神”，是“活佛”而不能证明“气功的气有物质性和特异功能”。甘巨廷接受了许多次的记者采访，不厌其烦。他风趣地对一记者说：如果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把这些成果公布于世，我国的千万个物理科学工作者都要跳入黄河浸洗五十年，才能去此耻辱！

在香港大论战中，直接写文章涉足的各界人士达700余

人，文章计 2000 余篇。香港的气功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变成了讨伐气功和特异功能热。这种热来得突然，香港装不下，又以爆炸的速度反射到大陆。

在大陆第一个站出来向严新挑战的，是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气功研究室主任张洪林。

张洪林生于中医世家，早年随父学中医，后考入吉林医科大学医疗系学西医。毕业后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又作为第一届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针灸和气功，获医学硕士学位，后又在职攻读了医学博士学位。张洪林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主任职务，气功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除领导气功研究室的气功实验室研究、理论文献研究、临床治疗工作、气功教学工作外，还参与气功发展史上首届及以后各届气功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任务。作为课题组长和主要参加者，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资助的气功科研课题，并多次在国家一级刊物和美国、日本科学杂志发表论文。

张洪林是医生，又在国家级气功研究部门工作，这决定了他对气功“外气”不能不予以高度关注。当“外气”一词在报刊上出现时，他十分重视，也深被震惊。他想，如果这是真的，真应当算人类科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发现；如果是假的，或者是骗局，其荒唐的程度和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张洪林做了大量试验，对各种外气报道文章进行了分析，肯定“外气”其实不存在。所谓“外气”治病，其实是心理暗示的结果。他一次次告诫“外气”迷，不要再自欺欺人，要从外气迷雾中迅速走脱，否则气功将走向伪科学，钻进死胡同。他向人们宣讲这样一个事实：临床及心理学实验证明，暗示具有惊人的

作用。

然而，在“外气”强大阵营包围下，张洪林显得很弱小。但他不气馁，不妥协，继续不停地向“外气”学说发难。当严新的外气实验公开后，张洪林决定对其提出挑战。

为了真正弄清楚严新清华大学实验的真相，1988年12月3日，张洪林第一次约同《健康报》陈浩、王国辰二记者一起去清华大学科研处、生物系、化学系调查采访。采访结果让他们大吃了一惊。

三个部门的接待人员分别向他们介绍了以下情况：陆祖荫、李升平和严新所做的实验未经清华大学科研处和大学审查批准，就以清华大学的名义发表文章的作法是错误的，他们的行为不代表清华大学。严新实验有时有变化，有时没有变化，作为科学结论还为时过早。实验没有恒温，方法学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根据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张洪林给《健康报》写了一篇评论外气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应《健康报》中医版刘燕玲副主任之约写的，刘主任希望通过他的不同观点的文章，能引起一场对“外气”的争鸣讨论。他在文章中，除较详细地论述外气形式治病有效的原因是心理暗示外，还格外介绍了他们亲赴清华大学调查的严新实验内幕。这篇文章《健康报》是1989年1月28日刊登的。然而有关严新实验的内容被删除了。然而，同一版面与他不同观点的文章中，肯定严新实验的内容却发了出来。

经询问有关人员得知，是报社领导担心与清华大学引发纠纷。此后，1989年2月25日《健康报》又刊登作者屈占魁的文章，张洪林的姓名出现在文章的题目上——《就气功外气问题与张洪林商榷》。文中写道：“如何看待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

作组的几组实验报告……对实验有怀疑是允许的，允许提出质疑，但不能不讲一点道理就不承认，更不能因为自己没亲眼看见就不相信……如果实验是真实的，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针对这些情况，张洪林非常着急，他认为这不仅使严新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内幕不能及时面世，而且影响他的声誉。为此，他给《健康报》白筠总编写了一封信，讲述事情的经过和他的想法，并亲自送给她。

白筠总编在认真地听了他的陈述，看了写给她的信后，对他说：“几次没有发出您文章中有关严新在清华大学的内容，不是怕引起纠纷，而是我们报社没有直接掌握严新在清华大学做实验的实际情况。毕竟这是涉及著名学府的事情，以及这是一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事情。我们打算再派记者正式去清华大学采访，如果采访的结果进一步证实您文章中的观点，我们立即将您的文章发出去。”

白总编当即安排中医部刘燕玲主任与清华大学科研处联系，约好时间，带几位记者前去采访。

清华大学科研处张宏涛处长接到刘燕玲主任的电话后，立即向大学领导汇报《健康报》记者将来采访严新实验之事。学校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意识到现在是到了学校必须讲话的时候了，并为此专门召开了校务会，统一了口径，并安排由科研处张宏涛处长代表清华大学出面接待来访的记者。在采访时，张洪林与《健康报》记者一起参加了会见。张宏涛处长向他们介绍了很多的情况。此外，他们还采访了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赵南明教授和化学系主任宋心琦教授。这些采访除了证实了前一次采访的真实性外，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刘燕玲主任在取得第一手资料，证实了先前调查内容的真实性后，立即向白筠总编汇报情况。《健康报》先于1989年3

月 11 日发出张洪林写的含有揭露严新实验内容的文章。接着，根据张宏涛处长写的内容进行整理，于 1989 年 4 月 13 日《健康报》头版发出消息如下：

本报讯（记者刘燕玲 王国辰）以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名义发表的《气功外气对 2000 公里超距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等文章，在海内外造成很大反响。清华大学科研处最近郑重声明，这些研究与清华大学无关，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项成果。

科研处处长张宏涛副教授说，气功研究不同于群众性健身活动，需要以严肃、严谨、扎实的态度去实验、探索。国家科委明确规定，科研成果必须经过成果鉴定及成果登记。而《气功外气对 2000 公里超距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既没有提出过鉴定申请，也没有组织过专家评审、测试测定，更未经过成果登记。

当提到在多篇报导中出现的清华大学的一些气功研究机构时，张宏涛说，我校并未成立所谓 7 个系和部门组成的气功科研协作组，也从未批准成立过“气功研究所”，而我校工会组织的气功协会只负责开展群众性气功健身活动，不是科研组织。另外，今年某报刊登一则清华大学东方健美研究中心气功减肥的消息，消息中说“清华大学有关科研人员对此进行了严格的临床观察和科学研究，证明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效减肥手段”。张宏涛强调，东方健美研究中心不是清华大学研究单位，也没有专家对气功减肥的方法进行过评价或鉴定。

在与张宏涛处长的谈话中，张洪林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学校的生物系和化学系有学校拨款的气功科研项目，严新的实验也是在这两个系做的，并且严新、陆祖荫、李升平等

又将实验结果在社会上宣传的神乎其神，那么，本着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学校应该主动对严新所做实验进行严格的科研审查鉴定，并将结果公诸于社会才好。”张宏涛处长表示此话有理。

由于后来很长时间再没有见到清华大学对实验进行审查鉴定的消息，张洪林决定再次向清华大学提出挑战，于1989年8月20日在《中国体育报》（第三版）发表了一篇敦促性的文章：《清华大学科研处应进一步澄清事实》。

面对清华大学的声明、赵南明主任和宋心琦主任的表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各界对严新现象的评论，严新、李升平和陆祖荫等制造科学奇迹的人们如热锅上的蚂蚁，采取各种方式为自己进行辩解。

他们连忙组织，写了一个辨诬的材料《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分部）与严新医生协作进行气功科研是属实的》。材料中称，“自1985年起，经上级有关领导批准，我校气功科研正式列为学校科研项目，并拨款进行实验，其中，在校科研处主项编号为I0458403及0448714，共拨款肆万元；另获校理学院科研经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人体科学基金计贰万伍仟元。为综合研究气功，气功科研课题组曾有生物系、物理系、化学系、无线电系、热能系、哲学教研组、校医院等多个部门的有关教研人员。……”

在他们的极力活动下，由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给各新闻机构写了一封推荐信，希望能将这个材料公布出去。推荐信如下：

我看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分部）写的材料，觉得情况属实，对于澄清事实真相是有益的，对于继续开展气功科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特别是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的良好风气将起很大的作用，建议报刊杂志予以刊载，是所至盼！

张××

1989年12月25日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不可辩驳的事实，使他们的辩解欲盖弥彰，越抹越黑。1989年展开的对严新等人制造出来的“科学实验”内幕的揭露，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由于伪气功已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势力，他们联合起来，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明为保严新，实为保自己的辩解和较量。因此，具有代表意义的比较典型的“严新现象”并未得到彻底的揭露。

第三节 众志成城破严新

在六年以后的1995年，科学家们以群体行动的方式，又掀起了一次揭破严新的高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科学意识也不断增强，尤其是以何祚庥为首的一批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有名气的科学家们，面对猖獗泛滥的伪气功等伪科学，不怕攻击、谩骂和威胁，挺身而出，又一次使反击伪科学的大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给了伪气功等伪科学以更加沉重的打击，产生了积极的更有成效的社会影响。

在这次斗争中，《工人日报》在组织何祚庥等科学家座谈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连续以大版面发表揭批伪气功等伪科学的文章，下面就是《工人日报》1995年7月26日刊载的一组科学家专门揭露严新实验的文章的标题。

《工人日报》首先在1995年7月26日的报纸头版头条发

布消息，标题是：《在本报座谈会上科学家就伪科学污染著名学府院所发表呼吁：科学殿堂不容玷污，与会专家指出严新“气功科学实验”不真实》同时在头版刊登评论员文章《坚决反对伪科学》。

同日《工人日报》第五版《科技大观》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六位科学家揭露严新的文章。栏目通栏标题《科学岂能如此信口开河——科学家对严新“气功科学实验”提出质疑》

六位科学家的文章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写的《评一组甚不科学的“气功外气影响物质性质的科学实验”》；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教研室教授霍宏暹写的《严新在北大的气功表演不具科学性》；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王蕴玉写的《对“气功外气作用于原子核并引起放射源衰率改变”的质疑》；

北京大学物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高崇寿教授写的《气功能够远距离传送吗？》；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郭海写的《一次没有被证实的气功碎石实验》；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宋心琦写的《科学实验要遵循一般原则》。

《工人日报》还于1995年8月9日头版发表记者赵燕、王金海和朱海燕分别采访清华大学原科研处长张宏涛及原大学校长张效文的报导。

采访张宏涛教授的标题是：《张宏涛重申五年前声明：严新“科学实验”与清华无关》。采访张效文教授的标题为：《清华大学原校长张效文披露：严新曾在清华露马脚》。在这个报道中，张效文校长披露了严新在清华露马脚的经过：“那是

1987年，清华有位教授找到他，说严新想当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对这个要求他很不同意，但无奈这位教授再三推荐，只好拿出一张表让严新填。等聘书写好后，张效文对严新说，听说你能意念移物，我的图章在保险柜里，如果你能把章移出来，我就把聘书发给你。严新听罢只得悻悻而去。”

就在严新神话遭到揭穿之际，另一些气功“大师”张宝胜、张香玉、陈林峰也在不同场合遭到相似的重创。

第十章 气功“超人”走麦城

第一节 兰迪中国行

关于特异功能研究一直存在十分尖锐、激烈的对立意见。以于光远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是魔术，是伪科学。以×老、×××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是未知的科学研究新领域，有可能导致新的科学革命。科委郭主任参加四人小组更激化了这一矛盾。

在科委内部，对气功外气也有持不同观点的两种人，一种是以郭主任为代表的支持者，另一种是以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和党组成员、秘书长兼《科技日报》社社长林自新为代表的反对者。1988年3月，林自新邀请了美国“超自然现象科学考察委员会”来中国调查特异功能的真伪。这个团的主要成员是魔术师兰迪。此兰迪在西方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对一些特异功能人来讲，不啻于钟馗式人物。

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兰迪，自幼聪明伶俐。读书时，兰迪常常跑到多伦多市的阿丽克莎剧院看魔术表演，这使他获益不少。17岁时，兰迪参加了一个游艺表演团到各地巡回演出，诸如意念悬浮物体等节目是他的拿手好戏。中学毕业以后，他来到加拿大的夜总会，以表演他的“魔鬼的幻术”作为职业，并很快轰动了加拿大。一天晚上，夜总会的节目刚刚结束，一位警察想考考兰迪的功夫，便带他来到戒备森严的监

狱，看他能否逃跑。于是，当迪轻松逃走之后的第二天，报纸上登载了题为《非凡的兰迪从监狱逃走》的文章。兰迪用“魔鬼的幻术”树立了自己的声望。正当人们都在为兰迪“特异功能”如痴如迷的时候，兰迪自己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表演的不过是魔术，是假的。他关注着“特异功能”世界的一举一动。

那些年，“特异功能”现象经常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那些自称有特异能的人常常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70年代，以色列特异功能人尤里·盖勒一时名噪欧美，当兰迪看了尤里·盖勒的表演以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能重复盖勒的绝技。”当时，许多科学家和记者都不相信兰迪。他寻找电视制片人和报纸编辑的支持，以证实他能重演盖勒的“绝技”。数十日后，尤里·盖勒终于露馅、失败了，这致使盖勒的声誉扫地，而兰迪的主张却得了进一步的验证和巩固。

曾有一个报告称，在圣路易斯的一个实验室发现了两名具有“特异功能”的小男孩，他们能用意念在未曝光的电影胶片上引起成像，能用意念使关闭的书翻书。当兰迪了解他们以后，认为他们最多不过是业余魔术的水平。有一天，兰迪在一本关闭的书周围喷洒了当许聚丙烯塑料——一种非常轻塑料，然后他要求表演者重复他们的意念翻书，人们才发现，“神童”是利用嘴唇发出的微气流才使书页翻动，那些四处飞扬的聚丙烯塑料揭开了他们表演的秘密。

兰迪是个揭露和摧毁超常能力的民间执法人。无论到哪儿，他都身带着一张一万美金的私人支票并附有几份由公证人签署的声明。声明的开头写道：“无论何人只要能证明自己的超常能力，我就付给他一笔一万美金的款子。”结尾写道：“这

笔款子任何人都能领取，种族、年龄、国籍不限……”

兰迪带着这张打赌的支票去测试别人已近 20 年之久，但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它。他曾测试过一批自称用意念力量能使调羹弯曲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心灵感应者，没有一个人能在实验的条件下做出令人惊异的事。

兰迪使许多具有“神功仙术”的人害怕，称兰迪为“魔鬼”。尽管兰迪遭到过攻击，但他仍坚称：“没有任何威胁能使我放弃我选择的职业。”

1976 年，兰迪参与创建了“超自然现象科学考察委员会”，该组织的成员多是各国科学界知名人士，包括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该组织的任务是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异常现象，诸如特异功能、飞碟、百慕大三角之谜、幽灵显圣……进行科学考察。

林自新曾经任过国家科委情报所所长，信息灵通，在出资邀请兰迪访华之前，对兰迪所用的手法和取得的效果了解得很清楚，他预料到兰迪在中国会像在美国一样成功。他认为兰迪是打遍美国无敌手，同样也会打遍中国无敌手。在许多行业引进国外高科技的同时，林自新引进美国高级魔术师向中国的特异功能宣战。

1988 年 3 月 21 日，考察团一行 6 人应《科技日报》之邀抵达北京。这 6 个人是：哲学家库尔茨，是“超自然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主要发起人，并且是该委员会的主席，著名无神论者，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团员詹姆斯·兰迪，美国著名魔术师；美国《探索者》杂志主编肯特列·弗莱希尔；心理学家詹姆斯·阿尔考克；专门研究“不明飞行物”的科学作家菲利浦·科拉斯；调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卡尔。

6 位客人到达北京的那天是星期六，星期天无安排活动，

便到《科技日报》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林自新家作客。林总编请客人们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录像。就是在那年春节晚会上，一个会“轻功”的大师大出风头：纸上悬人，纸环挂人，人踩在气球上……这些节目很精彩，使人感到：神奇的功法，竟然改变了万有引力的科学定义！客人们认真地观看。忽然，魔术师兰迪叫林总编把录像停下来，再重放一遍。这次兰迪看清楚了，对林总编说：“注意，这里是经过剪接的。”他说，主持人一共拿来三只气球，两只黄色的，一只红色的。为检验气球的真假，请歌唱家踩破了一只黄色的，可是是气功师表演时，脚下仍然是两只黄色的！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事后的一天，林自新偶然遇到了主持春节晚会的姜昆，问起踩气球的事，姜昆证实，气功师表演时，的确踩破了好几只气球。

第二天，在科技情报所礼堂举行的报告会上，兰迪从力学角度和纸张的性能方面分析了纸上悬人、纸环吊人的原理。据这位魔术师说，他小时候就玩过这把戏。他说，纸张能承受的剪切力很小，但能承受很大的拉力；两个人拉一张钞票是拉不断的。因此纸上悬人和纸环吊人属于技巧性的表演，并不是什么超自然功能。后来北京的一杂技演员私下试验纸环吊人，成功了。兰迪还表演了一些看似超常功能、实是魔术的节目，诸如意念拨表、意念致动之类。这时台下有人喊了句什么，那意思大约是“你这两下子没什么了不起”，兰迪礼貌地请喊的人上台来，却连一个站起来的也没有。兰迪说他怀揣着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谁要能在他面前成功地表演出超自然功能，他就把这一万美元输给对方，条件是必须按他设计的方案表演。事后气功界的一位知情人说，许多气功大师和特异功能大师就坐在台下，但他们却坚决不出来应战，理由是：“不能让外国人

把我们的底摸了去！”

会上，还放了兰迪的一段录像，是他表演的“外科手术”，不用手术刀，就能切开患者的腹部，取出病变的内脏。兰迪的这个表演并非无的放矢：亚洲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有一种“神奇的外科手术”，不用手术刀即可取出病变的内脏，术后不留任何痕迹。美国几个医生专程前往，揭开了秘密：那是用“障眼法”掩护下的骗术。兰迪说，他所使用的道具只需一美元就可买到。

报告会后，外国客人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活动。在京的第一个考察活动是在中医学院进行的。一个名叫刘×的年轻女气功师称，她能发功令人身体晃动。站成一排的两位外宾和三位中国人接受实验，气功师“发气”约15分钟，受试者毫无反应。这个学院有个李姓的气功师。《人民日报》1988年2月6日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说，他在法国远距离（约10米）发功推拿和隔墙发功引导的绝技，使旁观者目瞪口呆。

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女病人，躺在带轮子的病床上被推进了一间教室。她姓曲，据说患腰椎间盘突出多年，经李用气功治疗后效果显著。气功师站在离她三四米远的地方，像打太极拳似地向她发功。躺在病榻上的女患者随着气功师的手势，身躯作大幅度摇动、扭动和抖动，约十分钟。看来气功师真发出了一种什么物质，导致了女患者的激烈反应。

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提出，由任何一位外宾或陪同的中方人员接受李气功师的发功，可以么？

李气功师不同意。

代表团问：“如果气功师和病人分隔开，行不行？”

回答说：可以！

随后，双方商定测试方案，将病人和气功师分开，各在一

个教室，玻璃窗用报纸等遮掩上，防止有人传递信息。六个外国人和陪同的中国人也分开，几个陪着气功师、几个陪着病人。双方约定：每隔三分钟抛一次硬币，正面，气功师发功，背面，气功师不要发功。病人那边，则嘱咐病人：接到气功师的功，你就动；没有接到气功师，你就不要动。同时，记录下病人的反应情况。实验开始了，抛硬币。正面，好，请你发功！……背面，好，请停止发功！实验进行了30分钟，气功师时而发功时而停止，其中有四次抛硬币均为背面，就是说有连续12分钟的时间气功师没有发功，而女病人那边呢？却一直在动！

代表团由此得出结论：“病人的反应跟气功的发气，没有相关的联系。”但是中医学院一位女负责人拒绝在实验结果上签字。她说：“西方的形而上学方法，不适合用来检测我国的气功。”

代表团还测试了一对声称有“遥测功能”的邵姓兄妹。哥哥是中医学院教员，当时40岁；妹妹23岁，兄妹二人来到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自愿接受测试。他们出示了一份《莱茵邮报》，上面报道了哥哥在前联邦德国办气功训练班的消息，并说，一位意籍华人教授在测试后肯定妹妹气功透视功能极强。

按照要求，外宾先把亲属的姓名、关系、身体状况写在纸上。妹妹遥测后说：“兰迪的母亲有肝病和风湿性关节炎，长得不漂亮但心地善良，此时正在同别人谈话，兰迪的妹妹无大病，只是精神不好，总感觉自己有病却又查不出来；库尔茨的女儿怀孕三个月，因而胃口不太好，睡眠也不好。

翻开事先写的“谜底”：兰迪母亲已经去世两年，妹妹患乳腺癌；库尔茨的女儿患糖尿病。

兰迪还出了一道测试题：“去年10月我曾严重受伤，现在正在恢复中。这一点代表团成员都知道。请邵小姐诊断一下我的伤在何处。”妹妹在其兄的气功引导下对兰迪进行透视，确认兰迪伤在颈部。而代团成员事先写的是：伤在腰部。

遥测和透视全部失败了。库尔茨说：“他们兄妹这样无根据地为人诊病，对社会是有害的，是很危险的。”

在北京饭店，还想测试一下两个有“特异功能”的孩子，据说他们能用耳朵认字。一沓普通牛皮纸信封已经封好，里面装着写有汉字的纸条，然后像洗扑克牌一样打乱次序，连制作信封的人也分辨不出哪个信封里装的是什么字了。

然而代表团左等右等，等来的是两个电话，两个孩子都不来了。

西安有位记者，辞职后成立了一个“特异功能应用协会”，找了几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据说经过不知是训练还是诱导，都出现了“特异功能”，可以非感官认字，还能“意念折枝”，即用“意念”折断火柴盒里的火柴，或者用“意念”使折断的火柴复原。代表团到西安后，访问了“特异功能应用协会”，由这个“协会”组织了三次用意念连接和折断火柴（牙签）的试验。

3月30日下午，代表团制作了“试样”：将几个火柴盒用普通信纸所好，外面再用透明胶带粘牢。里面分别装有完整的和折成数段的火柴。一个姓杨的11岁的女孩表演“意念”折断完整火柴；一个姓高的11岁女孩表演用“意念”把断成截的火柴连接复原。经过一个半小时后，杨说她没有成功；高说她接上了一小截。检查结果，两盒子里的火柴都原样没变。

第二天上午，试验继续进行。由11岁的吉姓女孩和高表演“意念折牙签”，姓高的女孩表演用意念将断成三截的牙签

复原。牙签也是放在用胶带和信纸密封起来的火柴盒里。40分钟后，吉说可能成功了，高和宫说身体不舒服，没做成功。检查结果，三人均未成功。

在上述试验失败后，代表团请协会的负责人——即那位记者按他们平时的条件、方法再做一次试验，那位记者制作4个试验盒，分别交给吉、高、宫三个女孩和一个姓林的男孩，让他们带到院子里去玩儿。一小时后四个孩子回来，都说没做成功。代表团表示下午要去西安的名胜古迹去逛逛，同意孩子们将试样带走，下午继续试验。

晚上，代表团游览完大雁塔、华清池后回到了饭店，9点钟，那位记者也带着几个孩子和三个试盒来到饭店，说这三个均已成功；还有一个盒子被别的孩子弄坏了。

代表团用放大镜逐一观察每个试盒，发现A、B两盒密封完好，打开来看，A盒中原折成六段的绿火柴和B盒中一根完整的绿头火些均保持原状，没有变化，说明试验没能成功。当检查C盒时，发现外层胶带已断成几截，胶带下面粘有划屑和头发等污物，写在包装纸上的“C”字笔划也发生断列——说明这个盒子被拆开过。打开C盒后，库尔茨说：“今晚有两个奇迹发生：一是断成六截的火柴变成了完整的一根；一是原来的绿头火柴变成了红头火柴！”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实验结果是不真实的。

代表团还测试了这个“特异功能应用协会”两个据说有超常视力的孩子，即把两个装有字条的信封放在两个孩子的前面，半小时后，两个孩子相继把认出的字写在纸上，与信封里的字一对照，一个孩子把信封中的“雷”认成“友好”；一个孩子把“推”认成了“人”。代表团还访问了位于西安的陕西气功协会，在那认识了一对有透视功能的赵姓姐妹。姐姐当时

23岁，妹妹21岁。客人们被告知，这对能透视人体内部情况的姐妹，曾给几千人透视过，其中还有中央领导，准确程度超过了X光。代表团表示很感兴趣，问能不能透视其一特定部位。回答说当然可以。客人们说，那么好吧，请看看我们六个人的阑尾和扁桃体还在不在。

透视之前，代表团成员照例写好了各自的情况放在一边。开始透视了。姐妹两个站在十几米远的地方，姐姐发功，妹妹透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透视结果出来了：一个阑尾看不清，一个的扁桃体看不清，其余或有或无，写下了10个数据。

代表团拿出事先写的情况一对照，对错各占50%。客人们说这个结果符合掷硬币的概率，不能说明这对姐妹有特殊的功能。

代表团访问的最后一站是上海。在上海中医学院的气功研究所，兰迪给年轻的中国所长表演他的一项“特异功能”：他可以用“意念”控制自己的脉搏，想让它强就强，想让它弱就弱，甚至还能让它停止不跳！中国的所长表示难以置信，可他又对兰迪脉搏的真实变化感到大惑不解。兰迪笑笑说：“随便找个小孩子来，我几分钟就可以教会他！”兰迪这一“绝招”几年后被一中国学者识破了，他就是中国中医研究气功研究室的主任张洪林，1992年他访美时与兰迪相见并识破其机关。

兰迪在北京时，有人对他说起，中国某地方领导人，让有“特异功能”者在地图上找矿的事情。兰迪说，轻信“特异功能”是当今的世界性现象。对“特异功能”的真实性，只要用一些简单的办法即可证实。比如找矿，可以用几个易拉罐，分别装上不同的矿物，让有“特异功能”者辨认一下，罐里分别装的是何种矿物。

代表团在中国活动了两周。这些外国人的到来，给中国带

来一股冲击波，有人说好，有人激烈反对，有人甚至说外国人是来摸我们的底、窃取我们关于“特异功能”研究开发的情报来了；说兰迪本人，就是伪装成魔术师的“特异功能大师”！

代表团离开中国以后，在外发表了对中国气功和所谓“特异功能”不利的谈话。1988年8月12日的《参考消息》上刊载了这样一条新闻；《英报说在中国气功又吃香了》，副标题是：《专门赴华调查的美国科学家却表示不那么相信》。文章说，中国对“特异功能”的兴趣已经风靡全国。在这段消息的最后，提到了美国的这个访华团：“今年早些时候，抵达北京对中国气功专家和对超自然力量敏感的人进行调查的美国科学家们，对他们在这里发现的情况不那么相信；对超自然说法进行科学调查委员会主席保罗·库尔茨说，他们所有的试验都失败了。”

此次活动被中国特异功能界人士称为邀请洋枪队缴灭中国人。

第二节 何祚庥力克张宝胜

面对林自新邀请洋人揭露特异功能的挑战，×××定下应付的对策是张宝胜的功能属于保密范围，不能让美国人将中国特异功能的“底”摸走，不许张宝胜与美国人接触，但允许低层次的功能人与美国人接触，不干涉美国人在中国的调查活动。张宝胜是个神秘人物，虽然很有名，但从未在公众面前正式露过面，他的功能和研究情况曾被定为绝密。

兰迪访华活动和其调查报告，引起从事外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的许多人的异议。一些人说，人体科学实验研究和魔术有本质的区别，魔术有三个特点：一靠手疾眼快；二靠道具；三

靠助手或托儿。实验是科研人员精心设计，根本就没有托儿，也没有魔术师的道具。功能人再眼疾手快也不可能逃脱摄像或仪器的监测，不可能偷换具有唯一性、不可逆性等特征的试样。他们还说，不许宣传特异功能，为什么允许宣传外国人否定中国的特异功能，他们要求有机会说明科研工作的真实情况，说明科研与魔术的区别。

在人体科学四人小组的一次会议上，申漳介绍了兰迪访华活动情况，并反映了科研人员意见，建议召开一次人体科研汇报会和表演会，由张宝胜来作实验与表演。邀请反对者出席，不仅给科研人员说明真相的机会，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兰迪访华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四人小组同意召开这样一次会，准备邀请于光远、吴明瑜、林自新、何祚麻等人出席。×××还讲，尽管科研实验与魔术不是一个范畴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事物，但我们还是欢迎魔术师参加汇报会，欢迎他们来揭露作弊行为，能用实验来说服人们相信特异功以当然是好事；魔术师能揭露作弊行为，使我们免除上当受骗也是好事；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对话，总可以增加相互了解。

四人小组不定期开会，每次开会由小组的成员轮流主持，以示相互间的平等，通常说是“轮流坐庄”。商定即将召开的汇报会，轮到由科委郭主任主持。因此，具体事务由交由科委的申漳来办理。

为了保证试样制作的可靠性，特邀反对者派代表共同监制试样制作全过程。《科技日报》记者吴小平受林自新委托与申漳共同到507所监制了密码编号的试样制作，并到玻璃工厂，看着工人将瓶口烧结。然后由申漳将试样带回科技办，锁在铁柜内，直到表演那一天才拿到现场。在表演前，×××曾到于光远家与于光远进行交谈，邀请他参加汇报表演会。于光远坚

持认为×××上当受骗，表示不看魔术表演，并且说申漳保管试样不合适，言外之意，是他有与张宝胜串通作弊的可能。正因为有这种顾虑，反对者另外委托制作试样，开会时带到现场。

关于汇报表演地点的选择，这次会议由科委坐庄，按惯例应在科委会议室。但于光远当科委副主任时，曾有规定，特异功能不能进科委大楼。这样就选择了在科委专家公寓的多功能厅。

汇报表演结果直到1995年才在报上公开。原因是主持这次表演的单位不主张公开。1995年，何祚麻等人以《“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为题，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将其召示天下，并引起巨大反响，海外媒体纷纷转载，一时传遍海内外。现将该实录予以全文“实录”如下：

这是一篇迟到的报导，事情发生在1988年5月21日。

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种种宣传，如意念致动，隔瓶取物等等，我们一直是高度质疑的，因为这完全违反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大约是因为我们特“偏执”态度的原因，终于被邀请去参加一次由航天生理研究所和“超人”张宝胜向国家安全部、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央宣传部等几位领导同志的汇报会兼表演会。中心内容是“鉴定”张宝胜究竟有没有从某个封闭了的瓶子里取出药片或有机玻璃片或任何固态实物的能力。

条件是优厚的。主办单位同意由我们提供测试样品，并且以我们的样品作为是否成功的标准。条件是所准备的玻璃样品要留有“小孔”，以便“气”能方便地透入瓶内。这一点，我们照办了，因为药片或有机玻璃片的体积远远大于“小孔”，如果“气”能迫使这些物品“穿孔”而出，自然也是“伟大成

就”！主办人还说，张宝胜为了培养情绪，积累能力，在表演过程中，需要自由地在会场上出出进进。我们提出，为防有弊，不得将测试样品拿出室外，而是放在场内——大家都看得见的桌子上。我们还提出，为了防止“汇报表演”搞成魔术表演，可否由我们请几位魔术师到场“参观”，主办人也同意了，双方相约不将请魔术师到场的信息通知张宝胜，以免影响他神奇的功能。于是我们便请了北京杂技团和铁路文工团的五位高级魔术师和杂技演员到场。由于年深月久，恕我们已忘记了他们的姓名，只记得有一位以表演“空中钓鱼”而享誉国内外的铁路文工团杂技演员提曰利同志。

样品准备的中心环节是防止“掉包”。我们请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吹玻璃的老师傅特地吹制了5个难以仿制的样品，亦即在留有“小孔”但有不同外形试管里放置了编了号的药丸，有机玻璃片……据说高速摄影机曾“拍摄”到张宝胜抖落药片时，药丸“半截在外，半截在内”的现象。

汇报会由8时30分开始，首先由航天生理研究所的某位同志报告实验进程，结论是“物品穿壁现象，已是科学地确定了的事实”。

9时30分，张宝胜对我们所带样品进行测试。据主办人告诉我们，以张宝胜功能之强，大约半小时就可以实现。为了保证测试公正进行，主办人把我们这几位质疑者安排在最靠近张宝胜座位的地方，魔术师和杂技演员分布在前后左右，整个参加这一测试活动的约有60余人。

张宝胜拿起样品摇晃了几下，就放在桌子上，然后一动不动地坐在位子上，半小时，一小时，一个半小时过去了，5个测试样品，竟然没有任何一个药丸、玻璃片从试管中“流”出来！主持人有点沉不住气了，凑到张宝胜耳边，对他耳语。

11时30分，仍然没有动静。于是场外的另外两位人体特异功能“次强”的“超人”，拿起一只药瓶（注意：不是我们准备的样品），从中抖出许多药片！只听邻桌发生了“砰”的一声巨响！大家的眼睛都投向邻桌。这时，祚麻大声说：“大家看张宝胜，不要受声音的影响。”主持人也说，测试以张宝胜取出这5份样品中的任何一种为准。

12时，依然没动静。12时30分，大家肌肠辘辘。主持人宣布，今天的汇报会是否可暂不进行测试，而改为表演会。他建议先由张宝胜表演他最熟悉的项目，以便“培养情绪”，然后测试正式的样品。大家同意了。

表演的第一项目“透视”识字。航天生理所拿来一个信封，内中装了两张新的二角人民币。大家公推何祚麻、林自新书写。何林二人写了一串长长的物理常数，又写了一句唐诗：“一枝红杏出墙来”。信封封好了，又由何祚麻在接缝处签了6个“何”字。

这样一个精心密封的信封，就由张宝胜“透视”里面的字句。张宝胜拿了这一信封，反复查看，反复折叠，忽而左手，忽而右手，忽而放在桌上，忽而又拿回手中，迟迟认不出字来！

此时，张宝胜向主持人耳语了一阵，愿意先做别的表演，即把名片嚼烂，由他“拍”还原。观看汇报表演的一位领导人当即拿出一张蓝色的名片。何祚麻说，“在嚼碎前，可否由我签一个名字？”大家说“好”！，于是何祚麻即签了名，并交给了主持人。主持人把名片对折后放在口中。这时，张宝胜当即对主持人耳语：“这一表演不做了！”

于是，主持人宣布，张宝胜将表演另一个项目，将一块糖塞在刚才由何祚麻签名的密封的信封里。接着，张宝胜就将这

一“密封”的信封卷在一支钢笔上，让坐在一旁的×部长握在手中。为了“培养情绪”，张宝胜离开了会场。

这时，魔术师提曰利说：“×部长，你能否‘打开’一下，看看你拿的信封，是否仍是何老师签字的那个信封？”×部长打开一看，果然已经“掉包”。这已不是原先署有航天生理所的那只信封，而且封口敞开，里面什么也没有！至于那个签上6个“何”字，并“密封”的信封，已被张宝胜掉换去进行“透视”了。

大家噪动起来。纷纷说这一表演已没有意义。此时，张宝胜已由外面回来，主动对×部长说，原来准备的“签名密封”的信封，已“变”到桌子的那一头去了。可是，坐在桌子那一头的人翻皮包、掏口袋，都没能找出由何祚庥签封的那只信封。

于是，张宝胜又改为进行他最“拿手”的由药瓶里抖落出药丸的表演。我们当即拿出一个带有防伪用的塑料环的药瓶，贴上玻璃封条，签上名字。但同时要了一台精密天平，称量了这一药瓶的重量。

张宝胜拿到这一精心密封的药瓶后，又看了半天，仍然抖不出其中的药片。

14时，庆承瑞和何祚庥站起来说：“这一表演已没有意义。”于是离开会场。下面是林自新等其它质疑者以及在会60多人所看到的事实。

15时30分，张宝胜终于把药片从药瓶里抖落出来。可是，绕在药瓶外的玻璃胶纸已被撕开，而且防伪用的药料环已经脱落。这只能说明瓶盖已被打开过！

会后，我们这些质疑者要求“客观”报导汇报表演纪实，遗憾的是，这一报导始终未能曝光。

主办人倒是承认了这一测试的失败。说张宝胜有时作假，但有时确实是“真的”。

但是，会后流传说：“这是何祚麻的人体特异功能‘特强’，把张宝胜给压住了”——这里何祚麻本人要借此机会声明一下：“我从来没有有什么特异功能，也不会魔术表演。我虽然坐在旁边，以警惕的眼光监视着张宝胜，但没有能力发现张宝胜的‘掉包’，掉包是铁路文工团的魔术师发现的。”

附带说明，林自新和何祚麻曾参加过一次由高能物理所所长叶铭汉教授所主持的张宝胜表演会。张宝胜曾把“密封”的信封交到叶铭汉所长的手中，在他进进出出会场之后，就写下了信封中纸上所写的“真是不可思议，越是不可思议，越是值得思议”三句话。做这个试样的一位博士后立即站出来证明完全正确无误，三个“议”字中，有一个议故意写成繁体“言”旁，而张宝胜却准确无误地看了出来，写了出来。但是，当时的林自新和何祚麻没能看出他的“把戏”，更没有“特强”的功能“压住”张宝胜。

值得深思的是，张宝胜一直被称为“功能最强”的“第一超人”，在最简单的项目“透视识字”中，却用“掉包”的手法来实现他的“功能”！而且，这是在中央机关正式组织的汇报表演上。

《“奇人”张宝胜》一书大量印刷，广泛流传。遗憾的是，在这类书籍里，只有张宝胜“过五关、斩六将”，却没有张宝胜败走麦城的故事。我们的“迟到的报导”，算是补上这一缺憾。

后来，这次汇报表演的直接安排者申璋也在他的《天惑》一书中以《张宝胜“走麦城”的来龙去脉》为题讲述了他所经

历的此次事件和他的看法。以下是对他的文章的节录：

1995年5月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麻以及林自新等人在报刊上发表《“超人”张宝胜走麦城》一文。笔者也被卷进，因此，不断有人向我询问张宝胜走麦城的具体情况，尤其关心作弊的情况。在这里，我想还事物以本来的面貌。

……

汇报地点我选择了在科委专家公寓的多功能厅，不是司马南文章所说的科委情报中心。汇报表演的时间是1988年5月13日，是周五。某些人曾提醒我，又是13，又是周五，是不吉利的。对此意见，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何祚麻文章中谈事情发生在5月21日，这使我产生一个疑问。他的文章到底产生于什么时间？如果产生于1988年，是早就写好，未能发表，是迟到的报道，为什么连日期都记错了。如果是最近靠回忆写成，又怎么能将7年前几点几分发生什么事，都记得那样准确呢？

……

张宝胜经过近5个小时的努力，虽然完成了一些非指定项目，但始终没有能完成指定项目。大约下午3时，陈信承认指定项目没做成功，宣布散会。会后，林自新、吴小平、魔术师、专家组和四人小组办公室成员共进午餐。午餐后，林自新、吴小平与专家组进行了座谈。在午餐时和座谈会上，都没有人揭露作弊现象。

1995年6月，我得知报刊揭露张宝胜走麦城的消息后，曾问过一些当年参加汇报表演会的办公室成员和专家组成员，是否知道作弊这件事，他们都说不知道。最近，找出来一份当年在会后我写的《简况》，这个《简况》由参加过那次活动的

办公室成员、钱老秘书审阅修改，并经办公室主任同意后，在当月印发了四人小组、专家组和办公室成员。《简况》中写了“现场监视者没有发现作弊现象”。在当事人都记忆犹新的时候，我是没有胆量指鹿为马，将大家都知道有作弊行为写成没有发现作弊。我认为何祚麻文章中说，魔术师提日利发现张宝胜将信封掉包后“大家躁动起来，纷纷说这一表演已没有意义”，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我也不认为，何祚麻和提日利有胆量编造一个作弊的故事。我认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可能是，为了照顾张宝胜情绪和全场气氛，提日利只是将张宝胜可能作弊之事小声告诉了少数几个人，而在场的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作弊之事。如果当初公开揭露了作弊，从张宝胜的个性和脾气看，他不会将表演继续进行下去；陈信也无脸面将会议主持下去；×××也不会不顾饥饿，只当众吃瓶水果罐头而坚持到下午3时。

特异功能表演失败，人们是可以理解的。特异功能人作弊是不允许的，是需要及时揭露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张宝胜是如何作弊，或为什么作弊，作弊问题后面还要谈到，而在于如何对待作弊现象。在表演之后的座谈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林自新、吴小平没有揭露作弊现象，没有及时大发议论，是当时不知道呢，还是知道了不愿意揭露，还是有其他想法。为什么何祚麻、林自新在7年之后要大作文章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在7年前揭露作弊，充其量只能否定一次不成功的表演。更何况主持人承认对指定项目表演失败，再否定非指定项目，反对者自己也可能觉得没太大意思。7年后，则情况不同了。他们知道兰迪成功的秘诀之一是在于巧妙地利用公众情绪和媒介的宣传。兰迪承认，他不能模仿尤里盖勒所有的表演，但他可以通过揭露一两次作弊行为，使公众感觉上当受骗。因为他

知道，公众对特异功能的态度是与科研人员不一样的。一些公众或者是全部相信，是崇拜，甚至迷信，或者是认为上当受骗，从而全部否定。而科研人员不会因为一件成功而全部肯定，也不会因为一件失败或作弊而全部否定。兰迪的目的很明确，是在公众面前弄臭尤里，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的主要目的不是改变科研人员的看法。何祚麻、林自新也同样，7年前是面对科研人员；7年后，他们是面对公众。反对者企图通过走麦城事件，在公众面前“揭穿”张宝胜，从而达到全盘否定特异功能的目的，达到将人体科学定为伪科学的目的。他们讲伪科学是以科学的名义宣传迷信。7年前的汇报表演确实是以人体科学的名义进行的，没有什么迷信的内容，更谈不到有宣传迷信的罪过。这与所谓的伪科学有什么关系呢？那为什么又将揭露张宝胜走麦城作为批判伪科学的开刀祭品呢？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是要接受科学实验检验的，是由历史来作结论的。

申漳对上述故事的来龙去脉的述说，让我们能够发现更多的东西。就在何祚麻揭露张宝胜走麦城时，于光远也讲述了一个他计破张宝胜的故事：

我和“气功大师”张宝胜并没有见过面，但是，1988年“两会”在京召开，我决定亲自去会会张宝胜。去的理由有二：其一，出面邀我与张宝胜对阵的，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参加两会的部分香港人士，尽管项南同志对张宝胜和特异功能完全不信，但倘若我借故不去，岂不证明我理亏、胆怯？其二，香港女士先生有请，不去也不礼貌。记得那年在场的两会委员之中，还有香港的著名报人徐四民先生。他们中许多人曾看过张

宝胜的表演，不少人还为之喝彩。因此，他们特地在和平门烤鸭店摆下两桌酒席，请于、张二人当面较量。

出发之前，我精心准备了两件东西：一个是当时风行的智力玩具魔方，六面五十四块，拧乱之后，每面颜色肯定各不相同。我用牛皮纸把魔方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然后准备请张宝胜当场把魔方六面、五十四个小块的颜色写下来，我则当场撕开牛皮纸，以便验证。不过，我用魔方试验多次，从未遭遇“对手”，换言之，没有人能够“蒙”得出来魔方的六面是哪些颜色，五十四个小方块各是什么颜色！如果张宝胜来，我猜他一定当众出丑。

第二件东西，针对张宝胜最擅长的“意念移物”，针对他号称能在不打破瓶子、不拧开瓶盖的情况下，仅凭意念就能把玻璃瓶中的药片移出瓶外，我也带了一个瓶子。事前我当然要做防备：一是药瓶口我要用蜡封好，如果他想偷偷拧开瓶盖，则封蜡必然破碎脱落，无法复原。第二，我必须防备张宝胜借机“掉包”，于是，我带了自己家中的瓶子，并且事先把瓶中阿斯匹林药片倒出来，用红、蓝墨水涂在每一药片的两个半边，以便保证即使张手疾眼快能够临场“掉包”，现场也找不到我这种特制药片！

不过，直到那顿饭吃完，张宝胜也没露面。

张宝胜，原是抚顺的一个工人，后未被调入北京某重要科研单位，该单位甚至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专门研究“张宝胜之功力”。该单位的首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与我共同工作，那时我是民先总队的组织部长，他是宣传部长，但不知后来他为什么变得那样固执、迷信。

前面说到的那位“大科学家”，在我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也来表示祝贺，我对此表示感谢。不过，他仍希望

我能去看看“特异功能”。我一直坚持不去看，因为我看魔术表演，至少看过十次“空中钓鱼”，而且每一次魔术师都确实把鱼从空中“吊”起来了。问题在于：魔术师从来都是事先声明自己是在表演魔术，而特异功能者无论在表演之前、表演之后，都一口咬定“这是真功夫”，而且还不让检验。我何必再去看什么魔术表演呢？如果药片可以穿过玻璃瓶出来，那我们还要物理、数学干什么，大学、中学的课本统统扔掉算了！

经过以上揭露，张宝胜这个国防科工委的秘密宝贝终于混不下去了，后来他借口压力太大，特异功能消退，再也不肯作实验与表演了。有关单位最后将他送回老家了事。

第三节 “玉帝女儿”张香玉趣闻录

曾有人称伪气功有“四大天王”，他们分别是：严新、张宏堡、张香玉、张宝胜。其他三人都是男子，唯有张香玉是个女的。在这个大气功师满天飞的时代，这张香玉是凭什么当上“女天王”的，而且排名还在我国军队的秘密武器“奇人”张宝胜之前？人说，一招鲜，吃遍天，她是凭一招“宇宙语”而一炮走红的。张香玉最有意思的，是她那些漫无边际的胡扯，然而可悲的也正在此，居然有那么多人还就把她那些野狐禅信以为真！

我们先看她是如何得功的。张香玉这样介绍自己“功”的来历：“我的功是自然产生的。1985年8月6日，可能中午，我在家里看普法教育的材料，看着看着，突然有一股力量拽我往上提，我感到憋得慌，想出去，站起来就跑出去了，想到有植物、有水、空气好的地方去，以后我就常去公园。从此就有

一种力量带动我做各种动作，最初是几个礼拜出一种动作，以后就一礼拜出一种动作，最后就一天出一种动作，都是不由我自己所指挥，全是自动出来的。”

“信息是一种特殊信号，信号来自宇宙，有人说我会 700 多种宇宙语，我可没有计算过，换一种物体就是一种语言。原来我并没有问什么语，只是会说，后来有人考察我，让我与史凤芝对话，史凤芝说她说的是地球的语言，而我说的的是宇宙的语言。宇宙语是不让随便用的，我问过先师，宇宙语是讲什么的？先师告诉我，是讲自然法则的。我向先师提问可以用汉语，蒙语。先师有时是男的声音，有时是女的，我听得见，他讲汉语。”

在“得功”后，张香玉于 1986 年 3 月“受邀请”从西宁到北京，开始传授“大自然中心功”。

1990 年 3 月，张香玉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万人授功”活动。这次“万人授功”活动，还打着“为亚运会集资”的旗号。她在 3 月 16 日曾到亚运会集资部，提出授功集资，将部分所得捐给亚运会的要求。亚运会集资部有关负责人明确答复：授功必须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和支持方可举办。

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规定：“凡在公共场所讲授、传授气功疗法者，要向讲授、传授活动所在地的县（区）级中医药、卫生行政部门申报传授的功法、内容、疗效、形式、收费等事项，经批准后方可进行活动。”张香玉不仅没有向北京市中医局或海淀区卫生局提出申请，也未经其授功所在地海淀区的人民政府及有关工商、税务、物价、公安等任何有关部门的批准，就搞起了大型授功活动。

3 月 21 日，海淀区公安分局找张香玉谈话，她本人不露

面，只派了一个徒弟去。海淀公安分局指出，张香玉等人所搞的授功活动是非法的，令其马上停止授功活动。可是，张香玉等人无视国家规定，一边试图补办一些手续，一边仍继续在北京城区、郊区及河北省涿州市“授功”。在1990年3月18日至31日期间，就授功27场次，共从11693人手中，赚取人民币409255元。

张香玉搞“万人授功”，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关注，许多北京市民认为这是在公开搞封建迷信。人们纷纷写信、打电话向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强烈要求政府立即制止。中国集邮总公司的一位干部连续给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写了三封信，信中指出：“张香玉宣扬鬼神迷信，如此大范围行骗、蛊惑人心，政府怎能熟视无睹？长此下去，我们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封建主义？”1990年4月14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发表了“醒民”的文章《警惕迷信附体》，文章严厉谴责张香玉借气功宣扬迷信，同时提出了问题：“既是迷信，为什么政府不管？”

就在这天的下午4时许，海淀公安分局的警车突然驶到万寿宾馆前停下。十几分钟后，张香玉被公安部门收容审查并于12月5日正式逮捕。被人们斥为“现代女巫”的张香玉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这位现代女巫有许多趣闻。张香玉曾经给深圳一位老板的太太治过病，但没有治好。她对老板说：“我本想给你太太在天庭找个好位置，可借一时没有空缺。我让你太太暂时在云中等候，还给她弄了一张非常漂亮的水晶床。”回到北京，张香玉对弟子们说：“那太太浑身漏气，没法治了。”

张香玉凭什么给那位死去的太太在“天庭”谋个“好位置”呢？她曾多次对别人说，自己是“玉皇大帝的女儿”。为

了显示自己“公主”的身份，在王母娘娘的泥塑前，她曾扑倒在地当众请罪：“女儿未能尽孝……”。她又装神弄鬼，说认出了某女工是“玉兔转世”；确定某制片厂的一个职工是“真龙化身”。她还对某个律师说：“你的孩子可了不得，他已修行1000年了。”

1988年5月，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一个年轻女服务员得了白血病，她哥哥求张香玉给妹妹治治病。张香玉听说他们的父亲已去世多年，便说：“你们的父亲本是天上的神，因为你们没有好好读书，才降罪于你们。你妹妹的病我是可以治的，但是你们的父亲不允许。”说着，她突然做了一个从空中接到东西的动作，说道：“因为我要给你妹妹治病，你父亲生气了，他给我下了战书，约我明天在天坛决战”。言毕，张香玉的手又做了一个抛出去的动作，说：“我应战！明天你们要和我一起去。我们每人做黄色标记，以免误伤。”

第二天中午，这场举世罕见的“人神之战”在古老的天坛拉开了战幕。张香玉身着黄衣裤，头扎几尺长的黄绸飘带，乘车来到天坛公园，在天坛公园南门一下车就时人了“战斗状态”。她边唱（谁也听不懂）边跑，忽左忽右，时而跃起，时而卧下，一会儿抱树，一会儿又似手执兵刃向天击去……，许多游客莫名其妙，以为是拍电影。经过两个时的“搏杀”，张香玉终于杀到了祈年殿东南的柏树林。她煞有介事地又比划了一阵儿，突然从怀中抽出一块黄布对天挥舞。然后才慢声慢气地对病人家属及在她后面围观的人说，我们战成了平手。然后让病人的哥哥向天磕头……。

从此，张香玉就说天坛柏树是“信息树”。在张香玉搞大型授功的前后，这些被张香玉弟子命名为“信息树”的古柏，曾吸引来无数“接气”的善男信女，古柏受到损伤，天坛公园

也曾一度因此失去了平日的宁静。

张香玉喜欢向人吹“我是神”。张香玉曾在北京内蒙古宾馆住过。一次，一位服务员问她的一个弟子：“这人是干什么的？”弟子答：“她是气功师。”不料张香玉对这个弟子特别不满，她生气地说：“以后再有人问我，你就说我是神！”

有一段时期，张香玉突然要求弟叫自己“一、二、三”，说是自己的代号，弄得弟子们你看我，我瞧你，实在不知出了个什么花点子。还是一位贴身的女弟子最先解开“秘密”，张香玉不知听谁说，老子曾经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她给自己起“一、二、三”这样怪的代号，就是为了暗示她能够“生万物”。

作为骗子，编谎言是一个基本功。张香玉编起谎言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有一次在西宁胜利公园宾馆，当一个来求医的女病人走后，张香玉对女服务员说：“你们看见刚才来的那个女人吗？那是5年前坟墓里的一具女尸，是一个灰狐狸借体还阳的。我看见她进来时，还夹着一条灰尾巴。她来是要与我争门派，她要让我加入她那一派。我哪能听她的？我与她神游了宇宙，经过一番打斗，她输了。”

张香玉刚到北京时，为贬低另一个气功师，就在背后散布：“我看出来了，×××的原身是王八，谁跟他学气功，谁就会沾身霉气！”

北京一个干部的外孙病重，张香玉两次发功无效，孩子死后，她对弟子说：“不是那孩子治不好，而因为他是太白金星面前的童子，他不是死了，是被天庭招回去了。”

一次在去卧佛寺的途中，陪伴张香玉的弟了问，你去过别的星球吗？她不加思索地回答：“去过。”

张香玉的得意门生、“自然中心功研究所代所长”陪张香

玉到青海授功时，曾眉飞色舞地讲：张香玉可以把导弹给“退回去”；张香玉可以随时把美国的绝密文件弄来，再神不知鬼不晓地退回去。想必弟子不会编造师傅的话，总是张香玉自己什么时候说的。

张香玉在北京理工大学授功，事毕几个教授议论起大气污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张香玉插话说：练我这功，冲着炉子练，可以让炉火灭了。如果练我这功的人越来越多，全世界都练，就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网，把太阳的热挡回去，人类再也不用愁什么“温室效应”了。

至于“我曾经使内蒙与山西交界处的一次地震推迟了二个月”，她也不知说过多少次。她解释说：“我本来是想发功阻止那次地震的，正在我发功时，北京的税务部门找我的麻烦，我一气，就提前回了北京，但地震毕竟还是推迟了。”

其实，张玉香也曾经想在“预报地震”上，一展自己的“高功夫”，岂料“出师不利”才由“预报”改变“延阻”的。可能是“预报”更难吧！那是1988年的一天，张香玉突发奇想，对身边的人说：“不好了，北京东单以东525公里不久就会夷为平地！”一句不轻不重的慢言细语，还真使当时一些不识“大师”真面目的人毛骨悚然。他们马上把张香玉领到一位地震老专家面前，哪里知道，这位老科学家第一句话说是：“我们已经考察过好几个自称能预报地震的特异功能者，结果都不灵！”张香玉一听不对头，马上改口：“我不搞预测，我能阻止地震。我观察过日本的一次地震，看见从富士山下爬出一只大龟，满身尘土。沉入海里，大龟把日本的‘地灵’带走了，再过50年，日本会沉没。”老科学家对这派胡言十分生气，脸也沉了下来：“你别搞神秘主义了！你说日本我不感兴趣，你说说刚过去的一个月内，距此地不出500公里的地震情

况吧，说对了，我就信你！”张香玉还真慌了神，连声说：“我是阻止地震，我会救灾。”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

就在张香玉入监后，还继续闹上些笑话。据海淀公安分局的预审员透露：张香玉刚进来的时候，还趾高气扬，说如不放她，就遁地而出。过了两天，又说先师已告诉她了，要她好好接受审查。

一天，张香玉说头疼，要求给她治病。“你不是会发功吗？自己治治吧。”公安人员说。“不行啦，屋里空气太少憋得慌，发不了功。”“那好办，我们把窗户给你打开。”张香宝仍然没发功。

还有一次，张香玉说她最拿手的本事，就是你任意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她可以与此人接通信息，断出他的吉凶祸福来。公安人员就给了她一个人名。张香玉盯着这个名字，煞有介事地沉吟半天，然后果断地说：“这个人病得很重，非常严重”。预审员让她再仔细看看，看清楚。张香玉又改口说：“这个人已经死了，是病死的。”哪知，那个人正是在场的一位干警，众人忍不住大笑。

在看守所里，预审员同张香玉有如下对话：

问：你得功后，都见到了什么常人见不到的东西？

答：这我以前讲过，我见到了玉皇大帝，观音菩萨，还见过飞碟，并同飞碟上的宇宙人用宇宙语交谈过。

问：你说的先师是什么样的人？

答：是很古很古的人，几千年，几万年以前的人。

问：我问你一个问题，人死了还能活吗？

答：那当然不能，这小孩都知道。

问：那你的先师是几千年，几万年以前的人，他还能活着吗？

张不语。

问：大自然中有各种声音，你能说出你听到的先师声音属于哪一种吗？

答：我说不出来。

问：玉皇大帝和观音菩萨经过学者们的考证，是民间虚构出来的神话形象，你怎么能见到真人呢？

答：这我也解释不通。通过你这么一讲道理，我也不信了。先师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问：那么你的先师到底存在吗？

答：我原来脑海中确实出现过那种声音，不过练功时人的状态类似睡眠，那可能是种幻觉。我现在回想他不存在。我是在宣扬封建迷信，这样危害极大。

问：那你的宇宙歌，宇宙语是什么意思？

答：这个……人听不懂，但能与万物接通信息。

问：你都和什么东西接通过信息？

答：和树、花。

问：你们如何对话？

答：我们用汉语对话，因为在中国。

问：假如你到了美国和那里的植物对话，是不是该用英语了？

答：我不懂英语。

问：那怎么对话呢？

不语。

张香玉的荒唐闹剧收场了。但是伪气功并没有因此而退场。在1992年，另一场预测火箭发射的闹剧又大张旗鼓地开演了。由于它与当代最尖端科技火箭发射连在一起，就更显示出其荒唐之至。

第四节 庄逢甘戳穿陈林峰

1992年8月14日，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发射澳星B1取得圆满成功，中央电视台对发射进行现场直播，在国内亿万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出于对澳星发射科技工作者的尊敬，曾有一些捐赠钱物的举动。1992年12月30日，香港发景国际集团和世界华人协会也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捐赠40万元人民币，以奖励直接参与发射任务的航天专家和有功人员。出人意料的是，在捐赠仪式上，发景集团总裁沈泰东提出，将所捐款40万元人民币的半数即20万元作为特别奖赠予“大师”陈林峰，褒奖他对发射澳星作出重大预测。

后来，在一本介绍陈林峰“光辉事迹”的图书《慧的世界》（李志强著，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序言中说：“一个对航天技术毫无专门知识，对卫星及火箭的制造、发射情况毫无所知，仅凭自己的气功功夫，就对卫星的发射情况做出相当准确且详细的预测，这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在柯云路的《生命特异现象考察》一书中，也提到了此事。柯云路在书中说：“陈林峰算是中国有影响的气功师之一，……真正引起更多人注目的是陈林峰对中国卫星发射的接连几次的比较准确的预测。……这确实是事实，我手头有比较翔实材料证明这一预测事实的存在。”

此外，一家杂志在1994年第7期上刊登的该刊特约记者的署名文章，把1994年2月8日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的事实说成：“若不是这位大师在发射前夕，在几千里外测出火箭故障，那么这次发射可能成为一场悲剧，耗约10亿元的新型火箭和卫星，以及多少人的心血，将

在—声爆炸中化为灰烬。”

由于发景集团奖励卫星发射有功人员确有其事，这样一来上面这些似真似幻的情节，就一时传得沸沸扬扬，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真是难辨真伪。

那么，事实的真相又到底如何？在1995年，一位参与火箭发射工作的科学家出来揭开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他就是庄逢甘。庄逢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总公司的航天专家。以下就是庄逢甘先生对事实真相的披露。

关于那次捐赠活动，事实上，陈林峰本人就是世界华人协会的副会长，他也是这次捐赠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和主要联系人。这样一来，他本人顺理成章地由“捐赠者”变成了“受奖者”，变成了对火箭发射的“有功人员”。航天总公司刘纪原总经理当时任航空航天部副部长，他在捐赠仪式上的讲话中只对发景事团和世界华人协会关心航天事业表示感谢，根本就没有对“大师”的所谓预测有过评价和感谢。但是到了某报记者的笔下却被偷天换日地改为：“感谢‘大师’为澳星发射所做出的特殊贡献”。这样的消息不胫而行，越传越神。每到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期间，有关陈“大师”对航天预测的消息就在某些报刊上重新登一遍。

此外，庄逢甘还披露，航天总公司及其所属的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空间技术研究院等，从来没有邀请所谓“气功师”对火箭发射进行预测。陈林峰的所谓预测报告，总公司也从来没有正式收到过。大家在新闻媒体上看到的消息，几乎都是事后出现的。而且都是“大师”的一两个忠实追随者加以注解解释的。如“大师”在预测中说：“火箭本身整体向左有一点歪”。某报记者注解说：经测量，箭体向左歪斜约200mm。“大师”说：“反复检查每一个焊点，其中有一个虚焊”。“助推火

箭之一有问题，可能部件要换好的”。记者注解：遥测系统已发现虚焊点；检查结果发现一个传感器出了毛病。事实上，50多米长的运载火箭，竖起后在误差允许的范围略略有倾斜是正常的。一枚火箭上有数万个焊点，有一个或者几个是虚焊也是可能的。这些事实根本就用不着预测。另外什么叫“左”什么叫“右”，也完全是模棱两可的语言。

“大师”甚至说：“所有问题解决后才发射成功”。这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总设计师、总指挥，都是在把所有能认识到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才发出起飞发射指令的。这种预测是毫无意义的。

“大师”说：“在我的眼里，火箭只有一点点大，是一个活生生的透明体，就像透视人的脏腑，看得很直观，甚至比X光还要透。比如一个人坐在眼前就能看见他鼻子歪了，耳朵缺一块一样。”这段话，可以说是“大师”预测火箭的基础。事实上他对火箭、卫星一无所知，一窍不通、即使他真的能把火箭作为一个透明体来观察，一个毫无航天技术知识的人，也决不能判断出火箭的每一个零部件是什么，又有什么毛病。航天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技领域之一，它不仅博采诸多科技领域之精华，而且发展成为非常严密的科学体系。任何一个不经过专门学习和实践的人是决不可能掌握航天技术及其规律的。

庄逢甘还说，航天总公司对这些预测持完全否定态度，广大航天科技人员对此也十分反感。为制止这类行为的发生，航天总公司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所属单位一律不接待那些所谓“大师”们的参观和所谓了解情况；严令禁止参加发射试验的工作人员与他通电话、发传真；上述措施足以表明航天总公司对所谓预测的态度和立场。《工人日报》的一位记者曾明确表示，她采访到的情况是，“大师”对火箭发射的预测，五次

预测五次失败。对此柯云路说，气功师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有关部门仍在用他们，可见是有理由的。而事实上航天总公司从来没有用过他们。

庄逢甘最后说，事实上，卫星在经过长途运输运到卫星发射中心后，首先要按预定程序对各分系统以及星箭结合部等进行技术测试，对测试过程中出现的故障、问题要逐个进行分析、解决并加以排除，以确保发射做到万无一失。这些程序是严格遵照航天技术的自身规律，在总结多年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卫星发射中心的总设计师、总指挥以及各分系统的负责人，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其他所谓气功大师的“指点”，从来没有使用过他们的所谓预测。火箭、卫星发射的圆满成功，是航天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职工心血和智慧结晶。把中国航天事业几十万人几十年努力的成果都一下算在气功大师账上，把所谓挽回 10 亿元损失的功劳记在气功大师头上，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技术的悲剧，这个教训令人触目惊心。（庄逢甘院士文章原载《中国科学报》1995 年 9 月 25 日）

第十一章 中功“宗师”张宏堡

第一节 横空出世

严新大师靠气功起家发达，带动了一大批气功大师的出山。在这些“新秀”中，要算张宏堡最有“出息”，他也因此被列为伪气功“四大天王”之二。

张宏堡是1987年11月“出山”的。当时他还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名学生。有两本记载“张宏堡奇迹”的书，都是一位叫“纪一”的人写的。一本是1990年4月由华龄出版社出版的《大气功师出山》，一本是1991年7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超生命现象》，在这两书中都记载了张出山的经过。

据纪一1991年介绍，张宏堡“属蛇，今年38岁，大学本科毕业，共产党员”。一个自称是张宏堡“出山前期弟子”和同班同学的回忆说，他们是在北京科技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时认识的，1986年6月拜张为“师父”练功。“86年下半年和87年上半年两学期，师父缺课达90学时以上，离校时间累计90天以上”，回来后“看我们的笔记”，但成绩总在全班中上等”。“87年毕业实习，全班都外出了”，张则被“学校”留下，“为教职工传授养生大法”。他写的毕业论文叫《帅才浅探》，即“帅才宣言”。“毕业后，师父带着我们弟子去中国基金局(?)办了一个中华养生益智功速成班”。

在1987年出山后，“中功”立即奇迹般火爆京城。1988年

1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神奇的事业——气功大师张宏堡小记》；1月8日，已有多年不涉足气功和特异功能报道的《人民日报》破例作出报道《首都新闻界文化界举办中华养生益智功速成班》；1月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张宏堡掀起气功热》；1月22日，《中国电子报》报道：《张宏堡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办气功班》；1月31日，《天津日报》报道：《中华养生益智功风靡京城知识界》。

张宏堡到底施展了什么魔法，使京城报界和知识界如此痴迷？《大气功师出山》一书总结了“中功”成功五步曲，对此说得很清楚。这五步曲是：

一部曲：中功在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创立后，在高等学校传播。“张宏堡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北京大学。”（《大气功师出山》第55页）张宏堡说：“北大又是以社会科学为主的文科大学，征服了北大，说服力强。”从那时开始，北大就一直有中功组织，并且是在团委注册的。当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报道《未名湖畔气功热，燕园师生受益多》，提到“中功”创始人张宏堡在北大传功，有千余人参加。张在北大办的速成班学员除了北大的师生，还有来自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人，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员、讲师、博士等。第一步张宏堡成功了。

二部曲：第二步就是向科研机构进军。“在高等院校普及开之后，张老师审时度势，决定第二个目标，直接开进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林业科学院。这是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精英荟萃的殿堂。”（第58页）张宏堡又成功了，某刊物以《气功搅动了科学城》描述当时的状况，电视台也播放了张宏堡在中国科学院传播气功的消息。

三部曲：接下来就是充分利用媒体，《人民日报》自然在

考虑之中。“于是，第三个目标就选择了《人民日报》。”（第58页）在人民日报办班成功后，张又举办了首都新闻文化界的“中功”速成班和广播电视部的“中功”速成班。“这一下，把新闻界的力量调动起来了。”（第58页）。

四部曲：闯入禁区，打入国家政权机构。“他总想去闯一个禁区，一个别人想都不敢想的领域，那就是公、检、法、司。这是我们国家的专政机关，正是他们担负着扫除封建迷信的神圣职责。”（第59页）说得多么明确，张宏堡宣传的“再生人”、“发功5分钟腰围减少7.5厘米”、“灵魂重7.1克”之类与迷信有多大区别？张宏堡却想让专政机构认可这些迷信，为其大发展扫清障碍。张宏堡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做了研究，采取了投其所好的办法，征服了“第四个主攻方向”，“公安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司法部部长都对他举办的气功速成班表示支持。他大获全胜。”（第59页）

五部曲：走向全国各地，创办全国性、国际性中功组织，出版刊物《麒麟文化》，并创办“中功”实业。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功”实业也是非常“成功”的。

在1988年3月《新体育》杂志上一篇文章，借张宏堡的话，再次总结了这些“成功经验”。这篇文章是一名叫王颖的人写的，文章名字叫《青年气功师张宏堡的宏大抱负》。在文章中直接引用了张宏堡的话，来阐述他的成功之道。他说：“我这是去年七八月份打出来的，我是专找难题上。高教系统中，北京大学有典型性，我们在那里办气功班，一次200人，一次1400人，两期都成功了。新闻系统是《人民日报》难打，也成功了，国内版从今年开始发了消息，还有中央电视台，8年中没有专门报道过，不久前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也报道

了。医疗卫生系统中中医研究院和北京的几所大学、中医研究所的学习班刚刚办完。还有农业科学院、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的班马上要办。那位持反对态度的权威那里我一定要去。要促进气功事业的发展，必须多做宣传。为此，我给首都新闻界办了一次讲习班。……

为什么中国的气功发展缓慢？除政治、社会原因外，还有一点是陈旧观念，气功界如此，社会也如此，没有国家战略。日本为此专拨 10 亿日元的研究经费，苏联也办有几个官办的研究所，美国提出了‘意念战争’这个概念。因为‘意念’这种特异功能，可以干扰卫星和导弹场地的弹头发射；可以干扰国家元首的决策思维；在体育方面，可以用意念助以瞬间功力，使跳高、举重、下棋、游泳出现更好成绩。在音乐上也可以助功，使歌唱家能提高区度音。还有在农业生产上、在找矿上都可以运用气功。我打算这段时间筹办一所中国气功大学，成立一个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开办一个中国气功实业开发公司。这是科研、生产、教育三位一体。没有经济实体，气功不会有大发展。等我筹集到 200 万资金，办起这三项，我的历史使命完成了，我就找出第二代掌门人，然后自己退出历史舞台”。

到了 1988 年 10 月 7 日，即一年以后，“经北京市经委审查批准，国家工商局颁照”，张宏堡就办起了一个自称中美合资企业的“北京国际气功服务有限公司”，“经营中国气功的演出、培训、保健及相关服务”，“并与美、日、苏、香港等 8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联系”，张宏堡自任“总经理”，还拥有一座“北京六里桥国际气功大楼”。据北京市医药管理局 1990 年 8 月的一份报告，这时张宏堡在北京还办有“中华养生益智功研究会”、“中华养生益智功国际交流中心”，尽管事实

上和“北京国际气功服务有限公司”是一班人马。同年6月，张宏堡的“非法医疗气功活动”被该管理局“依法取缔”。

这是一个挫折，但并没有阻止张宏堡的宏图，在以后的时间里，他的“中功”事业称得上蒸蒸日上。以1990年11月1日《西部电子信息报》的报道为据，仅在这一年里：

3月中旬，张宏堡应邀在桂林市举办中功一步功学习班和师资培训班，有1364人参加，同时为3000余人作了“人体科学”的学术报告，“轰动了整个桂林市”。

7月上旬，大连远洋航运公司等八大企业单位，联合在大连举办了6000余人的中功学术报告会，并开办了中功一、二步功法培训班。

7月中旬，天津职工气功协会举办了2000人的中功学术报告会和400人的中功师资培训班。

7月下旬，浙江杭州等三个城市举办了中功一步功学习班。

此外，在河北廊坊、福州、南京、昆明、贵州等地，也有类似活动。北京国际气功服务有限公司“已培养了万余名中功师资力量”。中功在西南地区的五省七方（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广西、成都、重庆）已全部开班设点”。其中“成都市五区十二县成立了辅导站或研究会”；“重庆气功研究会”举办了4000余人的中功学术报告会，并举办了中功二步训练班。

就其发展速度言，仅用六个月时间，中功“推广工作就已覆盖了四川省的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诸如西昌、自贡、绵阳、德阳、攀枝花等市，南充、涪陵、达县等地区，中江、眉山、乐山等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均成立中功辅导机构。又应西安智能功法培训中心邀请，张宏堡及其弟子在西安分别作“学术报告”，开办一、二步功培训班，在所谓“中国

气功城”的西安“掀起中功热，其热正向大西北辐射”。

据这份材料的初步统计，截止到1990年10月19日前，“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省在内）均有中功辅导员在为当地人民做好事，全国练习中功的人数已达800万之多”。

与“中功”的大好形势相应，1990年内，张宏堡还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11月1日，与《西部电子信息报》合办“生命与信息专辑”。据该专辑报道，张宏堡在重庆创建了“国际生命科学院和国际生命科技大学”，自任院长和校长。该报头版同时报道，11月3—4日，张宏堡将以院长和校长身份在北京科技会堂做专题报告：《生命科学观与方法论》、《特异功能理论》和《人类特医体系在神州风雨中诞生》等。邀请与会的对象，“重点是学术界、科技界、医学界、政治界、新闻界等具有相当于副教授以上的高级职称人员、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在各自领域中有特殊专长的人员以及与生命科学有关的政府高级领导干部等”。

第二，12月18日，创刊《生命科学报》，由“国际生命科技大学”主办。据此报的《编者按》介绍：“张先生在大彻大悟之前，就已经学习了十个专业，获得了八个专业的文凭，掌握了200多门课程的知识”。他的头衔也由气功师变成了“生命科学家”，“张先生起步于气功界，又跳出气功界”，“既把握了生命科学的金钥匙，把握了气功和特异功能的奥秘，同时又把中国气功科学导向生命科学的高度”。

第三，同一份《生命科学报》，以《生命科学的曙光》为题，报道了张宏堡在1990年11月3日晚在北京科技会堂举办的“学术报告会”的盛况：“会场外车道上，在30名训练有

素、精悍威武的武警、公安及保安人员的护卫中，一辆一辆的高级轿车陆续到达”，一个又一个“气质高雅的人物从车上走下来”，接着列出一长串的“国家党政领导”和“老将军”、哲学界“泰斗”的名单，还有“科技界、学术界、医疗卫生界的各路权威”，也有一个颇长的名单，总共“三百多位专家学者”。此外，“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北京高级法院及中级法院、海淀区公安局的领导提前赶到会场，并抓紧时间与张先生的弟子热情交谈”。又记，中央和北京市的“70多家新闻单位”进行了采访。1990年12月18日的《生命科学报》报道这次“学术报告”的社会评价是：“和张香玉不一样，搞的确是一门科学”；“张宏堡真了不起，水平高……简直把马列主义用活了！”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这次报告会当是张宏堡成功路上的一大高峰。在1990年的气功低谷期，举办这样隆重而又带神秘色彩的生命科学学术报告，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那就请看：“在长达9小时的报告中，曾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驰骋拼搏并获得赫赫成果的老前辈们，随着这位大智大慧者的引导，他们被一步一步地带进一座神奇而又实实在在的宏伟瑰丽的生命课堂”。事实上，这次报告中的真正意义，是张宏堡把他的“中功”再次提高一个规格，“郑重向国内外宣布，将自己悟道而得的中功文化体系正式命名为麒麟文化”。于是，“麒麟文化”就成了张宏堡发展的新起点。

第二节 中功实业

从理论上讲，张宏堡并没有什么特别独创的东西。他用到了“人体科学”、“全息理论”、“心物辩证法”、及“意力”理

论等，这些早就不新鲜了。张宏堡宣扬和实施的東西，并没有超过其他“高功夫师”。但像张香玉那样，三两年内就失败了，有些“高气功师”尽管名声不小，但也很少取得像张宏堡那样的巨大成功，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还是那份《西部电子信息报》，在1990年11月1日发表署名文章《中功实业在暴风雨中昂扬奋进》，道出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张宏堡力图把他的中功变成一种“实业”。文中说，此前的气功活动大都以“气功研究会”、“气功协会”等“社团组织”的名义开展的：“这些社团组织，一无法人地位，二无经济实力，三无高档次气功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像“水上浮萍”，“弱不禁风，不堪一击”，以致使“著名的气功家此一时被捧为贤明，彼一时又突然会成为罪人；……在国外各路人马抢着要，在国内竟无立身之地”。为了结束这种“时代”，“走气功实业道路”是“正确的最佳的途径。气功事业如无自己的实体基础，就永远不会堂堂正正地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文章继之批评说：“我国没有正式气功管理部门”，气功这个“特殊行业”，“到此前为止，在国家政府机构中尚无一席之地”。所以，“气功实业可以说谁都管，也谁都不管。中功的实业机构从来接不到任何政府部门的文件通知……这就很可能出现与政策衔接不紧的偏差”。

上述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对“气功”确实没有统一的法规可循。譬如，1989年10月19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关于加强气功医疗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说明，这一规定仅限于“对他人传授或使用气功疗法开展的医疗活动”，如果不以“医疗”的名义进行的气功活动，就不属于这一规定的管理范围，例如“硬气功、武术气功、特异功能”等就是。

张宏堡看到了目前法规上的不统一和模糊性，充分运用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开展各种活动”，上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文件公布后，张宏堡的“北京国际气功服务公司”依法将“气功门诊”改为“内部保健室”，开展“特异功能保健业务”或“特异功能服务”。这样，名称一改，管理部门就无能为力。以至当北京中医药管理局根据国家《规定》对其进行管理时，他们敢于理直气壮地称之为“横加干涉，无视国家政策法令，损害企业的信誉和经济效益”。

将“气功”办成一个“公司”，也是张宏堡的首创。他的第一个“实业”“国际气功服务有限公司”，就其营业范围为“经营中国气功的演出、培训、保健及相关服务”言，与任何一个社团性质的气功组织都没有区别，但它挂上了“公司”的招牌，由“1988年7月7日经市外经委审查批准，国家工商局颁照”（营业执照——工商企合京字0319号），与一般要由民政局审批就大不相同，不受国家对于“社团”管理的限制，也撇开了国家对于中医药的管理。《生命科学报》第二期刊登《北京日报》1990年11月4日的一则《更正》：“本报1990年7月4日所载《北京国际气功服务有限公司气功医疗门诊被停办》一文最后提到‘这家公司被停办，听候处理’。经查，北京国际气功服务有限公司现在仍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特此更正，并致歉意。”这是张宏堡的关键性胜利，用“气功服务公司”的名义，比“气功医疗”服务的名义通畅得多。

从“公司”发展到“实业”，是张宏堡的又一高招。所谓“中功实业”，据说是以“国际气功服务公司”、“国际生命科学学院”和“国际生命科技大学”这“三个大型实体为骨干”的“公司、培训学院、康复中心以及各级的推广辅导站”，亦称“中功实业群”，稍后还有西安的“麒麟大厦”和“西安麒麟文

化大学”以及“国际生命科学院麒麟城”。所以称“麒麟实业体系”，并具有了崭新的内容：这个“实业体系……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而且首先是“安邦治国法和辅佐朝政法”——“这是麒麟文化的领导科学”。说明张宏堡的“麒麟”大有向现实政治迈进的趋势。这里让我们看他办的“研究院”和“大学”：

“1990年4月25日，国际生命科学院经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科学院”下设“青城山人体科学培训学校及特异人才培养学校（含小学部、中学部、中专部）及研究生院”。也就是说，从省级“科委”又获得了建立“科学院”及其附设的各级学校的合法手续。

1990年8月4日，“重庆市政府组织各有关部门和高层次的专业人员对重庆国际生命科（技）大学建立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最后“经重庆政府批准”，以“成人大学后教育的学校”得以“注册”。于是张宏堡又堂堂正正地经重庆市政府直接批准办起“大学”来。

气功之所以会在中国大陆得到急速的发展，“气功大师”此伏彼起，有许多原因，其中有暴利可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前述的张香玉，在两周内可以为万余人“授功”，赚得人民币40余万元。张宏堡在这方面，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捞钱的高手。在张宏堡办的《麒麟文化》上，刊登过一个招生广告，上面明码标价有“学费”（不含资料费），摘录如下：

一部功：①国内一般地区：中功实业机构内58元，辅导站和贫困地区经报批备案后，可在18—48元之间浮动；②广东、福建：58—68元；③深圳、珠海：下限68元。

二部功：①国内一般地区：中功实业机构内98元，辅导站和贫困地区经报批备案后，可在68—88元之间浮动；②广

东、福建：98—118元；③深圳、珠海：下限118元。

海外人士学费为国内一般地区中功实业机构收费标准的十倍。

函授学费：一部功18元，资料磁带费38元；二部功38元，资料磁带费70元。

从三部功开始，只为拜师的弟子传授。

根据这个公开的标码，作一个最简单的计算：1990年张宏堡自称他拥有“中功”学员和弟子800万，1992年达到3000万，那么，“中功实业”的总收入该有多少呢？可以计算出来的。从他不到五年的时间，即在北京、重庆和西安等地分别建起数座“规模宏大、气势巍峨”的建筑物，也就可以知道他聚敛的大概。

《世界气功导报》是张大师创办的又一份报纸，在其1993年第6期头版上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生命科学麒麟城工程建设指挥部的通告》，内称“我院院务委员会决定：（一）任命我院特别顾问（都江堰原市委书记）徐××同志为‘国际生命科学学院麒麟城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将按照张宏堡亲手指导绘制的《麒麟城规划图》付诸实施。这个“指挥部”又发布《第一号通告》，号召各界给以各种形式的赞助。赞助分“个人与单位”两类，其中“个人”赞助的等级有三：3000元以上者，500元以上者，500元以下者。单位赞助有两个等级：50000元以上者，5000元以上者。此外，还有“联合包建赞助”，分三个等次：1000万元以上者，200万元以上者，50万元以上者。至于“劳务赞助”，另行规定。从已公布的工程项目看，有中兴宫、人民宫、慧觉宫、麒麟圣迹长廊、特医中心主楼和天使宫、帝民宫、仁义宫、神灵宫、功舞厅、聚引桥以及采练场、场疗楼、彩练亭、音乐厅、探奇亭、太阳亭、生物

钟楼等。这个事实说明，张宏堡索要的赞助费用，也大得可观。

第三节 走向祸乱

随着经济实力的膨胀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受到“万民景仰”的张宏堡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在组织内部，张宏堡可谓是一掌遮天，成为至高无上的“教主”。为了达到更大的目的，他在组织内部逐步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并实行高度的控制，外人轻易难以知道底细。经一些参与到组织内部的“中功”学员的揭露，“中功”的内幕和张宏堡的政治野心才开始曝露出来。

首先是“中功”组织的特殊管理。在内部，张宏堡是“中功”的始祖，尊称“宗师”、“特医师祖”，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在“中功”系统中，唯有张宏堡有资格被称为“师父”，其余则称作“中功传人、中功弟子、中功学员”，也称过“学员、教练员和中功弟子”。这些名称所代表的身份资格显然并不一样，但只能有张宏堡一个“宗师”或“师父”，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其次，“中功”的组织系统十分严密。“国际中功总会”是最高领导机构，还在国内一些省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有的叫“辅导总站”、“辅导站”，有时笼统地称作“基地”。此外在美国和我国香港、台湾设有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的“中功”干部，则由这个中央领导机构委派和监督，由专职人员担任领导。“中功”的省、市、县总站是保密的，而且经常换地点。在基地内部不准学员拍照，特别是“慧法厅”更是严禁拍照。基地内情要是泄露出去，违犯宗师程序，就要受惩罚。据“中

功”内部刊物《麒麟文化》报道，“中功”在全国有5000多家分支机构（同时又是“中功”的实业机构），18万骨干队伍，3000万学员。

在这个组织系统中，有一套完整的通讯网络，还有几个大基地，张在青城山发一个命令，当天或最迟到第二天早晨，就能传达到全国各基层组织。在这些基层组织中，专职人员就达上万人，他们每月都有工资收入。

“中功”通过吸引学员练功名义，把练功人变成“中功”的忠实信徒。“中功”的拜师授徒，有一套程序，象会道门黑社会一样。对入门弟子，他们要举行严格的拜师仪式，先全体起立，面对张的肖像双手合十，恭念“八德”、“八念”，坐下。由张的大弟子宣布门规门礼，从今往后违背师命就是背叛，后果不堪设想。每人都得宣誓。很多人填表要写：一生跟随宗师永不变心，“生是中功人，死是中功魂”。而且拜师要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要执行中功的一切命令，否则就是违背宗师程序。就这样把一个练功人，变成了中功的忠实信徒，几十万群众，对宗师顶礼膜拜，有的地方还喊出了张宏堡万岁的口号。

另一方面，张宏堡采取的“实业”形式，又形成了一种以“公司”、“企业”、“学校”、“文化”、“中心”等名命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张宏堡自任“总经理”、“所长”、“院长”、“校长”，以至于“荣誉会长”等，他的弟子则“大多成为麒麟实业各机构的顶梁柱，无愧一代精兵强将。”张宏堡宣告他“功成身退”、“隐退”、“云游”以后，这些头衔大都转移到他的弟子们头上，或任副职。

这样，“中功”体系与“实业”体系就密切地结合起来，气功、宗教与现代企业组织三位一体，以“中功”聚敛的财支

持“实业”的开发，再通过“实业”推动中功在“全国范围”和“国际”、“世界”的扩展；以“中功”的宗法式的组织纪律培养骨干，强化管理；又以“实业”的现代经营方式，安置骨干，提高成员的活动能量。这种一套班底、两种组织活动的形式，不但在西方一些新宗教中可以看到，而且在某些党政一体化的组织中也可以看到。

此外，“中功”还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国际中功总会”自称“本门”，或“中功本门”，一切“遵照中功张宏堡宗师的指示”办事。“要求中功传人、中功弟子、中功学员牢记张宏堡宗师的教诲”，因此，对其成员的处理就变成了“清理”门户，整顿“门风”。在“国际中功总会”还特别设有一个“纪检巡察团，在全国范围开展清查违纪传功行为”，“巡查和打击重点违纪行为”。据此种种，使这个以“中功总会”名义统率的体系，带上了相当浓厚的会道门色彩，所以张宏堡直言不讳地称“中功”体系为“弘法机构”。

1991年2月，“国际中功总会”发出“清门令”，“清除臧××等劣徒”。臧“曾任中功吉林省辅导总站站长”，后来“有了名气”，“利用一切机会显示自己，进而诋毁张宏堡宗师”，1990年底，“拼凑太极养生功”，表明他是“数典忘祖，利欲熏心”，以此“清理出门”。1992年9月12日，“国际中功总会”又将黄××“清除出门”，黄也曾拜张宏堡为师，并为“中功在广州的发展作了大量工作”，但“在传功过程中，喧宾夺主，突出个人，贬低宗师”，同时“不用张宏堡宗师的原版教材”，“不按中功总会规定的比例上交管理费用，以至于“公然与中功总会设在广州的基地和纪检巡察团对抗”，改“中功功法”为“医学腾龙功”。被清除的罪名，由“劣徒”上升到了“中功门内的叛徒、败类”。

张宏堡还在“中功”内部宣扬他这一套“麒麟文化”，鼓吹“麒麟文化”将“天道、地道、人道，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哲学融于一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介绍了安邦治国法和辅佐朝政法，“麒麟文化提出了一条适合东方民族经济起飞的最佳经济体制改革之路。”

张的野心还可从他建造的“麒麟城”略见一斑。1990年，张宏堡率亲传弟子选择了青城山，购了旧建筑，修建了“国际生命科学院”，并建起“麒麟城”。“麒麟城”包括四园二区六个建筑群。六个建筑群的中心区“天宇园”的主体建筑为“中兴宫”。“天宇园”西侧是“大同园”，它由六个风格各异的宫殿组织，分别代表世界上各种主要文化。一曰“人民宫”，代表共产主义文化；二曰“慧觉宫”，代表佛教文化；三曰“仁义宫”，代表儒家文化；四曰“神灵宫”，代表道家文化；五是“帝民宫”，代表天主教文化；六是“天使宫”，代表伊斯兰教文化。六座宫殿组合，暗示人类文明的前景万法归宗，世界大同，故名“大同园”，“大同于麒麟文化之中”。

“而在张宏堡研究出震惊中外的麒麟文化体系的地方，叫‘紫光阁’。张先生在这里进行气功修炼留下的场能，使这里成为千千万万气功爱好者长功开慧的圣地”（见《麒麟文化》第1期59页）紫光阁是中南海里主席、总理活动的接见外宾的地方，这难道是巧合？

张宏堡还在《麒麟文化》中宣扬：“历史怎么如此惊人地相似！二千年前释迦牟尼出山传道，众多门派和外道纷纷向他皈依；二千年后，张宏堡先生再扬大道之理，亦同样出现了类似现象……中功三千万学员之中，有两千多万是学习各家功法之后，最后选定拜皈张宏堡宗师和他的麒麟文化的。这种现象几乎是老子、释迦牟尼出山传道的历史重演，得道多助，百川

归海，古今可斯”（《麒麟文化》第42页）。

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个大师张光璧，是“一贯道”后改称“中华道德总会”的“道首”。建立起全国性组织，首领称“道长”，他也以表演“特异功能”和“扶乩”发展信众。“一贯道”发展信众号称百万，实际上有几十万人。解放后，“一贯道”被人民政府取缔了。

现在，“中功”也发展起号称三千万人，有宗师、有理论、有纲领、有目标、有门规、有执法队……

据2001年最新消息，“中功”被取缔，张宏堡逃亡美国。

第十二章 司马南“捉鬼”

第一节 司马南登场

司马南被称为中国的兰迪，与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一起，被伪气功大师们并称为“四大恶人”。何祚庥风趣地说司马南“司马兵到，心惊肉跳”。殊不知，这位司马先生，早些时也曾是个“大气功师”呢。

这位司马先生是1990年开始出场的。说起他的登场，与张洪林还有些关系。话说张洪林经常与一些媒体记者每月举行聚会，他们在聚会时感到，面对社会上甚嚣尘上的伪气功浪潮，应该采取一些反击活动。但是由于缺少经费，计划无法落实。这时，他们与中国科协的中国科普研究所取得了联系。科普所的郭正谊所长不仅是一位大力宣传科学、作风严谨的学者，尤其是一位对封建迷信、伪科学毫不留情的斗士，长期以来，主持了很多宣传科学，揭露伪科学的活动。加之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多年来与其他科学界人士一道，提交了很多有影响的提案。双方一沟通，立即决定由科普所出面主持、大家合力举办一个“弘扬科学气功，揭露封建迷信”报告会。

报告会于1990年8月10日在北京科技会堂举行。会议邀请了中宣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安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等政府部门领导，以及科学界、新闻界的人士共100多人参加。会上，除几位报告人作报告外，还专门安排了一位气功师的

表演。

只见这位大师面对正在高速运转的台式电风扇，平抬右臂，深深吸气，然后一个箭步冲至电风扇前，将右手食指迅猛插进电扇护罩，那正在飞转的电风扇戛然而止。看者无不目瞪口呆。

紧接着，这位大师又开始表演外气吸功。他骑马蹲裆，深吸数口气，连连运于左掌，接着把左掌死死接在盆底，但几次提掌均未将盆吸起，这时大师已满脸紫红，大汗淋漓。稍息片刻，改为运右手掌。这次将盆提起离地一尺多高，台下响起热烈掌声。

接下来，大师宣布开始表演耳朵听字，台下不一会便有十数个纸条送到台上。大师在台中间站定，双腿直立，两臂微屈，全身放松。台下又选出两位观众作为监视人。

递上的第一张纸条，大师摸了一下，说是个“弘”字，是蓝色圆珠笔写的，台下报以掌声。一位科协的干部声称是他写的。

第二张纸条，大师也摸了一下，说是“人民”二字，台下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时，有人提议应该让那些不信气功和特异功能人的前来瞧瞧。大师搭话了：“诸位，这一切都是假的、是魔术”。

台下惊呆了。

这位大师就是反伪气功斗士司马南先生。

在表演后，司马南又一个个将表面神奇的节目的内幕告诉大家，使与会者深深地认识到，面对神奇的表面现象，绝不可以眼见为实作为判断标准。整个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国内外都造成了震动，沉重地打击了伪气功猖獗的气焰。可以说，这次活动也是司马南开始以揭露伪气功的面目走向社会的重要

里程碑。

司马南，祖籍山东，1956年出生于黑龙江信安县。1977年考入某商学院，后来做了新闻工作，他自小爱中医、爱武术，也学得不少民间绝技。当他看到伪气功以特异功能为幌子欺骗社会时，便下定决心以自己的本领戳穿伪气功的把戏。

1989年，他和业余时间倾注了大量精力操练各种杂技，与中国作协文彩声像公司合作拍摄了录相片《神功内幕》，整个录相全是纪实镜头，像手掌怎样吸起脸盆，怎样从密封的瓶中抖出药片之类，在这里全部暴露无遗。

司马南还写了一部书《伪气功秘闻录》，详尽揭示了伪气功的各种骗术。这部书一出版举国震惊。甚至于1990年春节晚会已定的气功节目，只得删去了。这一下，司马南成了气功骗子的死敌。

第二节 挑战柯云路

在1989年，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大小书摊和部分书店都在卖一本《大气功师》。此书的作者是人们早已十分熟悉的作家柯云路。气功，是国粹，研究国粹当然也算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可是打开一看，全是气功师如何扑灭大兴安岭的大火，气功师如何预测灾难，气功师如何算命治病治邪之类的东西，但此书却为气功界或迷信神功的人所欢迎，一连几版，达到了近40万册的发行量。作家柯云路就这样开始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但《大气功师》却是小说体，又在文学刊物《当代》上连载，这类神怪连篇的东西完全用艺术的形式公诸读者。人们当时想，可能柯云路又想开辟一种娱乐文学的新路，好比港台作家大写武打小说或情爱小说那样，给无聊而寂寞的文坛增添

点什么。

但是不久，柯云路另一部与气功有关的书又发表了，它叫《新世纪》，副题《献给二十世纪》。但作者仍标定为小说，其中的神怪也就无可非议了。此书有大陆版和香港版。这可能就是他说的“科学小说”。

再后来，书市上突然见到《人体宇宙学——〈大气功师〉理论剖析》一书。这部书已不再标榜是小说或艺术了，有了“理论”标志。紧接着全国各地隆重推出了花城出版社为柯云路出版的《人类神秘现象破译》两大卷。读者们未能读完之际，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柯云路的最最“新”作《面对气功界——气功修炼的奥秘与误区》。至此，柯云路可谓一气呵成，为中国人民奉献了五大部有关气功的书。

柯云路在其著作及电视片中向世人隆重推介了数十位气功大师和特异功能人，基于柯在文学界的声望，涉猎知识的广博及其高超的写作技巧，他对神功大师的生动描述达到了非凡的宣传效果。随着其著作的畅销，个个神功异能人物经其辉煌包装之后君临人间，成为善良的人们顶礼膜拜的“神”。

柯云路不仅仅甘于做“大师”的吹鼓手。1994年，他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院地点位于北京西北部的五塔寺。因柯的总部设在这里，五塔寺很快就热闹起来。柯云路要自己做“大师”了。他每天在院中讲授自己创编的“中国气功九大技术”，一边示范动作，一边以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讲解着：“把手伸出去，伸向无限远，伸到宇宙外面……”

1995年11月，柯云路联合35家气功门派，发起气功康复万例病案大征集，柯俨然已成为所有功派的“总舵主”了。他自己也感觉非常良好，“现在香港说，最热的就是这个了，现

在讨论的主要问题成了柯云路问题了……”

自然地，柯成为反伪科学斗士的重点目标。首先向柯云路开炮的是国家体委科研所的李力研，他出版了一本专门揭露柯的书《柯云路的新神话》，指出柯是错误百出的“理论家”。此后，柯云路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筹建工作碰了壁，北京市科委和中国科协明确表示不同意筹建。1995年8月28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发出了“终止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活动的通知。随之，柯的生命科学研究院活动变成了非法活动。

接着司马南也将矛头对上了柯云路这个伪气功的大秀才。在《神功内幕》等反伪气功书籍中，直斥柯云路为“大巫”。1995年7月21日，柯云路在他的“生命科学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向首都一批新闻记者介绍他的“新疾病学”新著时，司马南直闯会场，当面指斥柯云路搞“伪神秘”。之后，司马南等与柯云路的各种较量时时见诸报端。

1997年底，柯云路推出70余万字新书《发现黄帝内经》，该书的上部“发现当代华佗”详细介绍了“神医”胡万林。这一发现再次引发司马南与柯云路的新一轮争斗，并直接导演了——幕精采好戏——

第三节 决战终南山

1995年起，中国陡然间出现了一个“盖世华佗”，据说医术如神，包治百病，什么癌症、肝炎、高血压、阳痿诸病，一应手到病除。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癌症，在“神医”手下据说可达90%的治愈率，一时引得病者朝圣般从全国各地辗转来寻。

这个“神医”就是胡万林，一个1997年5月才跨出监牢

的“奇才”。在这之前，他于1983年因杀人罪被判刑，而这已是他第二次入狱。这个出狱后几年中红遍中国的“奇才”，50岁生命史中有24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早年的胡万林学过一点中医，在新疆服刑时他曾尽力表现其医术，搏得了一点点好名声。1995年郭周礼在《国际气功报》上写了一篇题为“一个囚徒创造的神话”以后，某新闻机构向全国发了通稿，尚在狱中的胡万林顿时名声大噪，患者万里迢迢，前往新疆和靖县的胡万林服刑农场求医。

1997年底，作家柯云路推出一本70万字的巨著——《发现黄帝内经》。该书的上部“发现当代华佗”详细介绍了“神医”胡万林。说他在新疆行医四年中，收治各类疑难病症120万人，共治愈癌症（其中大多数为晚期患者）6400多例，聋哑等先天性残疾5420多人，牛皮癣、硬皮病等2200多人，心血管病7000多人，甲亢1000多人，各类风湿病1200多人，其他如帕金森氏症、骨质增生、前列腺肥大、不育症、胃、肠、胆、脾、肾、眼（高度近视、青光眼、斜视、弱视等）、喉、腰、腿等疾病以及低烧、脱发等多达数十万人。该书“翔实考察了胡万林惊人的医疗事实，全面深刻地破译了胡万林的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奥秘”。

《发现黄帝内经》一时感动了成千上万读者，掀起了新一轮造神运动。

各种社会力量谄附胡万林，胡“神医”临世了。1997年7月，他在太原开办了胡万林医院，治死20余人。1997年11月左右，在陕西长安县太乙宫镇开办了臭名昭著的终南山医院，引来10万人“朝圣”，闹出146条人命。针对柯云路新一轮造神运动，司马南决定再次赤膊上阵，探访终南山，决斗胡万林。《南方周末》于1998年3月26日以《胡万林司马南决斗

终南山》(作者:姜古仁、江平)为题对这一决斗经过描写得异常精采。以下节录该文:

1998年2月24日上午10点,司马南一行3人由北京抵达西安,下午2时许与前后抵达西安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两位同志,连同当地司机共7人到距长安县一小时车程的太乙宫镇采访“神医”胡万林。

山脚下,院子很大,一幢二层楼,其余为平房,令人诧异的是,到处贴满了标语大字报。“谁反对胡大师,我们就和他斗到底!”、“还我大师!”、“把心献给敬爱的大师——全国病人!”……

司马南等七人在院子里正忙着,突然间有人低声说:“大师来了。”只见一位面目和报上照片一模一样的人在保镖的护卫下快步走过来。他个子很矮,步子快而碎,面无表情。

院子里人不是很多,大师进了屋,人们仍旧各就各位。有人排队挂号,有人排队取药,有人闲聊,有人散步,其中有些不像病人的人四处游动。

司马南抱着相机,全然不顾周围的情况,在院子里一味地拍个没完。几个男人突然朝司马南吼:“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拍照了?”司马南回头的一刹那,突然一女人高叫起来:“哎呀!你是司马南,我认识你!”“司马南来啦!”女人向四周游动的人又呼又喊,又跑到各房子里面通报。

“在这种偏远的地方,会被人认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司马南事后说。

几位目击者事后回忆,司马南被认出后,立刻有人往门口跑,“出门”被封住,四周的人向中心移动。

走,已经来不及了。

“司马南，大师让你进去。”大师弟子把司马南“请”进了大师办公室。进门的时候，随司马南来的两位助手被一群大汉拦在门外，好不容易才获准进去。从这时起，这三人便与当地和中央电视台的同伴失去了联系。

“你就是司马南？”胡万林盯着司马南的眼睛问。

“您就是胡先生？”司马南在客气中有点调侃，“我是在柯云路的书上看到您的情况，我想知道柯云路去新疆采访过您吗？”

“他妈的，他采访我干什么？”

“那是您带着材料到北京找到柯云路先生的吗？在柯云路笔下您是一位高功夫大师……”

话没说完，胡正在抽屉里取小药瓶的双手停了下来：“他妈的，我找他干什么，谁说我是气功大师，我就打他！”胡狠狠盯了坐在其左侧的司马南一眼，提高了嗓门向屋中“陪同接见”的众人道：“妈的，我不是气功大师，我敢打气功大师，谁是气功大师我打谁！”

这时，一女病人进来取药，一瓶药放在胡的桌子上，胡用右手上去捂了两秒钟，挥手让病人把药拿走了。在柯云路书中，这个“捂”便是发功。

“书上说，您能治艾滋病？”

“怎么不能治？现在，这里就有三个艾滋病病人！”

“可不可以让我们见一下？”

“妈的，为什么给你们看，这要保密，知道不知道？”

“我这里不光治艾滋病，吸毒百分之百能治，公安部他妈的不让老子治！”胡骂骂咧咧。

“柯云路在书中把您写成了神医，华佗再世……”

“他妈的。华佗算什么，他能治多少病人，我治多少病人，

我治的病人他能治吗？”

“您是神医”，司马南顺着他说，“比方您每天看几百个病人，都记得住，记忆力真好，确实够神的。”

“能力大一些就叫神？谁说的？你说了算？他妈的。”

“有个孙静的小女孩，东北的，我了解她不是恶性肿瘤，柯云路书上却说是恶性转移，还说是301医院孟宪臣介绍给你的，可是人家不认识孟宪臣……”

话没说完，胡开始骂：“妈的，这个狗东西不说实话，孙静就是恶性，我给她治好的。”

“那您到底多大年纪了？”

“我也不知道我多大年纪了。妈的。”停了几秒钟，胡像自言自语，低声道：“64岁。”

“柯云路书上说您把18岁的姑娘扒光了衣服吊在树上打，有这么回事吗？”

“妈的，他爹欺侮我太狠了，我报复她。那时我小，十六七岁。后来我知道错了。”

“据说在您这里要先立‘生死合同’，是这样吗？”

胡立刻急了：“谁说的？”屋里胡的属下也抢白司马南，“医院作手术难道不签字吗？你什么意思？”

司马南正和胡万林对话时，一黑方脸大个子进来了。有人起身为其让座，此人虎着脸，司马南想使气氛轻松一点，说：“这位是院长吧？”

屋内众人道：“你错了，他不是。”

胡起身，推开司马南往外走，“妈的，放屁。”屋内的人立刻你一言我一语的指责起司马南对胡大师不尊敬。

少顷，门开了，闯进几位着警服却没有警徽标志的彪形大汉，胡万林进了门，右手突然用力推司马南，胡边推边说了一

句：“你桀骜不驯啊！”

司马南佯装听不清这句话，试图往外走，黑脸大汉吼道：“你把照像机、录音机全都交出来！谁让你偷拍偷录的！”

胡用力推搡司马南，其余人一拥而上，对着司马南又踢又打，几个彪形大汉显然训练有素，对司马南及其两个助手扭胳膊扭腿，加上帮忙的人连拉带扯推搡打骂出了门。

门口人更多，三人脸上身上多处挨了拳脚，失去反抗能力的三人被拖进百米之外的小二楼一层一个大房间里。

一进会议室，三人被驱赶到中间一堆桌子边的椅子中间，一群打手上前轮番拳打脚踢，司马南几度刚抬头，便一拳一脚飞来，不知是什么部位流的血，三人脸上手上不同程度挂了彩。司马南高声叫道：“你们别打人，我们刚从北京来，不了解情况，听我们讲好不好？”话音没落，又遭到更猛烈的拳脚。

围观者中一位穿警服的中年妇女附在司马南耳根对他说：“你们别反抗，别说话。这些人都是全国各地的，打死你都找不到人。”三人只好低头不语，任人打骂。周围则围了更多的人，天渐黑了，人们愤怒高喊：“让他出来，打死他……”一中年男人一直参与打人，这时有些累了，却装好人说：“叫你们出来是保护你们，交给群众打死你都没人管！”

那位黑大个用手使劲掐住司马南的喉头，憋得司马南透不气来，黑大个教训道：“偷拍偷录是违法的，今天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你把录音机交出来！交不交！”边叫边更加用力掐司马南，司马南被迫交出录音机，黑大个得意地说：“不是我抢的，是你交给我的，是不是？”司马南困难地点点头，黑大个拿走了录音机。

这期间，窗外连续有人跳进来施展拳脚，司马南的助手孙江左眼被打得充血。那些打手都散了以后，新进来的“病友代

表”对司马南他们继续羞辱谩骂不停。

查验证件，三人证件被翻开；曝光胶卷，照的和没照的全被野蛮地当众撕碎；销毁录音带，黑大个咬牙切齿挑开撕乱了一整盘。

不知道是谁的主意：“让他们写检查，写检讨，交代不清楚，不放他们走”、“山上 1000 多名患者吐口唾沫淹死他们！”

“写了也不能让出去，他就是司马南，专门反对气功的，他写了东西，出去又不这么说了，出去又会乱说，不能放他出去！”一上了些年纪的女人反复揭司马南“老底”，致使司马南又多挨了几拳。

“知道柯云路吗？”一跳窗户进来的小伙子质问司马南，“知道”，“为什么反对柯云路？妈的，你反对柯云路。”又是一巴掌。

突然响起一阵掌声，“大师来了。”有人说。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道，胡万林扭着碎步走到司马南面前，立刻有人为其放好了椅子。胡凝视着司马南，坐下后，以胜利者口吻说：“我脾气不好，以前说过不打人，今又打了人。我今天一见他，就想打他。”胡用手指着司马南，场上气氛又愤怒起来，人们拍起了巴掌。

胡口气突然变了：“气嘛，一分钟就消了，我今后保证不打人了，让人家认识有一个过程嘛。我还忙，先走了。”

随胡一同进来的那个人，是终南山医院的董事之一郭周礼。此人坐在胡的右侧，不动声色，事后，被打三人对照郭本人编的一本介绍胡万林的书中的照片，均认出此人。事后记者通过西安市有关方面了解到这个人涉嫌组织非法社团，被公安部门抓过，在其家中搜出 100 多万元现金和 40 多枚公章，其社团亦被民政部取缔，可是不知其走通了什么人的路子，郭又

担任《国际气功报》负责人，1997年，又因涉嫌台湾黑社会集团宋七力案件，该报被国家新闻出版署予以取缔，但郭仍以该报负责人身份到处活动。

胡走后，果然再没人打骂，人们安静下来了。为脱身，司马南小心翼翼地周旋，向患者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晚上8点多，还是不肯放人，三人被迫在胡手下的人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司马南一人被逼迫签了三份不同内容的悔过保证书。后来，胡手下的办公室主任提出让三人上楼。进屋以后，这位当时动手打人的办公室主任说：“误会了，误会了，咱们不打不成交嘛，今天感觉怎么样？”为尽快逃出来，三人连声附和：“没关系，我们特理解，不打不成交！”

一个十分有风韵的女人此时进屋来，扭着腰身向众人发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不等别人回答，这位女士自我介绍说：“我生在新加坡，长在纽西兰，工作在香港。因为得了乳腺癌，又扩散了，董建华、陈方安生给医院打电话，人家伊丽莎白医院都不收。来到胡大师这儿，只几副药，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你看，我像癌症病人吗？”

办公室主任突然提出“吃饭”。司马南说不吃。主任说，你们要是条汉子，就吃。三人被一群人围着下了楼，也没说明是去吃饭还是放行，在门口，再次见到被簇拥着的胡万林。这次胡很和蔼，像换了个人似的。“你们好好读我写的书，客观报道我们欢迎嘛，不要神化我嘛！一定不要神化我，我的癌症晚期治愈率只有50%，我不能包治百病。”三人哭笑不得。

胡没有坚持让“吃饭”，别人也没逼。一外国人挽一姑娘（中国）主动送三人到门口。一俟确知后面没人，三人疾步如飞，终于逃出了噩梦般的终南山。

进了城里才发现，司马南手表也被抢去，皮衣被撕了大口

子，西服扣子也没了，随行的小薛脖子、耳后到处是血痕，小孙的左眼充血肿得老高，流泪不止。尽管如此，三人还是暗自庆幸。

第三天（即2月26日），《北京青年报》、《成都商报》二位同志到终南山采访，一进去也被盯了梢，并被勒令不准拍照，不准录音。这二位记者后来对公安局的同志说，胡万林五次提到，司马南前日在此被打得跪在地上求饶，胡指着地上得意地说：“就跪在这里。要不是我拦着，患者就会把司马南打死在这里。”两位青年记者听罢，不寒而栗。

胡万林想不到的是，这种狂妄的自供恰好为执法机关提供了证词。

2月27日凌晨，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布署指挥下，西安警方联合行动，出动600余警力，100多辆警车，直捣终南山。胡却在公安行动前畏罪逃走了，留下了一帮小喽罗被干警一网打尽。

就在陕西警方出动上千警力取缔该医院时，胡“神医”却能在警力合围之下悠然逃逸，在信徒的保护伞下，躲在了北京。

1998年6月15日，胡“神医”在河南商丘市卫生局及相关部门力邀之下，来到商丘创办卫达医院，先后治死30余人。被治死的典型案例是：刘法民、崔桂云、何素云。

河南省漯河市长刘法民在北京被诊断为肝硬化。9月24日，刘法民在夫人、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商丘卫达医院，经过“胡大师”几秒的“目测”之后，刘法民拿了被胡万林称为“活水”、“神水”的“药”，并于同日下午住进该市××大酒店。当晚，刘法民按“胡大师”的“服药须知”服药后，即呕

吐、腹泄、呻吟不止。第二天，刘再去卫达医院看病取药，晚上服药后又是呕吐、腹泄，凌晨一点以后刘法民就有了全身抽搐的反应，后来还伴有昏迷。他的夫人和女儿只得将他送到卫达医院。因卫达医院无法救治，刘又被转往商丘市中心医院，此时已是深度昏迷，全身抽搐严重。同日下午，由河南卫生厅领导率领的抢救专家赶到商丘，在专家们的全力抢救下，刘法民病情有所好转，9月26日上午，刘被转往郑州市河南省人民医院抢救治疗。9月27日早上，刘法民市长在郑州去世。

何素云，一位55岁的商丘市优秀小学教师，患高血压病。1998年9月，何素云的女儿傅春梅听说商丘新落成的卫达医院请来了一位神医，包治各类疑难杂症和不治之症，于是专程去咨询，得到院方百分之百肯定回答，并从“神医”手里买了柯云路写的《发现黄帝内经》一书。何素云看过此书后，对“胡大师”的医术深信不疑，遂于9月28日来到卫达医院，求见“大师”。胡万林说：“我治高血压就跟治感冒一样。”何立即得到了“大师”的一张纸条，领药回家服用。希望驱除高血压的何素云，每天喝下实为芒硝药水的“神药”。那药一下肚，即感腹内火烧火燎，肠胃如翻江倒海。喝了第二次，何便感体力衰竭、目眩头晕。10月1日第三次服下，便晕倒。傅春梅慌了手脚，陪母去找胡万林。胡称：“我的药就是让你反复的，有反复就好了。”说着对着一瓶纯净水作发功状，完毕将水交给何说：“喝过它就没事了。”何依言照服。下午傅春梅发现母亲已不能动了。抬到无人理睬的卫达医院后，胡撂下一句话就走了。未几，病人断了气。

胡治病的核心理论是：人生百病皆因水，病了的人就该用芒硝强行“脱水”——芒硝在中医上用作强泻剂，常人用量不超过10克，而胡是大把加用，一天数次。导致所有求诊病

人迅速上吐下泻。此虎狼之药致多人于死命。

“胡大师”搞出的命案被媒体曝光，举国一片哗然。商丘警方先对胡万林拘传，后转为监视居住，但胡旋即隐匿无踪。

1998年12月9日，因长期非法行医惹出多宗命案的“神医”胡万林在上海被公安机关扣留，商丘警方闻讯后迅速派人将“胡大师”押回商丘，等待他的是法律的惩处。

第十三章 1995 年向伪科学宣战

1995年，是科学界揭批伪科学最热闹的一年。随着中央关于科普工作《意见》的下达和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我国反对伪科学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众多新闻媒体的积极参与，形成了反伪科学的新高潮。

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要充分认识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这项工作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对利用封建迷信搞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依法打击，对反动会道门组织要坚决依法取缔。”

1995年5月28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会上作了《迈向科技大发展的新世纪》的报告。他作报告中说：“现在社会上有人鼓吹可能存在新的相互作用力，以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辩护，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这一通知一会议，等于是吹响了向伪科学、伪气功宣战的号角。

在这一年，一批伪气功大师纷纷落马。4月中旬，“法力无边”的“佛子”张小平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落入法网。张小平，男，吉林省东辽人，曾因盗窃、嫖娼等受刑事制裁。自称是万法归一功第五十七代传人，行骗许多省、市，1995年4月被捕。中央电视台驻武警记者张玲从1993年2月至5月跟踪

张小平辗转石家庄、广州、湘潭、桂林、梧州、郑州等地，看到大师触目惊心的诈骗行为，她撰写了长篇报告，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举报了张小平的罪行。

张小平于1991年伪造邓小平题词，冒充邓的保健医生，谎称什么邓小平“六四”后得了重病，人家都治不了，是他给治好的。“我告诉邓小平，我要在深圳办一家公司为慈善事业积累资金，邓小平说：‘好啊！祝你们公司步步上进’，并给我们题了词。”“邓小平的病好后，邓把杨白冰找来，要我当师级干部或军级干部，给我钓鱼台八室一厅小楼一座，并配汽车一辆。我不愿意当他们的佣人，所以没要。”还说什么“在北京时，我是专门给中央领导人看病的，部长级的干部我都不给他们看病。”“我四月要回北京二三天，准备搭中央首长专机回去。”“聂荣臻病危，中央让我回去给他治病。”“我在蛇口，但是还要给中央伟人发功治病，累得够呛，这是拿我的命换老头的命。”

张多次扬言说，“我认定了，我就是第二个毛泽东。你们是党员的，把党的关系全调过来，由我任党委书记。”在他所写出版的《中华奇宝——“万法归一功”密传真经》一书中的扉页上印着两行大字：“东北出了个红太阳”，“佛子张小平——一个注定要震惊世界的人！”

张小平在气功治病中共治死6条人命。张玲跟踪张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他及手下弟子，治死了梧州气功协会会长徐然。1993年在湘潭举行的万人治病活动中，张将29岁女子刘满珍治死。

张小平还冒充军人，诈骗巨额钱财。张经常身着上校军官服参加各种活动，说自己是“总参某种特警的高级教练。”称“国防科工委我有办法，导弹也能弄出来卖。”

张注册 100 万元在蛇口企业集团公司下办了永龙公司。他曾说：“如果买卖做不成，我们就搞官倒，我可从经贸部弄批文物来卖。”“我请邹家华当公司顾问，他说他不成，让他爱人当。”“杨得志上将、罗之发中将也是我们公司顾问。”“办公司没后台不行。”他还为自己找退路，说“永龙公司要在国外办公司，到时候我就往国外跑，要留这一手。”可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往国外跑，就已被收监。张小平被收押表明，以搞气功为名、行诈骗等违法之事的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张宝胜也是在 1995 年得到充分的曝光。5 月 26 日，《北京青年报》发表《“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揭露了张宝胜在 1988 年 5 月的那次表演失败和作弊的过程。

与张宝胜处境类似，严新在 1995 年也不好过。7 月 26 日，《工人日报》发表五篇评严新在清华大学做的“气功外气”实验及其它一些表演的文章，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这些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认为那些实验和表演“甚不科学”。8 月 9 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访了原清华大学科研处处长张宏涛，他重申五年前的声明：严新“科学”实验与清华校方无关。并声明，“严新不是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学校也从未聘请过包括严新在内的任何气功师担任教师或兼职研究员。”

柯云路在 1995 年也深受打击。6 月 20 日至 24 日，柯云路以“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身份组织了“柯云路健康万里行报告团”，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报告会。后经有关部门调查，这个“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是一个未登记注册的非法组织。8 月 5 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作出“停止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筹建工作”的决定；12 月 5 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今后如有人以‘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名义从事违法活动，有关部门将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罚。”7 月，司马南著《神功

内幕》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书中称柯云路为“大巫”。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官杉的文章:《灵魂的新装——评〈人类神秘现象破译〉》,揭露柯云路装神弄鬼的面目。

与大师们的倒霉相对应的,是科学家们的扬眉吐气。他们在这一年里,大声疾呼,高歌猛进,痛打落水狗。1995年2月,中国科学院112名院士联名签发“科普倡议书”。希望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来反对伪科学。

3月5日,《中国科协报》发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在中国科协四届五次会会议上的发言:《大力开展科普工作,坚决反击伪科学》。

6月2日,何祚庥、郭正谊、胡亚东、邱仁宗、张洪林、张彤玲等人共同署名,发出呼吁:《该揭露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了》。呼吁中说,在中国大地上闹腾了十多年的伪气功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它是一些巫医、骗子聚敛钱财的手段,是一些心怀叵测之人藉以组织非法宗教的工具。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不安定因素。伪气功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所制造的种种“奇迹”,是可以破译和解释的,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从报道第一例“耳朵”听字至今16年来,无一例符合规范的科学实验,能证实所谓“特异功能”的存在。相反,那位号称中国“第一奇人”的“特异功能大师”,多次在表演中做手脚被人识破。去除对他们的特殊庇护,揭露他们并不困难。

呼吁最后说,前不久在日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事件。仔细考察一下麻原的学说,与伪气功相似之处甚多;麻原本人就有所谓“特异功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警醒,趁伪气功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还未演变成真理教那样的邪教,还未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事实上,十余年来死于伪气功者、因练伪气

功而精神失常者已经不计其数了), 我们已经到了清算伪气功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时候了。

何祚庥还质疑说: “十几年来充斥于中国土地上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 ‘科学’乎抑‘闹剧’乎?”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6月10日在《法制日报》发表文章讥讽“伪气功”说: “……中国不是缺乏资金吗? 只要请几位当代济公爷出来, 运用他的‘意念摄物术’就可以把外国银行、仓库中的苏金美钞源源摄来, 为我所用, 何必去申请什么‘世行贷款’, 加入什么‘关贸总协定’呢? 患了绝症也不必寻医求药, 只要请几位大师在电台上布功传道, 无论远近都可不药而愈……”

6月, 中国科协酝酿成立了一个包括多方面人士的“保卫科学精神、反对迷信愚昧”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于9月在友谊宾馆以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大型研讨会。

8月21日, 《工人日报》报道: 8月5-9日, 在广东汕头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 与会华裔科学家纷纷向中国科技界表示祝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人表示支持中国科学界、新闻界、支持何祚庥反对伪科学、伪气功。

9月21日, 中国科协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捍卫科学精神”研讨会。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作了《科学终将战胜迷信、愚昧和伪科学》的发言。

长时期以来, 一些人借“三不政策”的名义, 压制媒体对伪科学的批评。在1995年反伪科学的大旋律中, 受到压制的媒体也充分地参与进来, 与专家学者们一起共同开展揭露活动。

1995年4月14日,《北京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司马南揭神功内幕》的文章。

1995年5月《海口晚报》记者采访了到海南讲学的于光远。在谈到对气功的看法时,于光远说:“气功作为一种体育锻炼的方法,我既不简单地反对,也不简单地肯定。但气功中的所谓‘外气’是违反物理学基本原理的,我要坚决地反对和揭露。”

5月11日,《北京青年报》发表题为《妖言·邪教·恶行》的杂文,文章说:日本东京地铁毒气案余烟未散,又有美国俄克拉荷马城一炸惊天。值得人关注的是,这两桩滥杀无辜、令人发指的恶行,竟都与倡行济世救人的宗教组织有关。……当我们惊异于异国的邪教恶行时,自然也应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邪教行动产生足够的警觉。近年来,国内上下大兴“气功热”,朝野双方热好此道者如过江之鲫,本来气功这玩艺只是方外之人寻求清静,江湖人物混饭吃的手段,没想到今天居然破门而出,来这茫茫尘世搅混水了。……作为一个以正统自居的合法政府,绝不该拘泥于纠缠那些乱七八糟玩艺的真伪,而是不论真假,一概射杀!……其中有不少人是以“进过中南海”,“为某某治过病”为号召,俨然奉了尚方宝剑,便可以大行其道了。这真该令我们全民族警醒,令“有关部门”重视了,该禁止的便明令制止,该辟谣的也不妨辟谣……

5月12日至6月2日,《北京青年报》分四期刊登了司马南的文章《伪气功纵横谈》。司马南在文章中揭露了种种假气功现象。在回答有无真正的特异功能现象这一问题时,他在举了“在一个高层次的表演场合,一位‘中国超人’以简单的魔术手法冒充特异功能去行搬运,抖药片,结果,当场被魔术师给戳穿”一事时说,“据此,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

论：所谓特异功能之中，有的是假的……对搬运术一类特异功能，从心理说，我希望有。因为有，世界会变得更更有魅力……但是，考虑到百多年来，古今中外这类超自然现象屡屡被揭穿的历史事实，联想起我这些年追随某些‘神人’、‘超人’、‘大师’一再上当受骗的经历，我又倾向于认定无。”

6月，《中国青年》第6期发表反伪科学专题：《科学与伪科学——世纪末的较量》。

6月30日《南方周末》载文说：“……从第一例耳朵认字的报道到现在，已经是16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应该冷静地反思一下了。16年的研究开发，除了耗费国家资财、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之外，‘特异功能’有什么惊人的发展吗？而使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如此长时间地被一种伪科学蒙蔽而久久不能醒悟，这本身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

7月26日，《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一些科学家在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呼吁：科学殿堂不容玷污！认为气功师严新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合作从事的所谓气功科学实验，完全不具科学性，违背科研规律和起码的科学实验原则。该报同时在第五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些科学家的意见。

8月3日至8月16日，《工人日报》连续在头版头条发表炮轰“伪气功”的报道及本报评论员文章。认为所谓“气功外气”等神话之所以到处云遮雾罩，就因为科学说话的机会太少，在许多问题上，还是名人说了算，长官说了算，而不是科学说了算。

8月3、4、5日，香港《中国时报》发表“大陆反思特异功能系列报道”：《媒体“发功”，特异功能首当其冲》；《“超人”特异功能，多属子虚乌有》；《伪科学蒙蔽人心，十二亿人

之耻》。

8月8日，《工人日报》以“伪科学为什么在当前的我国泛滥？”为主题召开科学工作者座谈会。龚育之在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是共命运的”的发言。

12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记者孔晓宁的文章：《向伪科学宣战》。

这一年，是科学与伪气功展开大宣战的一年。就在伪科学节节败退之际，人体科学小组的核心人物***“并没有退缩，他在上层领导询问有关情况时，上书申诉自己的观点。有关领导认真听取和研究了***的意见，于10月份制止了不恰当的大批判，于年底重新肯定了人体科学工作”，“人体科学工作转危为安”。

1995年以后，科学与伪气功之战又翻开新的一页。

第三部

“法轮功”大起底

第十四章 “大师”真面目

第一节 李洪志“出山”

一、“大师”身世

1999年4·25事件后，“法轮功”和李洪志就成为广受中国乃至全世界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正是此人，将中国20多年来特异功能和气功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发展成为邪教组织。那么，李洪志又是如何从一个气功大师发展成为邪教教主的呢？他的邪教与特异功能和气功又是什么关系？李洪志的“神功”又是如何被识破的？且让我们从李洪志的发迹史一步步说来。

李洪志原名李来，乳名叫“小来子”，男，汉族，1952年7月7日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公主岭镇（今公主岭市）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家庭。1955年随父母迁入吉林省长春市。

小来子7岁开始上学，1959年8月至1966年7月，在长春市珠江路小学读书。班主任杜老师办公室的墙上常挂着一把小号，李来每次到办公室，都被这小号所吸引。终于有一次他鼓起勇气向杜老师提出，他要学吹小号。经过一段时间的磨蹭，老师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也许是吹小号给耽误的，李来由于学业成绩不好，在小学留过两次级。但吹小号又在后来给李来带来不少好运气。

1966年，李来升入长春市第四中学读初中。这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具有革命色彩的李洪志。

当时，在长春市第48中学有一个实力很强的“毛泽东思想战宣队”。由于李洪志会吹小号，1969年48中就把李洪志“挖”到那里去读书，并加入到演出队里变成“专业”演员。

李洪志在长春市48中学读了半年，于1970年3月份，凭着吹小号的一技之长，李洪志又被部队军马场招文艺兵招走了。参军后，李洪志被安排到解放军内蒙古自治区201部队“八一”军马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了小号手。在军马场待了2年零10个月，近3年的时间可谓乏善可陈，李洪志又面临转业。

1972年12月，李洪志的母亲找到吉林省森林警察支队领导，说她儿子会吹小号，请求把他调到支队宣传队工作。森警支队领导考虑到李洪志父母离异，其母带着4个孩子，家庭生活困难，就这样将他调到吉林省森林警察支队文艺宣传队任小号手。1978年5月，吉林省森林警察支队的宣传队解散，他被分配到森警支队的招待所当服务员。与李瑞结婚后，李瑞的父亲于1982年4月托人把他调到长春市粮油食品供应总公司保卫科当了个干事。

1982年，李洪志的女儿李美歌出生。这本是一个平常人家，但李洪志后来竟吹嘘起他这个女儿，说成是他师父，说她3岁时就能看见李洪志的身后有神仙站着。后来李洪志还常常用自行车驮着自己的这位师父四处传功治病，说他女儿可以看见人家肚子里的五脏六腑，甚至看见人家腿上盘着龙。

30岁的李洪志已经成家立业，生了女儿，这使家里的生活显得拮据起来，他干起了倒卖自行车的行当，单位劝其下海，自谋职业。李洪志一时慌了，急忙找已经调到国家机关工

作的妹夫刘佳，请他帮助到粮油公司为他说情，总算保住饭碗。

这算是“大师”李洪志的“史前史”。此时的他，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后来他发达以后，却将这段日子吹得天花乱坠，似乎他一生下来就非同凡响，不过这是后话了。

二、入门学气功

80年代初期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一股特异功能热，并发展成为气功热。在这股全民练气功健身热潮中，爱赶热闹的李洪志也被迷住了，成天围着气功师看热闹。不过在后来李洪志的“自传”中，他这看热闹不叫“看热闹”，叫“考察”，《中国法轮功》的附录是这样写的：“从1984年开始，李洪志先生对国际国内的气功事业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并且参加了一些气功传授班”。

其实李洪志学习气功是从1988年才开始的，此前一直为生活所累，忙于倒腾紧俏商品，对气功仅仅限于看热闹，或者曰是“考察”。他发现，很多气功师就那么比划几下，就能够赚取好多的银子，这使他很感兴趣。他还发现，其实气功并不难学，那些功法动作，跟“文革”期间跳“忠字舞”差不多，对这个在戏班子里混的李洪志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于是，李洪志决定从事“气功产业”，决定当大师来挣钱。

1988年1月，在长春的吉林省气功科学研究会康复中心禅密功学习班来了一个新学员，他就是李洪志。这个学习班的老师名叫李卫东，他是吉林省气功协会的常务理事，掌握两门功法，一是禅密功（号称为“佛家功法”），二是八卦掌，另外还会推拿、针灸、按摩，有临床经验，1994年还曾经去加拿大讲学。李洪志就参加到禅密功学习班来，连续参加了几期

“禅密功”学习班，平时对练功也非常入迷。后常到李卫东开办的气功门诊部学习、切磋功法，有时也帮李卫东给人看病。可以说，李卫东是李洪志练气功的启蒙老师。后来还成为李洪志在吉林登记“法轮功”的引路人。但是李洪志在成名以后，从来也不提这一档子事。

李洪志在禅密功学习班里还认识了一个人叫于光生，他是长春地质学院的，会“九宫八卦圈”（号称为“道家功法”），功法特点是“走圈”，边走边比画些动作。李洪志在学完禅密功，就又跟着于光生学“九宫八卦圈”。

李洪志练气功还真是很“用功”，他还在自己家院子里画上一个八卦圈，经常在上面练功。有了十多年来在文艺宣传队的功底，李洪志学起气功的招式来还挺快，学得很像。打算靠气功谋生的李洪志不同于别人，练练功锻炼一下身体就完了，他一边学习，一边观察，一边琢磨。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和琢磨，李洪志就觉得自己有些上道了，也开始给别人治起病来。在单位，李洪志也时不时给人露一手。弄来弄去，李洪志会发功治病的消息还真在单位传开了，不时有同事找他给治一下，结果如何，也没人知道。

三、创立“法轮功”

到1989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为别人治病，李洪志又开始招收徒弟，向别人传授气功了。一开始，因为“九宫八卦圈”对他的影响较大，他就教人练“九宫八卦圈”。后来李洪志跟于光生闹翻了，李洪志就以“禅密功”和“九宫八卦功”为基础，摹仿一些舞蹈动作，拼凑了“法轮功”的动作和功法。据李洪志的早期弟子李晶超证实，“法轮功”的动作、功法是李洪志与李晶超共同设计的，直至李洪志“出山前的一

个月才初步形成”。李洪志办班传功初期，是由李晶超在台上演示动作，李洪志做讲解。据李洪志早期的合作者刘凤才说，刘曾对李的“法轮功”讲义修改了70多处。李洪志的另一个早期弟子宋炳辰的儿子宋念原还进一步将“法轮功”与李洪志学过的“禅密功”和“九宫八卦圈”作了具体的比较：一、佛展千手法：由“禅密功”的形神桩第一步功捧气灌顶和六通功演化而来；二、法轮桩法：由九宫八卦圈的第一步功八卦圈，不走圈变站桩，把明显为八卦掌的动作去掉；三、贯通两极法：与禅密功的阴阳合气法相同；四、法轮周天法：源于八卦掌排打功的周身排打法，把排掌的动作去掉，直接用手近身一划；五、神通加持法：前半段源于禅密功的捧气灌顶坐功，后半段为一些揉球动作，以表示怀抱法轮……由此可见，“法轮功”的动作虽然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都是由禅密功和九宫八卦圈拼凑而成。

李洪志为什么要把他的气功定名为“法轮功”呢？这也与他师从李卫东学习“禅密功”和随于光生学习“九宫八卦圈”有关。“禅密功”号称“佛家功法”，这使李洪志从一开始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的一些东西。而“法轮”则是佛教中一个很常见的名词，是古代印度佛教的一个术语。“法”代表佛法即佛教的一切行为规范和教义，佛教认为佛法是普遍存在的不变的真理。古代印度军队在作战时，使用战车，用会转动的车轮碾碎敌人。传说有位转轮法王，转动金轮，降伏敌人，统一了国家。佛教用强大的车轮比喻佛法，称之为“法轮”，含义有三：一是有无坚不摧之义，指佛法像转轮圣王的轮宝一样，能摧毁山川岩石、人间的罪恶与众人的迷惑；二是有常转不停之义，指佛法永继，佛对众生说法如车轮辗转不停，降伏恶魔；三是有圆满之义，指佛所说的教法像车轮一样圆满无缺。释迦牟尼

最初在印度一个地方为五位出家弟子宣讲佛法，是为佛教之始，佛教内称之为“初转法轮”。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周流不息，佛教内称之为“法轮常转”。法轮在佛教中用作一种精神象征，广泛用于寺庙、佛教用品和书刊中，成为佛教的标志。而李洪志盗用佛教“法轮”一词作为他所创立的气功门派名称，自然会使人感到他这个功法与佛教有关系，让人觉得他的气功是有来头的。而“法轮功”的“法轮”，凡是练过于光生的九宫八卦掌的人不会有陌生感，于光生讲八卦盘，说“我把八卦盘在你们的全身，你们全身到底都有我的盘，在不停地旋转，像飞碟一样。”这与李洪志的“法轮”除了名字不同，基本上没有两样。

在1989年初，李洪志就在北京先后收了杜某、张某夫妇、宗某、李晶峰和李晶超兄弟为弟子，传授“九宫八卦圈”。李洪志说，“你们走圈，气机是九宫八卦的，外圈我加上了莲花，是‘法轮功’”。可见李洪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熟悉了气功的术语，而且还自编了一套功法。不过此时的李洪志还没到后来的层次。没过几天，杜、张夫妇从李洪志言谈中了解到，李洪志对许多气功常识都不懂，与他们想像中的师父相差太远，于是不辞而别。但另外3个徒弟仍然跟着走圈。后来，在《中国法轮功》一书中，这3个弟子就成了李洪志的大弟子，他在书中吹道：“经过两年多的观察，这几个徒弟均达到很高层次。‘三花聚顶’在其他里是需要经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苦修才能达到的，而修炼‘法轮功’两年就已经有人达到了这样的层次，足见其长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法轮功》第189页）

1990年5月至9月，李洪志一家去泰国探望其妹。泰国遍地是佛，在泰国期间，他学了一点粗浅的佛教知识，并接触到

了境外邪教组织“灵仙真佛宗”的宣传品、有关特异功能的书刊。从泰国回来后，李洪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晶峰说：“他从泰国回来之后跟我说，他现在是高处不胜寒啊，我问怎么个高处不胜寒？他说‘我这个功夫现在是太高了，阿弥陀佛就相当于我一个小拇指头，太小了。’”

李洪志从泰国回来的另一个收获，是他学来泰国僧侣从着装到手势的招招式式，这对李洪志日后装扮神仙大有帮助。

四、正式“出山”

1991年，李洪志决定从单位“留职停薪”，专心去发展他的“法轮功”。

李洪志出山初期的敛财方式之一是在家里给人发功治病，让病人捐“功德”。李洪志宣布，治病不收费，但是他家门就放着一个“功德箱”，让来求医的人自己看着办，多多益善，少则心不诚。人们一般也都不会少给，通常都给50元，多的数百元。有人如果只给个5元10元，李洪志就当着众人的面说那人小气。

李洪志敛财的另一个方式是网罗气功爱好者来办班，收取培训费。长春胜利公园猴山一带是长春市民许多人晨练的地方，也有不少人在那儿练气功健身。李洪志在猴山摆出一个地摊，开始传播“法轮功”。通常是开始由李洪志在像江湖上卖膏药的一样，扯开嗓子讲解他的“法轮功”，讲“法轮功”如何好，如何容易学，而别的功法又怎么不好。等到看的人多好，吹的火候也差不多了，弟子李晶超就装作不认识李洪志，带头报名，带动其他人。这样，天天早上去表演一番。经过一番苦心，还真有人动心了，开始有人报名学“法轮功”了。后来，在李洪志闹成气候以后，猴山就成了“法轮功”的“圣

地”，长期被一些“法轮功”信徒占据，作为练“法轮功”的地方。在李洪志的生日和“出山日”，一些人还到此来朝拜。

转眼到1992年。这一年摆地摊的李洪志告别街头卖艺，开始登堂入室。长春五中礼堂是李大师举办大规模传功报告的第一站，1992年5月15日，李洪志开始在此传功，举办第一期“法轮功”培训班，正式向社会推出他所创立的“中国法轮功”，参加人员有60人左右，每张门票30元。这所是其所谓的“出山日”。这次开班可以说是让李洪志非常满意。旗开得胜，对李洪志很是鼓舞。接着，李洪志又在长春五中办了第二期“法轮功”传授班，这次参加的学员更多了，超过200人。两次办班，李洪志的收入达10500元。从此以后，李洪志就一发而不可收拾，走上了气功致富之路。

接下来，李洪志又在某空军俱乐部一连办了两期培训班，学员达1600人，收入4.8万元。当年秋季，李洪志又在吉林省的一个机关大礼堂办班一次，学员达800人，收入2.4万元。这样，一年之内，李洪志就通过开办气功培训班收入数万元，而且还培养了数个大弟子。宋炳辰就是其中的一个。宋炳辰是长春市某单位的办公室副主任，在参加了“法轮功”培训班之后，就成为李洪志早期的合作者。正是他在此时亲手帮着李洪志设计形象，为李洪志精心包装。宋炳辰会照相，就建议李洪志用照片来演示，这样效果更直观。于是，他们就在戏装店买来一套戏服，让李洪志穿在身上作练功服，在长春地质官的一块草坪上，让李洪志摆开当年在文艺宣传队里学的舞蹈动作，加上一些在泰国见过的僧侣的手势，拍了一组照片，再排版成图样，作为练功的姿势。李洪志在后来出版的《中国法轮功》一书中，还附有功法图，那就是宋炳辰的作品。李洪志的莲花法像照片，也是以宋炳辰的作品为基础制作的。李洪志的

老婆和早期弟子赵洁民一起，亲自剪了一些莲花，一片一片贴到照片上，移花接木，就拼成了李大师的莲花宝座照。

这个宋炳辰当时很是相信李洪志，马前马后为李洪志效力。有一次，为了李洪志，宋炳辰利用自己的职权，把单位新买的一部进口汽车开出来接送李洪志，结果撞坏了。李洪志对此也没有任何表示，连修车费都不出。害得宋炳辰还受了处分，降了半级职。李洪志还四处说：“嘿，要不是有我李洪志坐在车上保佑了，还不知车会撞成什么样儿呢！”后来，宋炳辰看透李洪志的真面目，不但与他分手，还成为李洪志的死对头，从1994年就开始四处揭露李洪志，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

为了名正言顺，李洪志想起了到吉林省气功协会进行注册登记。可是，要进行气功登记得有人推荐。这使他想起教他禅密功的老师李卫东，李是吉林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的，也是省气功协会的常务理事。于是，他找上李卫东，让他帮忙领着李洪志去办理“法轮功”的注册登记。李卫东见到他的功法很简单实用，也见不出有什么问题，就领着李洪志到气功协会的理事长家去了。想不到李洪志一到气功协会理事长那里，就一通胡吹，什么几岁就得到高人指点，练功学道法，前后共学过些什么道法之类。理事长一听就觉得太夸张了，十分反感。批评李卫东怎么领来这么一个胡说八道的人。李洪志注册登记一事自然也就黄了。注册登记没有成功，李洪志迁怒于李卫东，认为是李卫东嫉妒他，不给他帮忙。跟李卫东也就翻脸了。

第二节 “法轮功”成势

一、北京占山头

在长春发展了一段时间，空间终究有限，知道他底细的人

又多，加上注册没有成功，这些都让李洪志挠头。好多气功师当时都在北京进行宣传，在北京搞起来了，在全国也就有知名度了。于是李洪志也决定进北京发展去。

1992年6月底，李洪志就与大弟子李晶超带着5000元到了北京，刚到北京那会儿，李洪志还真有些找不着北，连吃住都成问题。只好轮流在他的弟弟或李晶超的哥哥李晶峰家里打秋风。这李晶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当解说员，练就一副好口才，能说会道。

要在北京发展，还得办好注册登记。李洪志又请李晶峰帮忙，前往气功科研会，看可不可以办成一个气功门派。要登记，就得先了解情况。李洪志于是就介绍功能功法，这个功如何如何好，可以治病健身，此外，本功法还强调功德，讲究一个德，就是“真善忍”。

按气功科研会的规矩，要登记成功，还得先举办讲功咨询，看看功力怎么样，疗效如何。在气功科研会的安排下，李洪志先搞了一段时间的咨询调理。当时李洪志看病，不像气功师，倒像是神汉巫婆，病人来了以后，给人身上喷酒，然后拍拍大腿，完事。

接下来是办班讲功。以带功报告和给听课人发功治病为号召。在一些大机关礼堂举办“法轮功”学习班，两个月后，1992年8月，李洪志的“法轮功”被注册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的低层次研究组。

不久，李洪志过河拆桥，和他的大弟子李晶峰闹翻了。原来，李晶峰有一次给门头沟一个白血病患者看病，看的效果比较好，李洪志就向李晶峰要钱，李晶峰说我没收钱。李洪志不相信，说不给我交钱我就开除你。就这样，把李晶峰给开除了。在李洪志开第三个班的时候，他就宣布说：“我有一个弟

子，我把他的功法给废了。”

1993年4月，李洪志扛着北京的招牌，又回到长春老家申请注册，被长春市气功科学研究会接纳为下属的专业委员会。注册以后，李洪志十分得意，有一次他在长春趾高气扬地说：“国家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一见我，看到我身上的功夫好，在座谈时我发表的见解都是高层次上的东西，他们从来没听说过。”

1993年8月，“法轮功”又升级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直属分会，直到1996年11月注销。

二、开班大捞钱

在北京登记成功，取得合法名义以后，李洪志声称自己是高级气功师，开始大规模开班、宣传。李洪志先后在北京办了13期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所谓“老弟子”如王治文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级“法轮功”组织的骨干。

为了打开局面，李洪志开始时打出廉价促销的策略，打着气功治病的旗号，来占领市场。在1993年12月的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的“法轮功”以价廉物美而声名鹊起。所谓“东方健康博览会”，跟90年代初的许多“博览会”、“评比会”一样，都是由民间主办的，有钱就可以参加，租个摊位就可以开练。

首届东方健康博览会是在1992年12月举办的，还是低层次研究组的“法轮功”也在此次博览会上摆摊宣传过，不过没有什么影响。到了1993年12月的第二届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已经成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直属分会的“法轮功”就不像当年那么寒酸了，李洪志花了一笔钱，参与进去，成了博览会的“组委会委员”，大显神通，成为博览会的头号明星。

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去看病，在一个气功师摊位上看了两次也没治好，到李洪志这一次就治好了。那位气功师收费是每次100元，两次收了200元，在李洪志这儿只收了10块钱。李洪志把这事搞了一篇广播稿子，送到大会的广播室，不停地反反复复播。这一下李洪志的摊位就火得不得了，挤满了人。后来有人怀疑那老太太其实是李洪志使的托，而不停地广播同一篇稿子更是李洪志收买了组委会广播室。

在博览会期间，李洪志做了3场“法轮功”报告，由于事前的宣传、使托和收买工作做得足，这3场报告场场爆满，足见当时李洪志的气势。博览会结束，作为博览会组委会委员的李洪志，给自己发了一个奖，“边缘科学进步奖”，据称这是本届博览会的最高奖。另外，博览会组委会委员李洪志还给自己加封了“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对这次博览会的成功，李洪志可以说是非常得意。后来出书时，李洪志把这些奖状和称号证书拍成照片，印到彩页上，欺世盗名。

小小的投资，低价的倾销，就名利双收，使李洪志志得意满。趁此东风，李洪志到处行骗，继续着“法轮功”治病的经营。

给人治病治多了，有些通过心理暗示，也许有些作用。这使李洪志有时也神神乎乎觉得自己真有功能。有一次他岳父病得不轻，在医院躺着。李洪志知道了，说我来发功给你治病，你也不用在医院躺着了，回家吧回家吧。楞是把老人家给弄回家去了，这下好，不到一个星期，老先生就一命呜呼了。李洪志一见大势不好，赶紧溜之乎也。

李洪志给人治病有时也很痛苦，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治不了人家的病，可又不能说治不了。他倒希望他一发功人家的病就好了，可是又做不到，常常只好硬着头皮上。这时他还有一

招，就是让他女儿上。人家说“还疼啊”，“还疼？美歌，过来过来，是不是佛在捣乱，咱们把他都抓起来，全下油锅。”

除了给人治病，李洪志更乐于开班给人传功授课，吹牛皮不交税，还有大把大把的银子进账。那会儿，除了在北京做带功报告，他还全国各地满世界跑。

1992年11月，李洪志走出北京，到太原传功，但很不理想，气得他大骂神灵。1993年1月，李洪志前往天津，先在天津人民礼堂办班。不幸天津之行差点又砸了。当时到天津人民礼堂的学员只有五六百人，弄得李洪志灰心丧气。不过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第二个班的时候，学员人数已经大大增加了。整个会场都满了，最后有些人站在外边，有些人买了票都进不来了。到这时，门票也从一张20元钱，一下涨到50元。李洪志为了抓住回头客，采取老学员听课半费的优惠措施。只要听过一次课，就能拿学员证，以后再听课就是半费。

接下来的形势就越来越好，乐得李洪志心花怒放。据不完全统计，在1993年和1994年，李洪志在长春以外的地方办班传功，收入就达近80万元。除在许多城市开班外，根据李洪志出售的《法轮修炼大法资料汇编》全国参加人数不下几十万人之多。从此，“法轮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

李洪志走南闯北，奔东走西，风尘仆仆，靠着发功治病，巡回传功，低价倾销，给自己找托儿，种种手段，李大师总算在江湖上有了点名气。“法轮功研究会”总结他这一段经历曰：“他以崭新的面貌，一改传统的功理功法特点，以自己的独到之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气功爱好者，时间不长，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不难想见，名利双收的李洪志一定高兴得常常从梦里笑醒。

三、向海外发展

美国社会历来正邪并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邪教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一些邪教在本国受到打击就跑到美国去发展。我国一些“气功大师”也纷纷到美国去筑梦和镀金。当年严新在美国的一些活动曾成为国内最热的话题，还宣扬他在美国受到当时总统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云云。这形成一股潮流，张宏堡、张香玉等后来都到美国去“拓展新的空间”。李洪志也走上了这条路。

1996年10月，李洪志第一次去美国传法，当时办的是旅游签证。回国后，李洪志又于1997年开始申请赴美，但数次遭大使馆拒签，所幸他最终还是弄到了签证，并于1998年2月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到美国定居。到美国后，李洪志又很快拿到了绿卡。对于他何以如此之快就拿到绿卡，还流传着一些说法，有的说是他的美国弟子帮助，有的说是他办了“投资移民”，按照美国投资移民的规定，投资100万美元，给当地提供10个就业工作机会，就可以办理投资移民，而且速度很快。还有的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看中了李洪志在国内的影响力，暗地里支持他，准备利用他这股势力作为反华工具，因此给他办了绿卡。各种说法不一。

李洪志在美国住在地价最高的地区之一的纽约长岛，在亚特兰大也安了一个家。平时他深居简出，有时外出传法，有时也重操旧业干点气功治病的营生。出国以后，他也不再身披袈裟，假装和尚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描述，李洪志在接受该报访问时，身着名牌开领短袖衫，丝光斜纹布便裤，看起来像个在乡村俱乐部度假的有钱人，而不是辛辛苦苦传法的“法轮功”大师。

在美国，李洪志也不再设什么功德箱敛财了，就连“法轮大法”的传法大会门票他也不管了，会场的场租，自有虔诚而富有的信徒支付。他的收入，主要是每次传法大会或者信众自己聚会时，兜售他的“法轮功”书籍、音像带、光碟这些出版物，还有版税的收入。另外就是给人以气功治病，索要赞助。

李洪志在美国不断扩大“法轮功”的地盘，他以纽约为据点，逐步向全美国辐射，在美国 38 个州设立了“法轮功”辅导站，信徒遍布美国的大小城市，不仅有黄皮肤的华人，也有黑皮肤、白皮肤的人，其中不乏硕士以上学历和留学生、高级知识分子。后来，“法轮大法”的辐射范围还超出美国，李洪志的书被翻译成为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和韩语。李洪志还让其信徒在北美、南美、东南亚、欧洲等地建立“法轮功”据点，与美国相邻的加拿大就有许多城市都建立了“法轮功”辅导站。所以李洪志时常会走出美国，到欧洲或者其他地方去传法。这时，李洪志的感觉可以说是好极了。他们此时发布通知，都是以“各国法轮大法学会”起头。

在 90 年代中期，互联网以火箭般的速度发展起来。在美国的李洪志也赶上这个时髦，他开始利用互联网对国内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法轮功组织进行指挥和控制，发布各种指示，在网络上编织起一个虚拟的“法轮世界”。在 1995 年，当国内还几乎没有人知道互联网为何物时，在国外的李洪志的弟子就开始利用网络来传播“法轮功”，在 1997 年 6 月 15 日，“法轮大法研究会海外联络组”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份《法轮大法 Internet 传播公告》，声称“自一九九五年开始 Internet 传播法轮大法以来，在世界各国修炼者的共同参与下，一个以电子邮件相联系，以国际互联网为载体的多文种传播法轮大法新局面已经形成”。后来李洪志到美国后，又建立了一系列网站。这些网

站以后来成为李洪志遥控国内信徒的主要工具。

四、疯狂诈取钱财

李洪志从一开始练气功，就为因为看到这个行业有利可图。因此在他出道以后，拼命捞钱就成了他的首要任务。在李洪志及“法轮大法研究会”、法轮功总站的部分骨干们的经营下，“法轮功”组织同其他一些气功组织一样，开始将“法轮功”组织建成一个气功“产业”，而“经营”方式就是办班传功，生产、出售“法轮功”宣传品和练功用品。

李洪志靠“法轮功”诈骗钱财的经过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年5月至1993年3月，即所谓李洪志“出山”传功初期。“他先后在长春、北京、太原、山东等地办班传功十几次，学员近万人”，办班收门票、听课费，少则一张三四十元，多则五六十元。不到一年时间，李洪志就聚敛了数十万元。

第二阶段是1993年4月至1996年6月，是李洪志疯狂敛财阶段。为了赚更多的钱，李洪志使出更多的招数，主要方式就有四种。一是继续收门票，制作“功德箱”。二是出版销售《法轮功》书籍。这个阶段出版的各种“法轮功”书籍，除出版社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均是由李洪志等少数人非法销售的。三是制作、销售“法轮功”音像制品。四是制作、销售“法轮功”其他物品。诸如“法轮功徽章”。

第三阶段，是1996年7月至“法轮功”组织被取缔，这是李洪志经营地下“法轮功”产业，大量非法敛财阶段。

到底李洪志利用“法轮功”敛了多少财，榨取了多少钱，无法得知一个确切数字，但据估算，至少也在八位数以上。

李洪志用从“法轮功”练习者手中聚敛来的不义之财在长

春、北京等地以他本人和其亲属的名义购置了多处房产，每处房产价值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元。这套价值几十万元的高级住宅是他在传播“法轮功”2年的时间内敛钱购买的，可见其暴富速度之快。

李洪志的私人会计刘桂荣曾经在1997年初为李洪志清理过一次账目，总计收入1000多万元。李洪志为了掩盖自己非法获利和偷逃税款的行为，亲自动手将这批账目在北京法华寺住宅中销毁。

从1995年开始，李洪志陆续将部分非法收入通过广东一些公司秘密转移到其在香港开设的账户里。手握着非法聚敛的不义之财，李洪志开始置办私人豪宅、购买高级轿车、雇用爪牙保镖、办护照买绿卡、周游世界各地、出入国外色情赌博场所，挥金如土。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克莱格史密斯(Craig S. Smith)1999年11月1日报道，当中国的“法轮功”练习者万余人头顶烈日长途跋涉到中南海周围静坐为李洪志讨说法的时候，李洪志夫妇正在办理购房手续，一座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面积4600平方尺、价值58万美元的豪宅落到了李家的名下。紧接着有人对这座豪宅进行了豪华的装修，单后花园内的私人游泳池价值就达2.4万美元。此时，距他花30万美元在一个高级住宅区购买一套豪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座豪宅终于圆了李洪志夫妇的“富贵梦”。

第三节 早期学徒揭老底

就在李洪志走向发达之时，他的一些早期弟子却在日常观察中，发现了李洪志的骗子本色，开始与他分道扬镳。李洪志在长春拜师收的四名弟子都离他而去，一大批早些练气功的

人，有的正式宣布退出再不参加法轮功的任何活动，有的不声不响地就离开了法轮功，就连为李洪志出了大力、个人出几千元钱为其修房子的当时长春站副秘书长刘凤才、宋炳臣也于1993年8月、10月先后正式宣布退出法轮功组织，并向省市气功组织和省人事厅人才中心的同志通报信息。

有的学员退出后，看到在李洪志的招摇撞骗下，受骗上当的人越来越多，便开始向有关单位检举揭发。早在1992年李洪志刚“出山”不久，就有人向领导机关写信揭发李洪志的真相。到1994年，又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揭露李洪志的行列中来，其中李的早期弟子宋炳辰、赵洁民及宋炳辰的儿子宋念原等人最为坚决。他们在1994年便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长春市气功人体科学研究会、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焦点访谈）、长春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大队、中国体育报等单位写揭发信，历数李洪志的各种骗人伎俩和违法行为。

1994年初，宋炳辰等8人共同署名，写了一封揭发信。11月，宋念原又向上述有关单位递交了一份题为《揭发江湖骗子李洪志的书面材料》，该材料长达一万多字，分十二个部分，历数了李洪志的罪状，对“法轮功”的出笼经过，李洪志伪造生日的经过，李洪志诈骗练功者钱财和偷漏税收的内情等都作了充分的揭露。以下是宋念原书面材料的一个目录：

伍绍祖同志

宋世雄同志

长春市教委成人教育处

长春人李洪志是个以传法为名到处骗钱的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特别是94年以来，又发展成自称是佛并打着党和国家

领导人“让他专做推迟地球爆炸”旗号的政治骗子。就他自1992年5月至今的近二年半的时间里的言行，已触犯了税法、民法和刑法，构成了犯罪。现对其言行揭发如下：

目录

一、“我是四月初八生的，是同释迦牟尼佛一个时辰生的，是佛”

二、李洪志所宣扬的具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四大功能必须揭穿

三、大肆宣扬地球要爆炸，人类要毁灭

四、吹捧自己，打击别人

五、李洪志为人调病疗效问题

六、以传功为名，另立宗教门派

七、由功底浅不调病到专讲“大法”演变过程

八、挖空心思，诈骗练功者钱财

九、李洪志和见义勇为的英雄行为唱反调

十、关于李洪志在贵阳市办班传法及新闻记者招待会

十一、李洪志的嫉妒心在世难找

十二、“法轮功”出笼过程

十三、结束语

可是，由于李洪志早已在有关单位打通了关节，培养了自己的亲信。中国气功研究会的办事人员在接到他们的揭发信后，居然把这些信压下来，并将其转给李洪志及“法轮大法研究会”。因此，李洪志得以掌握这些揭发信的全部内容。

对此，李洪志一方面在信徒中散布谣言，说这些人“已入魔，行魔事，说魔话”，是破坏“大法”的“魔”。另一方面，他还组织人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写“陈述意见”，反咬一口

说这些人都是因为做了违背大法的事情，而被李洪志开除了。他们写揭发信是为了报复和诬陷李洪志，是“图取金钱和名利”。他们所揭发的许多事情都“绝无此事”，是他们诬告，“现在这些人都已经后悔了，并且向我磕头赔礼”。在“陈述意见”中，还列举了大量李洪志治愈病人的事例和李洪志向某个单位捐款的“光荣事迹”。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中李洪志的亲信在向领导汇报时，也附和李洪志的解释，一起瞒天过海，欺骗领导。

这使那些写揭发信的人受到巨大的压力。但更加坚定了他们揭发李洪志的决心。他们不相信李洪志神通就真那么大，能够一手遮天。针对李洪志的反扑，他们又进一步向有关单位写信讲述真相。1995年4月15日，宋炳辰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领导又写了一封揭发信，再次揭发李洪志的行骗行为，讲述他参与创办“法轮功”的详细经过。4月20日，原法轮功修炼者赵杰民也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领导写信讲述李洪志打击诬蔑揭发者的行径，并对李洪志在“陈述意见”中所作的辩解作了进一步的揭发。以下是赵杰民信件内容（由于原文较长，有压缩）：

敬爱的黄老：

您好！

当我见到“法轮功”分会对赵杰民等8人检举材料的“陈述意见”（以下简称“陈述意见”），我很气愤，但细想也不奇怪。在这样心情下给您写下面材料，让您费心了，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首先，我认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某人把揭发检举犯罪材料盗送给李洪志及分会是犯法的。是对揭发检举人的出卖和政

治陷害，是危及揭发检举人人身安全的严重事件。其次扣压我们给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的材料，乃至前不久李勇散布我们“把李洪志犯罪事实的材料撤回，并对揭发的问题都不承认了”的流言蜚语，是欺骗您和上级领导，强奸民意，庇护犯罪和对深入查处李洪志犯罪事实设置障碍。这也表明气功界打“假”除“伪”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对上述事件我们保留进一步申诉的权利。诚望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能在您的领导下排除干扰，保护揭发检举人的合法权益，查处参与上述勾当的人，并严肃处理。

下面对李洪志在“陈述意见”中所辩护的几个问题进行再揭发：

1. 李洪志在1995年2月24日亲自写并签名的“李洪志简历”里边多有编造的东西。如李洪志说：“父母都是医生”，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其父李丹是一工厂卫生所大夫，其母是家庭妇女，李洪志上小学前其父母就离了婚，李洪志兄妹四人跟其母生活。

2. “陈述意见”对揭发检举李洪志另立宗教门派，制造恐怖进行否定，并说我们“中伤”。我们说李洪志另立宗教门派，制造恐怖、搞政治欺骗是依据事实而不是凭“分会”的宣言。

李洪志于1993年5月在北京搞宗教宣传（所谓传大法）受公安部门限制，回到长春后在由小范围讲、到百人群讲，由在他岳父家讲到公园中讲：“天堂、地狱、宇宙、地球爆炸，中国人像苹果似的从心里往外坏，人类即将毁灭。”只剩下跟他练“法轮功”的人，人类毁灭的那一天，他喊一声练“法轮功”的人就跟他到法轮世界去了，最低给个菩萨位……

李洪志长春站秘书长焦立勋正式传达：江泽民、李鹏对李洪志说：“你什么也别干了，你任务就是把地球爆炸时间往后推

移，越往后越好！”李洪志还说：“地球寿命是由我们定的，我师父定的大上次地球爆炸时间，我师父定的上次地球爆炸时间，这次地球爆炸时间是由我定的，这次的定的太死了，我尽最大的力也只能把地球爆炸时间往后推30年，再多就推不了啦。”在1994年春季李洪志在长春胜利公园猴山对法轮功学员讲：“现在地狱爆炸了！”当时在场的段永亮说：“地狱爆炸了，没有了，今后坏人干坏事可以不下地狱了！”李洪志当时对段永亮很不满意。

1994年9月李洪志回到长春，相当一段时间不出来。长春总站秘书长焦立勋传言：“李老师在家研究宇宙问题。天堂爆炸，一天24小时在阻被炸的‘佛’往地球上跑，他很累。”

……

李洪志充佛，用照片进行人为装饰加上莲花、光圈成“佛画”，非法印成大幅“佛画”照片兜售给法轮功学员供拜。他还多次宣扬：“天堂爆炸、佛的灵魂、尸体都不存在了，世间佛也都坏了，不能信了。”就是这个李洪志不是另立宗教门派是在干什么?!不是在制造恐怖是在干什么?!我们向组织领导揭发李洪志犯罪事实怎能说是对他的“中伤”呢?!我们所揭发的李洪志犯罪事实都是有人证、物证的，不是凭“分会”工作人员“没有听说”和李洪志一句“绝无此事”所能掩盖的，当然更是否定不了的。

在1993年2月李洪志炮制的“简介”中谎称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高级气功师”，具有大神通，“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四大功能。此简介的出笼是经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何时、何地、何人鉴定的？高级气功师之说又是何人默认的？不然李洪志怎能如此胆大妄为，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里，谁是李洪志的后台？

.....

李洪志公开声称：“我所传的不是气功，是‘法轮修炼大法’。你们抱着练功治病就别来了。我不调病、不治病，我传的是‘大法、佛法’。因此不能皈依佛门、不能去寺院、不能烧香拜佛、不能诵经、念佛号……”等等。为此有的学员如长春南湖练功点辅导员苑祖良把佛教经书送人了，李洪志的“佛画”照片挂在墙上，烧香顶礼膜拜。类似这种现象举不胜举。说李洪志假借气功另立宗教门派还不恰如其份吗？！

对李洪志种种倒行逆施提出疑议进行坚决抵制的同志，李洪志则认为“是魔、说魔话、谤佛、法之事、棒打佛法”（摘自李洪志在1993年7月15日给一法轮功学员的批示）。……在三年多点时间里，李洪志假借气功建立异论邪说，另立宗教门派的事实俱在，是赖不掉的。

3. “陈述意见”说我为名利、金钱。此纯属人身攻击，政治陷害。我退休前在长春市医药管理局供销处任副科长职务，退休后受聘于长春市石油化工局供销处经营开发科任科长，自1992年6月14日参加法轮功义务工作起自动申请离职。我一心一意地做义务工作至1993年6月止计13个月。……

我热爱、支持气功活动是有缘由的：我原是一个患多种疾病的老病号，1989年开始练气功，身体康复，收到很大益处。我的主导思想是用我亲身事例来动员更多的老年人和患慢性病患者参加练功，祛病强身健体。李洪志为练功人治病，这正好合了我的心意，所以才舍去了挣钱的工作投身义务工作。在1993年“五一”节前后连续数天为宣传普及推广法轮功把我家20寸彩电、女儿录放机拿到长春胜利公园播放法轮功录像带，来扩大影响（录放机因风沙大而损坏至今未修复）。……

1993年李洪志回长春办班时，我向他汇报组织招生情况

时李洪志说：“是我在北京把‘小佛’撒向长春组织招生的。”我觉得这话太离谱了，简直是疯话。我在组织宣传工作时，向省、市气功科学研究会领导、电视台、长春日报社、市教委有关人士和辅导员共送了30余本没收书款的“教材”。李洪志为这事大为不满，并说：他们要受益得花钱买，不送给他们……也就是这时我就逐渐认识了李洪志其人是个骗子。

我在这13个月的义务工作中未收取李洪志分文。我儿媳患高血压、冠心病去李洪志家求治，往他设置的“功德箱”里投放了50元。我表弟杨立权（北京新华社医院大夫）在1992年11月李洪志在京办班时按规定交了40元学费。上述两件事由我亲自带领并向李洪志一一做了介绍，是李洪志眼睁睁地看着交的钱。由于我拒绝受聘而为法轮功做义务工作，这段时间在经济上我少收入4000元之多。在“陈述意见”说我为名利、为金钱纯属诽谤。

“陈述意见”中说赵杰民、宋炳辰、刘凤才……“把法轮功作为自己谋取个人金钱、名利手段，做了一些完全违背法轮功功德的事情……。”这一无中生有、信口开河的对三人诬陷与诽谤，我们要依法追究说这话的人的法律责任。……“陈述意见”对磕头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我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我怎能向李洪志低三下四磕头？……

4. 通过来自多方面的情况反映，李洪志的为人是人所共知的。……李洪志在长春给数名患者治病，告诉患者病已治好，但仅剩一人还是植物人，其余的均死亡。由此而知李洪志在长春治病名声很坏。故现在只传“法”，不治病。

5. “陈述意见”否定李洪志偷漏税款之说亦是骗人的。

……

我们在“材料”中按估计李洪志有200余万元收入计算大

效偷税的数额，现在看来我们太保守了。据“陈述意见”中李洪志分会提供的材料，仅办班一项就20万人，按他们自己的说法一般每人50元，那么20万人，按50%全价50元，另50%按半价25元一人就低标准算，共计750万元，外加书、牌、佛画、单页挂历等就不是750万元了。……根据我国今年要严肃查办偷税案的精神，凡涉及到“法轮功”的都有补税和处罚的问题，该算算总账了吧！

6. “陈述意见”说我做了一些完全违背法轮功的事情。他从根本上背离了气功祛病强身健体，提高练功者道德情操，服务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宗旨。因此我才毅然绝然地主动退出李洪志功派组织，不再跟他在邪道上走了。……我曾向长春市气功科研会汤副理事长声明：李洪志走上了邪路，我是国家干部，要头脑清醒，不能盲从跟着跑而加以拒绝！比我早期退出的尚有陈殿武、彭锡荣、张云瑞等多人。……

7. “陈述意见”提到李洪志捐赠六万多元图书，就实质而言，(1) 这不值一提，这点捐赠是有背景的。(2) 这些都是骗得的钱，我们相信若是被捐赠单位真正了解了李洪志整个行骗事实真相，绝不会接受他一分不义之财的。李洪志用骗来的钱的所谓捐赠动机是通过这一活动给今后更大的行骗增加一块垫脚砖，给行骗的外衣涂一层油漆。我们更坚信，用骗来的钱作捐赠再多也不会洗刷掉任何罪过，这贴不上金，张小平捐赠几百万也还照样是骗子就是很好的例证。

我们的“揭发材料”中揭露李洪志出山以来利用讲他的“佛法”之机与见义勇为大唱反调。李洪志讲：“在社会上一个人欺辱另一个人，在世间法上讲：欺辱人的人没理，被欺辱的人有理。可是在另一个空间是要颠倒的！欺辱者和被欺辱者在很久以前早结下冤仇，在世间法上是一个回报，所以你们见到这

种情形不要管。这就是世间法上人们所说的‘冤有头、债有主’，迟早要报的。”

李洪志还说：“瞎子横过马路你们不要管，他瞎是因为他前世‘业力’太重，所以她才瞎，你领他横过马路是你消业还是他消业，你帮他，他的业就跑到你身上来了，大家不要干了。”这不是与见义勇为大唱反调吗？！他这些胡言乱语听的人很反感，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说李洪志这小子简直是混仗东西。就是后来干点捐赠的事，也是企图借此消灭坏影响。

尊敬的黄老：我今年66周岁，是从1989年9月4日开始练气功的，是气功最大的受益者，在今生有限之日，愿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国人民的神圣事业贡献微薄力量。那怕道路艰难险阻，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决心与“假佛，真骗子”的李洪志斗争到底！

此致

敬礼！

赵杰民

1995年4月20日

正是这些揭发检举信件，最早揭开了李洪志和“法轮功”的神秘面纱。可惜的是，他们的揭发，并没有能够完全阻止住李洪志的发展步伐。相反，李洪志变本加厉，进一步恶性膨胀，直至将“法轮功”发展成为邪教组织。

在《何祚庥与法轮功》一书的自序“从伪气功到‘法轮功’”中，何祚庥揭示了一个伪气功的发展规律：开始是用一些科学的名词术语或科学“理论”与科学的“实验”，来神化外气，神化特异功能，逐渐地，这种“伪科学，真巫术”就要和各种各样的“神”沟通起来，会去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关于这

种“神”的理论或学说。至于其目的，首先是骗钱，逐渐就要发展成为有组织地骗钱，骗大钱，这就要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组织，从地方性的，直到全国性的，甚而是国际性的组织。有了经济基础，就进一步追求政治，或寻求政治保护伞，或干脆自己成立某种独立的组织，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这就是邪教。“法轮功”就是由伪气功走向邪教的一个典型。

何祚庥的这一分析正是“法轮功”发展历程的高度总结。在经过了前几个阶段的发展后，李洪志果然走向了其必由之路——邪教。

第十五章 向邪教转变

第一节 建立严密组织

李洪志在传播“法轮功”的过程中，为了将全国信徒组织起来，便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法轮功”辅导站，并通过这些辅导站，在全国形成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1992年5月，李洪志推出“法轮功”之后，就在吉林建立了“长春法轮功总站”，自任站长。同年7月，李洪志又在北京建立了“北京法轮功辅导站”，并且指定了站长。1993年1月5日，李洪志以“中国法轮功总站”的名义，搞了一个《中国法轮功章程》，并且注明“本章程经掌门人李洪志批准，自1993年3月1日起生效”。这个章程明确规定：“中国法轮功的组织分为三级，即中国法轮功总站、辅导站和活动站。”

章程规定了法轮功总站的组织机构：“（一）总站工作实行站长负责制，总站站长由李洪志老师兼任（注：当时只有一个总站）。聘请两位副站长和一位秘书长协助站长工作。聘请气功、法律、科技知名专家学者为顾问，协助、咨询法轮功修炼的有关事宜。（二）以聘任的形式组成各业务部门，负责“法轮功”的功法传授、人才培养、资料整理、科研和应用工作。（三）总站工作人员的聘任期为二年。”

章程对全国各地辅导站的组织机构则规定：“（一）辅导站设站长一人，副站长若干人。辅导站设立相应的业务组，可聘

请顾问，协助开展工作。（二）辅导站工作人员由总站聘任，任期一年。”

“中国法轮功活动站要向辅导站（分站）报告备案。活动站的负责人（1-2名），即为法轮功辅导员。辅导员由所在活动站集体推荐，报辅导站批准、聘任，任期一年。”

章程规定法轮功辅导员的条件是：“（一）必须经过法轮功正式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120小时；（二）必须是专一修炼法轮功者，对于非专一修炼者，不得聘任；（三）必须具有较高心性者。”

章程还对成为“法轮功”弟子提出各种条件，规定：“法轮功创始人、掌门人才有资格接受弟子。申请为法轮功弟子的人应该具备下列条件：（一）接受老师对心性的考验二年以上；（二）能够讲法传功；（三）能够释法答疑；（四）能够诊病治病；（五）具备气功医师资格”。对一些“法轮功”急需的人才，章程还作出特别规定：“对于奇才贤士，老师认为可以接纳为弟子，不受（一）、（五）两款限制。”

章程还对“法轮功”系统中的气功师职称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分为：“（一）高级气功师；（二）气功师；（三）助理气功师。职称的批准权限是：（一）高级气功师由创始人、掌门人批准；（二）气功师、助理气功师由创始人、掌门人或者总站站长批准。”

几乎在这个章程出笼的同时，李洪志还拼凑了一个“中国法轮功科学研究总站”。不到半年，即1993年7月30日，李洪志又搞了一个“法轮功研究会”，这就是“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前身。

根据这个章程，在北京成立了“法轮功”的总部——“法轮大法研究会”，李洪志自任会长；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设立有 39 个辅导总站，总站下设有 1900 多个辅导站和 28000 多个练功点，下面还有无数个学习小组。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层层管辖，完整、严密、覆盖范围甚广的组织体系。该组织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纪律，每级组织都有专职人员负责，总站站长由李洪志本人亲自任免。不听话的和工作“不尽职”的负责人，就予以撤换。不专一练“法轮功”的，就立即清理出该组织。

除了《中国法轮功章程》外，“法轮功”组织还制订了一些其他规章，如《法轮大法弟子传法传功规定》、《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法轮大法辅导员标准》、《法轮大法修炼者须知》等，通过这些规章，将全国“法轮功”成员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

李洪志经常通过“法轮大法研究会”向全国“法轮功”组织发号施令，“法轮大法研究会”也常以“法轮功”最高领导机构的角色，向全国“法轮功”辅导总站发布通知、公告等，传达“师傅”之命和该机构的“指示”。各级“法轮功”组织都有人专门负责传达贯彻执行李洪志和“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指令。李洪志、“法轮大法研究会”及“法轮功”各级地方组织负责人之间，用电话、传真和国际互联网进行联系，信息灵通快捷，运作迅速，宣传动员组织效率和能量极大。而且联系十分隐蔽，不易为外人发觉。正是靠这样一个组织系统，1999 年 4 月 25 日，李洪志与“法轮大法研究会”组织了万余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围攻了中南海。其隐秘、快捷的组织能力，高度的组织性，令世人震惊。

第二节 宣扬歪理邪说

一、宣扬歪理邪说

李洪志在传功初期也仿效其他气功师，搞组场报告会，再为参加人员集体调病治病。后来，又变换手法，取消组场报告会，美其名曰传“大法”，不调病。并说：“高级功法与初级功法根本不同点在于此，中国法轮功是佛家功法，我时刻在为你们拔高。”此时的他，开始自命为教主。他声称：“法轮功不是气功，而是大法”。他的所谓“大法”，实质上是一系列荒诞离奇的歪理邪说。其基本观点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人类即将毁灭；对此，科学已无能为力，只有“法轮功”才能拯救人类。这一切与国内外其他邪教如出一辙。这样，李洪志一步步由一个“气功大师”演变为一个邪教教主。他的“大法”内容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 攻击科学是邪教。李洪志首先贬损科学，说“人类现在的科学实质上是站在一个错误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对宇宙、对人类、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错误的”。他进而诬蔑科学是造成各种过失的根源，甚至把科学视为邪教。他说：“这个科学，正因为它的肤浅，导致了人类社会道德的败坏”，“从这一点上看这个科学又是一个邪教。”李洪志贬损科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抬高、贩卖他的“法轮大法”。

(二) “消业论”。“业力”是佛教用语，本无褒贬，李洪志则曲解其本意，把它说成是做坏事的因果报应，说“生老病死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业力轮报，你欠了债就得还”。他说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都是“业力”所致，“那个黑色物

质业力场，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并把病视为是对人修炼的考验：“你只有偿还业力之后，你才能得到幸福，才能度好。”“偿还业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修炼法轮功”；“真正修炼的人是不会得病的，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炼功的人的功自动就会消灭病毒和业力”。生病不能吃药，“吃药是把业力压了回去，就不能够清理身体，因此也就不能治病”。

（三）宣扬“宿命论”。他说，人类社会的变化都是天象变化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动向那是历史的安排，是天象带动下面出现的”；人的福分、能力、官职等等“一切都是神安排的”，因为“神在操纵着世界”。他说“人是从宇宙这个空间掉下来的”，因为人“不符合那一层宇宙的法的要求”，只能往下掉，“过着低能的生活，用低能的方式繁育着后代。

（四）宣扬“末世论”。各种异端邪教都曾危言耸听地制造过“末世论”。李洪志也宣扬“末世来临”、“地球爆炸”这一套。“有一次我仔细地查了一查，发现人类有 81 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遗留下原状来的一点史前文明，进入了下一个时期，过着原始生活。人类繁衍得多了，最后又出现了文明。经过人十一次这样周期的变化，我这还是没查到头。”

“地球已爆炸过两次，20 世纪末就面临第三次爆炸。第一次地球爆炸的时间是由我师爷推迟的，第二次是我师父推迟的，这一次爆炸的时间是由我定。”“人类生存的空间处在极其危险境地”。“我们发现人类社会在史前时期每次不同周期毁灭时，都是人类处于道德极其败坏的情况下发生的”。“特别是现在人类社会的道德观念往下滑得很厉害。大家都在这个洪流之中往下滑，社会在整体往下滑。”“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着毁

灭，彻底的毁灭，那叫：形神全灭，很可怕！”

（五）信口雌黄，漏洞百出。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李洪志还断言：

“一切物质都是由水构成的”。

“月亮是史前人造的”。

“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常常是受外星人控制和推动产生、发展的”。

“现在的科学是外星人强加给人类的”。

“希特勒杀了很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很多人，这些都是天象变化造成的”。

“人，只有人类的外形不能说他是人。那鬼为什么不说它是人呢？它只是比人少一层粒子。”

由于李洪志的无知，他把天文学上的距离单位“光年”当成了时间单位，把核聚变与核裂变混为一谈。

二、大搞教主崇拜

古今中外，大凡邪教教主都惯于编织谎言，自我吹嘘，把自己神化成为“救世主”。通过大搞“造神运动”，大树教主权威，使信众对教主顶礼膜拜，绝对服从。正因如此，西方把邪教团体通称为 CULT，意为（具有破坏性或极端的）“膜拜团体”。李洪志也是如此。

李洪志自我“造神”手段，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改、编、造、吹。

改：改出生时间。1994年9月24日，李洪志将出生时间由1952年7月7日改为1951年5月13日（可他竟忘记了其父母结婚时间为1951年7月）。李洪志为什么要改出生日期呢？原来，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是我国农历四月初八，而1951

年的5月13日恰好是农历四月初八。李洪志将自己改为与佛祖同日诞生，其目的就是把自己扮成“释迦牟尼转世”，为其附神附佛作铺垫。

编：虚编自己身世，编撰种种神迹。李洪志1993年在其自己编造的个人简历中说：“童年开始，由佛家全觉人师传授独传修炼法门，8岁修炼圆满……12岁时，道家师父八极真人找到我传授道家功夫……1972年又由道号真道子的师傅传授大道所学……1974年又由佛家师傅传授修炼大法直到出山”。

光编出神奇的身世还不够，李洪志还编造出不少类似武侠小说中那种充满妖气、邪气的神奇经历。“法轮功研究会”撰写的《介绍李洪志先生和李所创立的法轮功》一文中，有一段专门介绍李洪志的神奇故事：“8岁的李洪志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与伙伴捉迷藏时，他只要一想‘别人看不见我’，谁也就发现不了他。甚至拿手电照在他脸上也看不见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雪地玩，跑跳中便会腾空而起。若发现两人要打架，只要他能让另一个人别过去，那个人就真的过不去……”。

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洪志为了神化自己，拼造、假造打坐莲花“法像”，用以愚弄“法轮功”练习者，使他们通过观看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李大师发功时背上发出的金色“佛光”，相信大师的佛身、佛心、佛功。

吹：吹小号出身的李洪志，为了招徕“法轮功”练习者，并从精神上控制他们，牛皮越吹越大，越吹越离谱，到了没有什么不敢吹的程度。

——吹他的功力：“我坐在这里可以看到北京的景象，看到美国的景象，看到地球那边去。”“具大神通，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功力达极高层次，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预知人类过去、未来。”“……我发出的强大功

力中，绝大部分是γ射线和中子成分，而且中子成分大得令人吃惊，而且是热东西，只有在核反应，核分解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强大的热东西……”“我可以推迟地球爆炸”。

——吹他的《法轮大法》：是拯救人类社会的“惟一大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千古以来能够把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生命及整个宇宙圆满说清的唯有‘佛法’”。“他（指佛法）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历史、化学、物理、天文物理、高能物理、哲学，好像是很多范畴都概括进去了。这些理论（指佛法）你无论翻遍世界上所有的书，你学了世界上所有的学科，你都学不到。”

——吹他的讲法、传法：“目前在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传正法。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在末法时期开了这么一个大门。其实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我讲的是宇宙的，而且是宇宙从上到下的一个最大的、能给宇宙的众生、不同层次的神和人开创生命环境的一部大法。”在悉尼的一次讲法会上，李洪志吹得更玄：“他（指释迦牟尼）确实确实没有系统地把修炼的原理、宇宙的特性、人为什么会提高上去讲出来。真的没有讲出来！所以我说我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开了一扇大门，我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就是把我所有修炼的道理、圆满的因素都讲出来了，而且讲得很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是很高的神对我讲：你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转法轮》。”

三、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

李洪志通过这样全面“造神”，对“法轮功”练习者实施精神控制，让他们像神一样尊崇他、膜拜他，并心甘情愿地任

其役使。为了把“法轮功”练习者牢牢地禁锢在“法轮功”邪教里，在神化活的教主的同时，李洪志还苦心设计并实施了其他不少精神控制办法和骗术。

一是灌输“不二法门”，禁锢“法轮功”练习者。李洪志窃取佛教“不二法门”这一概念，并且予以曲解，代之以排他性的惟我独尊、惟我独霸的含义。例如，有的“法轮功”练习者问李洪志：“我为什么不能修炼法轮功又在基督教工作呢？”李洪志回答说：“不二法门的问题我在《转法轮》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尽管这个法很大，那么大的法你还往里掺东西，掺低的东西也不行，都会把你自已修炼的身体和你所要修出来的一切搞乱，你就无法回家，你在破坏你自己前进的路。”李洪志灌输“不二法门”，不让弟子学别的东西，只学“法轮大法”。李洪志反反复复地强调“修炼要专一”，学他的“法轮大法”，必须先洗脑，不能学别知识，不能信仰别的宗教，不能练别的气功，把人的思想禁锢在他的神秘主义体系中。如果有人怀疑他、批评他，他就说是“魔在干扰”，是“魔在破坏大法”。

二是鼓吹“法身”无处不在控制练功者。“人修炼到出世间法以外相当高的一定层次上之后，就会产生法身。”“现在的学员包括其他功派的气功师没有一个有法身，据我知道有法身的就我一人。”“我有无数的法身，和我长的一样。他们会看护你，保护你，帮你演化功，做一些事情。”“这本书（指《转法轮》）里边每个字都有我的法身”，“你思想中想什么，在另外的空间里面，我的法身都知道”。许多练功者相信李洪志的鬼话，直到临死之前，还在盼望着李洪志“法身”的拯救。

三是用“延年益寿”、“祛病消灾”，特别是用“圆满”、“上层次”、“度人升天”等诱惑“法轮功”练习者。

第三节 各界人士揭露“法轮功”本质

李洪志建立起严密的组织，散布各种歪理邪说，蛊惑信众走上绝路的行径，自然受到众多人的批判。

对李洪志来说，1996年可谓是流年不利。1994年和1995年一些原“法轮功”弟子的揭发，虽然并没有伤到李洪志的筋骨，但是对他仍是一个打击，也拉开了社会性揭露批判“法轮功”的序幕。

按照李洪志对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的说法，1996年是他在中国开始到处碰壁的“转折点”。他咬牙切齿地说：“就是长春有那么几个人，所有的法轮功的谣都是他们造出来的，他们把对法轮功的仇恨写成信在96年送到公安部。”1999年7月7日，“法轮大法研究会”根据李洪志定的调，对准长春的“那么几个人”，以“一批法轮功老学员”的名义，抛出了一份万言书，题目就是《揭露长春极少数人的阴谋》。万言书说：“94年底有几个自称是法轮功的人，视法轮功为仇敌，决心尽一切政治陷害手段彻底打倒法轮功以泄私愤。他们乱编谣言，不知羞耻地以几十篇纸的黑材料向全国十几个有关部门诬告法轮功的四大罪、十二条罪状”。

其实李洪志1996年走背运，并不仅仅是因为长春那几个人“造谣”，而是因为这一年中国政府加强了打击伪科学的力度。

1996年以前，各种伪科学猖獗一时，反伪科学的人士势单力薄。到了199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吹响了反击伪科学的号角。在这一年，《“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曝光；司马南开始在《北京青年

报》上连续载文揭穿神功内幕；这年8月在广东汕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上，杨振宁等四位科学家见到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时，都表示了支持他反对伪科学的鲜明态度。这年，沈昌遭到苏州市计量局和物价检查所的查处，并在法院输了官司。

1996年8月，中宣部、国家体委、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局等7家机关发出《加强社会气功管理的通知》，指出要“依法坚决制止非法行医和封建迷信宣传，严厉打击利用气功进行诈骗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同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来树民给江泽民写信，指出披着气功外衣的新创宗教——“法轮功”“不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对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如果任其发展，‘法轮教’将把中国引向愚昧、无知的时代，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北京大学党委郑重其事地以党委文件的形式，将来教授的信转给上级。

1996年11月，在一年一度的年检中，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将“法轮功”注销，不再予以登记。该科研会还向民政部专文呈报了“法轮功”的问题，文中列举了李洪志和“法轮功”的问题各7项。李洪志的问题有：更改出生日期，自己称佛；编造“出山历史”；制造政治谣言；明确表示“法轮功”不是气功而是佛法；宣传“业力”、“元神”等虚幻说法；宣扬自己是救世主；大肆偷税漏税。

“法轮功”的问题有：自称“法轮功”的理论基点在佛家；大肆宣传轮回报应；世界是佛创造的（连佛家也没有这个佛创造说）；贩卖、宣传世界末日的到来；以神学代替科学；大量宣传封建迷信；否定现有佛、道，否定禅宗，否定别的气功

流派。

中国气功科研会的这份文件后来上了互联网，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李洪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李洪志对中国气功研究会注销“法轮功”的决定暴跳如雷，“法轮功”组织也反弹强烈。他们这样骂道：“气功科研会作为一级组织，把个人的政治陷害的诬告材料作为组织结论上报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更有甚者，这些材料成为全国到处流传、诬告法轮功的依据，电脑网页用以攻击的材料、流氓杂志的议题，”“在这一系列迫害事件中，中国气功科研会个别人罪责难逃，天理不容。”（见《揭露长春极少数人的阴谋》）

到1997年，国内反对“法轮功”的声音更上层楼，人们开始认识到“法轮功”本质上就是邪教。1997年起，海内外一些有识之士及“法轮功”练习者家属，有感于“法轮功”戕害练习者、危害社会的事实，纷纷向各级政府、传媒反映“法轮功”的问题。1997年3月26日，香港《信报》发表署名张立的文章《正邪之分》，反映“法轮功”为邪教，李洪志为邪教教主。文章说，李洪志“自称如来现世，传人类有史以来未见的宇宙大法”，“法轮功”书籍“借用虚无缥缈名词，实际上谤佛谤法谤僧，传播魔说”。文章认为这正是邪教的特点，“无限夸大其法的功能与效力，无限夸大其教主的潜力与权威”。

一位名叫陆兴冲的中年男子，从1997年开始，连续两年分别向江苏省体委、气功协会、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等多个单位状告“法轮功”害死了他朝夕相处28年的结发妻子。在1997年12月12日，《钱塘周末》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缘何猝死》，讲述了一个结婚才7个月的报社人员因痴迷“法轮功”，患上糖尿病而

拒绝医治，最后离开人世。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1996年李洪志开始到美国传法，1997年，李洪志终于实现了美国梦。在“法轮功”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日子里，恼羞成惧的李洪志来了个脚底抹油，一走了之。

李洪志借用佛教名词成立“法轮功”，并打着佛教气功的名义，号称“法轮佛法”，这使他手握两个标签：一个是气功，一个是佛法。李洪志为了标榜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大法，不仅给自己披上佛法外衣，还大肆谤佛谤法。对于李洪志的这种恣意贬低佛祖的行为，佛教界人士对其深恶痛绝。

1996年第8期的浙江佛学刊物《台州佛教》发表署名为金刚剑的文章，指出“法轮功”是一个“披着佛家外衣，不折不扣的‘邪魔神功’”。这篇文章在台湾佛教界引起共鸣，台湾正信佛弟子智光居士发表文章，转述了金刚剑的观点。

曾任哈尔滨市佛教协会秘书长、湖北岩山佛学院讲师，现就职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的陈星桥居士是佛教界较早接触“法轮功”的人，他在1994年就在哈尔滨听过李洪志的讲座，觉得其荒诞不经，未引起注意。后来李洪志以气功之名行宗教之实，打着佛家旗号，干着反佛教勾当，把气功宗教化推向了高潮，给佛教界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为此他专门购买了一套“法轮功”书籍，进行了研究。并于1996年写出《还法轮功本来面目》一文，发表在中国佛协主办的《研究动态》1997年第2期上，在文章中，陈居士认为，“法轮功”是一种“具有民间宗教特点的附佛外道或邪教”。这个观点后来为佛教界普遍接受。1998年7月，《香港佛教》就刊登文章，说“法轮功”是一种颇具宗教性的新型民间邪教。

陈星桥后来还在《法音》、《内明》、《文史知识》等报刊上

发表数十篇论文，揭露和批驳李洪志及其“法轮功”。1998年3-4月，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第3、4期以大篇幅发表了陈星桥的长篇文章《法轮功——一种具有民间宗教特点的附佛外道》。该文长达两万两千多字，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作了详细评论。这是佛教界极有深度和识见的一篇论文，从“法轮功”与气功，“法轮功”与佛教，“法轮功”与民间宗教，“法轮功”与科学，面对“法轮功”的沉思五个方面对“法轮功”的本质深入剖析，说明“法轮功既非气功，又非佛法”，“它是一种颇具民间宗教性质及浓厚意识形态内容的新型的现代迷信和附佛外道。”从佛教的角度看，“法轮功就是邪教。”他打着气功旗号贬低气功，打着佛家旗号破坏佛教，打着科学旗号排斥科学。

陈星桥还对“法轮功”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法轮功”的社会危害，如何认识和对待“法轮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像“法轮功”这样打着佛教旗号的伪气功和伪佛教至今仍迷惑着许多气功爱好者，不仅他们中的许多人深受其害，而且佛教也蒙受了不白之冤，广大佛门弟子的正信受到一定影响，宗教感情受到极大伤害。当务之急，一是要澄清是非，划清佛教与“法轮功”的界限；二是要努力清除其消极影响。

他提出，对“法轮功”有理有据地予以剖析，可以加深读者对“法轮功”本来面目的认识，希望能使广大佛教徒提高警惕，使“法轮功”弟子们有所醒悟；同时希望能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对类似“法轮功”的新兴宗教进行必要的研究，制定出相应的法规，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

他的这一研究对认识“法轮功”的本质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1998年1月13日，中国佛教协会召集专家座谈，讨论如

何认识“法轮功”以及相应的对策。在会上，陈星桥的观点获得与会专家的高度赞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吴立民所长指出：“信仰市场若被邪教势力所操纵，发展起来对国家将构成一种潜在的危险。”此言可谓是警世良言！

后来，陈星桥又在1998年将他的这些文章汇集成《佛教气功与“法轮功”》一书，书中还收录了发表于中国佛协《会务通讯》上的《中国佛教协会“关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问题座谈会”纪要》。

陈星桥的揭露在其他媒体也得到回应，1998年3月13日，《南方周末》发表“周末故事”《揭开民间邪教“法轮功”的真面目》。指出实际上“法轮功”既非气功，也非佛法，而是“一种颇具宗教性的新型的民间邪教。”这些对“法轮功”的定性，使人们拨开了罩在李洪志身上的迷雾，看到了李洪志和“法轮功”的真正面目。

第十六章 中南海事件

第一节 媒体与“法轮功”大斗法

“法轮功”所散布的各种迷信思想、诈骗钱财的行为以及全国各地许多“法轮功”练习者因练功而自杀甚至杀人的事例，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也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1996年，国家新闻出版署针对各种气功图书泛滥的情况，聘请了一批专家对部分气功图书进行了审读，发现李洪志的《中国法轮功》等几本图书存在大量宣传封建迷信思想及各种荒谬言论，遂作出了查封并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和音像制品的决定。此外，一些新闻媒体对“法轮功”的种种劣行也纷纷予以揭露曝光。

“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各地“法轮功”辅导总站针对各地新闻媒体报道、刊载揭露、批评“法轮功”的文章、政府有关部门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和音像制品、对“法轮功”组织非法活动进行调查等情况，多次策划、煽动“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围攻新闻单位和党政机关，组织练习者炮制“上访信”，向政府施压。

从1996年8月“法轮功”练习者围攻《光明日报》算起，各地“法轮功”组织共策划组织了300多次围攻活动。仅从1998年4月到1999年7月，李洪志等人就策划在全国各地组织了18起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的活动。

一、“《光明日报》事件”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为“辛平”的评论《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由〈转法轮〉一书引出的话题》,公开批判“法轮功”。指出:“最近一段时间摆在大街小巷书摊上的《转法轮》,就是一部宣传封建迷信的伪科学图书”。文章逐条批驳了“法轮大法”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宇宙大法”、“地球毁灭”等歪理邪说。这是中央新闻媒体刊发的第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战斗檄文。也是被李洪志所称的“《光明日报》事件”。

《光明日报》的文章第一次有力地打击了“法轮功”组织,李洪志等人惊慌失措。他赶紧召集“弟子”说“法”。据原“法轮功”石家庄总站站长段荣说,《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王治文就紧急电告石家庄总站,要求“组织学员写文章回击《光明日报》”,还说另一负责人李昌“已写了一篇文章给《光明日报》,并已下发到全国各辅导站,提供了一部分理论根据”。石家庄站“奉旨”立即通知邢台、邯郸、沧州等6站行动。

李洪志等人还在东北地区散发的材料和讲话中造谣说:“《光明日报》已派‘辛平’向李洪志认错、道歉了,”“报社已下令收回6月17日的《光明日报》。”

在李洪志的煽动下,北京地区少数“法轮功”组织甚至把培训班办到光明日报社大门口,并公然拉起了有“法轮功”字样的横幅。个别练习者甚至在来信中扬言要“不惜以身护法”。

8月的一天,一群“法轮功”练习者聚集光明日报社门前,要求与光明日报社负责人“对话”。光明日报社负责人经过慎重考虑,指示办公室工作人员“可以仔细听听情况,但不

要轻易表态，如遇无理要求，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予以驳回。”“法轮功”练习者的代表一男两女来到办公室后，工作人员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但对其就“辛平”文章“给予更正”的无理要求当即予以拒绝。

后来，李昌还亲自派北京某出版社工作人员王某专门到光明日报社，递交了一份百般狡辩的书面材料。“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李昌还专门通过一位在深圳工作的企业界人士、某省原某领导之子转来一封信，对报社横加指责，并要求《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其关于“弘法”的文章。

在围攻《光明日报》后，李洪志还在1996年8月28日下发了题为《大曝光》的所谓“经文”，称此事他在几年前就已安排好了、目的就是想对“大法弟子”进行考验，让不精进的看到不足，让破坏大法的显露出来。以此诱惑、胁迫“法轮功”练习者听从其驱使，进行“佛法”与“国法”的较量。

“法轮功”组织正是从围攻《光明日报》起，开始了有组织的围攻《齐鲁晚报》、《河北政法报》、《沧州日报》、《重庆日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等新闻单位的活动，企图封堵新闻媒体之口。

二、《齐鲁晚报》再揭“法轮功”

1998年3月，《齐鲁晚报》读者热线电话不断接到一些读者特别是一些“法轮功”练习者家属的反映，说“法轮功”让人走火入魔，而且生了病拒绝治疗，结果贻误了病情。这些读者还反映，因为家里有练“法轮功”的亲属而弄得全家神经兮兮，不得安宁，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些读者强烈要求《齐鲁晚报》对此现象进行报道、批评。《齐鲁晚报》决定派记者进行采访。

采访过程中，记者通过明察暗访，了解到了有关“法轮功”的许多真实情况，特别是发现他们散发的那些“练‘法轮功’治好病”的小册子中的事例，许多都是假的，其中有的人早已死亡，而事例中还称如何因练“法轮功”而治好了病。而许多“法轮功”练习者对此并不了解。于是，《齐鲁晚报》于4月1日发了第一篇报道《请看“法轮功”是咋回事》。报道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一些练功者的亲属更是拍手称快，有的亲属还来报社诉说“法轮功”给他们家庭带来的不幸。根据这些反映，《齐鲁晚报》又整理了一篇《要旗帜鲜明地宣扬科学》的文章，于4月7日刊出，8日又刊发了《“法轮大师”聚财有道》，用事实揭露“法轮功”以开展练功为名，采用多种方式搜刮广大练功者的真相。

就是这样几篇让广大群众看了称快的报道，一下惹怒了“法轮功”的“大师”们。李洪志得到这些消息后，立即向山东的“法轮功”负责人发出指令，要求他们“抓住时机，扩大‘法轮功’的影响。”“有忍耐地进行”。从此，他们中的骨干分子，便开始向该报发起“进攻”。而且这种“进攻”是有组织、有步骤、有目的的。他们采取了三个步骤，步步逼近，层层递进，最后达到把事态闹大的目的。

一是写信骚扰，施加压力。在1998年4、5月间，《齐鲁晚报》编辑部几乎每天都收到所谓“法轮大法”弟子们的来信，这些信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一开始先说“法轮功”如何好，超越科学、超越人类一切文明，李洪志如何了得等等，接着便说自己的学功练功经历，最后则指责《齐鲁晚报》诬蔑“法轮功”，攻击他们的“李洪志大师”。

二是屡到报社，胡搅蛮缠。在写信的同时，一些“法轮功”骨干便接二连三地开始到报社找领导施加压力，他们一坐

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他们强词夺理，向报社提出种种要求，要求报社发表他们吹捧李洪志的文章。

三是扬言聚众示威。随着6月份临近，他们来报社的人也越来越多，口气也更加强硬，而且还下“最后通牒”，如果不照他们的意见办，将组织“法轮功”弟子到报社“静坐示威”。

果然，1998年6月1日一大早，一些“法轮大法”的练习者便从四面八方陆续集合到报社门口两侧，要向《齐鲁晚报》讨说法，聚集人数约上千人。他们强烈要求与报社领导进行“对话”，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报社领导决定与他们的代表进行“对话”。他们在“对话”中，根本不容《齐鲁晚报》的代表讲话，而且不准对“法轮功”说一个“不”字，七嘴八舌指责《齐鲁晚报》“歪曲事实”，“诬蔑”他们“无限爱戴的李大师”，这是“天大的不敬”，要求报纸登报更正、公开向李大师道歉。

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经报社和公安机关商量，出于稳定广大练功者的考虑，报社同意在6月2日刊登一则“说明”。但是，他们提出，必须刊登由他们提供的一份向李洪志及练功者道歉的东西，并扬言：“明天登报一个字也不准改，否则我们还来，而且人数会更多。”

山东省委宣传部、《大众日报》社党委的领导与《齐鲁晚报》社负责同志共同研究，按照省委领导的指示，确定对他们提出的“更正”坚决不能登。但是，考虑到当时“法轮功”的问题不明确，从安定大局的角度考虑，可以发一个“说明”。

6月2日，在报社刊出“说明”后，“法轮功”骨干们看到报纸没有刊登他们提出的“更正”，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不遵守诺言”，“欺骗法轮大法”。6月3日一大早，报社尚未上班，“法轮功”练习者便再次聚集到报社门口，这次人数比上次更多，接近2000人。一批公安民警被调来维持秩序，济

南市公安局、区公安局的领导坐镇指挥。

在与“法轮功”代表的又一次谈判中，报社领导提出，这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有组织、有预谋的非法集会，冲击报社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要负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则宣布他们的这两次聚会都没有办理手续，属于违法行为，希望他们能认清形势，劝走静坐者，维护社会稳定。报社领导和公安机关的讲话，给了这些代表当头一棒，他们纷纷辩称“法轮功”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报社领导反问：“没有组织，怎么会有2000人不约而同地聚在报社门口？”代表们哑口无言。经过报社领导有理有据地给他们讲事实、摆道理，驳斥他们的谬论，经过一天的耐心规劝、晓以利害，这些“法轮功”分子看到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被动，最后才找了一个借口悻悻而去。至此，一场闹局才算画上了句号。

1998年5月4日，《健康报》的子报《健康文摘报》根据《齐鲁晚报》的文章《请看“法轮功”是咋回事》重新拟题刊登了《违法坑人“法轮功”》的文章。“法轮功”分子又开始了《健康报》的围攻。从6月10日开始，400余名“法轮功”练习者到该报社门口围攻、闹事，一连闹了三天。报社领导后来提出：“我们准备派记者到各地了解情况，然后澄清事实。”双方约定以10天为期，调查之后给“说法”。后来，报社领导认为“法轮功”以气功为名进行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本报不能向“法轮功”道歉，并将这一决定向他们进行转达。10天之后，“法轮功”练习者见报社态度强硬，便偃旗息鼓了。

三、围攻北京电视台

1998年5月25日，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播出《上岗证能否扫净假气功》的节目，在节目中，中科院院士何

祚麻先生讲了他的一个博士生因练“法轮功”而导致重病的事实。这下惹恼了李洪志，他指使“法轮大法研究会”副会长李昌到北京电视台讨个说法。

5月27日，李昌遵照李洪志的指示，召集叶某、纪烈武等6名“法轮功”核心骨干开会，声称这个节目是冲着“大法”来的，要动员北京各辅导站派学员去找北京电视台论理。会上商定了行动计划。次日早晨8点多，4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北京电视台门前静坐，后来人越聚越多，将北京电视台围了个水泄不通。

5月29日，李洪志从美国给李昌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当得知围攻电视台的人数时很不满意，斥责李昌说：“老李呀老李，我就少跟你说一句话，人太少了，人这么少还不如不去。”5月29日，李洪志又与李昌通话，称“我天地上都安排好了，就差人动了。机会已经错过了，如果不动再没有时间了。”李昌听后说：“事情很大，怕承受不了但还得继续做。”5月30日上午，李昌、纪烈武等人再次开会，确定了“能争取多少就争取多少”的谈判原则，并选出了与北京电视台谈判的9名代表，指派姚洁任联络员。5月31日，“法轮功”北京总站组织学员学法，再次动员学员们去北京电视台，并把参加围攻电视台说成是提高心性、走向开悟圆满的好机会。

在“法轮大法研究会”和“法轮功”北京总站的组织和鼓动下，5月30日、31日前往进行围攻的学员越来越多，最多时达800多人，严重影响了该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6月1日，李昌又召集9名“谈判”代表交代注意事项。然后，姚洁与9名“谈判”代表前往北京电视台进行“谈判”。当晚，李昌又召集“法轮大法研究会”、“法轮功”北京总站及各分站负责人开会，通报与北京电视台“谈判”结果。

6月2日，围攻电视台的学员仍不肯离去，坚持要北京电视台道歉。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北京电视台决定由台长、总编辑等人出面直接与“法轮功”“谈判”代表见面，劝其离开。6月3日，3名“法轮功”“谈判”代表向北京电视台提出“强烈抗议”，蛮横提出北京电视台要在电视节目中公开道歉，为“法轮功”“平反”。北京电视台领导对此无理要求严辞拒绝，并指出电视台是国家重要部门，在电视台聚集闹事是绝对不允许的。3名“法轮功”“谈判”代表听后，警觉地问：你们参加谈判的人中是不是有公安局的？北京电视台领导明确答复说：不但有，而且不止一个。并警告说，请你们劝说所有的人迅速撤离，这对大家是个爱护。这3个人有点慌了，说为了劝说大家，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如果不能公开道歉，是否可以拍摄一下练功情景，打上“这是练习法轮功”字幕。当遭拒绝后，又提出可否让练习者举着一个写着“法轮功”的牌子摄像后在电视台播放一下。此举又遭拒绝。为摆脱“法轮功”“谈判”代表的长时间纠缠和结束“法轮功”学员的连日围攻，电视台领导决定让步，拍摄播放一分钟的市民晨练节目，其中包括“法轮功”练习者练功镜头，并警告说如果对方还不结束纠缠、围攻，将采取严厉措施，由组织围攻者承担一切后果。这3名代表答应回去做劝说工作。6月4日，在李昌等人的授意下，围攻电视台的“法轮功”学员全部撤离。

在此次策划组织围攻活动中，李洪志一手操纵，通过“法轮大法研究会”进行指挥；“法轮大法研究会”6次开会密谋落实李洪志的指示，具体组织围攻、谈判活动。“法轮功”学员共围攻北京电视台长达8天之久。事后，“法轮功”骨干得意洋洋，把挟众向新闻单位施压作为“护法”的成功经验宣扬，并捏造出北京电视台领导向他们鞠躬道歉的谣言进行炫

耀，还统一组织“法轮功”练习者发出大量内容千篇一律的信件，向政府机关状告北京电视台。

四、李洪志一手指使围攻活动

李洪志利用“法轮功”练习者对他和“法轮大法”的虔诚信仰，以“护法”、“正法”、“长功”、“考验”为名，诱使、胁迫他们围攻新闻单位和党政机关。李洪志已经将组织围攻当成扩大“法轮功”影响、与国家叫板的一种重要形式。

1998年，李洪志把围攻北京电视台事件作为“法轮功”“护法”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他从中尝到了甜头，怀着复仇和得意的心情向全国“法轮功”练习者发布指示，蛊惑、煽动“法轮功”练习者向批评、揭露“法轮功”危害的科学家、学者、新闻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围攻。1998年7月6日，李洪志出笼“经文”《挖根》。在该“经文”中，他对批评“法轮功”的学者、科学家和新闻媒体进行谩骂和攻击，对实际上由他一手操纵的围攻北京电视台事件予以肯定，并暗示各地“法轮功”练习者到对“法轮功”提出异议的“宣传机构”进行“上访”。《挖根》部分“经文”如下：

“近一个时期由于那几个历来想用反对气功达到出名目的的文痞、科痞、气功痞不断造事，惟恐天下不乱，全国各地有一些报纸、电台、电视台直接动用这些宣传机器破坏我们大法，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为地在破坏大法。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北京大法弟子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叫那些人停止破坏大法其实没有错。这只是在极限的情况下而做的。但是学员群众自发地去向这些不了解事实、不负责任的宣传机构阐明我们的实际情况，这也不能说是错误的。”

他声称，大法不是为使人心向善、使社会安定而传的，是为了修炼，修炼远远比人类社会重要。他将大法置于社会之上，严厉指责那些对围攻电视台违法行动有顾虑、思想未完全与人类社会决裂、未能绝对听命于他的部分“法轮功”人员，说：“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反对……可是你现在是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李洪志还以不跟他走会失去修炼机会、修不上去为幌子威胁“法轮功”练习者与常人决裂，听从其指挥，在“护法”活动中提高修炼层次。他说：“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都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

李洪志将其大法置于社会、政府之上，将修炼者与维护社会稳定、遵守法律秩序对立起来，并将听从其思想控制、参与围攻新闻单位等非法活动作为千载难逢的修炼机会和提高修炼层次、走向“圆满”的手段，对于广大“法轮功”练习者具有很大的麻痹性和欺骗性，使他们为“护法”不知不觉走到与社会、与政府对立、违法乱纪的邪路上。据北京“法轮功”负责人和练习者揭露，“法轮功”总站一个负责人就是因为围攻北京电视台不积极而被李洪志“革职”的；有些思想上未跟上李洪志的指挥棒而未参加围攻北京电视台的“法轮功”练习者，正是学习了这篇“经文”后，为了悟上去、修炼圆满、提高层次而积极参加“4·25”围攻中南海事件的。《挖根》经文，

可以说是李洪志向全国“法轮功”组织和练习者发布的围攻新闻单位、党政机关的动员令。

第二节 何祚庥又捅马蜂窝

一、一篇文章引爆天津事件

对许多伪科学和伪气功大师来说，何祚庥先生无疑是一个大克星，正是在他手下，“超人”张宝胜败走麦城；也是他，使发明“水变油”的“大科学家”王洪成露出了狐狸尾巴。对“法轮功”，何先生已经在1998年北京电视台事件中与之交过一次手了。在那个回合的交手中，“法轮功”一边组织力量围攻北京电视台，一边组织人马到何先生家里去跟他辩论，同时还不断打电话恐吓他，使他没有片刻安宁。但是，何先生是一个硬骨头，“法轮功”的无赖行为只能使他更加看清其真实面目。

1999年4月，何祚庥先生的一篇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在天津师范大学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登载了。该文有三处提及“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其中一段提到“有一篇关于‘法轮功’的宣传材料，就说有某工程师练了‘法轮功’后，元神出窍了，可以钻到炼钢炉里，亲眼看到炼钢炉的原子分子的种种化学变化”。何先生对此提出疑问：“炼钢炉里的温度比太上老君炭炉里的温度要高出几百度，钻进去，可能吗？”文章另一段提到他所在的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就有一位同学因为修炼“法轮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抢救，病愈后又修炼“法轮功”，导致病情复发，并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青少年科技

博览》杂志考虑到伪科学在青少年中的毒害性，也考虑到何祚庠院士的影响，把文章作为“特稿”配照片重点编发了。总编周绍祿说：“我们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样一篇面向青少年读者的科普文章，竟引起轩然大波。”

此时的“法轮功”组织，已经习惯于对所有反对“法轮功”的力量，无论是个人、媒体还是政府机关，都要起来压制和围攻，尤其此文出自伪科学的老对手何祚庠之手，“法轮功”对此自然更是不能放过。4月15日，“法轮功”天津总站决定就此向该校进行交涉，要求为“法轮功”“正名”。当日，“法轮大法研究会”一位主要负责人与天津总站负责人通电话，表示予以支持，并指示不要通过法律程序和手段解决问题，而是要采取组织“法轮功”练习者聚集施压的办法迫使该校屈服。4月21日，“法轮大法研究会”该负责人又授意天津总站这位负责人对情绪激昂的“法轮功”练习者“别拦着，谁愿意去谁就去”，以致4月22日聚集在该校静坐的练习者激增至3000余人。此人听取了天津总站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后，对围攻活动表示满意，并为其出谋划策说：“你们可以白天去，晚上撤。”在其授意和鼓动下，4月23日，聚集在该校静坐的“法轮功”练习者达6300多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

在“法轮大法研究会”和李洪志的指使下，“法轮功”练习者围攻天津师范大学达5天之久。由于他们的幕后操纵、指挥，当地政府多方对现场的“法轮功”练习者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均无效。当得知天津公安部门要采取措施制止在该校区的非法聚集活动，“法轮大法研究会”的这位负责人又为天津总站负责人打气说：“怕什么，这不正是考验吗？”极力激化矛盾，把事态搞大。他还派人去天津当场进行策划指挥。当夜，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被劝离后，天津总站又组织两三千人围

攻天津市政府。

二、连夜上书

围攻天津事件的发生，给一些长期关注伪科学、伪气功的科学家以极大的震动。他们觉得，伪气功发展到这个程度，证明它们已经正在朝祸乱国家的道路急速前进。在这个时刻，如果不能及时阻止，任其发展，必将酿出大乱。可是，一些人还在为了一时的稳定，采取鸵鸟政策，不敢与它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任其发展，看不到其严重后果。使这些科学家不禁忧心忡忡，在这个关键时刻，使命感促使他们挺身而出。

1999年4月20日，中国科协举办了一个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纪念会。会议由龚育之和科技日报社社长焦洪波主持，科协主席周光召、科协党组书记张玉台、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何祚庥、赵忠贤、赵柏林，还有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以及一批专家学者，都参加了。会议的主旨就是研究如何发扬“五四”精神，提倡民主和科学精神，反击“法轮功”等乌七八糟的伪科学、伪气功。

在会上，于光远以极为恳切的言词，作了一个题为《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责任》的发言。在发言中，于光远一开始就非常直接地提出现在反科学反社会的势力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现象，我们应该对其高度重视，并尽快采取行动，千万不要轻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

他说：“二十多年来在我们中国有一股反科学反社会的势力，他们的势头颇盛，他们的活动在全国泛滥成灾，十分猖獗。我认为这是一个可悲可忧的、极为严重的现象。我认为一切关心祖国历史命运的人，而对着这一种极为严重的现象不能有任何轻视，而应该正视它、重视它、对之深思，作出恰当的

判断和采取行动。”

在发言中，于光远还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科学与伪科学、伪气功的斗争历史进行了归纳。他指出，“三伪一所谓”即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伪气功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发展从1979年“唐雨识字”事件到现在经过了七个阶段，他们组织的反动政治色彩、反社会色彩越来越明显，发展到公开包围报社、法院和电视台，他们的力量大了，他们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于光远还作出断言：如果我们一味忍让退缩，如果党和政府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伪科学、伪气功必然会进一步“显示力量”！

于光远还明确指出，他们这种活动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我们应该深思，为什么我们能容忍这种极严重的现象存在达二十年之久？为什么容忍这种极严重的现象继续发展？为什么有些犯罪分子现在仍继续逍遥法外？我们到底准备不准备打击这些邪恶势力？我们现在对这有没有明确的方针和有利的部署？现在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邪恶活动已经发展到走上街头显示力量的阶段，我认为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现象的严重性，而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轻视漠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

于光远更进一步提出，如果情况的确极为严重，有关方面就要担负起极严重的责任。他说，要让各级党组织认识到，反不反对这种极严重的现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如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党组织的严重失职。同时，我们的国家机器对这种邪恶势力一定要严肃对待，对那些为首作恶的分子决不应软弱无力，不能姑息养奸。

于光远用一连串的“极严重”来表达他的高度关切之情。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在另一个会上，科学家们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是无神论研究会组织的一个专题会。无神论研究会的

会长是著名哲学家任继愈教授，副会长就是何祚庥。

在会上，大家每个人都宣读了论文，在宣读论文时，大家不禁发笑，与会的每个人都搞了多年的无神论，自己也不是有神论者，反而你听我的，我听你的，这有什么意思。后来何祚庥就提议，“法轮功”值得重视，我们是不是做此工作，整理出材料，好好研究一下，大家把这个问题搞得清楚一点儿，送个汇报给有关领导。

说干就干，大家于是就忙活起来，整理有关“法轮功”的材料。

大家整理的材料，既讲了“法轮功”的理论体系，也讲了它的非法活动，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大家都认为这个材料对领导机关了解“法轮功”的情况并制订有关政策将有重大作用。可是就在大家正在忙得不可开交，还没有来得及将材料整理出来的时候，李洪志已经开始了行动，发动了4.25中南海围攻事件。大家一看问题严重，就加快行动，拼命打印、校对。就这样，一份还带有错别字的报告终于赶在25号送达中央，为中央下一步的科学决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后，大家直惋惜要是早两天就好了，可惜没有这个预见。

第三节 围攻中南海

一、兴风作浪，山雨欲来

远在美国的李洪志也随时在关注着“法轮功”在天津师范大学静坐示威的情况。在美国得到“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报告后，李洪志决定回国亲自进行策划指挥。他是4月22日17时

10分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从纽约飞到北京的。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前后跨了3天，共44个小时。

李洪志从大洋彼岸潜回北京，完全是“有备而来”。他事先通知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纪烈武。他从机场回到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楼他的一所相当高级的住宅，就迫不及待地让纪烈武汇报这几天“法轮功”练习者围攻天津师范大学的情况。这表明李洪志一开始就想抓住这件事策划一场更大的阴谋活动。

李洪志潜入北京的当天，4月22日，在天津师大聚集的“法轮功”练习者达到2000多人。

李洪志潜入北京的第二天，4月23日，围攻天津师大的人数从2000多人激增到6000多人。当“法轮功”天津总站向王治文报告有关部门要劝离非法聚集的“法轮功”练习者时，王治文说：“怕什么，这不正是考验吗？”随后，两三千名“法轮功”练习者又到天津市委、市政府门前非法聚集。

天津的事件正随着李洪志来到北京而升温。但是，李洪志的目标并不只是在天津闹事，而是处心积虑地要把事态扩大到北京，造成更大规模的社会震荡。

二、密室策划，扩大事态

4月23日上午，李洪志把“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李昌、纪烈武等人召到他的住处，密谋策划把天津的事情闹大，把火烧到北京中南海。

李昌和纪烈武在会上说：“天津的事情不能找北京哪个部门，要找中央和国务院。”李洪志当即说：“到北京去！”“要去中央，去国务院！”

李洪志强调：“人少了不行，要多去点。去年北京电视台

的事就是人去少了，要是去的人多，问题早就解决了。”同时，李洪志还让王治文跟外地打招呼：“人来得越多越好”，强调“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李洪志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还为围攻中南海的活动制定了一个策略：不能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和辅导总站的名义去做这些事情，要把普通练习者推到闹事的第一线。他要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去具体组织、落实。

“4·25”非法聚集中南海的计划，就这样在李洪志亲自密谋策划后定了下来。

23日下午1时30分左右，在“法轮功”核心骨干叶浩的家里，李昌、纪烈武秉承李洪志的旨意，召开了具体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的第一次会议。

李昌传达了李洪志的决定，要求他们通知所有“法轮功”练习者，4月25日清晨到中南海聚集。他特别强调，“不单是解决天津问题，而且是弘法和护法”。为了落实这一计划，他们还决定利用24日的“学法例会”，向“法轮功”北京总站各辅导站的负责人进行布置。

会议还没有结束，纪烈武就匆匆跑到李洪志住处，汇报计划落实的情况和具体措施。李洪志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

23日晚，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天津市公安局对连续几天围攻天津师大的“法轮功”练习者采取了劝离措施。“法轮功”练习者陆续离去。整个行动很平和，公安局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发生其他任何问题。

天津“法轮功”练习者被劝离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晚22时左右，“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骨干们又聚集在叶浩家召开了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的第二次会议。会上，李昌、王治文造谣说：天津警察抓人了，听说还死了人，还有人失踪了。

并要求把这些谣言传出去，为煽动“法轮功”练习者大规模非法聚集中南海作舆论准备。

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去中南海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的三条无理要求：第一，要求公安机关立即放人；第二，给“法轮功”提供宽松的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有关“法轮功”的书籍。从他们提出的这三条要求看，目的就在于把他们的非法组织合法化，任由他们发展，以便纠集、形成一股邪恶的政治势力，与党和政府进行长期的抗衡。

按照李洪志“不要暴露这次活动是‘研究会’组织发动的”这一要求，“法轮大法研究会”核心骨干密谋商定，“4·25”行动时李昌、王治文、纪烈武3人和北京总站负责人都不到中南海现场，以免有的“法轮功”练习者认出他们，看出他们的组织者身份。

李洪志在作了精心策划、部署之后，核心骨干们商定，北京这边一动，他就不宜留在北京，要赶快走，免得把自己暴露出来。为了掩盖罪责，4月24日一早，李洪志匆匆收拾行李，在纪烈武的护送下赶往首都机场，买了10时20分飞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的机票。但班机因机械故障不能准点起飞，李洪志又改乘CA109次航班，于13时30分飞往香港。

三、严密组织，恶意围攻

李洪志匆匆溜走后，由他一手策划的围攻中南海行动，在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的具体组织下，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同时，他坐镇香港，遥控指挥。

4月24日上午8时30分，在北京东城区藏经馆胡同7号，召开了“法轮功”北京总站及区县辅导站骨干的“学法例会”。“学法例会”，顾名思义是为学习“法轮功”而定期举行的会

议，实际上是“法轮大法研究会”操纵“法轮功”练习者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这次“学法例会”，就成了他们为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而举行的第三次会议。

李昌、王治文在会上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对“4·25”行动作了具体布置，确定去中南海聚集行动的具体时间为4月25日清晨。为了掩盖他们的政治阴谋，会上决定：在中南海聚集现场，各分站长要特别安排一些人负责安全、交通、秩序和卫生，包括现场联系，出现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处理；并确定了聚集的策略，参加的练习者不喊口号、不带标语、不撒传单、不要有过激言辞，对外不用“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会上还决定，“法轮功”北京总站副站长刘志春负责通知北京各区县，王治文负责通知外地。

4月24日下午，李昌、纪烈武等“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及北京“法轮功”总站负责人，在叶浩家召开了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的第四次会议。李昌继续抬出李洪志为大家打气。他说：“师父说这种事情是最后一次了，再也不会有什么机会了。”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4·25”行动现场指挥的组织分工：李昌、纪烈武负责全面指挥，王治文负责与外地联络，刘志春负责与北京各区县联络，姚洁负责与现场联络，刘树人负责通过互联网对外发表宣传稿件。会议还决定，在二七剧场附近的姚洁家设立“指挥部”，在民族宫附近柯明家设立现场联络点，派陈东月、李月秋等在中南海现场了解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最后，李昌反复强调总站以上负责人均不到中南海聚集现场。

根据会议的分工，王治文以“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名义，向河北、山东、辽宁、天津、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负责人打出一系列电话，要求他们组织“法轮功”练习者于4月25

日晨到北京中南海府右街“护法”。

李洪志的意图，很快传达给“法轮功”各总站站长，各总站站长又逐级传达给各分站、辅导站以及练功者。至此，“4·25”行动的准备工作的全部就绪。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开始向党和政府发难了。

4月24日21时40分，中南海北门出现了第一批约40名“法轮功”练习者。

25日凌晨3时07分，北海附近出现来自河北的十几辆大客车，客车上的人陆续在附近地下通道内集中。

3时30分，另一部分人在护城河边汇集。

5时13分，大批“法轮功”练习者开始从北海公园正门向西行进；另一批人从胡同中走向府右街。

6时55分，府右街出现大批行进人群。

7时，中南海西门府右街一带已形成静坐场面。

这以后，聚集的人继续增多。至25日上午，人数已达1万余人。众多善良的“法轮功”练习者，在李洪志的蒙骗和煽动下，为了“长功”，为了“消业”，为了“圆满”，为了寻找一个好“气场”，来到中南海非法聚集。

4月25日上午8时，中南海北门路对面，自东向西一直到府右街北口，便道上站满“法轮功”练习者。有记者询问其中一些人：“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来自北京远郊县的一名妇女说，要在这里练功。记者问道：“这哪里是练功的地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练功？”这名妇女无言以对。下午，非法聚集人数逐渐增多。18时左右，人群已排列到北海公园前门团城下。此时，府右街的交通中断，非法聚集严重影响了周围地区的社会秩序。

根据事先的安排，25日清晨，李昌、王治文、纪烈武、

刘志春等 20 多人陆续来到在姚洁家设立的“指挥部”，频繁地与中南海聚集现场联系，不断发布命令，进行指挥。

当日早上，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现场“法轮功”练习者的代表，明确指出“法轮功”练习者围聚中南海是错误的、非法的，应立即撤离，并作了大量教育工作。9 时许，“法轮功”现场人员向“指挥部”报告说，4 名代表进了中南海“对话”，但进去的人对为什么要搞这次活动说不清楚，又换了 4 个人进去，两拨人都说不清楚，要求“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北京总站派能说清楚的人去谈。经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商量，并请示了在香港的李洪志同意后，决定由原来不准备露面的李昌、王治文等 5 人作为代表进中南海“对话”。

四、遥控指挥，图谋难逞

4 月 25 日，躲在香港的李洪志又在做什么呢？

事实上，李洪志在香港的住所内，一刻也没有闲着。25 日一大早，他就打来电话向“法轮大法研究会”核心骨干了解聚集中南海的情况。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始终紧张地与北京的“指挥部”保持着“热线”联系，不断下达指示，遥控指挥现场活动。北京“指挥部”也不断给李洪志打电话汇报、请示。25 日当天，他们频繁来往电话 20 多次。在通话中，他多次要求“让外地人多来些，再多来些”。

纪烈武将现场情况和有关问题及时报告李洪志。当现场聚集 1 万多人时，纪烈武打电话告诉了李洪志。李洪志说：“好，外地学员多不多？”在两拨代表进中南海“对话”后，纪烈武也都及时向李洪志作了报告，李洪志说“行”。当中办、国办信访局提出让“法轮大法研究会”和“法轮功”北京总站派人来谈时，纪烈武立即请示李洪志，李洪志答复说：“找你谈，

你干嘛不去。”

李昌、王治文、郝嘉凤、周德承、刘树人等“法轮大法研究会”的5名代表，与有关方面负责人无理纠缠长达八九个小时。在谈判中，他们向中央提出三个无理要求：释放在天津被捕的“法轮功”闹事者；《青少年科技博览》和何祚庥公开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攻击”“法轮功”；宣布“法轮功”合法。他们还有一个“第四条”没有提出，直到5月份“法轮功”信徒在北京香山为李洪志“祝寿”时，这个“第四条”才提了出来：“法轮功”大师要进全国政协！在谈判期间，远在香港的李洪志多次催问向中央施压的结果。在没有得到李洪志的指令之前，中南海周围非法聚集的人群仍没有散去的迹象。

当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要求聚集者离开时，纪烈武立即报告李洪志，并请示聚集在中南海附近的人撤不撤。李洪志问：代表出来没有？纪烈武回答说，还没有。李洪志明确表示不能撤。

21时左右，李昌、王治文等人出来后，纪烈武再次报告李洪志。李洪志问：谈得怎么样？纪烈武说：“明天还要接着谈。”由于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严厉要求“法轮功”练习者立即停止非法聚集，他们请示李洪志当晚是否撤离，李洪志说：“老李（李昌）让走就走吧。”纪烈武接到这一指令，通知“指挥部”，“让大家都撤”。

李洪志一手策划、指挥的“4·25”非法聚集围攻中南海事件就这样宣告收场。

4月26日清晨6时左右，当李洪志了解到李昌等人并没有见到中央领导，就给纪烈武打来电话质问道：“昨天没有见到中央领导，李昌怎么就让大家撤了？”为此，他大为恼火，责怪为什么没有谈出个结果来。

8 时左右，李昌、纪烈武等人陆续来到姚洁家。纪烈武说：昨天不该撤，师父还以为见到中央领导了，情况没有搞清楚。李洪志还要他以“师父”的名义通知外地“法轮功”练习者继续来京，要大家再去中南海，人越多越好。纪烈武还叫嚣：“修炼的人什么也不怕，不怕死；必要时还是要流点血，流血才好呢！”

尽管 4 月 25 日当天李洪志不在北京，但他却在中国的土地上操纵、指挥着“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的非法聚集事件。直至 26 日下午，纪烈武赶到香港，当面向李洪志详细汇报了围攻中南海的全部经过后，李洪志才搭乘国泰航空公司 CX103 次航班飞往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五、制订对策，掩盖罪行

“4·25”事件造成了恶劣影响。这次事件以及“法轮功”组织操纵的其他围攻事件注定了“法轮功”被取缔的命运。

5 月初，李洪志在澳大利亚悉尼“讲法”装出无辜的样子，一再对记者表白，“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当天，他正在从美国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到达布里斯班后才完全知道此事，事先对此一点也不知道。但当我国政府公布了李洪志于 4 月 22 日从美国秘密入境抵京、4 月 24 日又秘密离京、然后秘密滞留香港的人证和物证后，他的西洋镜被揭穿，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他不得不承认“4·25”事件前夕来京的事实，但又辩解说来京是从美国赴澳大利亚途中转机，因为从北京到澳大利亚机票便宜，在京期间什么人也没见。事实上，从美国到北京转个弯再到澳洲，比直接从美国到澳洲路程既远，路费又贵，“李大师”一向“聪明”过人，偏要这样“省钱”，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

李洪志策划组织“4·25”非法活动后，自知犯下了滔天罪行，为掩饰罪过和事件真相，继续欺骗、控制“法轮功”练习者，与政府展开“合法”斗争，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向各地“法轮功”组织发出了一连串“密令”：

对策之一：稳住阵脚，标榜“正常练功”，“不参与政治”，以求在与政府斗争中占据舆论优势，并伺机向政府发起进攻。4月27日，李洪志从国外向“法轮大法研究会”发布密令：“和地方上讲，冷静下来，心不要浮躁，避免被坏人利用；不要参与任何政治；安定下来正常学法练功。”4月28日，又发布密令：“不要接触国内外新闻媒体，一律不见；不参与任何政治，我们就是修炼。”5月1日，发布密令：“守住心法，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对策之二：鉴于因外界风传政府要对“法轮功”采取措施，部分“法轮功”练习者产生动摇的情况，李洪志又发布密令，以神秘的语言，蛊惑“法轮功”练习者坚定信心，听从其指挥，继续与政府对抗。5月16日，“法轮大法研究会”发出“师傅对弟子的讲话”：“坚定实修，可能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乱中见人心，总得有一个毕业考试吧。”

对策之三：以退为进，取消大规模活动，转为分散活动，企图麻痹政府，保存实力，长期发展。5月18日，广州“法轮功”骨干传达“法轮大法研究会”指示，称：“李洪志大师不同意在全国范围内搞大型庆祝活动。北京‘法轮功’总会指出，近期，‘法轮功’在全国发生了不少事，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搞大型庆祝活动，万一出事，就会波及全国，不利于弘扬大法及整体发展计划的实现。”

对策之四：鼓动“法轮功”练习者放弃对个人生死的考虑，与政府对抗到底。6月13日，李洪志发布经文《位置》：

“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人才寥寥无几。人就是人，关键时刻放不下人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骗自己。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至一切人的观念。我为能在生死的考验中走过来大法修炼者祝贺。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以至未来所在的层次，都是你们自己开创的，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精进吧，这才是最伟大的，最殊胜的。”

对策之五：号召“法轮功”练习者收集所谓政法机关“迫害”“法轮功”的“证据”，鼓动“法轮功”练习者到政府机关上访。6月13日，李洪志发布经文《安定》：“关于前一段所发生的事情，对‘法轮大法’广大学员已经造成重大伤害，同时也严重地败坏了国家形象。学员可根据所掌握的有关地区有关部门，直接或变相干扰破坏‘法轮功’学员练功之事，以致政法单位某些人利用手中权利挑起‘法轮功’事件，把广大人民与政府对立起来，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的情况，通过正常渠道向国家领导人反映。但是我们是修炼的人，不要参与政治，不要受前一段事情的干扰，静下心来，恢复正常练功、学法，精进实修，不断提高自己。”

正是在李洪志的煽动指挥下，“4·25”事件后，一些“法轮功”练习者进一步到北京和一些省市政府所在地进行非法聚集，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第四节 取缔“法轮功”

一、围攻中央电视台

1999年4月25日之后，李洪志仍然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

继续在全国各地组织非法活动。在5月13日“李大师”的造出来的“生日”和5月15日李洪志的“出山日”之际，各地“法轮功”练习者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1999年6月，出于主持正义、铲除邪恶的良知，武汉电视台一位记者开始着手深入调查“法轮功”内幕，揭露李洪志欺世盗名、愚弄信众的丑恶嘴脸。他深入武汉的“法轮功”组织内部进行调查，北上长春、山东等地，对李洪志的部分亲属、邻居、原来与李洪志一道传播“法轮功”的同僚，以及部分“法轮功”成员进行探访，在以事实为依据，掌握了大量的有关李洪志的言论、音像、图片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了一部完整、内容真实、证据确凿的电视片，拟交中央电视台，在“科技之光”栏目中进行播出。

由于这部片子深刻揭露了李洪志的真实面目，他得知消息后，立刻通过指挥系统向北京和武汉等地的负责人发出指令性的所谓“内部简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电视片播出。于是他们再一次制订计划，决定对中央电视台进行围攻，向媒体和政府施压，阻碍揭露李洪志嘴脸的电视片的播出。

为了给围攻中央电视台制造舆论，欺骗和误导不明真相的信徒，李洪志唆使组织炮制出一个所谓《关于武汉电视台驻北京记者站在“科技之光”栏目制作诋毁法轮功诬陷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情况反映》，呈给有关部门，向政府施压，企图谋求他们行动的所谓“合法性”。这篇“情况反映”颠倒黑白，竭力歪曲辩解，主要内容如下：

武汉电视台的记者宋某，受某公安局委托，录制了对‘法轮功’并对创造人李洪志先生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的音像片，现已交送中央电视台，拟由第七套“科技之光”栏目播出。

“科技之光”栏目制作人一行于6月22日至25日期间，在李洪志先生家乡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门采访和极尽拼凑反对“法轮功”材料的活动。为他们提供材料的主要是宋炳辰、赵洁民等人……

加之宋某在制作过程中，以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剪接手法，加上攻击性的旁白，其结果完全是颠倒黑白，别有用心。该片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将严重损害中央电视台的形象，甚至会由此而挑起和激化社会矛盾，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亿万修炼者绝不能答应和坐而视之的。

希望各级有关方面的领导，从大局出发，为维护社会稳定，制止这种危害社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发生。

问题的处理结果，我们广大修炼者将拭目以待。

在这篇所谓“情况反映”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并对事实抵赖，还明确对政府进行胁迫和讹诈，称电视台如播出，“将挑起和激化社会矛盾，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绝不能答应和坐而视之的”，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政府他们将采取的政治行动，充分暴露了李洪志借“真善忍”之名，行反政府、反社会之实的本来面目。

见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政治讹诈没有回应，在李洪志的策动下，在7月的某一天，1000名左右的信徒开始聚集在中央电视台所在大街两侧，或站或坐。中央电视台的领导随即对聚集的信徒进行劝谕，但没有取得成效。一位“法轮功”负责人还喊：“我们要见江泽民！”他的声音立刻得到他身后的信徒的呼应：“我们要见江泽民！”“你们谁要见江总书记？”这位领导循声向人群中望去。人群中先是沉寂，过了一会儿，有个信徒说：“我们都要见江泽民。”他说完又有几个信徒附和着说了几

句。随后，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谩骂湖北电视台的记者宋某，要求中央电视台不准播放他采制的纪录片。有几个信徒还乘现场混乱之机，打算强行冲进中央电视台大门，但被中央电视台的保卫人员及时制止住了。

围攻中央电视台事件一直持续到下午。当日天气酷热，在阳光下的—些老年信徒开始出现中暑反应。大家个个耷拉着眼皮，昏昏欲睡。直至傍晚时分，这场闹剧才总算结束，围坐的信徒慢慢散去。

二、取缔“法轮功”

随着“法轮功”的活动愈来愈猖獗，中央对其性质也越来越看得明确。这已经事实上不是一般性质的气功组织活动了，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邪教组织活动。

面对“法轮功”及其信徒的嚣张气焰，中南海不再沉默。经过充分的调查和准备，中央取得了足够的有关李洪志其人其事、“法轮功”歪理邪说的证据，这些证据充分证明了“法轮功”组织的邪教性质。

1999年7月22日下午3点，全国各地同时组织人们观看中央电视台—档特别制作的专题节目，该节目以罕见的长时间详细揭露了“法轮功”及其李洪志的真实面目。自此节目开始，—场声势浩大的剿灭邪教“法轮功”的战斗打响了。

这是—场精心布置的大会战。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的播出是这场战斗的序幕。在同一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经查，‘法轮大法’研究会未经依法登记，并进行非法活动，宣布迷信邪说，蒙骗群众，挑动制造事端，破坏社会稳定。据此，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

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

中共中央向全国通电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李洪志编造的“法轮大法”宣扬歪理邪说，严重侵蚀人们的思想。“法轮功”组织策划、煽动、蒙骗一些“法轮功”练习者到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非法聚集，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破坏改革发展稳定的局面。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明确要求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

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也发出通告，通告中规定，由于民政部已于7月22日认为“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已经予以取缔。据此，今后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所悬挂、张贴宣扬“法轮大法”的条幅、图像、徽记和其他标识；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所散发宣扬“法轮大法”的书刊、音像制品和其他宣传品；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所聚众进行“会功”、“弘法”等宣传“法轮大法”的活动；禁止以静坐、上访等方式举行维护、宣扬“法轮大法”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禁止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式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禁止任何人组织、串联、指挥对抗政府有关决定的活动。

7月24日，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立即查禁“法轮大法”音像制品；同时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立即收缴封存〈中国法轮功〉等五种图书的通知》，通知根据有关规定，认定《中国法轮功》、《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法轮大法义解》、《神通大法——李洪志和中国法轮功》五种书借传授练功之名，宣扬迷信及伪科学，决定立即予以收缴、封存，不得继续销售。此后新闻出版署、全国“扫黄”办部署各地新闻出版管理机构、“扫黄”办对有关“法轮功”的非法出版物进行了严肃收缴，收缴了一大

批有关出版物，并掌握了“法轮功”进行非法出版、偷漏税收的犯罪证据。

几个重要的通知和新闻发布以后，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全国各个部委、各省党政机关、各民主党派、教育界、军队、政协、全国总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宗教界等都对中央作出的决定表示坚决拥护，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在中央电视台打响头炮后，全国新闻媒体也全面起来，掀起声讨和批判“法轮功”的高潮。报纸、电视、杂志、网站，揭露“法轮功”和李洪志的内容一时间铺天盖地。在互联网上，一批网站如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等都开设了揭发“法轮功”的专题。

在香港，凤凰卫视播放了由窦文涛主持的一个特别节目“法轮功大起底”，该节目通过对李洪志同学、同事、亲戚、原“法轮功”练习者等的深入采访，揭开了李洪志和“法轮功”的真实面目，一个骗子的发迹道路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前数年，“法轮功”一直没有间断地对批评他们的传媒进行围攻、静坐等示威活动。中国官方证实“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后，传媒们都长出了一口气，一些以前不敢公开的事实真相不断被公开出来。“法轮功”，一个由气功组织演变而来的邪教组织，其真实面目彻底地暴露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

三、通缉李洪志

在充分掌握了其犯罪证据后，1999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公缉[1999]0120号通缉令，对李洪志进行通缉。通缉令称：经公安机关侦查，李洪志组织、利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宣扬迷信邪说，

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截至7月28日，据全国30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因练“法轮功”致死的743人。同时，该组织未经依法申请和许可，策划、组织集会、示威，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活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0条、第296条、第300条的规定，涉嫌犯扰乱公共秩序罪。人民检察院已经对李洪志批准逮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3条的规定，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公开通缉李洪志。公安部在发布通缉令的同时，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向国际刑警各成员国发出协查通报，在全球范围内缉拿李洪志。

通缉令发布后，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随即向全国各地口岸发出通知，注销李洪志的护照，今后如果李洪志持我国护照均属非法使用。

我国政府通缉李洪志后，他惊慌失措，直到8月2日才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对他进行通缉表示“震惊”、“难以置信”和遗憾；辩解中国政府对他的指控是捏造出来的，毫无根据，他只是“教人做好人”，不存在与共产党的法律道德相违背的问题；并希望中国政府撤销对他的通缉，通过与他“直接对话，和平解决问题”。

李洪志还在多种场合装出无辜受害人的样子，为自己和“法轮功”辩护，开脱罪责，并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他矢口不提自己和“法轮功”组织祸国殃民的罪行，而是狡辩说什么：“法轮功”之所以被取缔，是由于国内“法轮功”练习者众多，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因此招来了当权者的忧心和误解。“法轮功”基本上是一种气功，政府不应予以取缔。他还强调，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为民，“法轮功”令修炼者心康体健，对社会有所裨益。“因为一个真正的法轮功信徒不会

从事非法活动”，多数党员天性善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对于中国政府的激烈反应感到不解。

策划组织完“4·25”事件后，为了给国内“法轮功”骨干打气并鼓动“法轮功”练习者继续与政府对抗，李洪志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大做爱护信徒、慷慨赴义状，表示如果能够换来“法轮功”信徒们免遭政府镇压，他愿一个人回中国受过，诚令“法轮功”练习者们感动了一阵子。但当得知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缉拿他时，便现出了懦夫和骗子的原形，惶惶不可终日。据美国《世界日报》引述李洪志的贴身弟子的话称，李洪志获知被通缉的消息后，便着手寻求美国保护。他的一些弟子也通过各种渠道，为其向美国政府寻求人身保护，并呼吁美国政府保护李洪志一家的人身安全。当美国国务院回复称美国与中国之间尚未有引渡协定，不会引渡其回国时，惊魂未定的李洪志才稍稍定下神来。其贴身弟子称，李洪志“目前暂时还算安全”。这位狂言谁要是动了他，他就能动了整个宇宙的“救世主”，顷刻成了一个向异国政府摇尾乞怜、请求保护的可怜虫。

第十七章 沦为反华走卒

第一节 负隅顽抗

一、继续组织力量与政府对抗

在7月22日中国政府决定取缔“法轮功”后，李洪志在美国十分不死心。他利用互联网，发布一批“经文”和指令，煽动一些“法轮功”顽固分子和痴迷者，起来与政府继续对抗。他还宣扬，政府取缔“法轮功”其实只是对“法轮功”信徒的一个考验，“法轮功”分子起来与政府对抗是一种“护法”行动，是“上层次”和“走向圆满”的最有效途径，还宣扬天安门是“上层次”和“圆满”的最佳场所，欺骗练习者到天安门闹事。

199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打击和防范邪教组织的决定》后，躲在国外的李洪志通过因特网以“大家都是辅导员，负责人，修炼者，关键时要站出来，要以法为师，都应该知道怎么做”等极具挑动性的语言继续煽动“法轮功”分子有组织地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各地党政机关非法聚集闹事。这些人打横幅、喊口号、放气球、散发和邮寄反动传单，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和社会安宁。

2000年2月4日，正当全国各族人民欢庆新春佳节之际，一批“法轮功”顽固分子到天安门广场聚集，企图举行所谓的

“除夕千禧弘法”活动。

4月13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即将表决美国提出的所谓谴责中国的议案之际，100多名“法轮功”顽固分子突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滋事，企图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与美国反华势力遥相呼应。

4月25日、5月11日、5月13日……李洪志及“法轮功”邪教组织骨干借助所谓的非法围聚中南海一周年、李洪志精心篡改的“生日”以及所谓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等“纪念日”，精心策划，大肆煽动，企图掀起轩然大波。

进入5月以来，躲藏在幕后策划、指挥的李洪志突然跳到前台，连续发表言论，煽动执迷不悟的“法轮功”顽固分子铤而走险。在他的授意、教唆下，“法轮功”组织的非法活动变本加厉、迅速增多，北京等地甚至发生了上百名“法轮功”练习者非法聚集事件。

当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华期间，“法轮功”顽固分子密谋举行若干万人的签名活动，妄图与联合国经合组织取得联系，向安南递交“请愿书”。

在200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参与在天安门等地的“护法”、“弘法”活动的“法轮功”分子突然人数激增，他们还向两会代表的信箱中投放诽谤我国政府的“公开信”、“请愿书”，妄图为“法轮功”翻案。

2000年6月16日，李洪志通过网络发布了《走向圆满》的“经文”，声称“破坏大法的只是一小部分恶势力”，“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他还说：“在全面最严厉的检验中走过来的弟子也为大法在世间确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与大法在人间的真实体现，同时圆满了自己最伟大的位置。邪恶即将被除尽；人世间的败类也将得到应有的报应；不能使罪

恶再延续了。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

“法轮功”顽固分子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被北京市查获的参与非法活动的“法轮功”分子每天从几个人增加到百人以上。他们在公共场所公开“练功弘法”，散发反动传单，甚至到公安局的看守所和监狱门前“抗议示威”，聚集滋事。

6月26日，联合国大会社会发展特别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李洪志一伙也“不失时机”地纠集“法轮功”顽固分子挤到会场前，大搞“静坐”、“示威”。迫于人手有限，他们不得不花钱雇当地一些无业人员或老人、儿童代他们“弘扬大法”。

2000年7月5日，李洪志再次发表新“经文”——《排除干扰》，威胁那些已对其歪理邪说产生动摇的“法轮功”练习者已“处在极其危险之中了，如果不醒悟，将成为破坏法的鬼。”“这些理智不清的败类已经被特务所操纵”，“那些被执著心带动附和的人，即便能明白过来，也很难再有修炼的机缘了。”

8月28日，宗教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在联合国总部召开。李洪志认为这是一个争取“法轮功”合法地位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四处游说活动，不惜一切代价参加此次会议，结果被拒之门外，自取其辱。

8、9月份，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和千年议长大会先后在美国纽约举行。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给他们展示能量、骗取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的良机。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调动一切力量，甚至斥巨资从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募集人员。会议期间，他们时而举行“大法会”、集体练功，时而举办新闻发布会、图片展览，时而散发传单“示威”“游行”。为了制造更大的影响，他们还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刊登广告，组织车队尾追我代表团，甚至施放气

球、租用直升机展示他们的标语横幅。

“法轮功”组织还大肆制造散布各种宣传品。2000年10月，湖北省十堰市公安部门破获了以该市“法轮功”辅导站站站长为首、由120多名“法轮功”顽固分子组成的作案团伙。查获非法宣传品3万多份，查封复制非法宣传品的经营性打字复印店铺3家，摧毁地下复印窝点5个，查获了一批制作非法宣传品的作案工具。仅2000年第四季度，全国公安部门就打掉印制和传播“法轮功”非法宣传品的团伙953个，抓获涉案人员1.7万余人，收缴宣传品300多万份。北京、山东、重庆等地都陆续有一批制作和散发“法轮功”非法宣传品的案件被破获。

在李洪志“最后的圆满机会”的鼓动和“法轮功”骨干的精心策划下，2000年国庆期间“法轮功”的违法闹事活动再次剧增。仅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就查获参与“弘法”、“护法”活动的“法轮功”分子1373人；10月17日，在北京共查获聚集滋事的“法轮功”分子2924人，查获制作和散发非法宣传品的案件73起。这些“法轮功”分子组织严密，行动统一，身着黄色“法轮功”服，伺机打出写有“法轮佛法”、“真善忍”等字样的横幅和散发反动宣传品。

接连遭到的失败使躲在国外“山中看世人”的李洪志2000年10月22日在公共场合公开露面，并在“明慧网”上发表了《窒息邪恶》的新“经文”，恶毒攻击我国劳教所的工作人员是“小鬼转世”，攻击被转化的“法轮功”痴迷者是“隐藏的毒瘤”，煽动“法轮功弟子”继续与政府对抗。

11月30日，李洪志又发出《除恶》的新“经文”，对“法轮功”痴迷者进行威胁与诱惑，他说：“当这次考验结束时，所有的坏人都将被神销毁；能在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

都要圆满地离开；留下来的人要在极苦的偿还历史上所欠下的恶业中消去罪恶才能进入历史的下一步。”

“法轮功”分子还采取流氓手段，向我国有关部门投寄恐吓信件。2001年元月，云南省建水县政府、人民法院、看守所等陆续收到来自香港、英国、新西兰“法轮功”邪教组织指名道姓的恐吓信件，信中声称：“已记下了你们在镇压法轮功事件中的恶人恶事，记下了你们的姓名、职位、单位、家庭资料，记下了你们的罪恶行为，直接或间接法律责任。”“他日法正，恶报无情。一人做恶，亲戚家属将会受害。”俨然是一副黑社会分子的丑恶嘴脸。

二、奥运会大演闹剧

2000年在悉尼举办的奥运会是一个全球关注的体育盛会。李洪志认为这是一个吸引人们关注“法轮功”的好机会。为此，早在奥运会开幕前1个月，李洪志一伙就从组织上、物质上做了精心的准备。他们提前在网上散布消息，筹备在悉尼举行大型“心得交流活动”，号召全澳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法轮功”分子届时聚集悉尼，并特制了5米多高的巨型气球、字体达一人高的巨大横幅以及1米多高的李洪志经文模型等道具，密谋在奥运会期间上演反华闹剧。

9月15日，奥运会开幕当天，“法轮功”分子趁机打着庆奥运的名义，企图挤入活动现场，招摇过市，制造声势。当地警方及时加以阻止，并将他们的活动限制在远离现场几百米、中间为大片建筑物所隔的公园内。枉费心机的100余名“法轮功”分子只能与气球、模型为伴，落了个形影相吊的下场。

9月29日，澳大利亚侨界为我国体育代表团举办盛大庆功会。几十名“法轮功”人员未经当地市政当局许可，强行纠

集在会场外，企图滋事。他们的叫嚣立即被欢迎代表团的欢庆场面和气势所压倒，又不断遭到市政官员和警方的警告，以至于他们连带到现场的横幅标语还没来得及展开，就灰溜溜地狼狈离去。

第二节 建立第二梯队

在“4·25”非法聚集中南海事件发生后，“法轮大法研究会”及有关省、市的“法轮功”组织当时核心骨干预感到他们这种反社会、反政府的非法活动必将受到惩处，就开始有预谋、有计划地安排后备力量，部署建立第二、第三梯队，企图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与我们党和政府长期对抗。

1999年4月27日，“法轮大法研究会”主要负责人李昌等人召集北京各区县“法轮功”分站、辅导站负责人开会，会上李昌通报了“法轮功”北京总站负责人等人行动被“限制”和“监视”的情况后，要求各分站、辅导站负责人都要有所准备，把接替他们工作的人安排好。

5月25日，李洪志以“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名义下达了建立第二梯队的指令，主要内容包括：都是辅导员、负责人、修炼者，一旦出现突发事件，不用人叫，关键时要站出来，以法为师，都应该知道怎么去做。根据李洪志指令，在“法轮大法研究会”授意下，一些地方纷纷开始安排、落实组织第二梯队。

5月下旬，“法轮功”大连总站负责人指示手下的“法轮功”骨干，根据没有暴露、有一定组织能力、有一定文化层次、学法悟性高等4个方面的条件，推选出“法轮功”大连总站的第二梯队人选两人。6月中旬，“法轮功”大连总站要求

各分站及下属站点也要根据上述4个条件推选出各自的第二梯队人选，名单统一上报总站掌管。随后，星海分站等两个站点推选出了第二梯队人选。

5月下旬，“法轮功”江苏徐州辅导站负责人召集聚会，商定了3名第二梯队负责人名单，并征得了本人同意。7月3日，在片长例会上，将选定临时负责人的情况通报了各片片长，并要求各片片长自己也要物色一名接替者。7月中旬，这位负责人又将各片第二梯队临时片长的20人名单交给了第二梯队负责人。同时，任命了“徐州—济南”联络员，授权其可以直接向第二梯队骨干下达命令，并规定了和济南联络的暗语。

6月，“法轮功”南京总站负责人召集当地“法轮功”骨干开会，要求各片、辅导站要找比较积极的年轻人上来，万一他们暴露，站、片、点都要有二线人物顶上去，要有人接替工作。会后，南京市区的5个片先后开会，落实第二梯队的组建。不久，这位“法轮功”骨干分子再次开会策划，称现在形势比较严峻，要求再秘密物色几个人作“第三梯队”。为此，他们选定了两名候选人，并先后对其进行了暗示。

6月上旬，“法轮功”四川乐山辅导站负责人召开会议，要求各区县辅导站推选后备站长、副站长，条件是：笃信“法轮功”，没有暴露身份，家中装有电话便于联系。随后，他们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对各区县辅导站上报的79人名单进行审查，并制成表格下发到各区县辅导站。要求各区县辅导站一旦原负责人失去领导能力和条件，这些人将接任其职务，组成第二套班子继续组织指挥“法轮功”的活动。

此外，山东、福建等一些地方的“法轮功”组织也先后部署、安排了第二、三梯队后备力量。为了精心物色、挑选第

二、第三梯队人选，许多地方的“法轮功”组织活动频繁而行动诡秘。有些所谓的第二、第三梯队也果然“不负重托”，从幕后跳到前台，组织指挥了一起又一起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破坏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非法活动。

7月20日至22日，在“法轮功”大连总站站长及第二梯队骨干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大连“法轮功”练习者5000余人在市政府门前非法聚集，向政府施压。7月21日，“法轮功”江苏徐州辅导站负责人暴露后，第二梯队负责人即主持徐州“法轮功”组织的工作，多次传达指令，要求“法轮功”练习者到市政府上访，到济南、北京声援。

7月22日，当公安部门依法取缔“法轮功”组织之前的几天时间，各地“法轮功”骨干根据李洪志关于“人人都是辅导员”的指示，纷纷跳出来，先后组织、策划了78起300人以上的非法聚众示威活动。

第三节 天安门自焚事件

2001年2月24日，新世纪第一个除夕，在李洪志“放下生死”、“升天”、“圆满”妖言蛊惑下，几名“法轮功”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自焚事件。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这起自焚事件完全是李洪志对“法轮功”痴迷者进行蛊惑、唆使和直接精神控制的结果，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罪恶活动。2月2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这起自焚事件的直接组织者刘云芳、薛红军等人依法批准逮捕。

一、精神控制，诱人疯狂

近两三年间，在河南开封市一些“法轮功”痴迷者中，流

传着一个大法大弟子的离奇故事：他宣称开了天目，能看到另外空间生命和物质的存在方式；自称是李洪志十大弟子之一。

他还四处散布：1997年9月的一天子夜，他正在练功时，“师父”用立体声将四句诗打入脑中，并让他立即到湖边拜谒。顿时，一股神奇的力量使他穿墙破壁，踏水而行。见到“师父”后，连磕3个响头，“师父”摸着他的头说：“缘份……”

这个荒诞故事的主角，就是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直接组织者、“法轮功”顽固分子刘云芳。

疯狂痴迷“法轮功”的刘云芳，将心思全部投入对“师父”李洪志的顶礼膜拜，沉溺于其歪理邪说之中，2000年5月，刘云芳对“法轮功”痴迷者王进东、郝惠君、薛红军等人兴奋地说，“我悟到‘圆满’了。‘圆满’就是什么都要放弃，人‘圆满’后能白日飞升，直奔‘天堂’。”

不久，刘云芳突然神秘宣称，“练功时进入了状态，悟出‘元神’带着点火工具和汽油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焚。着火后，我的‘佛体’就出现了，口里喷着火，一瞬间光芒万丈。”

刘云芳将这段胡言乱语告诉了能说会道的“功友”薛红军，并叮嘱说，“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只要心境够了，自然就会悟到这些。”薛红军被“法到人间”的幻境深深吸引，马上添油加醋地在“法轮功”练习者中传播。

受李洪志不断“上层次”的诱导，王进东也亦步亦趋。去年12月下旬，他公开宣称自己“悟”到了必须以最高形式——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才能“圆满”。并明确提出，“自焚‘圆满’的最佳时刻应选农历除夕。”

在人类欢庆新世纪之际，李洪志却抛出《忍无可忍》的“经文”，煽动痴迷者为“大法”而舍尽一切。这一“经文”，令刘云芳、王进东等人更加狂热。2001年1月10日，刘云芳、

王进东、薛红军、郝惠君等人再次聚集，争相表白自己又上了一个“层次”。他们共同表示，1月23日农历除夕这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焚“圆满”。薛红军还提出，“要多组织一些人去天安门广场自焚，人越多‘法轮功’‘气场’就越强。”这个建议当即得到了这些痴迷者的赞同。

按照分工，刘云芳、王进东分头通知了“法轮功”痴迷者刘葆荣和刘春玲母女；郝惠君打电话给正在北京上学、同样痴迷“法轮功”的女儿陈果，动员她一起“圆满”。

二、密谋筹划，命丧“天国”

按照李洪志“经文”的暗示，在确定了“圆满”的方式和日期后，刘云芳、王进东等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准备。王进东主张“自焚最好用汽油”，在字画店打工的他还又献上一计，“用装画轴的长塑料袋装汽油，绑在身上不容易被发现。用刀片一划，就能洒遍全身。”众人商定，为了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提前一周进京。

2001年1月14日，刘春玲随即购买了6张16日19时从郑州开往北京的1488次火车票。拿到车票后，郝惠君又与陈果联系，约定1月17日8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会合。

1月16日，刘云芳、王进东、郝惠君、刘葆荣，以及12岁的刘思影和她的母亲刘春玲等6人登上了1488次列车。火车启动时，前来送行的薛红军与他们相约：“天堂见。”

18日上午10时，王进东和刘云芳乘坐出租车，到宣武区新华街“天畅轩”工艺美术商店，购买了40米包装画轴用的长塑料袋。而后，两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观察情况。

19日，王进东、刘云芳等7人在藏匿的住处，将长塑料

袋剪成一米多长的小段，扎住口后注水做试验。第二天上午，王进东与刘云芳又到“天畅轩”买了40米塑料袋。期间，他们还发给每人两个用来割塑料袋的刀片和打火机。

即使是在手忙脚乱的准备期间，这伙痴迷者仍念念不忘醉心交流进“天堂”后的“美好滋味”。刘云芳对刘思影说，“天堂里全是金子”；“‘天国世界’可好啦，你这么执著，修炼好了到‘天国世界’肯定能当‘法王’”。并劝她说，“你现在的妈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在天上。”

22日上午8时许，刘云芳、王进东买了满满40升汽油，将汽油分装在每个长1米左右的10多个塑料袋中，并约定“23日一早取汽油袋，上午10时30分准时到天安门广场自焚。”

郝惠君、刘春玲母女4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后，先在历史博物馆附近的一处厕所里，将携带的汽油全部浇洒在身上，而后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10多分钟后，刘云芳、王进东等人乘坐的出租车也来到天安门广场西侧。不久，烈焰腾升，黑烟翻滚，一起愚昧、疯狂的惨剧发生了……

三、惨痛结局，罪孽深重

一直以“法轮大法大弟子”自居、直接组织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刘云芳，在除夕的天安门广场上却没能像郝惠君、陈果等“法轮功”痴迷者那样“执著”，按事先约定自焚“圆满”，甚至连一滴汽油也没有洒在身上。

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记者向刘云芳提出这个问题时，刘讪笑着为自己的言行不一做着辩解：“我不自焚，那是因为‘师父’想要留下我，留下我这张嘴来说话。”

“你为什么事先告诉郝惠君他们?”

“他们都比我的‘心性’高，他们自焚是真正‘圆满’了。我的层次还不够，所以打消了自焚的念头。”

就是这个为邪教“法轮功”忙前跑后、对李洪志奉若神明的刘云芳，一再鼓动别的痴迷者为“求圆满”、“上层次”铤而走险，到头来，自己却以“‘师父’有话”、“自己层次不够”为借口，轻飘飘地一推了之。刘云芳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暴露了李洪志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以“法轮功”练习者的生命作筹码，煽动、蛊惑他们“放下生死”、铤而走险的丑恶嘴脸。

同样是自焚事件直接组织者，又同样口是心非、将别人推向深渊的薛红军，面对着看守所的高墙，终于发出了内心的表白：“‘圆满’是一个肥皂泡，对没明白的人来说，是一场美梦；对明白的人来说，是一场噩梦。”得知李洪志一伙不承认自焚者是“法轮功”练习者时，薛红军激动得双手颤抖，“他们是睁眼说瞎话，李洪志想推脱责任天理难容啊！”

当人们与刘思影谈起在自焚前浇洒汽油的情景时，浑身缠满纱布的刘思影仍条件反射般地干呕起来。“好几瓶汽油呀，他们每个人都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了。当时感觉气味特别难闻，好象昏了过去。陈果姐姐见我这样，只能搀着我走路。”痛苦的回忆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着刘思影的心。“1月15日那天，妈妈说，她脑子里突然有了自焚‘圆满’的念头。妈妈还问我敢不敢。我对妈妈说，你要是走了，我跟谁过呀。我只有跟着你，我是你的一个小尾巴。”问起刘思影对将来的打算时，刘不禁哽咽出声：“我想回家，我要找妈妈！我还想老师、同学，我要上学。我得赶紧补课，不然，同学们都上六年级了，我就落下来了。”

“我真后悔！”病床上的陈果一提到“法轮功”就伤心地抽泣起来，“我想家里的亲人，盼着病能赶快好。”“当时觉得自焚并不可怕。因为这样就能‘圆满’了，就能去天国世界了。《转法轮》上说的，天国世界特美好。”陈果慢慢回想着那痛苦的一幕。

“今后你还练‘法轮功’吗？”记者问。

“不练了。我后悔了，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后果。”

“病好了以后，你最想干什么？”

“继续上学。毕业后回河南老家，像妈妈那样当一名音乐老师。”

重度烧伤的天真无邪的刘思影也许没有意识到，她亲手点燃的邪火摧残了原本花一样的人生。经过医院大力抢救，这位花季少女最后仍然未能逃脱死神的魔爪，因医治无效，而怀着对“法轮功”迷梦的破灭死去。血的事实也给那些痴迷“法轮功”的人员敲响了警钟：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了亲人的幸福，不要再充当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的殉葬品了。执迷不悟、追随邪教，到头来只能是祸国殃民毁自己。

第四节 充当反华走卒

一、投靠美国

就在“法轮功”在国内遭到唾弃的时候，美国一些反华势力却看到了“法轮功”的能量，他们发现“法轮功”组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反华工具。于是，就拼命在背后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进行不遗余力的纵容和支持，并对中国处理“法轮功”问题横加干涉，指手划脚。

美国对中国处理“法轮功”问题的干涉是一步一步深入的。就在我国一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组织后，美国少数主流媒体就对我国解决和处理“法轮功”问题恶意攻击，指责我国政府“镇压”和“迫害”“法轮功”；美国少数反华议员还联名上书克林顿，提出就“法轮功”问题向我国施压；美国国务院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法轮功”问题上对我横加指责。

1999年11月8日，美移民局法院无视“法轮功”组织是危害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邪教组织的基本事实，竟然给予一名“法轮功”练习者所谓政治避难。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

但是，美国不但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反而变本加厉。在1999年11月18日晚，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反华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美政府就“法轮功”问题向中国施压。表决结果名义上是“一致通过”，然而由于当时国会休会在即，大部分议员已经离去，所谓的“一致”不过只有在场的七八人而已。11月19日下午，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有关决议案。两项决议案均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逮捕、关押和迫害，释放因信仰不同而被关押的所有人员，尊重公民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行为自然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谴责。

此后，1999年1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签署五十一周年纪念日演讲时，首次批评中国镇压“法轮功”活动，指禁止“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做法令人困惑不解，并谓中国拘押“法轮功”学员的行动，是令人不安的例子。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于1999年12月11日也站出来，抨击中国“镇压中国民主党和法轮功”。她指出，美国支持人

权在世界各地扩散，并且赞扬新民主社会出现，但是“还有太多地方无从捉摸人权和民主”。这等于是公开标榜了美国支持“法轮功”的真实意图，是以“维护人权”为借口，对别国的内政说三道四、横加干涉。

美国的这些行为等于公开地为李洪志和“法轮功”张目，对这一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对的邪教组织予以支持。

二、交手日内瓦人权会

2000年4月13日，100多名“法轮功”顽固分子突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非法聚集滋事。由于在场群众和执勤民警及时制止，“法轮功”邪教组织制造混乱的阴谋未能得逞。事情刚刚发生不久，在香港的所谓“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即迅速向外国驻京新闻机构发出传真，添油加醋地说“北京200名‘法轮功’学员天安门示威被拘”，并将此事件同所谓“人权”问题扯在一起。境外一些传媒很快都接到了关于此次事件的消息并迅速作了报道。

此次事件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境外一些媒体对事件报道的迅速和某些人的借题发挥。是什么原因使李洪志一伙费尽心机竭力渲染这次并不漂亮的行动呢？“法轮功”海外网站发布的消息一语道破了天机。那就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表决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的议案”，所以它们要紧密配合美国人的行动。

当时在瑞士的日内瓦，正在召开联合国第56届人权大会，美国的一些反华分子正在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在他们第九次炮制的反华提案里，“法轮功”的名字赫然在目，成为他们攻击中国的一个重要炮弹。以往他们每年提出的反华提案，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而今年他们可以利用

“法轮功”邪教组织做一点新文章。

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确实也没“辜负”美国的期望，利用各种机会为美国的反华行为摇旗助威。2000年3月2日，一名美籍华裔“法轮功”人员被安排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和西藏的人权问题”的听证会上，昧着良心向与会者散布谣言，称其于一个月前因在北京“护法”被关押8天，受尽“虐待”。这些谣言博得了这个委员会某些人的赞赏。

3月16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洛杉矶举行“中国宗教自由问题”听证会，为美国反华提案造舆论。李洪志派其得力助手张尔平伙同魏京生等“民运”分子和“藏独”分子以及吴弘达等出席。魏京生在发言中呼吁有关国家拒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的共同立场。

3月20日，联合国第五十六届人权大会召开。李洪志一伙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新闻声明”，声称：“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政府正准备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一项批评中国1999年人权记录的议案”，并公然宣称：“……违反人权行为不能被当作内政。”……李洪志一伙还伙同魏京生等，为美国反华提案到处游说，在会内会外大肆活动，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反华提案鼓噪造势。

可惜的是，美国借“法轮功”进行来指责中国人权问题的梦想再一次落空了，在联合国第56届人权大会上，美国的反华提案还没有提交大会就被否决了。这已经是联合国人权会第9次否决美国的反华提案。到2001年联合国人权会，美国再一次故伎重演，“法轮功”也再一次充当其配角。但这一次美国和李洪志输得更惨，他们的提案不但第10次被否决，而且在新一轮人权会代表投票选举中，美国还被落选！美国打着人权

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已经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这对美国、对“法轮功”都无异于当头一棒。

三、五毒合流

“法轮功”邪教组织还积极与境内外台独、藏独、民族分裂分子以及“民运”组织等势力勾结、串通，其活动已逐渐从秘密转向公开，“数毒合流”形成所谓“反中共联合阵线”，妄图伺机颠覆我国政权。

对于“法轮功”组织，台湾当局允许其在台湾正式注册。在祖国大陆正在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之时，台湾势力却站出来积极为“法轮功”呐喊助威：2000年7月，台湾驻美联络机构的头目召集全美主要亲台社团的侨领开会，研究如何支持“法轮功”的活动，让“法轮功”组织壮大，使中国政府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并要求亲台社团全面配合“法轮功”组织的活动，给予道义、场地等方面的支持。7月28日晚，纽约“法轮功”组织在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法轮功’真相介绍会”，由台湾民进党美东党部负责人洪哲胜主持，出席会议的“法轮功”分子绝大多数来自台湾。台独分子甚至在示威中高喊“支持‘法轮功’”的口号。

此后，“台独”先锋吕秀莲也公开跳出来，支持“法轮功”，1999年12月23日，台湾“法轮功”组织在台北举行“法轮大法烛光晚会”，吕秀莲出席晚会并发表“讲话”，公开表示支持“法轮功弟子”争取应有的“练功人权”，“祝福”他们“修炼成功”。年底，“法轮功”邪教组织又动员了10多个国家的“信众”，在台北连续举办4天所谓的“法轮大法2000年亚太地区心得交流会”，以集体练功、烛光纪念会、人权座谈、游行静坐等形式来扩大“法轮功”组织在当地的影响。甚

至还有人想邀请李洪志访台，扬言以高规格接待，以“衍生连锁效应”……

在反对祖国的共同目的下，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还积极与海外“民运”组织及民族分裂势力勾结起来。“民运”声称要研究和借鉴“法轮功”蒙骗和煽动大批群众的“经验”，在国内打好群众基础，壮大实力，伺机与政府较量。2000年3月16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洛杉矶举行“中国宗教自由问题”听证会期间，李洪志派其助手张尔平，伙同魏京生等“民运”分子和“藏独”分子以及吴弘达等到场，为美国的反华提案提供“炮弹”。联合国人权大会期间，李洪志一伙又伙同魏京生等纠集台独、藏独、“民运”分子等，在会内会外大肆活动，造谣惑众。他们还主动贴近达赖集团，而达赖集团也对“法轮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境外的“法轮功”还组织多次利用我国领导人出访之机，与台独、藏独、新疆民族分裂分子以及“民运”组织一起“示威”、“游行”、“抗议”，企图影响国家及领导人的形象。

第五节 揭批与挽救

面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疯狂挣扎，中国政府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揭批，坚决打击“法轮功”骨干分子，并将普通的“法轮功”练习者和痴迷者与为首作恶的骨干分子区分开来，本着团结大多数的精神，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挽救，以让他们脱离邪教的魔窟，回到正常的生活道路上来。

1999年7月22日我国政府宣布“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1999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外宾时，向国外客人介绍了我国打击“法轮功”的情况，在介绍时，江泽民提出，

从“法轮功”组织的各种情况看，“法轮功”就是邪教。此后，我国政府正式将“法轮功”非法组织定性为邪教组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法轮功就是邪教》。社论从“法轮功”散布歪理邪说、鼓吹教主崇拜、宣扬末世论、诈骗钱财、组织和发发展邪教组织、煽动反社会反政府等方面提出，“法轮功”的本质就是邪教。

此后，对“法轮功”与邪教的揭批再次出现新的高潮，新闻媒体通过对“法轮功”内幕进行深入报道，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进行充分揭露。媒体同时还大量介绍国外邪教组织的发展情况，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并将“法轮功”与这些邪教进行了比较。这使大家清楚地发现，“法轮功”与国外其他邪教如出一辙。至此，“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已经被全国全世界人民得以认识。

我国政府还加大依法打击“法轮功”邪教首恶分子的力度。199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彻底揭露“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本质，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惩治邪教活动提供了锐利的法律武器，也标志着我国依法解决包括邪教在内的比较复杂的违法犯罪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99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经公开审理，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三罪并罚，分别判处组织4.25南海事件等活动的“法轮大法研究会”骨干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姚洁四人有期徒刑十八年、十六年、十二年 and 七年。这一宣判，有力地震慑了“法轮功”分子的嚣张气焰。

截至2000年6月底，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法轮功”案件162件，刑事处罚123人。到2001年6月，全国共刑事处罚“法轮功”顽固分子共约150多人，至此，曾经猖獗一时的“法轮功”邪教组织土崩瓦解。

在依法处理“法轮功”邪教工作中，党和政府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着眼于团结大多数，教育大多数，转化大多数，解脱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方针。随着揭批“法轮功”斗争的深入，一场全国性大规模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也随之展开。一些深受其害的“法轮功”练习者的悲惨事实，使广大群众认清了李洪志残害人民的险恶用心。各地各级党政领导和政工人员登门去做“法轮功”练习者的思想工作，用事实说服他们认清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骗人把戏，促其与之划清界限，和“法轮功”邪教组织决裂。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通过宣传教育，发现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真面目后，自觉与邪教组织脱离了关系。

还有一少部分“法轮功”痴迷者，由于长期陷入“法轮功”泥潭，中毒较深，一时还无法从“法轮功”的毒害中脱离出来。对这些上当受骗的痴迷者，我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办班教育，象戒毒一样，使他们从“法轮功”精神毒品中脱离出来。经过耐心细致、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现在超过绝大多数痴迷者已经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脱离“法轮功”组织，回到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道路上来。

第六节 战斗仍在继续

现在，对李洪志和“法轮功”的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面目已经让全世界人民看清。在

国内，已经没有人再相信李洪志的鬼话。经过艰苦细致的挽救教育，绝大多数“法轮功”痴迷者已经回到人间，获得新生。在海外，李洪志已如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已经没有市场。

但是，李洪志仍然没有死心，仍然在寻找一切机会，妄图作最后的挣扎。他们还在利用互联网，发布各种“经文”，制造各种谣言。但是，连他们自己也明白，他们的日子已经不长了。这一切言行，只不过是一个邪教教主在垂死前负隅顽抗的哀鸣，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一日不死，就一日不会善罢甘休，还会继续挣扎到最后灭亡的时刻。对此，我们仍然不能放松斗争，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提高警惕，把揭批“法轮功”的斗争进行到底。

结语：不是尾声

从1979年发现唐雨“耳朵识字”起，一场从特异功能——神怪气功——邪教的“新时代”运动在中国大地上风行了23年。在这23年，我国见到了太多的“神功大师”大红大紫，太多的愚昧信徒上当受骗甚至牺牲生命。

在这场新造神运动中，一方面是一些科学家、电视台长、报社社长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一些斗士面对伪科学，不惧不畏，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无论是谁，无论是哪一方，大家都恐怕不会想到事情会如此戏剧性地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可是，这一切的发展演变又是多么地自然而然，多么地顺理成章！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本书对23年来从特异功能到邪教的发展历程的叙述，正是试图通过事实来揭示这个问题的答案。

答案现在看来似乎已较为清楚了。然而，展望未来，又觉得并不尽然。我们还会在未来重演这一历史上演过多少次的一幕吗？

现在，李洪志仍逍遥法外，也还有极少数痴迷者仍沉浸在邪教的泥潭中难以自拔。我们并不敢说一切都已成过去。

面对未来，我们也不敢完全肯定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不会再出现“张洪志”、“王洪志”，在我们的土壤中，生长出他们的环境并没有完全消除。于光远有一本书，书名叫

《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按照于光远的说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轮功”已经完结，但是，对其他的造神运动，对各种改头换面的迷信输灌和思想钳制，我们仍需要提高警惕。

过去的，绝不是尾声。

附录：气功、特异功能争论大事记 (1978—1999)

1978年

《自然杂志》创刊号的“研究通讯”栏目上发表了顾涵森的文章：《探测气功“运气疗法”物质基础的初步实验结果》。该文首次提出了气功“外气”是“受低频涨落调制的红外辐射”。这是最早对“外气”的研究。但是，由于实验仪器的局限以及实验的不可重复，该实验以及实验者本人后来的一些相关实验并没有受到重视。

1979年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向科学进军”、“攀登科学新高峰”成为时髦的口号。但是在老百姓心中，“科学”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人们往往把神奇的东西和科学联系在一起。于是，“耳朵认字”被当作科学上的新发现。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该省“大足县最近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的儿童。经反复考察，确有其事。”“人类生理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这则消息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3月13日至20日，四川医学院派调查组到大足县进行调查，结果认为“唐雨的耳朵并不能认字”，而只是作假。“唐雨

作假的手法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是魔术师的那一套。”^①这一调查结果并不为许多人所知，所以导致了后来“耳朵认字”的泛滥。

北京一8岁女孩姜燕在得知唐雨的报道后宣称，“耳朵认字”并不难，她自己也会。4月15日，《北京科技报》报道了这一消息。4月底，姜燕的功能被报道后，又发现11岁的王斌和13岁的王强姐妹俩也有“耳朵认字”的功能。

4月19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姜燕的“功能”进行了测试，发现凡是她认出来的都是通过作弊手段偷看的，并拍下了她偷看的照片；凡是用胶水粘上的都认不出来；闭上眼睛后也不能辨认。

5月，《科学画报》刊载读者4月10日来信《用耳朵能看见东西吗？》，指出这条新闻在科学上是不可信的，国内外这类现象都是骗局，用的手法是偷看，因此必须用科学知识来加以认识和识别。

5月5日和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批评文章：《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祖甲）；和《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报道》（叶圣陶）。文章认为，所谓“耳朵认字”荒诞无稽，违背了科学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在搞四化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之后，一些报刊转载了这两篇批评文章。《四川日报》的有关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耳朵认字”作假被揭露之后，唐雨和姜燕的“功能”都“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7月，上海《自然杂志》编辑部的一些人在北京考察了王强和王斌两姐妹“耳朵认字”的功能，并把“耳朵认字”改为

^① 于光远：《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1986年。

“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在“眼见为实”的信念下，他们写了《“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观察报告》一文，认为“‘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这种异常功能确有其事，值得探索”。^①从此，《自然杂志》就成为宣传“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的最重要的阵地。并重新掀起了对已经受到批评的“耳朵认字”的宣传。《自然杂志》于1978年5月创刊，在当时是一份档次很高的杂志。而到1997年，这份杂志只排到第86名。

8月，北京大学的生理学教授、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到姜燕家中考察她的“耳朵认字”功能。

9月—10月，陈守良写成《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技能的调查报告》的论文在《自然杂志》2卷11、12期上发表。之后，他成了“耳朵认字”最积极的宣传者。17年后的1996年，他还在《中国人体科学》上发表长文《耳朵认字是真的吗？》，重温那一段历史并为自己辩护。但在1997年的一次小型报告会上，他说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而他的辩护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和让人信服。

11月8日，胡耀邦就“特异功能”问题给中宣部领导作了批示：“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请你们务必把关。”但是，中宣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贯彻胡耀邦的批示精神，所以，后来特异功能的闹剧就愈演愈烈。

1980年

相对于1979年，1980年是比较平淡的一年，“研究”只是

^① 本刊记者：《“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观察报告》，《自然杂志》2卷（1979）9期。

在量上又多了一些特异功能人，同时在器官上，从耳朵认字发展到全身都能认字。“特异功能”开始引起哲学界的思考和争论。

年初，发现辽宁本溪人张宝胜能用鼻认字，6月，该市科协组织对张的测试，肯定了他的功能。后又发现他能作人体透视。在以后的特异功能争论史上，张宝胜是个关键人物。他一直被当作“国宝”保护起来，很少露面，不像其他“大师”那样频频表演，只是偶尔作些“汇报表演”。但是在1988年的那次关键的汇报表演上，他又“辜负”了一些人的良好愿望。

1月，《文汇报》发表安徽袁一志的文章：《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之后，他并向报社表示要登广告：凡经他测试证实耳朵认字者，他个人馈赠二百元。

2月，《自然杂志》编辑部主持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参加的特异功能人包括唐雨、姜燕、王氏姐妹等。会议安排了特异功能表演，“他们除耳朵以外，在身体的其它部位，如头顶、腋下、手指、手腕、臀部、膝弯、脚底等，也具有这种功能——……目击者都叹为观止。”^①但是，2月4日那次正式表演却没有成功。对此，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洪东流写了一篇《“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观察记》，结论是：“王斌的‘耳朵认字’证明了，去掉腊封胶盒和知底熟人在场两个致命障碍，‘特异功能’就会大显奇效。”^②

6月，著名科学家×××访问《自然杂志》。他从开发人的潜能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

① 《自然杂志》3卷3期。

② 丁光远：《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人体科学”这个概念。

10月6日到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辩证唯物主义学术讨论会。于光远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认为一些哲学工作者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表现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

10月20日到11月4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草稿修改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安排了特异功能表演，使一些哲学工作者相信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因为那是“眼见为实”。于是在这本权威的教科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气功”产生了身体的特殊功能，人体“特异功能”的发现，越来越引起科学界和哲学界的注目。

1981年

在忍了两年多之后，反对派终于站出来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著名学者、理论家于光远在1981年7月后连续发表讲话和文章批判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于是1981年就成了对立双方公开交锋的一年。

5月，在重庆召开了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同志出席了会议。在他的主持下，酝酿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于光远认为这件事影响不小，便给科协负责同志写了信，要求科协“严肃地研究一下‘耳朵认字’的问题”。在其后的六年中，中国科协一直不承认这个学会是由他们组织成立的。

7月，于光远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发表演讲。他认为所谓“耳朵认字”完全是不可能

的，这样的研究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并从哲学上批判了一些人“眼见为实”的经验主义错误。这次演讲的动因是，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出版前加了一段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文字。而所谓“特异功能”就是西方灵学的变种，它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批判过华莱士等大科学家做了灵学的俘虏。

10月，国家科委组织了一个“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这个小组不定期地出版《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

10月，美国一个有著名的“特异功能”研究者克里普纳带领的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具有“耳朵认字”功能的儿童。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在一位华侨妇女的协调下，考察团在北京、上海、西安观看了十几名儿童的“特异功能”表演。他们发现，尽管一些儿童在不正式的条件下表演很成功，但对他们从美国和加拿大带去的密封洋品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异功能”来。^①那些成功的表演全都是用小戏法的途径完成的，可是在场的研究者大多浑然不知。对这样一件大事，国内的“特异功能”研究者却一直闭口不谈，直到1998年才有航天医学研究所的何宏博士指出，国内的“特异功能”研究“相当成问题”。^②

11月，《知识就是力量》第11期开始连载于光远同志的长文：《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这篇重要论文主要内容有：（1）回顾了历史上所谓的特异功能，指出这种现象在

^① Knppner, S. *Afterword*, The four major mysteries of mainland China, Prentice-Hall, Inc. 1984.

^② 何宏：《提倡严格、客观的科学态度》，《气功与科学》1998年第2期。

古今中外都有过，它们根本不是事实，而是利用魔术手法的弄虚作假。(2)指出特异功能完全不符合科学，也经不起科学的严格检验。(3)指出这种宣传的认识论基础是主观经验主义，作为其表现形式的“眼见为实”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4)由于“耳朵认字”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因此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

于光远在文章中提出了进行科学检验应该遵守的一些规则：第一，试样要密封；第二，测试中不允许用手接触试样；第三，测试前应接受检查以防止夹带；第四，与特异儿童有关的家长、教师等人员在测试中应回避。这样一些规则是严格的科学测试所应遵守的，而且这些规则并不妨碍特异儿童的“功能”。^①

11月4日，于光远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上讲话：《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12月，他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重读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灵学是一门伪科学；灵学是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严肃批判过的，它同自然辩证法是不能并存的。”^②

1982年

1981年的那场争论持续到1982年，直到6月份中宣部发出指导性通知：不宣传、不介绍、不争论、不批判，对弄虚作假

^① 于光远：《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1986年；《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82年第7期。

^② 于光远：《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

假者要给予批评或处分。之后，反对者就基本上没有再进行批判。但是支持者以“研究”的名义进行宣传的活动却没有停止。

年初，《百科知识》和《中国社会科学》分别发表了于光远的《唯灵论·心灵研究·超心理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psi和他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这两篇文章论述了我国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就是psi的变种。Psi（超心理现象）根本不是事实，Parapsychology是一门伪科学。

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科学报告会。会上于光远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他用有说服力的材料和论证再次批评了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说，他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但是他不相信所谓人体特异功能。2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次报告会的新闻并加了编者按，说“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但是对“特异功能”是科学还是伪科学问题的争论不是由《人民日报》来裁定，可以按严格科学程序和方法组织对特异功能进行测试。

3月3日，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张××找到曾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一起工作过的伍××等人观看张宝胜的特异功能表演，并希望伍××能向胡耀邦反映。虽然“那天的表演实际上很不理想”，但还是给伍××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①

4月10日，胡耀邦给胡乔木、王任重、方毅、邓力群作批示：反对宣传特异功能，再次强调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

^① ×××：《在1996年人体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体科学》，6卷4期，第151页。

4月20日，中宣部发出通知，说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对耳朵认字之类不要介绍和宣传”。通知发出后，×××同志致信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同志。5月13日，胡耀邦同志对特异功能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以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判，这两条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可以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6月15日，中宣部再次发出通知，重申在科学上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组织批判和争论；今后不要再搞许多人去做人体特异功能表演；同时指出，对个别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的人，可以给予批评或处分。^①

4—7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组织了几个省市联合测试。在测试过程中，研究者们提出了实验设计的“五项原则”：（1）试样具有惟一性；（2）辨认“目标”采用“不透光、不可逆”的封装；（3）主试人和被试人均不知“目标”的内容，以做到“双盲”；（4）现场监测可靠，不允许将试样带离现场；（5）实验结果具有“统计学显著性”。^②

8月，受国际超心理学会的邀请，航天医学研究所的陈信等人参加了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二十五届国际超心理学年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中国有关的研究。研究报告指出，“人体特殊感应机能辨认目标时，具有展开、放大、分层辨认、对比选

^① 参见《人体特异功能通讯》，总第24、25、26期。

^② 人体特异功能联合测试组，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真实性的联合测试报告，《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第1卷（1983）第1期。

择、分步显示、自动调整方位等特点。”^①

10月，在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讲话。他批评《科学美国人》的编辑马丁·加德勒和霍夫斯泰德，这两个人一直是激烈地反对特异功能，说人体特异功能“都是假的”。他说：“真正吸引着我们将沿着这条曲折而又艰险的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二十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我们当中谁来作这场未来科学革命的启蒙者呢？谁呢？”^②这段话表明，他支持特异功能的研究是因为他预测那将导致科学革命。作为一个敏感的科学家有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直到今天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不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特异功能可能导致科学革命，反而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特异功能不可能是科学发展的方向。

10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通灵人”尤里·盖勒的真相》。该书披露了震惊欧美的以“特异功能”行骗的以色列人尤里·盖勒的真相，但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1983年

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特异功能的宣传开始改头换面，与气功联系在一起。认为“气功”可以开发“特异功能”，于是掀起了气功热。

×××发表文章，认为“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统一，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引起整个科学的

^① 陈信：《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中国》，现代出版社，1997年。

^② ×××：《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第1卷（1983年）第1期。

革命。……那是翻天覆地的事，是科学要整个改变面貌，整个世界也会大大地向前发展。”

钱伟长同《中华气功》杂志编辑人员谈话。他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也没有包治百病的东西，也没有万能的东西。科学是各种事物在发展及进步中互相促进的。科学是没有顶峰的。宣传气功也一样，应该留有余地，不要有迷信。”

3月14日，×××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作《关于科学道德》的报告。之后，到1987年10月5日，他在该所一共作了一百多次报告、发言，就人体科学、系统科学、气功、中医、特异功能、以及科学革命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报告后来整理成一本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这些观点对人体科学研究影响很大。

3月30日，《文汇报》发表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香桐的文章：《对大脑研究的哲学思考》，批评了特异功能。认为人的感觉器官具有专门的功能。“前一段时期盛传的‘耳朵认字’，用所谓特异功能否认感觉器官的特异性，否认大脑思维的一般规律，它所提出的问题就不仅仅涉及自然科学。要科学地回答它的挑战，需要脑科学知识，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到这篇文章后，批评张教授不知道特异功能的进展。“我看这位老科学家有点跟不上时代。”^①

5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杂志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1980年10月15日创刊的《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

6月12日到19日，北京举办了“量子物理与人体科学讨论会”。

① ×××：《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1984年

2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一个气功学术会议上作报告：《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他说：“搞这个事业很不容易。但我们相信，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就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如果搞得好，这场革命在21世纪就会到来。”他认为，不能把人体科学“单纯地看作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活动”。这是模仿《共产党宣言》，把人体科学比喻成共产主义运动。并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斗”。

1985年

《气功与体育》杂志在西安创刊。主编郭周礼原是一个体育教师，气功爱好者。此人值得一提是因为，他后来任“国际气功联合会”和“中华体育气功研究会”两会秘书长，并利用气功进行诈骗。

7月，《读书》杂志发表于光远的文章：《为〈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出版讲几句话》。他说：“《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过去不被自然辩证法研究者所重视，而今天成为一个反对伪科学宣传的重要武器，恩格斯写它的时候，决不会想到他写的这篇论文，是对8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出现的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有力驳斥。”

8月2日，于光远把他在三四年前的文章收集起来计划出版，但是这本书直到1986年11月才出版。

12月25日，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1986年

2月23日，×××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说，当前气功科学研究的一项任务是建立唯象气功学。“什么叫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国有十亿人口，如果每一百个当中就有一个练功，就是一千万，每百个练功的人有一个人去教，就需要十万个气功师，把这十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就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实践表明，气功可以练出特异功能来。——……到那时，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就无愧于自己的祖先，应该闻名于世了。”^①

3月，《气功与科学》发表一篇介绍严新的文章：《现实和我们身边的神话》。严新开始引起全国的关注。这位“现代济公”后来成为中国气功界的风云人物。他曾在中国大地红极一时，几十元一张的带功报告门票被炒到几百元，几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外，在公开场合，群众对任何名人的狂热程度没有超过严新的。

4月5日，×××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说，“人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对特异功能，“有人试图解释它，我看不行，因为它远远超出现代科学的范围。”

5月26日—31日，“人体科学研究会”代表大会在京举行，“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作了《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的发言。认为人体科学“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千万不要认为是个简单的事情，这涉及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的

^① 《自然杂志》，1986年9卷5期。

革命。”同时批评“一些人创造了虚无缥缈的所谓理论，什么气场啦，还有同志说是‘龙子’啦，其实这些东西没有科学实验的验证事实，是凭空想的。……有的同志提出这个‘场’-那个‘子’，无非使用一个说不清楚代替另一个说不清。这不能叫做科学。”^①会上，杨超作了《哲学界在思考》的发言。他说，“人体科学的发展必然引起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6月，严新到北京为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病。虽然严新在给邓稼先的治疗上没能为自己捞着分，但是却为他在北京传功创造了条件。中国气功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接纳了他。9月—12月，严新开始在清华大学作气功报告和一系列气功“外气”实验。

11月18日，《光明日报》报道：《怀揣着求医者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北上——中医师严新千里迢迢找病人他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沿途为不少人治好病》。这是严新第一次在全国大报上报道。

11月，于光远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时特异功能已经在中国闹腾了近八年。这本书收集了他从1981年7月到1982年4月左右的文章、讲话、书信等，是我国反对伪科学的一本经典之作。

这一年还成立了“人体科学”三人小组，1987年，改为四人小组。1990年12月，又改为六人小组。这个小组虽经多次变换×××一直在其中，并在1990年后明确他为领导。

1987年

1987年是气功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① ×××：《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人体特异功能研究》，4卷1、2期，第2—3页，1987年。

一是严新与清华大学合作做气功“外气”实验。实验“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改变物质”，应“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二是张宏堡“宗师”创立了“中华养生益智功”，并正式出山。

1月24日，《光明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实验发现，“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能治病的原因，这项发现表明我国气功的研究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25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予以转载；26日的英文版《中国日报》和香港《文汇报》也发了消息。这里也涉及到一个科学态度问题。他们的实验是在1月23日完成的。在没有写好实验报告时就向新闻界公布，这种做法在科学上是不慎重的。

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李升平宣布，严新远距离发功使生物实验室里的化学样品发生变化。

《气功与科学》第1期发表暨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梁荣麟的文章：《对气功及气的不恰当描述》。该文否定了“外气”的五种观点：1. 外气是人体的—种潜能；2. 外气具有物质性；3. 外气是电磁波；4. 外气是低频调制红外线；5. 人体是有生命的磁体。

“特异功能高医”张维祥在北京开办特医门诊。他自称和宇宙间的高级生命有联系，能听到宇宙人对他下达的指令。

3月，张香玉从青海到北京，并开始传授她的“大自然中心功”。

5月3日，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那时于光远已经调离国家科委。但是这个学会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是1992年的事。

5月15日，严新在辽宁向外界透露，辽宁方面邀请他作气功扑灭大兴安岭火灾的试验。他说：“过去气功有呼风唤雨

这个说法，人们都把这看作迷信。现在应重新看看这个说法究竟是封建迷信还是科学的。因为我在清华大学做的实验说明，气功能使温度升高，使气压升高。如果气功师发功，使气压升高，就能把地下水压上来；地面温度升高，水蒸气就会上升，水蒸发多了，就会降雨。”^① 这样看来，气功“呼风唤雨”是有科学道理的。不过，这事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在火灾发生的初期不发功，而是等到解放军奋力扑救之后才发功呢？

8月，张宏堡“宗师”出山。那时他刚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据说“拿了十几个学位”。但是《大气功师出山》一书却说，这位“累计旷课90余天的学生”的“毕业证书至今还在校方”，原因是他没有时间去领，“忙别的事去了”。

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把与严新作实验的7篇论文提交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对这组论文予以极高的评价。他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9月4日，《光明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首次发现，气功外气能够影响核酸分子结构，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分子结构。”

10月12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西安召开大会。唐雨在会上对记者说，他由于忙着做“耳朵认字”实验，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因而初中毕业时没能考上高中。由于他经常埋怨自己的特异功能，根本没有想到要保持这种功能，致使他的功能已逐渐消退。

^① 《严新报告》，《气功与科学》增刊，1988年2月。

1988年

一方面，由于CSICOP于3、4月间来中国考察“特异功能”，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张宝胜的“汇报表演”以失败而告终，国内掀起了揭露特异功能和伪气功的第二次高潮。

1月，新闻界掀起了一股张宏堡热。1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神奇的事业——气功大师张宏堡小记》；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张宏堡掀起气功热》；22日，《中国电子报》报道：《张宏堡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办气功班》；31日，《天津日报》报道：《中华养生益智功风靡京城知识界》。

2月，在龙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中央电视台现场播放了张加陵表演的“纸上站人”、“气球站人”、“纸吊灯管打千秋”等轻功节目。但是据知情人士说，这个节目实际上是经过剪切的。

《气功与科学》增刊本刊发了《严新报告》。严新在这次报告中宣布了气功阻挡原子弹和大兴安岭灭火实验的新闻。该刊还同时发表了陆祖荫、李升平等人与严新合作实验的一组论文：《气功治疗的生物物理学基础的研究》。

3—4月，受《科技日报》的邀请，“对于声称的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来到中国考察特异功能现象。考察团由哲学家库尔茨（主席）、魔术师兰迪、心理学家阿考克等6人组成。这个国际性的科学与教育组织成立于1976年。其宗旨是：以负责的态度，科学的观点，批判地考察各种声称的异常现象，并通过会刊《怀疑的探索者》和讲演、电视节目等传播考察研究的结果，向公众进行“科学的目的与方法”的教育。自1964起，兰迪就随身带着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声

称“任何人能在符合要求的条件下显示特异功能，我马上付给一万美元。”至今测试过七百多名全世界声称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却没有一人能取走这张支票。这次来中国考察，他们先后在北京、西安、上海等地作报告和试验，结果是所有“超人都失灵。相反，他们发现了一些不可靠和作弊的证据。

5月13日，张宝胜进行汇报表演。起因是CSICOP代表团访华活动及其调查报告引起很多人的异议。“人体科学工作组”决定邀请反对派参加，组织一次特异功能汇报表演。会议由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陈信主持，反对派人士有体自新、何祚庥等人。表演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尽管张宝胜作了很大努力，却始终没有完成指定的表演项目。在做非指定项目时，又调包作弊。因此，双方都认为这次表演失败。但是这次张宝胜败走麦城事件的真相，直到1995年才曝光。

6月29日的《科技日报》和6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分别发表文章，《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发表专题报告指出，人体特异功能迄今未获得科学证明》。×××在7月召开的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的会议上提到了这些报道，以及《Scientific American》8月号的文章。

7月19日，《科技日报》发表“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在中国考察时的演讲：库尔茨的《谈谈科学与异常现象》和肯特列·弗莱兹尔的《用科学知识帮助人们弄清真相》。

库尔茨在演讲中指出，异常现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心灵力”，即人体特异功能，包括超感知觉（ESP）和意念制动（PK）；第二类是“空间时代的宗教”，如占星术；第三类是“不明飞行物”，即所谓UFO。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异常现象呢？他认为，“首先要有开放的思想，而不应仅仅由于那些稀奇古怪的现象或违反常规的理论对我们的观念构成了挑战，就

反对它们。”“其次，只要任何声称的异常现象有真实依据，而且它们的效果在其它实验室也可以观察到，或者受试者可以有其他独立的研究者加以考察和验证，我们也会重视的。”“第三，一旦这些数据被确认有无可辩驳地可靠性，下一个步骤就是要设法阐明或解释人们声称发生的事。”但是，异常现象通常做不到这一点。文章还指出：

传闻故事是不可靠的，不能根据表面现象就相信。

迄今为止，“超感官能力”还未在实验室得到证实。

在这个领域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弄虚作假和欺骗。

由于存在“超自然的诱惑”，卷入这个领域的大多数人相信特异现象，不是靠事实，而是靠先入之见。

必须特别警惕那种为了支持异常现象而不加批判地认定“眼见为实”的态度。

最后，库尔茨提出两点意见供科学界和教育界人士参考：第一，必需要让公众知道科学界对各种异常现象的声称的批评。第二，我们需要在公众中培养对科学事业本身的重视的态度。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向更多的公众、特别是大中学生传播对科学方法本质的认识。^①

7月23日，《科技日报》再次发表心理学家阿尔考克的报告：《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吴小平的文章：《以科学的态度探索未知》，以及美国《时代》周刊6月13日第24期发表的介绍兰迪的文章。

吴小平的文章把“对于声称的异常现象调查委员会”的一些观点作了归纳。主要内容包括：1. 科学并不像有些批评者想象的那样排斥任何可能性，但是科学可以估量可能性的大

^①（美）库尔茨：《谈谈科学与异常现象》，《科技日报》，1988年7月19日。

小。对那些异常现象，要极其审慎地对待。2. 轻信特异功能是当今一个世界性现象，甚至一些科学家也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3. 关键在于弄清客观的事实。4. 在对“异常现象”进行周密考察时，魔术师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5. 1987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对“超心理学技术”的评估结论是，最佳的科学证据并不支持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致动存在的结论。6. 对声称的异常现象进行科学考察很有必要。用科学观察的结果反对迷信，揭露骗局，迎接“异常现象”对科学的挑战。

8月20日，《北京晚报》发表署名文章：《是气功还是“气功教”？》。文章认为气功是一种功夫，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能受益，想靠听几场“大师”的报告就能获得神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防止把气功锻炼变成气功教。

8—10月，《自然杂志》第8、9、10期发表严新在清华大学作的外气系列实验。该组实验总共7篇，其中包括《气功外气2000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影响的实验研究》。这些实验把“气功外气”神化了。11月，在日本举行的“气与人间科学”国际学术交流会上宣读了这些论文。

11月，香港掀起讨伐神怪气功热。《大公报》发表化学博士甘巨庭的文章：《姑妄评之，姑妄听之——评〈严新报告〉的科学实验》。

12月，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了×××等著的《论人体科学》。

年底，张香玉在北京成立了“自然中心功研究所”。她自称会说“宇宙语”、会唱“宇宙歌”、会写“宇宙文字”，能与鬼神相通，受命于天，传功于世人，准备拯救本世纪末的“世界大劫难”。

1989年

1月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于光远的谈话：《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他说：“我想有朝一日再写一批文章，再来一次战斗。”

2月，针对于光远的文章，聂荣春写了一篇《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这篇稿子在聂荣春去世后，于1991年发表在《中国人体科学》第1卷第4期上。

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叶圣陶先生之子叶至善的文章，文章说：“我和父亲一直住在一起，知道他临终也没有看过特异功能表演。‘让他亲眼看’的好心人是有的，或者打电话来，或者寄请柬来，还有愿意上门来表演的，他都婉言谢绝了。”

3月11日，《健康报》发表气功研究专家、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负责人张洪林的文章。

4月13日，《健康报》发表清华大学科研处处长张宏涛的郑重声明：《某些气功研究与清华无关》。报道说，“以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名义发表的《气功外气对2000公里超距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等文章，在海内外反响很大。”“这些研究与清华大学无关，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项科研成果。”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既没有提出过成果鉴定申请，也没有组织过专家评审、测试测定，更没有经过成果登记。张宏涛还说，某报刊登的“清华大学东方健美研究中心”有关科研人员研究“气功减肥”的消息，“证明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效减肥手段”。对此，他强调，“东方健美研究中心不是清华大学的研究单位，也没有专家对气功减肥的方法进行过评价或鉴定。”

8月20日，《中国体育报》发表张洪林的文章：《清华大

学科研处应进一步澄清事实》。

1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等著的《创建人体科学》并举行了首发式。该书收集了×××全部有关论述和各种典型实验结果。

1990年

2月，张香玉在青海西宁受功21场，获利9.7万元。3月18日到31日，张香玉打着“为亚运会集资”的旗号在北京北太平庄进行“万人受功”。14天共受功27场，牟取暴利40余万元。

4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醒民”的文章：《警惕迷信附体》。文章严厉谴责张香玉借气功宣扬迷信，同时提出疑问：“为什么政府不管？”当天下午，张香玉被公安部门收留审查，并于12月5日正式逮捕。^①

5月，《中国人体科学》杂志创刊。

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谢龙主编的《现代哲学观念》。该书第十二章题为《主体思维和人体特异功能》，大约是因为人体特异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古典形态推向了“现代”形态。

8月10日，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郭正谊的组织下，北京科学会堂举办了一个“弘扬科学气功，揭露封建迷信”报告会。会上，张洪林等人作了《神化气功探源》等几场报告。另外，面对科学界、医学界和新闻界人士，一位名叫司马南的“大师”表演了意念认字、抖药片、白水变味、

^① 参见郭正谊、申振铎主编的《气功与伪气功——兼揭露张香玉的巫术》，北京出版社出版，1991年。

一指禅停电扇、电气功等“特异功能”。但是表演完后，他声明那不是特异功能。那次活动标志着司马南正式出山，开始揭露伪气功。

11月3日，同样在北京科学会堂，张宏堡作了一次《生命科学学术报告》。

12月，于光远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6期上发表文章：《论科学与伪科学》。这篇论文对科学与伪科学作了界定。并指出，同伪科学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有必要对伪科学作社会科学研究。

1991年

在苏州市电子局领导等人的支持下，沈昌成立了“沈昌特功求是者协会”。此后，他在苏州、吴县作了多场带功报告，同时在苏州公园等地开设“信息茶座”。

1992年

2月，于光远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期发表文章：《坚持科学态度》。

5月，李洪志开始停薪留职传播法轮功。

8月14日，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发射澳星B1取得圆满成功。12月30日，香港发景国际集团和世界华人协会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捐赠40万元。出人意料的是，在捐赠仪式上，发景集团提出将20万元奖给某“大师”（指陈林峰）。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10月，郭正谊率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美国参加CSICOP学术年会。会议期间，委员会主席库尔茨主持了中国特异现象专场报告会，中国代表团介绍了中国江湖门派、八卦、“特异

功能”、《周易》及气功“热”等问题。

1993年

2月2日,《科技日报》发表陈祖甲的文章:《何必求助于神魔》,认为唯物论者应该依靠科学技术,而不能求助于神魔。

5月,于光远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毛泽东与科学规划》。文章谈到大跃进时,《人民日报》曾发表有人根据阳光辐射的数量来计算粮食产量的文章,来证明亩产十万斤是可能的,并把此事与特异功能相联系。

1994年

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贾西平的文章:《“气功师的预测”及其它》,揭露陈林峰所谓“预测澳星发射成功”。

据《中华民政医学杂志》第6卷,因练气功导致精神病的病例上升。

10月11日,民政部发出解散“国际气功联合会”的命令。命令说,该组织是未经民政部注册的非法组织,自1990年起就擅自打着“国际气功联合会”的牌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坏。

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要充分认识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这项工作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对利用封建迷信搞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依法打击,对反动会道门组织要坚决依法取缔。”

1995年

随着中央关于科普工作《意见》的下达和全国科技大会的

召开，我国反对伪科学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众多新闻媒体的积极参与，形成了反伪科学的新高潮。

2月，中国科学院112名院士联名签发“科普倡议书”。希望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来反对伪科学。

3月5日，《中国科协报》发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在中国科协四届五次会议上的发言：《大力开展科普工作，坚决反击伪科学》。

4月中旬，“法力无边”的“佛子”张小平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落入法网。张小平被收押表明，以搞气功为名、行诈骗等违法之事的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5月26日，《北京青年报》发表《“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揭露了张宝胜在1988年5月的那次表演失败和作弊的过程。

28日，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会上作了《迈向科技大发展的新世纪》的报告。他作报告中说：“现在社会上有人鼓吹可能存在新的相互作用力，以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辩护，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中国科协酝酿成立了一个包括多方面人士的“保卫科学精神、反对迷信愚昧”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于9月在友谊宾馆以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大型研讨会。

6月2日，《北京日报》发表何祚麻等人的呼吁：《该揭露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了》。

20日至24日，柯云路以“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身份组织了“柯云路健康万里行报告团”，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报告会。经查，这个“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是一个未登记注册的非法组织。8月5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作出“停止

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筹建工作”的决定；12月5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今后如有人以‘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名义从事违法活动，有关部门将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6月，《中国青年》第6期发表反伪科学专题：《科学与伪科学——世纪末的较量》。

7月1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王小波的文章：《迷信与邪门书》。文中所指的“邪门书”就是柯云路那些“特异功能”、“生命科学”的书。

26日，《工人日报》发表五篇评严新在清华大学做的“气功外气”实验及其它一些表演的文章，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这些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认为那些实验和表演“甚不科学”。

7月，司马南著的《神功内幕》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8月8日，《工人日报》以“伪科学为什么在当前的我国泛滥？”为主题召开科学工作者座谈会。龚育之在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是共命运的》的发言。

9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访了原清华大学科研处处长张宏涛，他重申五年前的声明：严新“科学”实验与清华校方无关。并声明，“严新不是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学校也从未聘请过包括严新在内的任何气功师担任教师或兼职研究员。”^①

21日，《工人日报》报道：8月5至9日，在广东汕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上，与会华裔科学家纷纷向中国科技界表示祝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人表示支持中国科学界、新闻界，支持何祚庥

^① 据8月9日的《工人日报》透露，严新曾想当清华大学的名誉教授，但被清华校长巧妙地拒绝了。

反对伪科学、伪气功。

9月1日，柯云路写了一封致杨振宁等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公开信：《人体特异功能真伪之辨》。认为他们在华人物理学大会上的表态“过于轻率、急躁”。他可以就“人体特异功能”向世界公证。

3、4、5日，香港《中国时报》发表“大陆反思特异功能系列报道”：《媒体“发功”，特异功能首当其冲》；《“超人”特异功能，多属子虚乌有》；《伪科学蒙蔽人心，十二亿人之耻》。

21日，中国科协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捍卫科学精神”研讨会。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作了《科学终将战胜迷信、愚昧和伪科学》的发言。

25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的文章：《评陈林峰的“预测”》，揭露陈林峰所谓“预测”的荒谬。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官杉的文章：《灵魂的新装——评〈人类神秘现象破译〉》，揭露柯云路装神弄鬼的面目。

12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记者孔晓宁的文章：《向伪科学宣战》。

1996年

1月20日，×××在人体科学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讲了自己如何从不相信特异功能转到相信、支持特异功能的过程；对特异功能表演，他认为“100个当中即使有99个作假，只有一个可以完全地排除作假的可能，也是值得研究的。”讲话还谈到人体科学领导小组的变迁。最后，针对去年5月以来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的批判，他提出了十六条意见。这次讲话可以说是对中国人体科学（特异功能）17年的一个总结。由于没有取得成果，而且“在我有生之年大概研究不出什么结

果”，他最后的一些话流露出一种悲壮的语气。^①

26日，《工人日报》发表秋云飞的文章：《听沈昌吹牛，心想事成太荒唐》。4月8日，沈昌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状告《工人日报》社和秋云飞。10月10日，法院认为被告“不涉及侵犯名誉权问题”，驳回原告沈昌的起诉。

2月7日，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科学界要同社会各界一道，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

3月1日，《求是》杂志第5期发表郭正谊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

5月17日，龚育之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认为要对伪科学作理论的、案例的、和社会的研究；同时要把握好伪科学的界限。当前反对伪科学，就是反对那些用“科学”的名义，违背基本的科学事实和规律，来宣传迷信和进行欺骗的学说和行为。

6月12日，中宣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发出《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通知》说，“在对待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这类重大问题上，新闻宣传要勇于捍卫科学与真理，不能模棱两可，对违反科学事实、科学原则和科学精神的荒诞学说，对反科学、伪科学的‘奇闻怪事’，对求神弄鬼的封建迷信活动，对违反科学规律的弄虚作假行为，一定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批评和反对。”

6月17日，《光明日报》载文：《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由〈转法轮〉一书引出的话题》，指出这是“一部宣传封

^① 《中国人体科学》6卷4期，第149—155页。

建迷信的伪科学图书，居然得以正式出版，而且出版后确实迷惑了一些人。”结果该报接到 900 多封“法轮功”信徒的围攻信。

本月，世界怀疑论者协会“第 20 届国际学术年会和第一届世界怀疑论者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我国申振钰等人参加了大会。

8月30日，《工人日报》报道：《北大学者奋起批驳沈昌到北大贩卖所谓“人体科技”》。北京大学教授黄楠森、赵光武揭露，沈昌人体科技的所谓“意识调控”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9月1日，何祚麻主编的《伪科学曝光》一书出版发行。在首发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珩、邹承鲁、庄逢甘、何祚麻和龚育之等多位老科学家和理论家为公众签名售书。曾经喧嚣多年的“气功大师”、“预测大师”、和“发明大师”们，在书中露出了它们的“庐山真面目”。

10月16日，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在中国科技馆举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研讨会。

21—22日，第二次“真伪科学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12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信息茶”探秘。该节目揭露了沈昌“信息茶”的骗局。记者问：“信息茶能治哪些病？”沈昌：“很难说。信息茶只是告诉你一个技术。主要要靠心诚。它的作用超出我们的想象。想象是一种生命信息，这种信息在所有的仪器上都是不能检测的。”记者：“你是如何给茶叶加信息的？”沈昌：“就是靠想。一想信息就进入茶中，时间和距离不成问题。”

12月17—18日，“弘扬科学精神、反对迷信愚昧和伪科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科学技

术馆召开。

本月，由于李洪志将气功宗教化，违背了气功的宗旨，中国气功协会将“法轮功”从直属功派中予以除名。

1997年

2月26日，人体科学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李杰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认为，关于特异功能、气功外气的存在性检验，目前还缺乏铁证，不能被科学界公认。针对作假问题，他说，一百次失败都允许，但是一次作弊、变魔术也不行。

3月30日，宣称“每期版面都由气功名家进行特定的气功信息处理，带功于字里行间，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就能接受功益”的《国际气功报》被查封。

11月18—19日，“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第四次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的秘书涂元季在开幕式上发言说：“有的气功师在那里‘预测’，说他得了什么病，并表示要给钱老治病，在这里我代表钱老和他的夫人蒋英同志对大家的关心一并表示感谢。”^①最后，原任理事长陈信作了总结报告。

12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沈昌一案，判处苏州市技术监督局、物价局对沈昌行政处罚650万元。

1998年

《南方周末》2月13日第一版报道：《司马南、胡万林决斗终南山》。

2月27日，西安市警方联合行动，一举取缔胡万林在长

^① 涂元季：《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中国人体科学》8卷1期，第14页。

安县太乙宫镇的非法活动的窝点。胡于警方缉拿前闻风潜逃。年底在河南被缉拿归案。

2月，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何宏博士在参加“国际变态心理学联合会第40届年会”后认为，相对是西方的超心理学研究，中国的人体科学研究还缺乏严肃、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人们在对待特异功能问题上，可能会犯相近的观察性错误。这种来自人体科学研究者内部的反思声音很难得。

3月13日，《南方周末》发表“周末故事”：《揭开民间邪教“法轮功”的真面目》。

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书中介绍的“当代华佗”胡万林成了众多媒体、读者、患者关心的热点。受中国科协委托，中华医学会、中国中医药学会分别于3月27日和5月11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关于黄帝内经专家座谈会”。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李乾构说，《发现黄帝内经》内容违反科学。^①

本月，山东《齐鲁晚报》刊登两篇揭露“法轮功”的短文。4月1日刊登《请看法轮功是咋回事》；7日刊登《要旗帜鲜明地宣扬科学》；8日刊登《“法轮功大师”聚财有道》。6月1日，上千名“法轮功”练习者前往该报围攻，3日达到近2000人。该报和《大众晚报》在给上级的书面汇报中指出，“法轮功”危害社会，应予以坚决取缔。

3—4月，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第3、4期发表陈星桥的长篇论文：《法轮功——一种具有民间邪教特点的附佛外道》。

^① 《中国科协报》，1998年4月23日。

4月8日，中国科协和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科学与法律”主题研讨会。与会的著名科学家和法学家强烈呼吁，科技界和法律界要携起手来，依法严厉打击那些假借科学名义诈骗钱财、祸国殃民的反科学和伪科学活动。4月23日，《法制日报》发表文章：《向伪科学扬起法律之剑》。

5月，北京电视台在《北京特快》节目中播出了揭露“法轮功”的一些镜头，遭到大批“法轮功”练习者的围攻，结果迫使电视台致歉并解雇了该节目的制作者。

5月11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司马南郑重宣布：悬赏百万人民币，奖励特异功能人。自1998年5月11日1起到2010年12月31日，凡经过科学验证得到科学界公认具有特异功能的中国公民，将一次性得到100万元人民币奖励。

6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短报道：《女儿不幸炸双手母亲邪术疗伤痛》。文章揭露该母亲愚昧地依靠“法轮功”意念治疗，致使女孩双手残疾并危及生命。该报社被“法轮功”围攻3天，人数最多时达1800人。

6月，《真理的追求》第6期发表何祚麻的理论文章：《经验不等于实践》。主要论点有：1. 实践高于理论，但是理论高于经验。2. 经验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3.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不会被新的实践所推翻。4. 信仰特异功能的所谓“眼见为实”只是经验。

9月20日，《环球时报》报道，曾对“特异功能”悬赏1万美元的美国魔术师兰迪再次挑战“通灵人”，并把奖金提高到100万美元。

9月底，司马南在湖南卫视、湖南经济电视台表演，向全省人民普及“特异功能”。

11月15日，李政道在北京会见何祚麻、司马南时明确表

示不相信特异功能。他说，“科学不特异，特异非科学”。

1999年

1月，《三思评论》第一卷发表记者在1998年7、8月间关于“特异功能”和“超自然现象”的五人访谈录：^①

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对特异功能的观点是：第一，它违反现在一般的科学常识；第二，它违反经过多少年建立起来的科学规律。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认为，特异功能和宗教不是一类东西，却与邪教或反动会道门一脉相承；科学家不要被那些在其研究范围以外的东西所迷惑；非科学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目的，“我有责任反对它”。

中国科普研究室主任申振钰认为，科学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或标准是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科学是客观的，无论是信仰者还是不信仰者，科学都是一样的。特异功能由于不能满足这些标准，因此还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

中国人体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易成是在看了王强、王斌的表演后“上钩”的；在看了一个甘肃孩子的表演后就几乎深信不移了。他做了很多“致动”、“穿壁”的实验，并认为这些实验不是不能重复，但是因为“功能人”年纪大了、做“疲”了，因此很难重复。在做不出来时，他们就会作弊。另外，他认为特异功能实验与一般的气功研究有区别。

这个谈话中最有意思的当属507所人体科学专业副研究员何宏的谈话。他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牛津大学物理系做博士后。但是他一直坚持练气功，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独

^① 黄爱禾，《三思评论》（第1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

到的见解。他回国的初衷是想找到确凿的特异功能现象，然后用前沿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但是现在的情况与其初衷差异很大。对于特异功能研究，他主张用严密的实验，可靠的方法进行检验。虽然专职从事人体科学研究，他却是中间派；到底有没有特异功能，还不能肯定。他还另著文认为，迄今为止，气功研究总是个别研究者所在的研究组才能获得惊人的结果，外人重复不出来。那些气功研究者“既不屑于做给别人看，却又连续不断报道新项目、新发现，满足于自己验证自己的发现。”^①

这次访谈的对象双方层次都很高，大家各抒己见。遗憾的是，访谈是单独进行的，而不是双方面对面地交谈。

3月3—11日，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何祚庥、王夔、冼鼎昌等人向大会提交了三个有关胡万林的提案，均已立案。

4月11日，天津教育学院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何祚庥的署名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

4月20日，一些反伪科学的人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会议。于光远在会上作了《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责任》的发言。他指出，如果我们一味忍让退缩，如果我们党和政府再不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那么伪科学、伪气功必然会进一步“显示力量”。其实，当时“法轮功”已经在天津“显示力量”，虽然于老还不知道。

果然，5天后的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练习者就有组织地聚集在中南海附近“显示力量”，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① 何宏：《气功科研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气功与科学》，1999年第1期，第5页。

7月22日，国家民政部发出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为非法组织；公安部发出通告，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修炼“法轮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政府终于行动起来了。但是，反对伪科学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而是“任重道远”。用于光远的话来说，“同伪科学至少要斗一百年”。

参考文献：

《评所谓“特异功能”》，于光远著，知识出版社，1986年

《我不信邪》，何祚麻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钟科文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还气功本来面目》，张洪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虚妄的智慧》，王昌盛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于光远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天惑》，申潭著，华夏出版社，1997年

《伪科学曝光》，何祚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伪科学再曝光》，何祚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神功内幕》，司马南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中国气功大论战》，张兆志著，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年

《何祚麻与法轮功》，何祚麻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气功与伪气功》，郭正谊、申振钰主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

《法轮功大起底》，程鹤龄著，现代出版社2000年

《司马南还活着》，李力研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司马南反了》，路云亭著，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

《转不动的法轮》，邓卫编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

《“法轮功”歪理邪说剖析》，中宣部新闻局编，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年。

后 记

在编者和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本书终于出版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反伪科学的斗士们真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现在，气候已经完全不同了。阳光总要冲破阴云，普照大地。

本书的编写分别由三位作者负责：

第一部：申振钰，他是我国最早关注和揭露特异功能的斗士之一，从1979年起就开始从事特异功能问题研究，至今仍战斗在反伪科学的最前沿。

第二部：曾昭贵，他是何祚庥院士的博士，专注于我国伪科学与伪气功的发展史研究。本书所附“气功、特异功能论争大事记”也为他所整理。

第三部：徐升国，他从1999年起开始从事“法轮功”邪教问题研究，有关文章曾被新华社发通稿，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采用，还参与过数部反邪教图书撰写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大量图书和论文资料，由于篇幅有限，未能一一标出，在此谨向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本书责任编辑对书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作 者

2001年6月15日